

中共國沒有明天！

試論制度、文化與人性

黃河清

謹以此書獻給“生行善美真，死蹈義烈信”的胞妹黃迎憲！

卷首語

五千年文明傳承，兩千年儒道延續，五十七年人性泯滅沉淪墮落、生態環境瀕臨全面崩潰。山頹木壞，陸沉魚爛，神州已逞末日景象，中共國沒有明天！

目錄

自序	2
第一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3
第二章 制度殺人慘有跡	5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無形	9
第四章 忍系膽汁甘如飴	15
第五章 忠融骨髓化入血	22
第六章 謊絕慘絕無恥絕	37
第七章 懦怯大行剛勇無	49
第八章 地獄煎熬也幽默	55
第九章 最後神器墮落盡	59
第十章 共產黨萬稅	68
第十一章 毛主席萬歲	72
第十二章 孩子已經沒有明天	79
第十三章 東西文化對照錄	85
第十四章 李敖演講榮辱談	98
第十五章 毛將焉附與獨立人格	105
第十六章 異數文化的悲哀	113
第十七章 不是不見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123
第十八章 亂象紛呈碾碎一切	126
第十九章 文化秩序重建無望	131
第二十章 生態環境全面崩潰	137
第二十一章 明天，你在哪里？	145
後記	149

自序

制度、文化兩者的關係是老題目，論者濫矣；但將兩者與人性聯繫起來探究，則不多見。筆者一試，期見新意。書名“中國沒有明天”，非故作驚人之語，乃無可奈何之實。末日景象屢現，歌舞昇平愈盛，本歷史迴光返照之陳跡。皇帝新衣既幻，孩子真話是實。筆者不過臨死之前，回復童真童趣以過把久違了的真癮罷了。

本書各章聯為一個整體，總括論述制度、文化和人性三者的關係；每章又可以獨立成篇，用以說明各章標題所示的問題。

寫法上儘量避免此類文章必然的刻板、枯燥、理論化，力求多用史實、事例有意味地具體地也必然是沉重地講述所要說明的意思。希望能給讀者耳目一新、有興趣讀完的感覺。然意存高遠，筆難從心，但求盡力。

所有引文，皆有出處，不作詳注，為求簡潔，避免冗沓，且本書非學術專著也。

中國明天之有無，歷史將證實。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一月於地中海畔

第一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制度是營盤，朝代是流水，皇帝是兵！

這營盤、流水、兵的辯證關係是中華民族兩千餘年歷史的鐵則。

黃虞堯舜禹，已難以確切稽考；商周，史跡鑿鑿；春秋戰國秦後，則有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物作了準確的記錄。從秦始皇嬴政到清宣統溥儀，中國有幾百位皇帝。溥儀遜位，名義上沒有了皇帝，事實上還是存在，袁世凱、張勳且不論；蔣介石，是准皇帝；毛澤東，是大皇帝，集大成的大皇帝，集皇權和教主于一身，集秦始皇和孔夫子于一體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做這個營盤裏的兵是許多人的夢想。最早也最典型最傳統最概括的例子是三個人的豪言壯語。貴族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小吏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農夫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明康熙……這些兵們，無過於這三種形態。他們在制度的營盤裏翻江倒海、縱橫馳騁，成就了一代代、一樁樁豐功偉業，在兩千餘年的歷史長河裏演出了無數威武雄壯的活劇。其中，贊襄最力，最功不可沒的是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孫。孔子的智慧、孔學的理念、孔門的才華不斷地修繕、美化這個營盤，似滔滔不絕的流水沖刷浸潤的這個營盤日臻完善、成熟以至美倫美奐、堅不可摧。因此，代表並見證著這個營盤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歷朝歷代，無論如何更替，都能傲然於世，屹立不倒！

兩漢、魏晉、大唐、南北宋、元、明、清，無論是爛漢、髒唐、懦弱稱臣的南宋兒皇帝、屠戮功臣的朱元璋、外來的遊牧部落蒙古與女真，一旦進入這營盤，無不為流水所清洗所浸潤所滋養，大體上清潔光鮮起來、溫文爾雅起來。

小吏出身的漢高祖，逃命時把兒子推下車，對壘時不顧父親死活的無賴劉邦，當上了開國皇帝，執掌了營盤後，流水就開始將他的流氓習氣清除，那首著名的“大風歌”留下了他的帝王氣象：“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創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黃袍加身玩弄權術開有宋一朝的趙匡胤、其不肖子孫讓南宋王朝的子民苟安了150餘年的趙構，寺廟裏跑出來的野和尚明太祖朱元璋，都為營盤所陶範所制約，成就了一代代勳功偉業。一代天驕開拓疆土至貝加爾湖的成吉思汗，野性未改的努爾哈赤，平三藩收臺灣定一統的清聖祖玄燁，都被流水所清洗所浸潤所滋養而名垂青史。特別是玄燁的康熙朝，崇尚儒學，尤重朱熹理學，親臨曲阜拜謁孔廟，舉辦博學鴻儒科，編輯出版《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種種舉措，奠定了清王朝完全納入漢文化的基調。可以說，歷朝歷代的營盤、流水、兵的法則在清王朝同樣得到了體現和實施。

延至當代，毛澤東橫空出世，事情才開始發生變化。毛澤東背離了歷朝歷代的流水鐵則，將外來文化、而且是最壞最無人性的外來文化引了進來，硬揉進營盤中；因為毛澤東曠世奇才，這種硬揉非常到位、非常成功！

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伴隨著“五四”的狂飆而成了一場歷史的誤會。溫和而沉潛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到中國匆匆一瞥，很快就被列寧“十月革命”激揚激蕩激烈的暴力至上排

斥打擊的奄奄一息。毛澤東奉列寧主義為主臬，唯蘇維埃馬首是瞻，攪亂天下，亂中奪權，亂中取勝。這一股濁流洶湧澎湃，紅浪滔天，淹沒了神州大地。

如果說，毛澤東是“始作俑者”，那麼，應該是“其無後乎！”遺憾的是，他有後。更遺憾的是，毛澤東是作俑的大師、是斑斕虎豹，他的後是庸匠、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是裝腔作勢媚俗貓、是猥瑣不堪鼠竊輩。

毛澤東逼死劉少奇後選的接班人是上海灘上的暴發戶王洪文。這位所謂讀過書、當過兵、做過工的全才，其業餘愛好是下陸戰棋和玻璃球跳棋。王洪文實在上不了台盤，再選了一位華國鋒。這位英名領袖上台後的第一舉措，是派遣解放軍的工兵部隊在一夜之間將北京東西十里長安大街兩側已成蔭的法國梧桐連根拔起，換上了挺拔鑽天白楊新樹種，以示新王朝的開始，萬象更新；然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稚拙可愛的書法作品，大躍進時代的一首民歌：“高山頂上修條河，河水嘩嘩笑山坡。昔日在你腳下走，今日從你頭上過。”以彰登基、得志、俯視、快意恩仇的欣喜。

太小家子氣的華國鋒很快被老謀深算的鄧小平趕下了台。這位鄧小平，確有過人之才。毛澤東曾對梁漱溟稱讚鄧小平“這是一把好手，軍事、政治，樣樣來得！”周恩來私下與薄一波臧否人物時，稱劉伯承細心謹慎，凡事“舉輕若重”，譽鄧小平大處著眼，凡事“舉重若輕”。可惜，這位鄧小平舉重若輕過了線，玩坦克機槍如兒戲，屠學生、殺平民。此後，國防軍與警察一起武裝保衛貪污腐敗。虎豹吃飽了也就走開，豺狼則貪得無厭。當今豺狼般的貪墨正是鄧小平的豐功偉績。

至於江澤民、李鵬、胡錦濤之屬，荒腔走板，守成不足，等而下之不入流了。

皇帝兵坐掌營盤，舉手投足，自然有帝王氣象，行事規矩，兩千年一以貫之。虎豹踞營，則無法無天；犬貓鼠輩小家子氣，在營盤裏亂竄亂爬、亂叨亂咬、亂搬亂放，遂致一塌糊塗。毛澤東及其後，一27年，一30年，一共才短短57年，兩千年封建制度鐵打的營盤就被破壞的支離破碎、慘不忍睹、不可收拾。鐵打的營盤快要融化，將要坍塌！

第二章 制度殺人慘有跡

兩千年的中國史，兩千年的中國政權更替史就是殺人的歷史。同世界各國的戰爭歷史一樣，那種殺人的殘酷野蠻，人類已有定論。無須再論。

本章議論的是取得天下後的政權殺人！

本章說的是以公理、正義殺人！

本章說的是以法律殺人！

本章說的是國家特地用納稅人的錢養著的劊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合法地穩妥地殺人！

為了維持政權，要殺人，歷朝歷代皆然，無可非議；殺法殘忍、慘酷，砍頭、腰斬、寸磔、車裂、滅滿門、誅九族，雖令人毛骨悚然，回復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也能理解。但犯人死之前讓吃一頓飽飯好飯；讓同親人話別；臨刑前任其或頹然軟癱、或認罪懺悔、或喊冤叫屈、或呼天搶地、或詛咒詈罵、或豪言壯語、或視死如歸……滿足可以滿足的願望的人性天則也是歷朝歷代皆然、固然。

竇娥死前立下三誓，其中一誓是背後豎一匹白練，若冤，頸血濺到白練上，殺人者照辦了。阿Q砍頭前能唱“手執鋼鞭將你打”，大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如果說這是文學作品裏的描寫，當不得真，那麼：

商鞅車裂，李斯棄市史有記載，死前都讓說話的。

清末譚嗣同獄中賦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臨刑絕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鑒湖女俠秋瑾留下了千古絕唱：“秋風秋雨愁煞人”。

共產黨領袖瞿秋白被國民黨將軍宋希濂槍斃時未被捆綁，從容步行，唱著國際歌挨了一槍。

最為史家所稱道的魏晉竹林七賢的嵇康嵇中散，據《晉書》，嵇康被判死刑後三千太學生向司馬昭要求拜嵇為師；《世說新語》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從此絕矣！”

嵇康赴死的從容顯示了人的尊嚴。嵇康的從容，反襯了司馬昭的器度；司馬昭的器度，成就了嵇康的從容。若說殺人也有文明，這就是了。殺你，是利害攸關，性命攸關，政權攸關，你死我活，成者王侯敗者寇。辛亥元老陶成章祭秋瑾文就說過：“謀人國不成者，死。”沒話說。但因為同是人類，這死法就有異於野獸，打輸了咬死吃掉就完。人性的天則表明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在死法上有別於動物世界的野獸法則。

魯迅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目睹了學生和同輩的死亡後，對國民黨政府殘殺死囚、對死囚的心態有很深刻的揭示與剖析：

……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

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到得就要失敗了，……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人類現在如何殺人？

西方有劊子手這一職業。中國古代有三百六十行，就有劊子手這一行檔。京劇裏全身穿紅，手抱大刀片，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就是。延至現當代的中國，反倒沒有了，要殺人，臨時在解放軍官兵、武裝警察官兵以及獄卒中挑選。這是因為，要殺的人太多了！

英國司法部門公開的檔案顯示：在20世紀上半葉，劊子手職業在英國是一個很難得到的工作，入選者必須遵守嚴格的職業操守和道德。幹這行不但要求性格冷酷，還要求臂力過人，不能在行刑時拖泥帶水。必須在面臨壓力時技術動作不走樣，必須具備優秀的心理素質。執行死刑的時候手法俐落，對犯人盡到人道職責，是他們這一行的最大使命。至於報酬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劊子手的報酬由各地具體決定，報酬不一。英國監獄委員會推薦的報酬標準是：劊子手執行一次死刑可獲10個舊英國幾尼金幣（guineas），外加一張三等車廂火車票。舊時英國貨幣體制是一個幾尼金幣等於21個先令（shilling），1個先令等於12便士。現在的一個英鎊等於20個先令，那就意味著10個幾尼金幣等於10英鎊略多一點。這個報酬在當時物價情況下是相當可觀的收入。劊子手的助手在執行死刑後立即獲得1英鎊11先令6便士的固定報酬。如果兩個星期之後他們沒有洩密，將再一次獲得同等數額的報酬。

新加坡唯一的劊子手高齡74歲的辛格最近被政府解雇。雖然他有46年殺了850人的經驗，雖然他沒有徒弟，新加坡政府從此將不得不考慮從國外引進劊子手，新加坡政府還是因辛格違背職業操守向公眾媒體暴露了身份而毅然解雇了他。（摘自：博訊）

當代中國，沒有職業劊子手。這樣殺人：

1975年4月4日，遼寧省殺女死囚張志新，幾個大漢獄卒把張抬舉起來，掄了幾圈，摔在地上，用一塊磚墊在頸後，按住身子腦袋，一刀割斷喉管，再用一根鋼管連接喉嚨呼吸，然後拉去槍斃。

被割喉管後再殺死的死囚，在遼寧省張志新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沈陽市皇姑區某小學20歲青年教師賈某。

記者陳禹山著文揭露如此割喉管再殺死的在遼寧省有30餘案例。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批示張志新的檔案文字裏透露：遼寧省行刑前被割喉管的有28人。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殺女死囚李九蓮，獄卒用尖銳的竹簽把李的下顎和舌頭穿在一起，然後拉到贛州西郊槍殺，拋屍荒野，不准收埋，任其被侮辱糟蹋。

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殺女死囚鐘海源，故意一槍不打死，然後趁鐘半死不活之際抬到準備好的車上，活取鐘的腎臟。

筆者八十年代初期曾在浙江省溫州市任兼職律師，當時正是政府大力宣傳要法治的時候。一當事人剛滿18歲的XX因流氓罪被判死刑，我為其上訴，什麼回音也沒有。一日，市里開“嚴打”大會，XX被拉去槍斃了，沒通知我這個辯護人，也不通知家屬。他家人從另外的管道得知訊息，趕去刑場收屍，只撿到死者的一顆鈕扣和一些頭髮，屍體沒有了，怎麼問，都沒有了。當事人曾在我最後會見他商量上訴時囑我讓他哥哥在他遊街去刑場的路上等他見一面。我想像著他在刑車上絕望地尋找兄長的眼光和心情時，我同他一樣的絕望！

在中國，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新制度以國家、公理、正義、法律、革命的名義如此殺人！

據有關資料，五十七年間，從1950年的“鎮反”，1951年的“土改”，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的“肅反”，1957年的“反右”、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革命、1976年的“4・5”殺戮、1989年的“6・4”屠城，到現在，這個政權就這樣殺死了一千萬人以上。

如此殺人，又如何折磨人呢？

不管這人如何萬惡不赦、如何該死，讓吃喝拉撒睡，應該是人性的最基本天則。當然，監獄不是家居，犯人、死囚、獄卒也不全是紳士，背銬、腳鐐、打罵，作為懲罰性的手段全球皆然，有史皆然，那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是必要的。但在大陸的監獄裏，背銬一銬幾個月，家常便飯，死囚用鉚釘固定在囚床上不讓動彈幾個月，司空見慣。犯人不聽話而不被背銬，是稀罕；死囚不被固定，是特例。所謂不聽話，在政治犯，只是要求最起碼的人權，如唱支歌、提個抗議、要求得到尊重、不要辱及人格諸如此類的意義；所謂背銬幾個月，固定幾個月，是沒有一秒鐘解開過的意思。正常的人很難想像這人怎麼吃飯、喝水、撒尿、拉尿、睡覺，可這人就這麼過來了，千真萬確，半點不虛！有關此類事實的披露在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上、尤其在海外的互聯網上已比比皆是，無須再作抄述了。

還有一種懲罰性的小黑屋，其可怕程度凡未親歷過、親見過的人都絕難相信。黑屋僅容一身，只能半蹲，躺臥，不能站直，日夜無燈光、無陽光，一日三餐從牢洞中塞進，塞飯時牢洞的一開一關是唯一的光線。牢洞約兩巴掌大。絕無放風，吃喝拉撒睡全在黑牢內。那是關狗狗都要發瘋的地方。浙江溫州的鄧煥武先生曾被關了七百多個日夜！

四川成都的廖亦武先生這樣寫道：

一長串五花大綁的逃跑犯被解至台前……從戲臺上下的群情激昂中，我逐漸醒悟或許就在腳下，或許就在文革中挖掘的備戰防空洞裏，還有若干終年不見天日的獄中之獄，那是專為逃跑及其他嚴重違規者準備的墓穴，長兩米，高一米，人一旦塞進去，就只能象動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種姿式，且吃喝拉撒全在裏面。這樣長期幽閉的結果，一個黃種人就逐步演變成白種人，骨頭枯脆，鬚髮如霜，皮膚亮得能隱約透出血管和內臟。某司法官員公然在會上威脅大夥：“誰敢以身試法，成為反改造典型，政府就

將他打入小間，絕不客氣。到裏面去自殺吧，去挖洞逃跑吧，沒人管你。哪怕你是鐵，也要漚成綠黴紅鏽。”“一年半載你可能抗得過去，三年五年你肯定報廢。”監獄黃政委呷口茶繼續侃道，“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尖子某某，脫逃兩次均被抓回，加刑六年，關進小間。開始在黑暗裏尋死覓活，後來就安靜了。頭兩年，我下地洞去看他，他強著不吭聲，可第三個春天來臨之際，他就趴下磕頭求饒了。此人關了五年零七個月，成了雙目失明的活鬼。最後他摸准機會，隔柵抱住我的腿不放。出於人道主義，我才讓他起死回陽。”（摘自：廖亦武著《證詞》，明鏡出版社出版）

五十餘年來的中國大陸，在殺人、折磨人這件事上，退化到連人性的天則也沒有了。

歷史上，古今中外毫無心肝、滅絕人性的人與事多如牛毛，數不勝數，但乖離人性的天則且被視為理所當然，被形成規範、規定、制度化，為全民所認可、所奉行、所信守，則只有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才出現過。

為什麼如此不近情理？為什麼如此滅絕人性？為什麼如此乖離人性的天則？受者無可奈何，也罷了；觀者，麻木不仁的，算是不錯了，絕大多數處之泰然視為當然；施者呢，為什麼竟能如此凜然、樂此不疲、安之若素？！

似乎只能歸咎於制度的惡劣、野蠻、殘忍。

商、周時以活人做祭壇上的犧牲，以活人陪葬天子王侯；漢初的皇帝劉邦老婆呂后，將情敵戚夫人砍手砍足裝在甕裏放在豬圈稱為人彘；羅馬貴族讓角鬥士互砍、同獅虎搏鬥取樂；史前部落戰爭後有吃俘虜的習慣……

這一切都比現行的任何制度野蠻、殘忍，也不見那時有類乎上述乖離人性天則的記載，應該還有別的、更深層的原因。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無形

那就是文化的原因！文化配合制度如此殺人！

無論是張志新，還是李九蓮；無論是陳禹山揭露的30餘案例，還是胡耀邦批示的28例；無論是遼寧省、江西省，還是全中國的幾萬例幾十萬例……；無論是文化革命期間，還是其他時候；割喉管再殺人，全都是怕她們喊叫，不僅是怕她們喊冤叫屈，更是怕她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這是怎麼了？！

毛澤東引進的外來文化中最主要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將階級鬥爭的學說擴充、發展到登峰造極之巔，發揮到淋漓盡致之境，創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階級鬥爭文化、無產階級專政文化。

毛澤東說：

“與人鬥，其樂無窮。”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這種階級鬥爭文化把人類固有的善良、仁慈、愛心、悲天憫人、融融相處、太平祥和劃分到資產階級的溫情與人性的範疇，掃蕩殆盡，而代之以勇敢、無畏、仇恨、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水火不容。於是，對所謂敵人有一點點人性，如給垂死者一口水喝、說句安慰的話、捋捋頭髮、整整衣襟、減輕他一點痛苦等等就是同情敵人；反之，對垂死者一個耳光搥過去，再踏上一隻腳，罵他裝死，反正是越狠越凶越無人性，就是立場越堅定、對黨越忠誠、對人民越熱愛。那獄中之獄小黑屋的發明者或是魔鬼，但那使用者為什麼能自鳴得意，津津樂道呢？當然有他人心特別殘忍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階級鬥爭文化教育、灌輸、薰陶、驅使、逼迫的結果。終於，廣西吃人，道縣屠嬰，挖眼取腎，割喉止喊……都作出來了。因為畢竟是在和平時期，有別於戰場上廝殺時刀槍互擊的你死我活，所以就事先發明、制造了一套最堂皇，最可漫無邊際、攬括所有人所有事的理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是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云云。據此，就可以讓自己和人們公然、昭然、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進行乖離人性天則的行為。

在階級鬥爭文化的語言詞典裏，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這一說，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說到人性的時候，一定要冠以“無產階級”四字，絕大多數時候，是以“革命的人道主義”來代替人性說法，任誰都不敢、不能、不會越此雷池一步。竟至於“人性”一詞，談虎色變。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何其芳被毛澤東召見時，小心翼翼地問文學作品裏可不可以寫人性，人性到底有沒有。毛澤東回答曰：“口之於味，有嗜則同。”（見1978或1979年《人民文學》某期何其芳文章。）也算是認同了“食色，性也”的動物法則。無產階級的人性由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確定于止於此境，復雜、高級一點的人性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

的。毛澤東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理論上批判、否定人性的濫觴，此後，大陸在所有的領域裏，所有的書報文字中將此奉為圭臬。一個叫王實味的作家、翻譯家，因為寫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諷刺延安共產黨有等級觀念，就被毛澤東判定為特務、反革命分子，用斧頭砍了腦袋，成為階級鬥爭文化一具最著名的犧牲。

制度、文化是互為因果的，是相互依附，相互倚賴的，是恃以生存的基礎，是得以發揮的載體。在這個制度下的所有大小官員以及幫兇、幫忙、幫閒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維護和延續這個制度，奉行這種文化而盡心盡力。這種文化醬缸曾使生活在大陸上的所有人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不管你原先是農民工人，還是知識人；不管你是平民百姓，還是名人顯貴；無一倖免。

官至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對老友胡風的出賣是一個典型，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制度和文化是如何滅絕人性的。胡風是大作家大詩人，毛澤東1954年欽點他為反革命，在全國範圍批判鬥爭長達一年餘。茲引錄謝泳的文章。

1966年2月，胡風將要被趕出北京時，……給喬冠華的信中說：“明日受命即日遠戍（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後會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了心頭。語言有時是無能為力的，何況又在神情無緒之中，那麼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罷。”

喬冠華把胡風的信轉給了本部門的上級領導章漢夫、姬鵬飛和中宣部的領導周揚……

漢夫、鵬飛同志並轉周揚同志：

忽接胡風一信。最後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麼具體內容，已經記得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便再理會他了。

章漢夫和周揚都在喬冠華的信上畫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漢夫還特意寫道“我意不理”。這些歷史的細節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悲傷，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為基本特點的，那麼這樣的文化精神就是可恥的。當年如此對待胡風的這些朋友，過不了多久，他們也都遇到了和胡風同樣的命運。也許胡風當年的朋友那樣對待他是有他們的難言之隱的，他們也身不由己。這裏面有時代的原因，但也有個人的品質，也有一個時代整個的文化精神。如果一個政治團體在他的成員身上清一色地體現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徵，那麼這樣的團體就是最殘酷的，最沒有人性的。（摘自《謝泳居》網站）

喬冠華諸人是胡風多年前的老朋友。胡風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會寫這封信的。喬冠華不理也罷，還要轉到上級領導那兒去，說好聽點是避嫌、撇清，其實是示忠。同情心呢，人性呢，半絲半毫也不見，都到醬缸裏去了。以喬冠華的才識、器度、眼力、人品，在官員裏應該不算是下乘，但這種文化就會使你不得不爾，或必然如此！當時又有誰會說、能說喬冠華不對、錯了、不近人情？！哪個領導不會肯定喬冠華立場堅定、界線分明！？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由此而昭明顯著，乖離人性的天則自然而然。又豈止是政治文化如此，它已遍及所有領域、所有時空，滲透到全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胡風是毛澤東忠實的信徒，毛澤東冤枉了他。這從四十餘年後，胡風得到平反昭雪可以證實。可是當時批鬥胡風時，全中國所有的知識人無不義憤填膺，鳴鼓而攻之。絕非所有的人都瞎眼了，而是制度與文化迫使你不得不爾。

這就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力量與慘毒，已經是環環緊扣的惡性循環了。既已把胡風劃分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萬惡不赦的敵人堆裏去，那麼，“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訓誡和“對組織要絕對忠誠”的箴規當然會使所有的人名正言順，心無愧怍地同胡風劃清界線，或拍手稱好，歡欣鼓舞；或保持距離，冷眼旁觀；或回應號召，落井下石……落井下石的，會得到獎賞、擢用；拍手稱好的，會得到表揚，記功；保持距離的，會得到鼓勵，觀察；那沉默的、不平的、幫腔的、私通的……立馬就撥拉到同是胡風的敵人堆裏去了，比胡風還慘。絲絲入扣，分毫不差，循環往復，生生不息，五十餘年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一例外。

著名作家劉賓雁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國青年報社同仁戚學義不願違心批判劉賓雁，也被批判威脅警告。戚學義以死抗爭，在劉賓雁再被大會批鬥前從五樓跳了下來，以身殉道，立刻被宣佈為反革命，是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這是五十七年現代史中僅見的壯烈！

青工部戚學義在新聞界、文學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的一次批判劉賓雁鬥爭大會之前，當滿載著批判大會的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人員的大汽車到達會場（北京日報的五樓會議室）之時，戚學義從五樓的視窗跳下來，摔死在北京日報大樓的大門口！當時，人們親眼目睹了他從天空墜落到地面的慘烈情景！人們驚呆了！戚學義竟然以死來抗議當權者對劉賓雁的批判！（狄沙：《賓雁，我甚深地為你悲哀》——《劉賓雁紀念文集》）

人之初，不管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經過這五十多年煉獄般的鍛磨，這善，這人性不是被摧殘殆盡，就是束之高閣；這惡，不僅被挖掘，發揮，而且得到欣賞、鼓勵、獎掖、公告、發揚光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尚且如此，那長年同殘忍、邪惡、黑暗打交道的秘密警察、獄卒在這種文化的薰陶籠罩驅使下，人性中固有的那一點獸性還不會發揮無遺麼？善良的人們絕難理解作為人，怎麼能忍心把張志新這樣美麗、純潔的女性當口袋一樣地舉起使勁摔打到地上，使之半昏，然後按住腦袋一刀割斷喉嚨。但當你被告知：這個張志新是化為美女的毒蛇，打死她有益於黨有利於社會主義，怎麼弄她都不為過且有功於人民，造福於子孫萬代，那麼，你即使還能保留一點人性，不參加到輪暴她的行列裏去，你會不打麼？你要還下不了手，你會再被告知：你要不打，你就是同情毒蛇，你就是毒蛇的同類，你就是與人民為敵，其他人就要打你了，你就要遭到與毒蛇一樣的下場了。

這樣的階級敵人，這樣的毒蛇，死之前讓其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不就是讓他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殺錯了嗎？設法堵住他的嘴，割斷喉管才是萬無一失的辦法。人性在此時讓位於階級性黨性，蕩然無存了！張志新，毒蛇罷了，一刀下去，當然心安理得，正氣凜然。

文化革命中，廣西大規模殺死造反派群眾和地富反壞右，割心肝挖腦髓吃人肉竟能風行一時；新世紀時代，活取法輪功學員身體器官的慘酷，就是被灌輸進這些人像張志新一樣的該死的階級敵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的觀念。

刑事犯罪而至於死的人更是公認的人類的渣滓了，踐踏、蹂躪起來就更輕鬆了。

人性有其醜陋的一面。孟子主善，荀子說惡，同是儒家祖宗，所見迥然相背，可見人性之複雜善變。

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入的宣傳和灌輸使幾乎所有的人都真心實意地接受和相信了這種階級鬥爭文化的說教和訓誡。冠冕堂皇的理據使人性中趨利趨安的本質在良心不安的狀況下也能暢行無阻。人性醜陋的一面被助長、被人為地放大膨脹。人性的天則就是這樣逐漸泯滅以至蕩然無存的。這種文化，就是毛澤東創立的階級鬥爭文化。毛澤東既是始作俑者，又是發揚光大者，還是集大成而流惡後世者。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人，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必須接受這種文化，就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成為鬥別人的人或被鬥的人，此時此境鬥人，彼時彼境被鬥，循環往復，無邊無沿。

人是可以不這樣生活的！即使制度相同，只要文化有異，人還是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裏鬥，鬥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摘自《謝泳居》網站）

其實，新月社的同仁們即或有奪妻之恨、殺父之仇，也只是個人恩怨，同全體無關，更上升不到階級仇、民族恨的層面去。其別在此，這是最根本的區別！

中共創始人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殺後，遺屬孤兒寡母，無力營葬。有大陸《文匯讀書週報》刊發散文文章“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導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回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纫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蹟，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3·18”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二十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黨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相對於當時全國範圍一片“剿匪”聲中，這些人仍然對“匪首”李大釗同情、哀憫、襄助、厚葬，竟能安然無事，被秉政者、被全社會所接受。中共如何面對？如何看待？按道義、循邏輯，中共只能“情何以堪！”但是中共從來若無其事，處之泰然。這就只能從文化層面來解釋這一現象了。

創造社、太陽社、左聯的郭沫若、蔣光慈、周揚、丁玲、胡風們遵行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新月社、學衡諸社團的胡適、徐志摩們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愛的文化。這就是二者在同一片藍天下生活，在同一制度下受管轄，卻有迥然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結局的根本緣由。

制度相同，文化不同，表現出的人性也會不同。

再來看中共另一創始人陳獨秀。

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⁴⁴ 4年他客死江津時，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雖然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摘自《謝泳居》網站）

陳獨秀無論是中共的總書記，還是托派的老祖宗，他北大的老同事首先把他看作是對新文化運動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總書記也好，老祖宗也好，同他北大的老同事都毫無利害關係。為陳獨秀在法庭上免費作無罪辯護的是被陳獨秀痛罵過的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士釗。陳獨秀在法庭上也侃侃自辯，說出了，並揮筆寫下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的豪言

壯語。當時報刊披載了陳獨秀的這幅字。法庭竟讓說、讓寫、讓辯，當局竟讓報導、讓披載，這在當今大陸的當局、法庭是無法理解、匪夷所思的事。其實，這才是正常文化，這才是正常文化下人跟人的正常感情，人跟事、跟當局的正常關係。

正常的人類文化同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批示張志新、李九蓮案例時，不可能不想到這種殘忍、滅絕人性是他最痛恨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做不出來的，是世界上、歷史上任何最壞的壞人也做不出來的。胡耀邦瞭解的共產黨的罪惡肯定比我們更多更具體更細緻。胡對共產黨怎麼看呢？胡會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嗎？沒有！他還是繼續維護這個惡黨。即使他心裏否定，他在行為上還是處心積慮、苦心孤詣地為這個黨隱瞞、辯解、撒謊、挽救……這是胡耀邦的黨性，更是他的人性！胡與這個黨利害攸關，否定這個黨就是否定自己！也許他自己就做過雖沒有如此殘忍但性質相同的事——下令槍殺政治犯！這就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關聯。一般人是無法脫此窠臼的。除非你是大聖賢。人類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很少幾個人能達此境。第一個是匈牙利的納吉，第二個是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中國，念天地之悠悠，愴然涕下，尚無來者！

臨終不讓回國回家，死後不讓追思，死前被割喉管，臨刑不讓喊叫、不讓家人知道，屍體無影無蹤，……凡此種種，正是毛澤東祭壇上的犧牲。最可悲的是，這一切，在大陸被視為正常，被奉為規定。人性的天則蕩然無存了。究竟是為什麼？我將其歸結為：

豈獨制度無人性，應究文化是元兇！

制度的瓦解可以是一朝一夕間事，但文化的變化消亡，則日長月久也，人性之善之惡則為永恆。中國目前愈演愈烈的駭人聽聞、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草菅人命、廉恥喪盡、徹底墮落的事實就是這種黨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難過與沮喪之餘，不佞不揣淺陋，深入探究制度、文化、人性之間的關係；雖不挽狂瀾於既倒，姑留印跡，盡綿薄於歷史。

第四章 忍系膽汁甘如飴

忍，在中國，是一種文化。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是最常見最普通的說教。

“打落門牙和血吞”，是弱者的忍氣吞聲，當然，也可以是一種自嘲的幽默。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是忍的另一種境界。

“真、善、忍，精、氣、神”是儒佛道要義的綜合歸納。

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是“忍”的一種巧妙的可以自我陶醉的方式。

哈佛大學前研究員龔小夏對風靡當今的“忍”有深刻精妙然稍嫌刻薄的判詞：

對小人物的平民百姓來說，一個忍字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他們過去在權勢的淫威下打掉門牙和血吞的那口氣，如今突然變成了他們的美德。忍，不再是忍氣吞聲的卑微，而成了居高臨下的寬容；被動的忍變成了主動的忍。忍字令弱者在精神上成為強者。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的精神狀態。（引自《北京之春》）

忍文化在中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忍文化一旦為階級鬥爭文化所懾所用，就使一切反抗、剛性的精神消弭於無形，融化成一攤泥。

中國大陸的各項政治運動中，這“忍”字就發揮了大作用。

中共建政初，為立威大開殺戒，鎮反、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時的隨便殺人，固然是“怕”字起了威懾作用，但“忍”這一傳統文化的瑰寶，是殺戮順利進行的最大功臣。每一個被殺的反革命份子、地主、士紳、惡霸、貪污犯……除了怕，就是“忍”；認該的大約也有，不會太多。絕大多數死者在空前強大殘忍的血腥恐怖面前怕字當頭外，想的最多的恐怕也就是“忍了，算了，罷了”，為了父母、老婆、兒女、親友能活下來；至於死者的家人親友，則在怕的大前提下，忍的份量占得就更多了。這是中共濫殺無辜如許之多，卻未見什麼抗爭，幾幾乎沒有什麼大的、集體性抗爭的主要原因。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共前總理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父親被作為惡霸地主殺死的事實。趙紫陽時任地委書記，下邊報上來要鎮壓槍斃的地主惡霸反革命的名單上有他的父親。趙紫陽簽字畫押，同意殺死自己的父親。趙父即按中共的標準，也並無該死的罪，且在中共困難時期，幫助過中共。

趙紫陽批准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這叫大義滅親。這種大義滅親，中華古文化中屢見，中共接過來，發揚光大，登峰造極。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父親身邊把情報源源不斷地送給中共。不過，到頭來，陳璉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父親的關係，被指為國民黨特務死於非命，同乃父一樣的結局。傅作義的女兒也是中共安置在他身邊的諜報人員，傅作義的一舉一動，甚至發什麼脾氣，中共都會瞭若指掌。

可以想見，趙紫陽在提筆簽下准殺令時，肯定天神交戰，十分痛苦；陳璉、傅女在出賣

父親的時候也不可能沒有良心的譴責。最終，他們都大義滅親了。這背後，幸有“忍”文化的教化支持，不是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的“忍”，而是為革命為了黨而忍痛割愛、忍心犧牲一己利益，才使他們自欺欺人、麻醉陶醉，得以安心直至最後。

歷史上殺人如麻的事例多不勝數，吃人的事也不絕如縷。中國人都忍下來了。

隋末朱粲、唐張巡、五代趙思綰、北宋范溫……無論是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還是忠君保民抗亂抗金的將軍、首領，都曾以人為軍糧，吃人成癮，成為吃人魔王。

褚人獲的《隋唐演義》裏有一回“啖活人朱粲獸心 代從軍木蘭孝父”，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裏敘寫一劉姓山民殺妻烹肉招待劉備。沒有當時司空見慣大量食人的事實，小說家何所據輕描淡寫如此慘絕人寰的故事。

上世紀的四十年代，河南災荒，人相食。蔣介石到河南巡視戰區，指導抗日，河南士紳拿人相食的照片給蔣介石看。當時的報紙做了披露。1951年，梁漱溟參加四川土改團回來向毛澤東反映四川地主夫妻被逼雙雙跳河的事，毛澤東說：群眾發動起來了，這些個別的過火現象是難免的。當時的報紙廣播鋪天蓋地的報導宣傳地主的惡、土地改革的偉大成就。無論四十年代還是五十年代，人們為什麼寧死不反抗，就是這“忍”字的功效！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人持續了三年，餓死人達三千萬。浙江省永嘉縣，有一老人餓得快死了，死前掙扎著半走半爬到山上，躺到早些年給自己修造的墓穴裏等死。因為他怕自己死後，沒飯吃的兒孫們沒有力氣抬他上山安葬。足足一個星期，村民們經過他的墓穴，都可以聽到他的呻吟聲。他的兒孫們沒有力氣把老爺爺從墓穴里弄出來抬回家。這樣的事例不是僅見的，比這更慘的人相食、易子而食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也很多，以至劉少奇公開對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種下了以後被整肅而慘死的禍根。清末，有一則與此幾乎完全相似的慘事。美國傳教士史密斯1890年寫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裏描述一老婦人步履踉蹌在野外往親戚家走，親戚家離她的墳墓近，死後可以節省抬棺材的錢。誰能想得到，七十年後，中國會出現比這位老婦人更慘的事。

如果說 政治運動的殺人死人，被屠者主要因怕而忍是人性使然，是古今中外皆然固然，概莫能外，那麼，這純粹的餓死人、活活的餓死人，幾千萬人寧肯活活餓死，也不起而搶倉庫、搶糧食、搶強征暴斂者，則只能純是“忍”的無可替代無與倫比的作用了。

這“忍”是民族文化，這“忍”也成了民族性格。

上海市委前書記陳丕顯回憶福建家鄉餓死人：

一位名叫陳從明的中年社員更是激動得爬坐在桌子上，喊著我的乳名大聲說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就不曉得該不該講真話？”看著這位苦出身的鄉親這麼激動，我深知他有許多話要說，便對他說：“你有話儘管講。”“我講了真話，你走後公社會不會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瞭望在場的地、縣、社領導，說：“你反映真實情況，怎麼會成反革命呢？”接著陳從明便一五一十地訴說起來：去年發大水又下冰雹，糧食減產，可是公社卻向上級浮誇說糧食跨《綱要》，並按《綱要》的指標來徵購。我們完成徵購任務之後，就沒有多少糧食了。現在飯吃不飽，靠挖野菜充饑，許多

人得了浮腫病，射山村已餓死了十多個人。公社領導只顧扛紅旗爭先進，不顧群眾肚皮，不管群眾死活。說著又指著我說：“春分，你當那麼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眾沒有飯吃呀？我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啊！”陳從明一席話，說出了許多群眾積鬱在胸中多時、想講又不敢講的話，引起了在場群眾的強烈共鳴全場頓時出現一片呼喊聲：“陳從明說得對呀！”“陳從明說得好呀！”大家紛紛爭相訴說餓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頭髮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擠到廳堂中央，“撲通”一聲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聲。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趕忙用雙手把她扶起來。定眼一看，原來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著她一邊說：“三妹婆婆，你不能這樣，我擔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話起來慢慢說。”老人家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春分我這60多歲的老太婆從來都沒有餓得這樣透（厲害）呀！我一家餓得不行，上山采山蒼子樹葉確糠吃，頭都被確打破流血呀！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啊！你要救我們呀！”

與南陽毗鄰的舊縣、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員群眾，誤以為我已到了南陽。許多群眾匆匆趕來，挽著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連坑，見著李應槐專員，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頭便跪在他的面前，異口同聲地哭著喊著：“陳書記呀，救救我們吧！我們沒有飯吃呀！”一位群眾當場哭訴說：“我家裏人都餓死了，只剩下我孤獨一人了，走投無路才出來討飯吃呀，陳書記你大恩大德救救我們吧！”聽了這些情況，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們一行吃過早飯——稀飯配酸菜，就告別鄉親來到南陽公社，參加了公社召開的烈軍屬代表和基層幹部會議。到會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會議室擠得滿滿的。……我剛講完，軍烈屬代表劉富玉便搶先發言。他說：“我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形勢一片大好，糧食畝產800斤，跨了《綱要》，群眾生活比過去好多了……”

她的發言引起許多幹部、代表的不滿，不少人搖頭歎氣，有的乾脆說：“劉富玉呀，你現在還在為公社吹牛皮，你不覺得臉紅嗎？”在眾人的指責下，她才不得不結束了背誦式的發言。

事後我才得知，原來她是按公社領導的意圖搶先帶頭發言的，以起示範、導向作用，發言的內容也是公社領導事先授意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來。

接著一位叫黃啟智的白髮老人發言。他毫無顧忌地說：“有人說我們公社的糧食畝產800斤，除非把田裏的泥土挖出來湊數！我們的實際產量不過是2、3百斤，公社領導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要這樣吹牛皮呢？這是因為幹部為了爭取先進，可以提拔當官。他們昧著良心彙報，卻苦了我們老百姓。現在群眾吃不飽，不少人篩糠、摘樹葉當飯吃。丕顯，我們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種田人連飯都吃不飽呀？”

遺憾的是，福建省委撥給龍岩地區糧食後，龍岩地委個別領導同志認為情況沒有這麼嚴重，遲遲不肯要這些糧食。實際上是他過去向上面吹了牛，結果露了餡，感到下不了臺，不好意思，怕影響今後的前程。到後來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群眾知道省裏已撥了糧食，卻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紛紛提意見。這時，他才不得不要了糧食。結果遲了一個多月時間，全區多餓死了幾萬人。（摘自陳丕顯網站）

人命關天，這是古義，中共治下，則不是了，人命如蟻！明目張膽地要你餓死，還要加上那麼多堂皇正大的壓死人的道理。中國的農民在跪乞無效之下都忍下來了，餓死也忍！

有周曰禮者，在一篇“回顧安徽的農村改革”的文章中描述曾為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在安徽省委書記任上時在農村看到的景象：

第一次目擊是：“1977年11月上旬，萬里到金寨縣調查。在燕子河山區，他走進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在陰暗的房間裏，見鍋灶旁邊草堆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便親熱地上前和他們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著他，一動不動。‘老大爺’，萬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著他，不肯起身。萬里很納悶，以為老人的聽覺有問題。陪同的地方幹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來看你，老人這才彎著腰顫抖地緩緩站起。這時萬里驚呆了，原來老人竟光著下身，未穿褲子。萬里又招呼旁邊的兩個姑娘，姑娘只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動半步。村裏人插話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穿，天太冷，他們凍得招架不住，蹲在鍋邊暖和些。”

第二次目擊是：“萬里又走到了另一人家，看到家裏只有一位穿著破爛的中年婦女，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小孩。’‘他們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請你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里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出門去找。在萬里的再三催促下，她無奈地掀開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燒過飯的鍋灶，拿掉鐵鍋，利用鍋膛裏的餘熱把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裏面防寒。”

沒褲子遮體的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裸露下身的老人還去握他的手，不能讓三個孩子穿上衣服只得放在鍋膛裏取暖的母親只是“面有難色”。沒有痛哭，沒有怨恨，沒有憤怒。忍的力量化解了這一切。麻木到連乞求哀告也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忍、忍、忍！無休無止無窮無盡地忍下去。

農民如此，知識人呢？

巴金，曾大聲呼喊“說真話”，“6·4”後噤聲。他不可能贊同屠殺，但他忍了，換來了暮年的榮衰、榮華、富貴。

冰心，曾支持學生，“6·4”後轉口說上了壞人的當才簽名。她愛孩子是出了名、有定論的，但她忍了，不再說愛孩子了，換來了晚年的平靜和安寧。

胡風，坐了30年牢後，賦詩曰：“恨海雖深曾敢跨，冤山再重也能擔。”忍辱負重，一至於斯！

大陸幾乎所有的知識人，在6·4後，恢復了文化革命前的老實聽話、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的內心世界，恐怕更受煎熬。他們大多是忍著、忍了。

曾國藩給他兒子的信說：

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

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摘自：《曾國藩書信選》）

中國傳統忍文化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麼？實際上就是上面說的曾國藩那一段話。

“君、父、夫”換成了“黨、毛澤東、黨組織”罷了——中共治下的知識人，即是所謂的精英之輩，如巴金、冰心、胡風、艾青、丁玲諸人，說到底，也就是這樣的耐勞忍氣者。

有誰能責備他們？責備他們什麼？垂暮之年，耄耋老人，他們只不過要求有人生最基本的安全感而已。為此，他們仍然需要付出沒有尊嚴的代價！中華的忍文化使他們在出賣良知沒有尊嚴與尋求安全之間能稍微平衡一些。人性的軟弱、趨利避害使他們選擇了安全。凡人，都需要安全地活下去啊！我們不應去苛責這些老人、苛責人性中的卑微與醜陋。我們去譴責這個吃人的制度、這種懦弱卑怯的忍文化吧！

儒家文化中的恕道，大約有“忍”文化的意味。世人誤解儒家的恕道，以為只是一味地講寬恕，也就是“忍”。其實，恕道的大前提是公義、是正義。沒有公義正義的恕道，只是鄉願罷了。《論語》中有“是可忍，孰不可忍？！”還是落到了“不可忍！”應該說，正常的正確的理解恕道，就是不忍之心。儒家的恕道，認真論究起來，是有別於“忍”的。

2003年，薩斯蔓延中國時，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揭示真相，就是有不忍之心。或責他破壞穩定，就是不懂恕道的大前提是公義正義。蔣彥永正是識得人類生命是第一位的公義正義，才能有此不忍之心的恕道。

風行全球的法輪功奉行“真善忍”。真、善無須論，忍，則大為人所詬病。本文開頭提到的哈佛大學前研究員龔小夏對風靡當今的“忍”有深刻精妙然稍嫌刻薄的判詞，即其顯例。

法輪功為什麼不用習慣的流行的“真善美”，而用“真善忍”呢？“忍”字到底有何高妙之處？無論這“忍”字是儒佛道三家的混血兒，還是民間傳統中的“忍”，抑或是新人新論新解；掘字眼，尋章摘句，可以有千萬篇的論述注解，卻會流於冬烘與文字遊戲。欲得真解，須看法輪功信眾近十年來在這“忍”字上的行為事實。

法輪功信眾只是要求煉功，這種最原始最低的要求遭到了中共當局最嚴厲最殘酷的打擊鎮壓。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無論如何看待法輪功，無論如何看待中共當局，不能脫離這一最基本的鐵的事實。

法輪功信眾因為煉功，遭到了恐嚇、威脅、搜身、抄家、毆打、拘捕、判刑、坐牢、凌辱、酷刑、強暴、摧殘至死的打擊與鎮壓。其手段之殘忍慘酷令人髮指，回復到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時代；其打擊鎮壓的面遍及大陸所有城市與農村中的所有法輪功信眾。被摧殘至死的法輪功信眾有名有姓記錄在案的已有幾千人。遭受打擊的是全部法輪功信眾幾千萬人。澳大利亞的章翠英女士、曾鈴女士是遭受摧殘瀕死而虎口餘生者，分別著有大量畫作和《靜水流深》一書，講述了事實，見證了歷史。

面對血腥的鎮壓、死亡的威脅，法輪功信眾是如何的呢？他們沒有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暴抗暴。他們冷靜、平和、容讓然而堅定不移地繼續煉功、繼續信仰；他們智慧、理性、

和平地堅決抗爭——對打擊與鎮壓進行堅持不懈的抗爭；他們所有的抗爭，無論是街頭的、寓所裏的、牢房中的、天安門廣場上的、酷刑進行時的，沒有一絲暴力；他們面對無論如何殘忍慘酷血腥的暴力，全都默默承受、逆來順受而頑強不屈地堅守著信仰；他們在抗爭時連語言也是最溫和最理性最智慧的：他們決不責罵對方，只是述說自己不願放棄煉功、堅守信仰。這裏，最重要的是，法輪功信眾在殘忍慘酷血腥的打擊鎮壓下，只是默默地承受，而不是“忍了、罷了”；法輪功信眾在承受的同時，堅持了不屈不撓的抗爭，這是與傳統的“忍”文化質的根本上的區別。這個區別是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區別！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不合作不抵抗的精神，從西方的馬丁·路德到東方的甘地，成為人類文明的一大精華。追根溯源，華夏文化裏春秋時代墨子的“兼愛”庶可比之。墨子行勞千里，排難解紛，死不旋踵，以“兼愛”化人；最終若化不了，墨子會助弱鋤強，以暴抗暴，因為他有這個資本——他的門人都是武藝超凡的勇士。

法輪功信眾的抗爭正是墨子前半段的繼續，正是甘地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的發揚光大！

法輪功信眾已經絕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阿Q！

芸芸眾生中的法輪功信眾，覺醒了，不再一味“忍了、罷了”；不僅覺醒了，而且抗爭著；不僅抗爭著，而且以最溫和的方式頑強執著地抗爭著。

法輪功信眾的“忍”，這種變被動的忍為主動的忍，已經昇華為儒家的忠恕之道，已經媲美於基督的博愛大愛，已經等同於佛家的捨身飼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種溫和而然而頑強執著的抗爭，正是東西方文化中的博愛、恕道、中庸、權利正義的綜合融匯；無論它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百餘年來，知識人前赴後繼為之努力、夢寐以求的景象終於出現了；幾千年來芸芸眾生的覺醒第一次大量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這是多麼值得歡呼和慶幸的事啊！我們必須千萬倍地重視、珍惜、研究、參與，為它的發展壯大盡知識人的綿薄。

當今的中國，當今的16億中國人，帶著傳統文化的枷鎖、受著黨文化的灌輸訓導薰染。中國根子裏基本上還是封建文化的載體，芸芸眾生大多還是阿Q。他們對西方文化的糟粕接受得很快，卻對西方文化中最低級最基本的文明“隨地吐痰”都學不會，或是潛意識地抗拒和嘲笑。遍佈各大中小城市風景區伺機抓吐痰者罰款的老太利索地撕收據的景致正是雙向荒唐的一個小小的但微可足道的明證。以一小小事證大大理，似乎單弱的不成比例，實則痛苦落實的緊！因為此類事例千千万萬、萬萬千千，神州大地，俯拾皆是；億萬民眾，全是見證；精英愚氓，無不如此；百姓官吏，愈演愈烈！

習慣於崇拜於癡迷於西方文化的精英們，對西方文化鑽研甚深，而對祖國文化淺探輒止。西方的涇渭分明、是非界限判然的不忍、努力奮爭、強調權利、勇承責任、民主自由，固然好固然高明，精英們對此已耳熟能詳，恨不得馬上實行，然而對於中國的芸芸眾生還有很大的距離，他們還未能明確透徹地理解，接受起來更有困難。近三十年來海內外知識人所努力所奮鬥所從事的民主運動，除了很特殊的“6. 4”之外，總是只在小範圍內、知識人的小圈子內蹦達而自我陶醉自我歎息自我不滿自我鬥毆自我譴責自我沮喪，泛起一點漣漪而未能匯融進民眾的汪洋大海掀起波瀾，其根源恐怕在此。

百餘年來，民族文化的精英們做的所有的事，可以歸總一句話：喚醒民眾。但沒有成功。大家在繼續做，海內外的知識人在努力地做，法輪功信眾也在做。做的最好的，非法輪功信眾莫屬！

中國走向與西方文明融合無間還需要一段長長的時間，一個過渡的形式。中國國情、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性格需要一個過程和轉換，需要一個過渡形式、過渡時期；中國需要以中華文化為主地來接納消化西方文明。

法輪功信眾以“忍”字為標誌的堅持不懈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做法，也許正是這樣一個過渡時期、過渡形式中天賜華人的一瓣鮮花、一縷馨香。

對法輪功信眾的行為，對他們的“忍”，對他們的講述宣傳，多從積極光明的一面去理解去接受，少從或不從消極的陰暗的一面去挑剔去排斥，更不要在迫害者中共與被迫害者法輪功之間自覺或不自覺地用雙重標準來衡量來評判。這應該是公平公正絕不過份的要求。魯迅的這兩段話，有著非常針對性的非常現實的意義：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那麼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那麼求全責備。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不揣冒昧，斗膽妄改龔小夏對“忍”的判詞：

對於小人物的平民百姓來說，一個忍字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他們過去在權勢的淫威下打掉門牙和血吞的那口氣，原來可以轉換成不屈不撓堅持平和抗爭的勇氣。忍，不再是忍氣吞聲的卑微，而成了博愛大度的寬容；被動的忍變成了主動的忍；一貫的忍正是不忍。不忍之心令弱者在精神上成為強者。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基督的大愛。

不揣淺陋，對“忍”字再作褒貶，以奉獻給法輪功信眾。

從來忍、事事忍、時時忍、處處忍、餓死忍、無褲忍、殺人忍，此謂阿Q 愚昧忍、麻木忍、賣己忍、鬻良忍，心裏忍，忍忍忍！

恐嚇忍、抄家忍、毆打忍、拘捕忍、坐牢忍、凌辱忍、酷刑忍，是乃法輪智慧忍、理性忍、主動忍、抗爭忍，忍中爭，爭爭爭！

忍乃心頭一把刀，千年利刃猶吹毛。法輪信眾新忍術，煉鈍鋼鋒納入鞘。

忍文化，在法輪功信眾身上有了質的變化。這或許是沉淪墮落的當世唯一讓人有一絲安慰的光明。但願它能成為漫天彩霞，普照大地。

第五章 忠融骨髓化入血

與“忍”字相映成趣的是“忠”字，它們是民族文化裏的雙胞胎，是民族性裏的聯體嬰。

我們的傳統文化裏有“文死諫，武死戰。”“武死戰”，好理解。外敵入侵，保家衛國；百姓造反，蕩寇平亂；當然是要拿命去拼的。“文死諫”，則是中國特色，需要拐個彎才能接受。商紂王酒池肉林，炮烙虜盆，叔父丞相比干進諫，賜死剖心；岳飛精忠報國，落了個風波亭枉死……例子多如牛毛。這些忠臣都名垂青史，千古流芳，萬世敬仰。於是就形成了忠的文化。以忠為本、以忠為志、以忠為則、以忠為榮、盡忠蹈死！

封建末世清王朝，仍有數不清的忠臣死士。延至清與民國之交，還是有梁濟、王國維的以身殉清、殉忠文化。

清末戊戌年間，清宮太監寇連才，明知會死，竟仍公然違背祖制上疏諫慈禧太后支持光緒帝變法，終被活活杖殺。

忠文化綿延不絕兩千餘年，是有道理的。屈原的忠、司馬遷的忠、蘇武的忠、關羽的忠、岳飛的忠、史可法的忠、文天祥的忠、梁濟的忠、王國維的忠，他們忠的是國家忠的是民族忠的是道統。梁濟（梁漱溟之父）、王國維，於1918年、1927年先後投河自盡。梁漱溟在王國維死後撰文曰：“……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挽聯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這種“忠於世”、“惜吾道”的忠道統文化是構成中華優秀文化的很重要的內容之一，它不同於中共建政後完全異化愚昧之極、既強迫強制又心甘情願、既匍匐叩拜又無可奈何的忠黨文化。

郭沫若早於1951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就當著毛澤東的面打出一面錦旗，上書“我們永遠跟著你！”這是文化界向毛澤東獻忠的濫觴。

還是這個郭沫若，1963年為毛澤東在飛機上所攝照片題詩：“難怪陽光格外明亮，原來窗內與窗外有著兩個太陽。”創肉麻為有趣以示忠的先河。

1969年中共召開第9次全國代表大會時，8億人“早請示、晚彙報”、大跳忠字舞、商店營業買賣時以背誦毛主席語錄為始終，是忠到頂頭、登峰造極，“把毛主席的指示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行動中”的標誌。

芸芸眾生、凡夫俗子的愚昧難以理喻；長期培養的黨員、幹部、紅人盡心盡忠自有道理；心中明白、利害驅使者言不由衷也情有可原；可為什麼幾乎是歷來全部被冤枉殘害瀕死的黨國要人、精英學子、平民百姓也都如此盡忠死忠、迷途不悟呢？這就不是簡單一句封建遺毒、愚昧愚忠可以解釋得了的。

彭真在中共建政前的1948年，于晉察冀的一次黨的大會上率先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這是新王朝將要建立之際，聰明的臣子借助舊文化的造忠；彭真遭毛整肅時，向專案組一再提醒此點，則是人遭滅頂之災時，總要撈一根稻草的乞忠。

陳伯達被關進秦城監獄時，再三再四地說明自己在內戰時期救過毛澤東一回，也是類乎彭真臨沒頂時的乞忠行為。

劉少奇被鬥後，徘徊於毛澤東住所路口，冀其邂逅一見毛，向毛表示願回農村種地。這是絕望時的哀憐乞忠。

臧克家人稱四朝元老，毛澤東、四人幫、華國鋒、鄧小平時代都很吃香。臧的忠是臻於頂峰的世故、圓滑。

馮友蘭批林批孔，出賣老本，不忠學術，獻媚皇后，改忠皇上。馮的忠純是利益驅使，是“仁義禮智忠勇廉”，無“恥”了。

鄧拓是黨的筆桿子，文化革命中被逼自殺，遺書“毛主席萬歲！”這是明白人無奈何的忠。

老舍不堪毛澤東的紅衛兵毒打，投河時帶著手書的毛主席語錄幾十張。

翦伯贊夫婦被毛澤東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雙雙仰藥自盡時口袋裏的字條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潘光旦經歷了他自己形象地概括的四個“s”後半生：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每個英文單詞打頭為“s”）於1967年被折磨至死。葉篤義挽潘聯：“平生不事積蓄，只落得兩袖清風，遺書萬卷；老來自勉服從，臨終時家破人亡，不怨一言。“這是鄧拓、老舍、翦伯贊、潘光旦之類的知識人哀切苦澀的忠。

聶紺弩，文化界錚錚鐵漢子，人譽第二個魯迅者，在牢獄中渡過了半生後，有述懷詩曰：“手提肝膽輪困血，呆對車窗站到明。”

時人著書贊當代大禹黃萬里，通篇不離“披肝瀝膽、忠心耿耿、負冤含屈”之類詞語，所引詩句有“誰知貶謫崎嶇路，多少提頭直諫人！”

為什麼知識人如此受冤，還總是離不開“忠”？

所有中共治下的人，都還沒跳出“忠”的藩籬，都還在中共的思想理論框束下制約下思維。因而不被理解不被接受自以為的正確、好心好意就會覺得“冤”，就會竭力聲訴辯解，而怎麼也不可能脫出那“忠”字的掌心。

流亡作家馬建說：“至今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作家堅持自己的立場，要求不平反以證實自己確實是右派，即反對黨的領導也反對社會主義專制。沒有。”此話說對了前半句，錯了後半句。因為沒有一個右派真的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真正的悲劇也正在此！時代、文化的悲劇！無可更易的、更大的更深切的悲劇是至今亦然，連海外向中共頻送秋波者還是大多數。文化和人性的力量大極了！

黨，是正義、是真理的化身；黨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正義，就是

真理。黨已等同於封建社會的“天”、天子——皇帝了。這一“雷池”，五十餘年來，大陸知識人沒有誰能越半步。即使對毛澤東有離心，卻從來不會對黨離德，更不會對黨的理論思想主義有懷疑。“為著全人類的解放事業”，這一偉大崇高堂皇頂天臻於至極的思想理論主義教條理想綁定了所有人的身心大腦。他們缺乏或者說沒有自己的思想。這是至死盡忠的緣由，這是總是悲劇的根源！

他們的愚忠，既是無可奈何，也是心甘情願。

所有的各種各樣的忠，構成了獨有特色的現代中華忠文化。

中共的統治，就依賴著這種忠文化，屢屢化險為夷，延續著延宕著。

最著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有“中國的良心”之譽的劉賓雁所疾呼所提倡的“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是指不要向雷鋒那樣作馴服工具的愚忠，而是要對黨的錯誤進行抵制，忠誠於黨的正確思想正確指示。無論如何詮釋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這忠誠的指向是黨的正確的一面；或者說，不忠誠於現在錯誤的反動的一面；又或者說，曾經有過的正確的一面，將要再有的正確的一面；如果更進一步地提高這忠誠的指向，是指一個正確的主義、一個正確的思想。這種忠不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道統，而是忠於黨派忠於自己尋求獻身的事業。如果一定要說這種忠是忠於道統，那麼，這是將黨派視為道統視為國家視為民族。這個黨派就要是象仁義道德、象真善美、象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象國家民族一樣神聖一樣永恆了。這是不可能的！

這“第二種忠誠”，受到了中共黨內有識高官的歡迎和讚賞。人大委員長萬里在1986年7月31日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離開講稿，即興說道：

我為什麼贊成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呢？我們黨需要這種忠誠。不是批判他嗎？我找來看了。我們黨需要這種忠誠！我同意劉賓雁的觀點……我們不但需要雷鋒式的第一種忠誠，還需要陳世忠式的第二種忠誠。”（幾天後，萬里約見劉賓雁。）“萬里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摘自《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從少年時代起就有追求，追求主義、道理，美好的主義美好的道理，正確的主義正確的道理，所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都涵括在主義道理裏頭。劉賓雁最終認定了共產黨的思想理論代表了這些美好，於是他選定了共產黨。一旦選定了共產黨，共產黨的制度文化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劉賓雁的一生。在他發現這個黨是一個反動罪惡的黨時，劉賓雁還總希望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或者說總不能相信自己錯了。在蘇東波一瀉千丈一潰無遺的事實面前，在大陸當政者殘忍慘毒屠殺折磨人民的真相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無需任何懷疑辯駁的時刻，劉賓雁還是希望那個殺人的主義是對的。他一邊義無反顧地譴責當政者的荼毒無人性，一邊苦心孤詣地號呼嘴勿歪念正經。在他的內心世界，他還是沒有跳出對黨的忠誠，對主義的忠誠。這就是劉賓雁，晚年的劉賓雁，最真實的劉賓雁！

這樣的劉賓雁，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是值得非常欣賞的劉賓雁，因為這才是最符合人性

的劉賓雁。可以說，劉賓雁這個時候的頑固堅持，毋寧說是忠誠黨、追求正確美好的主義道理，不如說已進而忠誠、追求、堅持人性的真善美了。

劉賓雁，終其一生，在矛盾中。他的猶豫、他的掙扎、他的不徹底，盡在這矛盾中！他的真實，他的人性、他的良心、他的可貴，也無不在這矛盾中。徹底否定主義，也就是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徹底否定自己的一生，這是非常痛苦的事。周揚、胡喬木、陸定一、胡績偉、李銳諸人，何嘗不明白主義是禍根，可就是沒有勇氣走出來，因素很多，這會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徹底否定自己的一生，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價值是最主要的。這是人性！劉賓雁走出了大半——否定施虐者，是人性，但抓住主義這根稻草，以“好經給歪嘴和尚念了”為理由為安慰，自欺欺人，也是人性，更是人性！

當然，這是局限，是劉賓雁的局限，也是時代的局限，幾代人的局限。無論胡風、章伯鈞、顧准、張中曉、李慎之，還是張志新、王申酉、遇羅克都脫不了這局限。剛烈、徹底如林昭，也有扮作竇兒喊冤的時刻和心態。可以說，大陸那幾代人，概莫能外。

然而，在看到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的局限時，絕不能忽視劉賓雁一以貫之對人性的堅守。大陸當今的境況，人性的全面沉淪墮落，愈演愈烈。目前，看不到人性復歸的希望。劉賓雁對人性的堅守，就蘊涵著深遠而偉大的意義。

從劉賓雁的矛盾中深入發掘，可以見出人性的真實和輝煌。在事實的鐵證面前，在感情的漩渦中，劉賓雁尋找理性的支持來安慰來肯定自己，這中間該有多少不解、疑惑、苦悶、猶豫、彷徨、掙扎、浮沉的痛苦！？值得慶幸的是，無論如何痛苦，無論心在如何支離破碎地咬齧，劉賓雁在這種極端的矛盾痛苦中仍然穩穩地、牢牢地、定定地守住了仁義、博愛、誠實、正直、慈悲、擔當、良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守住了這些人性這些道統，才可以說劉賓雁忠誠的指向已經不是黨，不是主義，不是道理，而是人性了！

劉賓雁，是我們這個扭曲的時代，體現最活生生的最真實的人性真善美的最大標誌。

最近辭世的何家棟先生和劉賓雁是同代人同路人，他們有驚人相似的煉獄般經歷，也有完全一致的“第二種忠誠”。何家棟以自身的頑強執著證實了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的廣泛存在，劉賓雁以“第二種忠誠”提升、明確了何家棟和自己最終沒能跳出忠黨文化的樊籬。

何家棟生前有篇重要文章“我們來自何處又去往哪里——《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序”（2001年著，載《觀察》網站），把“12·9”運動劃分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思想階段，把胡喬木作為這個階段湧現的且在八、九十年代發生大影響的思想家來定位。余英時先生《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其中關於“12·9”運動的考證和論述與何先生對“12·9”運動的看法迥然相異，頗引人深思。

何家棟認為，20世紀中國思想家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代人：

世紀之交的一代、“5·4”一代、“12·9”一代、“4·5”一代和世紀末的一代。……與“5·4”一代思想紛呈、流派林立的情況不同，“12·9”一代的思想相當一致。由於時代的原因，雖然如費孝通、錢鍾書這樣的一流學者產生於黨外的學術殿堂，多數具有思想家氣質和抱負的知識份子都彙聚到了中共黨內。……

“12·9”一代的閱讀面是相當狹窄的，占主導地位的並不是國民黨的“黨義”讀物，而是《鐵流》、《毀滅》、《母親》這樣的蘇聯文學譯著和艾思奇《大眾哲學》一類的馬克思主義簡易讀物，雖然“黨義”讀物與後者之間也有一定的親緣關係。

“12·9”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個主要目標：對外是獨立自主、伸張國權，對內是通過計劃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軌道上實現國家統一。由於中日戰爭、國共對立的殘酷性，由於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了啟蒙”，“12·9”一代在延安整風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為特色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新中國的大一統思想。這樣，也就延後了“12·9”一代思想家的產生。

劃分歷史，各有標杆。對於“12·9”運動，何家棟明顯地以中共黨文化的標杆思維與論述歷史。“多數具有思想家氣質和抱負的知識份子都彙聚到了中共黨內。”這同歷史事實相違了，是典型的黨文化的語言。其實這裏“多數”的計算本身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歷史標準，早把眾多異己知識人都排斥在外。他既能看到問題，“‘12·9’一代的閱讀面是相當狹窄的，占主導地位的並不是國民黨的‘黨義’讀物，而是《鐵流》、《毀滅》、《母親》這樣的蘇聯文學譯著和艾思奇《大眾哲學》一類的馬克思主義簡易讀物……”卻仍然堅持把受這些遵命文學和馬列主義普及簡易讀物薰陶影響者視為思想家，把這個階段定位為一個思想階段。他甚至能很清醒地指出“‘12·9’一代在延安整風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為特色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新中國的大一統思想。”這就是說，對於這一歷史階段的定位，何家棟是從中共黨史的立場，從毛澤東思想的角度來分析來思維來總結的。我們應該理解何家棟作為受“12·9”運動影響而參加革命者，對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天然地抱有親切感認同感回歸感；但無庸諱言，這也是他作為中共的一員，始終對這個黨懷有深厚感情的一大原因。這也正是何家棟在論述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脈絡時會把“12·9”運動作為一個思想階段來定位的根本所在。

1935年的“12·9”學生運動是完全在中共操控下發生的。在中共黨史上，它是很重要的一頁，何家棟視它為一個思想階段與黨史對它的定位是一致的；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抗日史上，國共兩黨對它則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在學人眼裏，它又是另一番景象。歷史學家余英時在《重尋胡適歷程》中對“12·9”運動的考證和論述，作為局外人與局內人何家棟的看法相映成趣，太能說明問題了。恕我大段引文如下：

……1935年的“12·9”在一個關鍵的方面，斷然不同於1919年的“5·4”如傅斯年（1896—1950）在1946年時所作的回憶：“5·4”的學潮大不同。“5·4”全是自動的，“5·4”的那天上午，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傅樂成，1969：62—63）然而，就1935年“12·9”學生示威運動而言，今天我們知道，一切新啟蒙運動，它也是由共產黨地下基層組織細密策劃與執行的。根據北方局黨書記高文華（活躍於1930年代）的第一手記述：“學生動亂在‘12·9’運動中達到高潮。我們在北方局裏支持且領導了此一愛國運動。趙升陽、柯慶施、陳伯達等同志為黨中央的領導。公開場合的直接領導人，則包括李昌、蔣南翔（清華大學支部黨書記）、林楓、姚依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高文華，1982：187；葉永烈，1990：102）。此外，1935年，在“12·9”示威運動中被描述為“中國的聖女貞德”的學生領袖陸瑾（活躍於1930年代），在她紀念這一事件60周年宣傳文集中，公開承認，她那時在地下黨組織的直接指揮下工作（陸瑾，1995：7、19）。明顯地，被巧妙策劃來相互奧援的這兩場運動——“12·9”與新啟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免讓人聯想到狹義的“5·4”（1919年的學生示威運動）與廣義的“5·4”（胡適於

新潮社所謂的“文藝復興”）之間的關係。但是“12・9”與新啟蒙運動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局的地下共產黨組織 因此說前者是“1919年學生運動的目標直接延續和實現”，而後者是“‘5・4’五四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似乎沒有什麼意義。（《重尋胡適歷程》247—24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余先生作為局外人很客氣，對將“12・9”和“5・4”相提並論，委婉地批評說“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其實是什麼意義也沒有，“12・9”與“5・4”二者扯不上。

魯迅說：“搗鬼有術，也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事功，若搗鬼，尚且成不了，遑論思想！思想何能靠搗鬼形成、確立？！駐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美國飛彈炸毀後，大陸“憤青”們在中共的縱容指使下遊行示威、砸美國大使館領事館的種種；追溯上去，文革時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種種，以及遵命抗美排日反蘇斥俄援越幫柬支埃及要巴拿馬……——這“我們也可以說不！”的種種，其聲勢可以浩大到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其地域範圍可以遍及北京上海幾十個幾百個大中城市以至全中國，其時間跨度延續到五十七年，較之“12・9”運動，規模宏大到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但能把這一切操控搗鬼的大動作看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留歷史的有價值的思想階段嗎？

請再看余英時對“12・9”的細節考證，以見操控搗鬼的事實。

“12・9”是劉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傑作。當時中共為了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為這一新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12・9”運動。關於這一點，當年的參與者已公開站出來，作了及其坦率的交代。（1）……蕭公權先生回憶當時清華的情況，恰可與北大相印證。他說：赤色陰謀家事先已指使黨徒和同路人滲入清華。教職員和學生當中有多少人有心或無意地參與陰謀，為外人無從知道。我想為數不會很多，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07）。

蕭先生雖不知內情，推理則十分精確。所以12月9日以後，北大的學生終於北捲入了運動之中。同一天的《日記》接著記下午3點後的情形，說：從長安（飯店）出來，過王府井大街，見有學生一隊，似是遊行到此。車過東安門大街，見最後一部分打著北京大學旗子，約有三四十人。他們見我的車子，都紛紛私語。

我趕到第二院，見著鄭秘書長（天挺），始知遊行隊伍到第一院門口站了15分鐘，高喊“歡迎北大同學參加”的口號。有幾十個同學忍不住了，出去加入遊行。

我回到家中，得鄭秘書長電話，知遊行隊伍已散了。晚上居仁堂打電話來，邀各校校長開會商議學生遊行事。（中略）秦德純市長報告，今天高橋武官去市府抗議，說今天學生遊行，是有背景，主謀人是蔣夢麟與胡適。

……

胡適在1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

孟真說我近日脾氣不好！其實我這幾天的失望比前20天更大。青年人沒有知識，沒有領袖，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今天城內各校傳說日本兵到清華，打傷了幾個學生，死了一個。城外各校則傳說師大前天死了一個女生，並說死在協和醫院！城裏造城外的謠言，城外造城裏的謠言！可憐！

城裏城外互造謠言以“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自是“12·9”學生運動的實況，因《胡適日記》而保存下來，但胡適的理解則完全錯誤。他限於五四運動的經驗，以為學運的領袖都是公開站出來領導，如傅斯年、羅加倫、段錫朋、羅隆基等皆是明證。

“12·9”沒有五四型的學生領袖，是因為它的“領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組織。“城裏城外”互造“謠言”以保持運動的熱度不下降，其實正是出於“領袖”的暗中策劃。

“12·9”在北大的最後高潮發生在12月31日下午蔣夢麟校長所召開的全體學生大會。根據胡適貼存的剪報，這次到會的學生有600人，空氣十分緊張。

下面是《胡適日記》關於這次大會的簡單記述：

十點夢麟電話邀去談話。各校長都到。昨天北大學生代表會議議決二事：1、南下請願，2、反對提前放假。我們今天議決，由北大校長下午召開學生會，看結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

三點趕到北大三院，剛開會。夢麟先生先報告，次請我說話。我剛起立，即有幾個學生江之源等大聲“噓”我，我從容把大衣脫下，上臺講話。說了半點鐘，我提議請校長測驗公意，以二事付表決：1、1月4日提前放假，2、如不放假，1月4日複課。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說這是談話會，不是學生會。我告訴他們：這是最大的全體學生會，我們要問問全體學生的意見。如果多數學生不贊成昨天的代表會議決議，代表應該反省，應該復議他們的決議。如果少數人把持不許同學多數有個表示的機會，這種把持是不會持久的，將來必要被打到的。我請夢麟把問題寫在黑板上，先表決：

1、4日提前放假，無人舉手。

2、不贊成提前（放）假，約有7、80人舉手。

次表決4日複課：

舉手者101人

次表決不復課

舉手者7、8人。有人喊，“不要表決！”那幾隻手又放下

了。結果是零。

……

另外一封署名“學生友仁”……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摘引最有關的一段。他是這樣說的：

近因時局轉變，我們有第一次的議決案——罷課3天表示點真正民意——我當然極端贊成。第二次的無限期罷課議決案發表出來，我們有幾位同學負責向學生會建議，告訴他們對於這樣大的難題，應當召開全體大會，讓大家在充分討論的機會，然後舉行全體總投票（因大會總有不到者）。不料我們所得著的答復：“不識時務，膽大妄為。”悶了20多天……那天召開談話會，我當然是贊成複課的一員。不過看到少數藏在群眾中做那種不露面的流氓（實在無以名之），用極卑鄙的手段威嚇別人，而有些同學也就被嚇唬住了，不敢舉手。……

……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體地指出北大少數學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數同學的意見，如何蠻橫地把持著所謂“學生會”，而且還揭發了那次全體大會舉手投票時台下學生的活動實況——這是胡適在臺上絕對覺察不到的。原來那天舉手的人數僅有100人上下，是因為少數“藏在群眾中……的流氓”用種種“極卑鄙的手段”把本想舉手的學生們威脅住了。這封信完全證實了上引蕭公權先生的觀察：“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重尋胡適歷程》

39、40、42—4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何家棟也許未看見過或不知道余英時說的這些情況，也許他知道的更詳細更透底。無論知道或不知道，何家棟對“12•9”運動的看法與余英時是如此地相異，是絕不可能一致的。相同的一件事，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看法和結論會截然相反，這在史學研究中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余英時和何家棟的不同看法孰客觀孰公正孰能作為歷史留下來，也是毋庸置疑的。

何家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編寫的《把一切獻給黨》、《趙一曼》、《我的一家》、《革命母親夏娘娘》、《王若飛在獄中》、《方志敏戰鬥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記毛主席在陝北戰爭中》、《劉志丹》等等諸多革命書籍膾炙人口、風靡一時，配合著黨的方針政策，教育、浸潤、異化了好幾代人的思想和心靈。何家棟對黨的忠誠不亞於劉賓雁，對黨的貢獻大於劉賓雁，可這個黨還是把他打入了另冊。何家棟在煉獄裏所受的煎熬甚于劉賓雁，他的兩個兒子都被這個黨折磨死了。

晚年的何家棟醒悟了。何家棟說：這個黨，不是他們的。我們的黨不是這樣的。我們要找回自己的黨（大意）。這比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似乎進了一步，就差另立黨中央了。但是仍然未能最後走出忠黨的老路。海外有魏碑者，有相似而更明確的思路。魏碑在“有關劉賓雁、共產黨與其他”一文中說：

於是我覺得共產黨的精英們，應該明智寫出一個“共產黨再宣言”之類的東西，在其中肯定自己當初的高尚理想和歷史功績，然後明確宣佈自己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和平退出歷史舞臺，然後改變名稱，大幅修改黨章，分步驟還政於民。當然在89—64之後，這個可能性對於中共自身已經微乎其微，但對劉賓雁、蘇紹智、王若水這樣的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共產黨的正統自居，逕自來做這個宣言，這對於這場轟轟烈烈盛行了大半個世紀的世界性運動的結束和轉變，也應該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關於這個想法，我最想告訴和討論的物件當然是劉賓雁，但其後幾年我好象一直沒遇到合適的機會。記得清的是91年前後在普林斯頓，我碰到機會當面跟蘇紹智講過，他當時很感興趣，說日後找我詳談，但不知何故，日後不了了之。（《劉賓雁紀念文集》312頁。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

何家棟逝世後，何夫人陳蓓說：“儘管如此，老伴對自己的人生抉擇依然無怨無悔，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裏，有一次對看護他的子女喃喃說道：‘我愛你們啊，但是，這能比得上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黨嗎？’這樣熾烈如火的深情，這樣九死不悔的摯愛，真是可用一片丹心可對天來形容的。”（陳蓓：又是一個未了的心願。載新世紀網站06年11月20日特稿）。如果說，這是未亡人在大陸那個環境裏可能多少有點言不由衷的應付場面的敷衍話，那麼何家棟有自編文集傳世，陳蓓說：“老伴的《文集》中的所表述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問題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充溢著對社會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關切，表達出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陳蓓：同上）。這應該是真實的反應。

何家棟的這一信馬愛黨忠黨的局限從陳子明的以下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粉碎“四人幫”之後，老何的老搭檔王勉思在湖南少兒社當社長，就張羅著把《我的一家》、《趙一曼》等書署上何家棟的名字出版，一是為他正名，二是為他的“平反”

增加一點份量。但被老何拒絕了。他說：“不出名也就少丟人。”“其實我並不怎麼看重我寫的東西，總以為自己還可以寫得更好些。過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現在重印《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為我所拒絕。《中國的保爾》電視劇請我當顧問，我把聘書退回，他們不收。我說：只要你們別署我的名字，也別說我提過意見，你們怎麼編都行，我不會找你們的麻煩，他們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過眼雲煙，何足掛齒。我懷疑今天宣傳這些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前人的功績能掩蓋後人的罪行嗎？”（陳子明：懷念何家棟。載《北京之春》2006年12月號）

何家棟的淡泊、高風十分難得，令人由衷地欽佩嘆服。但一句“前人的功績能掩蓋後人的罪行嗎？”也毫無歧義地說明了他的思想局限。

說到底，何家棟諸先賢最終沒能走出忠黨的窠臼。無論對這個黨的罪孽如何痛恨，這種恨，總也脫不出越不了“恨鐵不成鋼”的雷池。這同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是完全一致的。這是為什麼？他們的根本局限在哪兒？就是因為他們始終糾纏在這麼個怪圈中：這個黨的理論主義思想原本是好的對的正確的益世的完美的，被毛澤東篡改了歪曲了糟蹋了變質了，應該尋求恢復原本正確的黨的理論主義思想。列寧主義不對，斯大林是暴君，毛澤東思想反動，但是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人道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對的還是好的。這是他們堅決堅持的底線。他們對毛澤東離心，但對黨不離德。他們將毛澤東與共產黨剝離，將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分開，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社會主義區別，以便自慰與證實忠黨是對的，是忠主義忠思想忠道統而非忠領袖個人崇拜。於是，“第二種忠誠”的發現和存在應運而生。一句話，他們沒有完全走出來。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思想！這不僅是何家棟諸先賢的局限，也是當今全體中國知識人的局限。正如熱愛敬重何家棟劉賓雁諸先賢如筆者的知識人拳拳愷愷竭盡心智往積極方面詮釋“第二種忠誠”的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異曲同工的局限！知識人總還是自覺不自覺地在黨文化的樊籬內思維、踉蹌、跳躍。

幾乎所有的55萬個右派，都有這麼一條罪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認這條罪名，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是擁護、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這真是歷史的悲哀。如果說，把你打成右派時，你還因種種緣由，未能看清這個制度的錯誤罪惡，那麼，當經過了五十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後，這個制度還是不認錯、道歉、賠償、改正，你是應該認識到這個制度不講理的本質了。

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

右派的所有冤屈、痛苦、慘酷、死亡，都來自這個制度；六十年來的一切罪惡，都來自這個制度。不改變這個制度，不顛覆這個制度，冤屈、痛苦、慘酷、死亡與罪惡就會也已經在變本加厲地繼續。

為什麼這個制度如此頑固頑強幾乎堅不可摧，除了執政黨的陰鷙兇殘和高明的統治術外，其實，右派們自己也是幫兇和幫忙！55萬右派，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罪，匍匐在地，山呼萬歲，臣罪當誅，吾皇聖明。這種忠誠，這種愚蠢，有歷史的局限，有人性的醜陋，也有民族性的軟弱。正是這種忠誠，導致了懷疑自己、詆毀自己、糟蹋自己、否定自己，導致了逆來順受，導致了更加無法無天，幫助、維護和鞏固了這個噬人的制度。

右派，無論高層的章伯鈞、羅隆基，中層的李慎之、劉賓雁，還是底層的林希翎、周居正諸先賢都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時力辯自己是忠黨愛黨、熱愛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當然這有生活在這個制度下的無奈，但是認識上呢、內心深處呢、事後呢、現在呢？可以說，幾乎全是如此——仍然不斷地表白自己如何忠黨愛黨、如何熱愛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章伯鈞從沒對這個黨不忠、從沒對這個制度予以否定，無論是公開的、私下的、事前的、事後的、日記裏的、遺屬披露的，統統是強調自己是如何好心好意幫著這個黨。他們几乎全體一致地在愛黨忠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向黨提意見、大鳴大放。儲安平向大和尚提點意見是高層最大胆最出格的特例（也不過如此溫和）。葛佩琦的殺人論是有意栽贓樹靶的把戲。黃萬里的“花叢小語”則是最典型的知識人略帶一點傲骨的諍言。羅隆基的思想是最西化的，民國時期反蔣時是其顛峰狀態，投靠毛以後則大為收斂，1957年借機故態復萌，但無論是實質或態度，都已大大地大大地打了折扣了。李慎之諸賢是中共黨員，即便被掃地出門，仍死乞白賴守在山門外，冀恩師某日發現他的忠誠，一念倒轉，收回成命，得以重新廟列門牆；其中以劉賓雁在22年後，總結歸納提出的“第二種忠誠”為最明確、最準確、也最實在地表明了這一點。可以說，右派是“第二種忠誠”的集體濫觴！此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人，尤其是知識人中的善於獨立思考者，就背負著自欺、自慰、自得的十字架在“第二種忠誠”的雷池裏沉迷、浮游、痛苦、愜意、掙扎、迷惘而未能越出雷池半步，至今猶是。

55萬右派，在最不可思議的冤枉下、最慘無人道的苦難中以55萬顆紅心向冤主表明了、踐履了“第二種忠誠”。右派周居正，是與江竹筠江姐、羅廣斌一起關押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的共產黨員，江姐繡紅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國民黨集體屠殺關押在白公館的中共人士時，周居正虎口餘生逃出前還救了一個四歲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為右派後，1964年在沙坪壩改場被以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判處死刑。周居正被共產黨槍斃前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這種能麻醉、麻木人至死不悟、死也不悟，還要遺囑後人繼續的“第二種忠誠”現象，是最令人痛心，令天地悲泣的。一念及此，不由人顫慄無已。周居正的遺孀曾昭英尚在人世，他們的兩個兒子因為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自盡，年逾古稀的曾昭英從重慶市小龍坎小學退休，在四川窮山溝裏苟延殘喘，孑然一人，形影相弔，至今猶牢記夫君的諄諄遺囑“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在為著夫君的冤屈寸步不拉地跟著黨的最基層的皂隸，喃喃不休地發著要求平反垂憐的永遠的哀鳴。

周居正是最忠良、最慘烈、最典型，無庸諱言，也是最愚蠢的“第二種忠誠”者。王實味是更早的周居正。他們死了都還在夢中。這種悲劇一直在延續，比他早一些的代表是險死還生的胡風，比他晚一些的是張志新，斃命於暗室中的同類可以肯定不知凡幾。體制內的精英翦伯贊、鄧拓、老舍、吳晗、趙樹理……可以列出幾百人的名單，在自殺前都留下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遺言手跡，以致後人要將此一現象作為自殺文化來研究。他們終身所踐履的“第二種忠誠”、他們忠魂所喊的“萬歲”“毛主席”、他們忠心所嚮往所尋求的真正的馬列主義正是導致他們死亡的根本。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至今猶是，真是人類的最深刻的悲劇。

似乎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王若望。王若望流亡海外後，絕口不提無論第幾種忠誠，在行為上也是一以貫之的嚴厲抨擊中共、否定馬列主義；無論是什麼樣的馬列主義，蘇式的毛式的鐵托式的，還是原教旨式的，抑或是冠以動聽辭彙人道主義式的，在王若望眼裏，統統無須再提，全部予以否定。可以說，王若望是流亡海外徹底反叛的異議者，無論是他們這一代，

還是後一代，延伸下去的天安門新一代，王若望都是反叛中的徹底者。在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黨反叛的徹底上，相對於劉賓雁諸賢的流連忘返，是不得不推崇王若望的，他是同輩人中幾乎唯一的。或以為王若望對馬克思主義沒有深入研究而視為淺薄——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沒有深入研究，幸虧有此淺薄，才難能可貴地有了一位徹底反叛者。設想王若望如果一生都浸淫在馬克思主義裏頭，恐怕現在仍然也在這個藩籬內踟躕跋涉而出來，那不過多了一位並不深刻或很深刻的馬克主義者罷了。

據王若望遺孀羊子回憶：“九十年代後期，許家屯在一書裏闡述民主漸進以後，很多精英們改弦易轍了。王若望始終認為這個黨不可能改良的了，可是自己營壘裏的人都轉向了，對外，他只好閉嘴，只能對我感歎：‘唉，中國未來民主哪，至少還得五十到一百年方有起色。’”

王若望不僅與王實味是同時代的人，且是同在延安同辦牆報同寫批評文章同受整肅者，略有區別的是：王實味在小砭溝辦牆報，王若望在大砭溝辦牆報；王實味被關，王若望被貶；王實味五年後被殺，王若望成為山東的王實味後因羅榮桓喊停“刀下留人”僥倖續命。歷史真是有趣。王實味死的冤枉、死在夢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二王都曾是革命最忠誠的兒子，王實味延頸挨宰成了祭壇上的犧牲，被革命吃掉了；王若望，則掙扎出來做了死不還鄉的野鬼。二王的結局雖然都十分悲哀，但思想軌跡的演化，則是一種進步。歷史總在前進！儘管無比艱難，還是在前進。相對於55萬右派的未徹悟，這種進步是十分寶貴的罕見的。二王相遇於地下，會說些什麼呢？我想，他們除了寒暄互慰，最一致想到的、提到的一定會是曾與他們“五同”——同時代、同在延安、同辦牆報、同寫批評文章、同受整肅而至今健在、活在陽世、碩果僅存的同志——李銳！他們一定會關心李銳醒了嗎，徹底醒了嗎？歷史就是如此地不作弄人！王實味、王若望、李銳，是三個座標，標誌著、見證著三個無比忠誠的共產黨人初始完全相同最後迥然相異的人生軌跡。李銳至今仍是一位忠誠正直的共產黨人，可以說，他是“第二種忠誠”那一代尚在人世寥寥可數的代表中的典型。李銳對自己終生獻身的事業的批評、抨擊不可謂不尖銳、不可謂不猛烈、不可謂不留情面，較之王實味、流亡前的王若望，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仍能生活在一個物質豐足、自由略缺的環境裏，沒有像他的同伴王實味那樣被砍頭，沒有像王若望那樣被驅逐。這當然也是一種變化，也是歷史的一點進步；但是，相對於王實味的掉腦袋，相對於王若望的苦難，相對於55萬右派的慘痛，相對於六十年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劫難，這種進步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制度不改變，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沒有新思想，不可能有新制度。李銳與右派們的“第二種忠誠”，至多只能使劫後餘生的右派苟延殘喘、使李銳們體面地活到死，永遠也不可能給國家給民族帶來新的未來。

王若望是右派，所以，王若望也是55萬右派中的最終醒悟者、徹底反叛者。在這一點上，同是右派，同是流亡者，主張並鼓吹、實踐“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李銳諸賢不僅相形見绌，且是未醒悟者。所有從舊營壘過來的人，天生地與舊營壘連著一根臍帶，孕育於那個子宮，胎生於那個產門，臍帶割斷了，血脈相連著。母體的震怒、躁動、囁語、歎息、低落、輝煌、召喚……都會對你產生影響。真正能削肉還母、剔骨歸父而煉獄重生是極其艱難極其罕見的。可惜的是，王若望的徹底反叛，還只是停留在踐履上，尚未昇華為系統的思想理論留世。這是歷史的局限，也是王若望的局限；是歷史的遺憾，也是王若望的遺憾。限於篇幅，本章不作詳論。

國家和政黨不是一回事，是兩碼事，這個普世認可的常識被共產黨混淆了，有意無意地

攪成一鍋粥了。這同國民黨是一脈相承的。1949年前，民國時期，國民黨用的最頻繁的專有名詞是“黨國”，“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共產黨不是不喜歡用這個詞，而是不喜歡國民黨，愛屋及烏，恨屋也及烏，怕用這個詞引起對國民黨的懷念。它比國民黨高明，用愛黨、黨就是祖國、祖國是母親、黨媽媽來代替“黨國”，也更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一響徹神州大地至今猶在回蕩的歌聲就是明證。

我們從專制制度中出來的人，誤區大得很。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從字面上全都知道是絕對錯誤的，都以為自己絕不會中了這邪、落了這套；事實上呢，則不然，幾乎是全然地認了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絕不放棄永遠喋喋不休千花萬門的解釋，不解釋到有真的馬克思主義、真的馬克思主義如何不同于以往的假壞、真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好如何你們還不明白、聽我的就會明白、照我說的做就會對就正確……絕不罷休！就是明證！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聖經”，這是天經地義，應被尊重；作為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禍近一世紀、半個地球、十幾億人後，為馬克思主義正名，還其原汁原味，天經地義，極應尊重；作為人類、作為華夏子孫，則可有多種選擇。但可悲的是五十七年來，中國人沒有任何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強迫指定為全中國、全民族、16億人的指導思想。這是五十七年來的歷史事實。著名的最根本的首選的“毛主席語錄”是：“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實已滲透到骨髓、溶化在血液了，至今仍被共產黨和真正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奉為鐵則。無論如何為馬克思主義正名、還原其原汁原味，都不過是“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便是黨國一體的最大最確切最無可辯駁的明證。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天然地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非天生是中國、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我們千萬不要被共產黨八十來年的灌輸漿糊了腦袋。從共產黨的立場，在馬列主義為禍近一世紀、半個地球、戕害生靈逾億後，自然要而且非要為馬克思主義正名不可；作為共產黨員，作為終生信仰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應該這樣做；這纔是正當的、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但是作為中國人，作為華夏子孫，就沒有這個必要和義務。可供我們選擇的秘籍真經很多，已經證實有許多優秀傳統的秘籍真經就有：儒學、道家、佛典，還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還有基督耶穌、穆罕默德……。真馬克思主義無論好到天上去，同上述這些文化對於中國人、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平等的、是處在同一水平綫上的。馬克思主義只對共產黨只對共產黨員具有另外的神聖的不可不認同不崇奉不實施的意義。共產黨會沒有了，中國不會沒有了；共產黨員會不見了，中華民族則至少長命萬歲。所以，共產黨不是中國，中國不是共產黨；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不能讓中國讓中華民族也永遠信奉馬克思主義！

歷史地來看世界看中國，馬克思主義本身無論正誤，在前蘇聯、在東歐、在東南亞、在北韓、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尤其在中國大陸的實踐，已註定了是罪孽、是為禍人類的大罪孽。那麼，去爭辯、證實原教旨、人道、科學、進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地不同於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閹割歪曲變種了的馬克思主義，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學術上有益的探討罷了，於歷史事實、於已被荼毒的各民族、被殘害的億萬生靈則已毫無用處了！難道要將無比正確的原教旨、人道、科學、進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再來一番“交學費”式的實踐以證實爭辯的輸贏麼？以試驗人類社會的更加美好麼？！中國大陸實行馬克思主義五十七年了，弄得山河破碎、民怨沸騰，國將不國！為什麼就不能跳出這架五指山來看中國呢？為什麼非

要還在這架五指山中間翻筋斗呢？大陸的沒有人，海外的呢？似乎也不見影子。習慣的力量、人性的力量大極了。

問題確實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真假好壞，問題在即使好，也不要了！也不能再用一個世紀、半个地球、十幾億人的生命去交學費式試驗了！問題是即使好到天上去的寶貝，給爛透到骨髓的共產黨一鼓搗，就一定會變成壞到地底下蒙着畫皮的魑魅魍魎（“民主自由”即是例證之二。）共產黨以及繼續信奉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也應該努力為其正名，還原馬克思主義的原汁原味。這是一個政黨一個終生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的責任和義務，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同樣存在着選擇的自由。五十七年來中共對十來億人的強制強迫強暴不能再繼續了，學者們也不能再自覺不自覺地幫閑幫忙了。這個時候，即使對摒棄馬克思主義有一點激烈，也應視作“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而予以理解諒解。

以何家棟、劉賓雁諸先賢之優秀，一置身其中，就不由自主地受到黨文化的影響制約，這恐怕只能是人類人性的局限才能予以解釋的。

這個荼毒人類的黨，不僅依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諸黨魁耀武，也恃仗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劉賓雁、何家棟……諸先賢以及包括筆者在內芸芸眾生曾經的或會繼續著的無怨無悔忠心耿耿揚威，而得以延續延宕。說到底，我們這個民族、16億中國人，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澤東早就有見及此。知識人卻一直在徘徊、彷徨，被黨文化的厚皮蒙蔽粘附，在忠文化的深淵中不能自拔。一代代地更換核心，一次次地換湯不換藥。知識人卻總是一次不落地抱有希望——幻滅——再希望……。中國上世紀後半的思想史，實際上是除了毛澤東思想再無其他思想的思想史。如此，沒有自己的思想，是絕無可能脫離黨文化的厚皮、走出因循忠文化的深淵！

必須有新的思想，才能躍出“第二種忠誠”的深淵，才能邁出“從未起義”不敢起義的雷池，才能掀翻一黨專政的樊籬。右派，你就是反黨，你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以前不是，現在要是；如果行為上不能是，認識上要是，思想上要是。這才是真正的救國救民救黨！沒有這個起點，永遠也不可能有新的未來。五十七年後，如果還不明白明確這一點，那麼五十七年的苦難、半世紀的光陰可真是白白流逝了。

只有自覺地明確地否定顛覆這個萬惡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有一個新的局面；只有感受到真正的壓力，共產黨才會做出選擇：要麼滅亡，要麼改變；這也才是真正幫助共產黨改弦更轍，於制度這個根本問題上重起爐灶。共產黨的既得利益盡可維持一段時期，被迫接受多黨制的共產黨自然會在新制度的熔爐裏逐漸融化改變；這是從全民利益、大歷史角度考慮的最低成本的大買賣。臺灣的當下，就是眼前同文同種同根同命同黨同國的顯例、明證。

五十七年的光陰亦長亦短。可憐的當代中國知識人，承載著幾千年中華文化的精華，卻一直匍匐在皇帝文化、黨文化的腳下；從55萬右派的“吾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哀呼，到“第二種忠誠”的鴉片麻醉，到全面的幫閑幫忙、賣身投靠的徹底墮落，遙遙無有醒期。這樣的知識人，怎麼可能產生新的思想？這才是最可哀歎的！

“中國의良心”劉賓雁在生前最後一次演講裏感歎中華民族遭受的劫難和當世的全面墮

落，十分憤激地說：“該！”最可悲的是這憤激之言準確無比。

知識人，一貫是代言人也總是以此自居。一貫比農、工、商有著無數方便和好處的知識人，面對著近六十年的無法無天、人間地獄，我們鴉雀無聲，我們充耳不聞，我們處之泰然，我們大言炎炎，我們清談侃侃，我們輕搔細撓，我們拿捏分寸，我們鶯歌燕舞，我們夢死醉生，我們與時俱進，我們歌舞昇平，我們上體聖意，我們下責妄動，我們成精成怪，我們輪贏通吃，我們悠哉幫閒，我們精心幫忙，我們暗輸款曲，我們明碼賣身，我們投靠幫兇，我們歌功頌德，我們無恥無尤，我們粉墨男旦……

筆者注意到時賢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似乎跳出三界外來看中國。余先生以“道”來釋中國，完全不在任何方面任何時刻以馬克思主義為座標來解讀中國，更不會背負着“第二種忠誠”的十字架在愛黨的前提下來愛中國，尤其是當今的中國和將來的中國。這是很可引人深思的。自從余先生得大獎後，他的著作成了熱門，談論他成了時髦。我略微讀過余先生的幾本書，發現他對中國歷史的解讀都有那麼點言在意外的余韻。時人議論余先生與他的著作，恰恰忘了這最重要的一點。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余先生專辟兩章外加附錄一篇來論述中國歷史上的士商關繫，約15萬字，佔全書61萬字的四分之一篇幅。余先生旁徵博引，議論風生，舉例說明中國歷史上的士商關繫。落到了何處呢？士應、士可自養！唯自養才能自立自強！無論這是否歷史事實，可以商榷爭論駁難，但對於當今時代的士——中國知識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知識人，是應該有那麼一點很重要的很急迫的現實意義的。余先生接觸過大陸的士，近二十年來，他在普林斯頓接觸的最多的應該是流亡海外的士。他看在眼里，記在心裏。他是紳士、是歷史學家，一有機會，就借歷史把自己的看法想法發為文字。《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寫于02年9月，03年1月第1版。余先生是有話對當今的中國知識人尤其是海外流亡的士說啊！局外人看局內人，會有另外的角度。似乎沒有人理睬他，接他的這個茬，都只在真誠地褒揚敬佩他、準確地泛泛地說一些繼絕開來的話，唯一有針對性的文章却是在知識的硬傷上的批評與糾纏。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理解有差，也許是我對於士商關繫的言外之意敏感了？！那麼，《方以智晚節考》是余先生的另一本書，純從氣節上論士的風骨節操。從學術的層面上來看，余先生自然是為方以智而方以智，為方以智而考；但是我們當今的讀書人難道不應從中悟到一些什麼嗎？余先生在另書中引陳寅恪先生的一首小詩“男旦”：“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余先生註曰：“罵當世讀書人都已成了戲臺上的‘男旦’。”一句“罵當世讀書人都成了戲臺上的‘男旦’”，很重，非同小可，也絕無歧義，却至今也沒有引起應有的反響。不妨尖酸刻薄一點地說，海內外已是“男旦”的讀書人，對這一深到骨髓裏的嘲諷自然避之唯恐不及，那麼尚未變成“男旦”的士，則應惕厲自強念念不忘！！鄙以為，讀余英時，這才是最重要的。

余英時不同人扯馬克思主義或很少扯馬克思主義，這同劉賓雁不同。當然，他們的專業不同，但是，劉賓雁是記者作家并非哲學家。劉賓雁對馬克思主義的留戀眷顧、流連忘返，說明了營壘中人營壘外人、局內人局外人着眼點確實是不同的，看問題的立場方法態度都有根本性的區別。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大背景情況下，局外人的獅子吼似乎才能是振聾發聵的綸音；至少在目前來說，局內人總在馬克思主義的樊籬內踟躕，似乎是一個未可更易的事實。

海內外的中國讀書人，需要先賢的警諷，需要沒有利害關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透析精微的外籍時賢的警策。筆者將讀先賢陳寅恪、時賢余英時警世之作的感悟記下，與當世讀書人共勉，也是奉獻給55萬右派和劉賓雁、王若望以及所有逝去的知識人和海內外所有存活着的

知識人一束帶刺的玫瑰。中國當下全體沉淪的知識人，當今最需要的是刺、是針、是砭、是灸、是醒、是悟、是支撐脊樑的骨頭、是不依附于任何皮的獨立自由……從先賢從中華文化精華中學會、恢復站立之姿，然後才能行走，才會有新的思想產生、新的思想到來。

直筆隱語斥“男旦”——陳寅恪余英時共識探微

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與余英時先生《方以智晚節考》乃當代文史考證上的雙璧。

余英時考明末志士方以智密謀反清、赴難死節；陳寅恪論明末風塵女子柳如是絕世才情、忠肝義膽。錢穆先生序余考曰：“而密之乃得以乾淨為一明代人”！柳如是叱明亡之際拒踐以身同殉國難之約的男人錢謙益曰：“公不死於乙酉，而死於今日，不已晚乎？”一雌一雄，亦乾亦坤，雄視天下，雌傲古今，是乃雙璧！

余英時作《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陳寅恪得閱是文，下四字評語“作者知我”。“知我”者何？陳有《男旦》一詩：“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余作《陳寅恪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有句“罵當世讀書人都已成了戲臺上的‘男旦’”。一故一健，耆宿時賢，直筆隱語，考古推今，是乃雙璧！

小子晚學，識字讀書。瞻之陳公在前，忽焉余英繼後，高山景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警我以氣，策我以節。謹領教誨，敬撰聯語，以悟以告：“傳薪翻是讀書人”已鑄於心；直筆隱語斥“男旦”，敢學三分！聯曰：

陳寅恪論柳如是，殘花敗荷勝谷蘭籬菊，感墮風月傲松柏，歎舊時勾欄猶存風骨；
余英時考方以智，赴水沉江效屈平文正，羞見精英淪伎男，哭新世文壇已無精神。

晚學：黃河清上
丙戌年小寒後三日 於地中海畔

【作者註：07年香港出版發印本書時補充增寫本章。】

第六章 誑絕慘絕無恥絕

地主，這一世界文化史上中性的名詞，在大陸五十餘年的歷史中成了罪惡、罪人的代名詞之首，用流行的語言，叫做“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傢伙。

《白毛女》電影是一個真實故事的改寫，地主黃世仁的不仁和白毛女的悲慘已在大陸幾代人心中定格了。曾有解放軍戰士觀看《白毛女》話劇演出時，按捺不住憤怒的情緒，舉槍打死了舞臺上飾演黃世仁的演員。《白毛女》宣揚地主之惡的重大影響於此可見一斑。白毛女原型人物尚在人世。

《半夜雞叫》是小學語文課本裏的一篇文章，也拍成了卡通片電影。地主周剝皮敲骨入髓剝削長工的行徑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大陸的兒童、60歲以下的人，大約沒有不知道地主周剝皮半夜學雞叫，催長工起床下地幹活的故事的。《半夜雞叫》選自一本紀實性的小說《高玉寶》。

泥塑“收租院”以真人大小、栩栩如生的塑像，形象、生動地展示了大地主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大陸的電影、出版物裏隨處可見。大陸人大約也沒有不知道劉文彩和“收租院的”。

《劉文學的故事》也是小學語文課本裏的一篇文章，敘述四川農村紅領巾少年劉文學與一個偷集體田裏紅辣椒的過氣地主搏鬥，被地主殺死的故事。所謂過氣地主，是指這個地主是以前的地主、是中共建政後身份被定為地主，實則，當時已被作為專政的對象、農村中最下等的賤民了。這樣一個階級敵人，竟殺死了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恰好為毛澤東階級鬥爭論提供了最有力最典型的證據：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

“變天帳”的神話傳說是文化革命中挑起對地主仇恨最常用的把戲。

1987年，北京章伯鈞先生夫人李健生先生去世，我致挽聯吊唁。後收到其女章詒和寄來的挽聯集影本。陳立夫伉儷挽李健生的聯語同我的印在一起，且是上下文。我當時尋思，這倒挺巧的。章詒和在電話中說，陳公的挽詞還惹了風波，有關部門不讓公佈，因為有“節哀順變”四字。這話不用說現在美國、臺灣的人聽不懂，就是我在當時，驟一聽，也無法理解。後來，仔細一捉摸，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章伯鈞是57年中共打的最大的右派分子，死于文革。八十年代，章夫人是統戰對象，當時，“官”至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死後哀榮，中共給她副部長級的待遇，是要作給人看的。當時政治寬鬆了些，陳立夫致哀沒問題，說“節哀”也沒問題，問題出在“順變”上。

六、七十年代，大陸階級鬥爭理論甚囂塵上，時不時可以聽到、讀到、見到從某地主家、富農家，某國民黨將領家，某右派家搜到什麼“變天帳”；這些所謂的“變天帳”可以是一張民國時代的舊照片，幾件民國時代的舊衣服，幾本民國時代的書籍。保存這些東西，說明懷念過去，懷念過去就是痛恨現在，痛恨現在就是痛恨共產黨，就是想“變天”，就是想國民黨捲土重來，就是要廣大人民群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現在聽來似乎是笑話，當時可是最最正而八經，最最堂堂皇皇的推理與理論。這是“階級鬥爭的新

動向”。那就沒完沒了地鬥當事人，教育周邊人，“永保紅色江山不變色”。要是找出日記、委任狀、軍刀、匕首什麼的，那就死定了。被懷疑或被找到藏有“變天帳”的個人或家庭所受到的折磨，其慘酷，其長期，是非人的，是罄竹難書的。宋朝的岳武穆以“莫須有”三字慘死風波亭，千年後，毛澤東發明的“變天帳”三字害死了難以數計的善良百姓，使所有前朝留下的官、吏，所有前朝稍有頭臉、稍有財產的人全部生活在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無邊無沿的擔憂和恐懼之中。

說毛澤東是“變天帳”的發明人，有確鑿的證據：1954年，中共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登載胡風的日記及同友人來往的信件加以批判，毛澤東親自寫編者按，稱胡風記“變天帳”，“磨刀霍霍”。這是白紙黑字載之中共黨史的。此後，“變天帳”一詞就流傳開來，成為中共搞階級鬥爭而令家喻戶曉的專有名詞。始作俑者，毛澤東也！（摘自拙文《節哀順變 變天帳 陳立夫》載《爭鳴》）

那麼，地主在大陸真的就那麼壞嗎？

毛澤東的父親叫毛貽昌，字順生，號良弼。毛順生年輕的時候，家境並不好，靠過人的精明和勤勞儉樸，起早摸黑拼命幹，還清了債務，累積田產至24畝。毛順生雇了一名長工，開始做糧食和生豬生意，長途販運到湘潭，還放高利貸。毛順生的資本逐漸滾到二、三千元，自製了一種叫“毛義順堂”的流通紙票。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財東了。毛澤東自己說：這時“我家達到‘富農’狀態，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裏收穫84擔穀……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凶的監工。他最恨我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糲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雇工吃雞蛋和鹹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毛順生的小兒子毛澤覃出生時，做“三朝酒席”。

1910年，韶山饑荒，毛順生長途販運的糧船，被饑民搶了個精光。（以上綜述源自《韶山毛澤東故居》網站、斯諾《西行漫記》、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

毛澤東的父親就是地主！毛澤東自說乃父是富農，其實，應該是地主。從他父親所處年代而擁有的田地、財產；從他家所居山旮旯韶山沖而能在清末光緒年間留下許多照片（毛順生穿長袍馬褂、頭戴紳士帽）懸掛中堂諸類事實細節，完全可證，毛澤東的父親就是地主，毛澤東就是地主狗崽子！即便就是富農吧，中共的政治辭典裏，“地富反壞右”，也是一丘之貉。

中國歷史上的地主、近當代的地主其真實面貌究竟如何，是黃世仁、周剝皮、劉文彩、還是毛順生？我無意對此作學術上的考證，也無須我來考證，浩如煙海的早於中共的歷史文獻對此已有定論。毛澤東的父親就是中國典型的地主——勤勞節儉，精打細算！問題是：為什麼毛澤東明知中國的地主多是乃父毛順生式的地主，卻要竭盡全力對地主全面妖魔化而予以最嚴厲最持久最慘酷的打擊鎮壓？

毛澤東的治國總綱：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需要敵人！必須制造出敵人！謊言由

此始、由此製造出來，供足應求！明乎此，也就不奇怪城市裏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國民黨殘渣餘孽、右派、壞分子……等等階級敵人總是源源不斷地湧現，成為階級鬥爭既活生生又毫無反抗能力束手挨整坐以待斃的“肉靶”。為了江山，毛澤東只好犧牲父親毛順生；因為人性中最基本最強大的親情，毛澤東把絕對是地主的毛順生提升（或降格）為富農，似乎沾了一個“農”字，就多了一點“勞動人民”的情份，離剝削、萬惡的地主就能遠一點。人性的趨益避害毛澤東亦莫能外。這是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通過美國記者斯諾向全世界公佈的。全面謊言自此堂皇正式登場。

AB團，是謊言；長征，是謊言；西路軍，是謊言；延安整風，是謊言；托派，是謊言；抗日史，是謊言；長春圍城，是謊言；抗美援朝，是謊言；土改分田，是謊言；公私合營，是謊言；畝產十萬斤是謊言；超英趕美，是謊言；大煉鋼鐵，是謊言；辦食堂，是謊言；三分人禍七分天災，是謊言；一個指頭九個指頭，是謊言；沒有餓死人，是謊言；沒有殺死人，是謊言。

為了61個階級兄弟，是謊言；伊犁事件，是謊言；西藏平亂，是謊言；治理淮河，是謊言；三門峽水庫，是謊言；長江大壩，是謊言；唐山地震，是謊言；雷鋒，是謊言；張海迪，是謊言；徐良，是謊言；劉文學，是謊言；劉文采、南霸天，是謊言；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謊言；脫帽鞠躬，賠禮道歉，是謊言。

批武訓，是謊言；批胡適梁漱溟，是謊言；批胡風，是謊言；批俞平伯，是謊言；批右派，是謊言；大躍進，是謊言；人民公社，是謊言；總路線，是謊言；批彭德懷，是謊言；七千人大會，是謊言；四清，是謊言；文化革命，是謊言；劉少奇是內奸叛徒工賊，是謊言；劉少奇是卓越的國家領導人，是謊言；四個偉大，是謊言；折戟沉沙，是謊言；永不翻案，是謊言；平暴，是謊言；三個代表，是謊言；和諧社會，是謊言。

再追溯上去，孔老二，是謊言；法家，是謊言；盜跖，是謊言；秦始皇，是謊言；綠林赤眉，是謊言；黃巢，是謊言；李自成，是謊言；張獻忠，是謊言；太平天國，是謊言；八國聯軍，是謊言；義和團，是謊言；清宮劇，是謊言。

無事不謊，凡事皆謊！五十餘年來，還有什麼不是謊言？！

有人總括了1949年以來的十大謊言。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說理當名列紅朝謊言第一位。這個稱謂有兩個核心處與事實嚴重不合。第一，它說國家是人民的，其實從1949年建國之日至今，這個國家從來就只是共產黨的，準確說來，這個國家僅僅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把手及其助手幾個常委們的，國家任何大小事務，他們說咋辦就咋辦，人民主權只是徒有虛名。第二，它說國家是人民共和的，但從建國後起，國家就一直處於“階級戰爭”狀態，共產黨在人民的不同群體之間挑起內鬥以坐收漁翁之利，沒有人民共和，只有權力寡頭“共和”。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民權利，對政府權力而言，憲法是“限法”，中國的憲法雖有保障人民權利的官樣文章，卻不賦予對這些權利保障以司法效能，中國的憲法對黨和政府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這樣的憲法，徒具憲法之名，

卻無憲法之實。非謊言而何？

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與“黨的領導”水火不容。一個權杖，不可能兩人同時擁有，給了人民，黨就不應該拿在手中不放，被黨搶奪去了，人民手裏就是空空如也。1949年以來，國家政治權力一切執掌在共產黨巴掌心裏，“人民當家作主”成為純粹愚哄人民的宣傳口號。

四，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民主，人民當家作主，非人民當家作主便是非民主。在中國當家作主的只有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中國的民主，或者叫作中國特色的民主，是一個標準的婊子牌坊。

五，民主集中制。民主是一切權力在人民，在下面，民主集中制運行的實際卻是一切權力在政治局，在上面。民主集中制給極權主義這頭惡狼披上一副民主的羊皮，遮人耳目，其實質卻是強姦民主以保證集中。

六，西方的民主。民主只有一個種類，即人民當家作主就是民主，沒有西方東方的區別。但中共當局為了把專制說成是民主，為了粉飾不民主的事實，便憑空捏造出一個“西方的民主”來，以便給自己的假民主真專制騰出一個宣傳空間。

七，為人民服務。只要是中國人，或者在中國的底層呆過十天半月，便能親自品嘗到中國官員不把人民當人尊重的種種況味，也會親眼目睹當官的貪贓枉法的種種劣跡。在今天的中國，“為人民服務”一語簡直氾濫成災，是最常用的謊言。那些手裏正接受著賄賂的官員，嘴裏肯定高唱“為人民服務”，那些履行職責的人們，也常常把自己的責任行為說成是功德無量的“為人民服務”。

八，選舉。中國的報紙喜歡報導其他國家民眾對選舉熱情不高，好像中國民眾對選舉十二分積極似的。其實，中國的選民們誰不知道，選舉只是走過場，選誰不選誰根本不由選民決定。中國的選舉徹頭徹尾就是假的。

九，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由於政治權力在上不在下，上面想幹什麼時，一般都要列舉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借助於官方輿論工具，要求“社會各界統一思想，提高認識”，似乎提出這種工作“部署安排”的當局真的站在高處高瞻遠矚。其實，這種自上而下的工作部署絕大部份只是為了局部利益或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於社會根本就是有害的。著名的如大躍進，人民公社，計劃生育，政績工程，網吧管制等等，如果社會真的把思想統一到這些混蛋認識上，結果很可能是災難。哈耶克已經為我們論證過了，社會各界自生自發的認識是遠高出於專斷權力者認識的，與官方統一思想的過程不是提高認識，而是降低認識。

十，“三個代表”。誰是不是代表，能否成為代表，必須經過其所欲代表的對象的同意和授權。江澤民無視這個前提，一句話就把代表的資格壟斷到自己手裏。他說自己是代表，所代表的“生產力”，“先進文化”，“人民利益”卻不這麼認為。江澤民不管物件是怎麼看待的，同意或不同意，自顧自的大喊自己就是代表，實在是當今中國最為無恥的謊言。（原載：大紀元）

我們的謊言已到了這樣一種程度：謊，已不覺其謊。謊，已是正常；不謊，則成了反常。謊，自然到渾然天成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謊，已成為習慣、成為生活的需要。謊，得到讚揚、鼓勵、獎賞、宣揚、效法；不謊，受到批評、責難、降薪、調離、撤職、開除、坐牢、槍斃。

謊言的目的在掩蓋真相，掩蓋真相的目的在讓人不明真相，聽我所言，信我所行。那麼，謊言的終極目的就是愚民！

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對他明確地說過：我們就是要搞愚民政策！

我們的愚民已到了這樣一種極致：被愚，已不覺其愚。被愚，已是正常；不愚，則成了反常。被愚，受之當然、應然、泰然、自然；不愚，反生懷疑、不解、愕然、憤然。被愚，已成為習慣、成為生活的需要。被愚，得到讚揚、鼓勵、獎賞、宣揚、效法；不愚，受到批評、責難、降薪、調離、撤職、開除、坐牢、槍斃。

一位參加審判“四人幫”的法官回憶說：

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預審前後，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後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贊同的。

.....

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於由他一手製造的當時轟動全上海和全國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後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麼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應屬於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後來，大家的意見都统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我參加預審工作後，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後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後國家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張春橋緣何在法庭上一言不發》王文正口述 沈國凡整理——博訊·史海鉤沉）

毛澤東幹了反革命的事，張春橋就只是錯誤了。這位法官敘述的很實在、很自然、很符合黨的需要、很天經地義。可怕正在於此！謊言到了這樣的程度，已不是謊言，而是一種堂皇的習慣，一種可以公開述說的愚民方式，一種明白無誤明目張膽欺人的同時更須自欺自慰自麻自醉的必要了。

葉淺予在其回憶錄裏說：“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

李慎之說，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

一邊把“勞動光榮”吹上天，工人農民如何偉大、如何當家作主；另一邊，則把勞動作為懲罰的手段。“勞動改造”、“下放鍛煉”是中共各級幹部教育、訓斥知識人最頻密最冠冕堂皇的用語，也是不管倒楣還是風光的知識人耳熟能詳脫口而出倒背如流的話。這種根子裏的虛假，已經自覺到自然而然了。

明白無誤的謊言，無須多說，此類“深刻”的謊言，謊者被謊者皆已浸潤其中而不覺其謊。稍作深究，五十七年來，幾乎事事時時如此，所以說這是謊言的極致，沒有更合適更確切的詞語來說明了。

制度性的謊言、文化傳統中的隨機應變，結合著人性的醜陋，趨炎附勢、愚昧無知，將五十七年的歲月攪成一大醬缸謊言與愚民的混合物，浸潤著、灌輸著、滋養著16億人的腦神經末梢、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以至於脊髓。

謊言導致荒唐、墮落、無恥，制度性的謊言導致全面的荒唐、墮落、無恥，這是順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以至慘絕人寰的人、事在神州大地的底層呻吟不絕、層出不窮。

以前，萬元的貪污案曾要人頭落地，張青山劉子善就是，幾十萬元的極罕見；現在百萬元的已司空見慣，幾百萬、動輒千萬，甚至上億也屬平常；只有幾個億、上十億、幾十億的才會令人感歎一聲“又有了！”

據大陸官方媒體披露貪賄實例：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2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2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近2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近2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億，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

上海沙葉新最近有文章論腐敗，總括歸納貪賄已“集團化、部門化、市場化、黑幫化”，用大陸官方媒體披露的事例系統全面深刻地論述了貪賄驚人的荒唐墮落與無恥。文載新世紀NCN.ORG網站。

香港的《爭鳴》幾年前報導：15000名地廳級或以上高幹子女擁有的財產達2500億元——不包括港澳、海外的資產，平均每人達1600萬元。所據是中紀委“關於高級幹部子女家屬、子女工作、經濟情況的報告”。我們設想一下，大陸底層老百姓知道了這個數字會怎麼樣，相信了這個數字會怎麼樣？當然，問題的實質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知道了也不相信，相信了也會找出各種理由予以辯解、容忍，以安慰自己。不可能知道，是因為謊言、封鎖；知道了也不相信，是因為當局一句“海外敵對勢力的造謠誣蔑”就行了；相信了也會找出各種理由辯解、容忍，則主要是文化上、性格上的原因了：古已有之，當官總為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有什麼辦法，人家有權；你要當官，也會這樣；……沒有人或幾乎沒有人會奮起抗爭。各地個別的因私人恩怨、利益衝突或出以公心揭發貪賄者絕大多數遭到了各種打擊報復。制度保證了貪賄，文化營造了氛圍環境，人性則對這一切予以容忍。制度、文化、人性就是如此糾纏互動，造就了大陸空前的貪賄。

再舉個例子。

大陸民眾的儲蓄額達14萬億元，全部存在國家銀行。五十七年的謊言使民眾絕對相信國家銀行是人民的銀行，國家是絕不會坑老百姓的。殊不知國家銀行早就成了中共各級官吏的私家金庫。據報導，大陸銀行壞帳12萬億，老百姓的儲蓄14萬億元，已被揮霍殆盡。正如一個大家族，各成員把自己賺的錢按照歷來的規矩，交給家長保存，而這個家長已變壞，吃喝嫖賭偷蒙拐騙無所不為，早已把存款花光了，還以家族的名義借了許多高利貸。一旦家庭成員有急需用錢，這位家長是絕無可能給他原先存進來的錢的。如果我們不厭其煩將這些情況詳細透徹地講解告訴大陸的某一位老百姓，他們會相信嗎？有什麼用嗎？大陸的老百姓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血汗錢往國家銀行這個破口袋裏扔。這是大陸的現狀和事實。五十七年謊言的作用就是如此巨大！撞了南牆不回頭。不見棺材不落淚。制度文化人性三者合力，已形成了狂瀾，人力是無法挽回的了。

當生命變成數字，僅僅只是數字時，殺人魔王希特勒、斯大林就會象一把達克摩里斯之劍懸掛在尚存活著人們的頭上。

斯大林在整肅屠殺異己者時說：殺一個人是殺人，殺十萬個人就變成了數字。

毛澤東藐視核武器時說：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一半，還有三億。

鄧小平在挽救中共王朝時說：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太平。

大陸每日每刻礦難死人、車禍死人、食毒死人、塌樓死人、沉船死人、大火死人。生老病死、意外死亡，對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來說，是正常不過的事。問題是人是怎麼死的、死了人後怎麼處置、總是重複死人？問題是鎮壓死人、草菅死人、冷血死人！

請看一位3歲的小女孩李思怡是怎麼死的。

李思怡，女，3歲，四川省成都人，2003年6月4日到6月21日，因母親被警察抓走而餓死在自己的家中。

6月4日，李思怡的母親李桂芳把孩子鎖在家中後就到金堂縣去偷東西並吸毒，被警方抓捕後送去強制戒毒。當時李桂芳哀求警方通知親屬照顧自己的女兒李思怡，但警方並未採取措施。李桂芳在被收容期間向員警下跪訴說自己有一個3歲的娃娃還鎖在家中，乞求放她出去，把娃娃放到親戚家中再到派出所報到，但警察們拒絕了。6月21日，警方接到舉報發現李思怡時，她已經死亡多日。

.....

整整17天，這個世界平常地運轉著，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個掙扎的3歲的小女孩。到6月21日人們發現她時，小思怡倒在門後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爛。當地媒體報導說：經過法醫檢查，她的小腳已經踢腫了，門後有一塊脫落的漆，右手指甲不同程度損傷。喉嚨紅腫。衣櫃被翻，像是找吃的東西，臥室窗戶前放有一個小凳子，不過窗戶沒有開開，案發後，成年人開這個窗戶也是很費力。通過地上的痕跡，屎尿（小心的放在衛生紙裏面）的狀態，專家認為小女孩生前一直在求生，並慢慢的死去，這種絕望的死比世上任何酷刑都要殘忍，並可能晚上受到驚嚇，因為根據痕跡，小女孩晚上似乎曾躲在衣櫃，“長夜漫漫，無處話淒涼……”

派出所在李桂芳的二姐家對面，距離不過100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後沒有警察去通知她。李桂芳還在被拘捕中，她將來有一天應該記住以下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

派出所值班民警黃小兵、王華麟，城郊派出所轄區刑警隊長、副所長王新、副所長盧曉輝、青白江區公安分局團結村派出所實習警校學員穆羽——她直接和間接地向他們哀求過。世界也應該記住這些名字，他們在家中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親，是非常正常的普通人，更可能還是“好人”。（摘自任不寐《祭李思怡文》）

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官方報導是24萬，實際上遠遠超過此數。這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更具悲劇意味的是，這幾十萬人的死亡原來是有可能避免的。唐山地震的預兆預報上報了，只是因為毛澤東在北京、在病中，忌諱說地震凶兆，就輕描淡寫了，就不採取警報預防疏散的措施了。離唐山僅115公里的青龍縣，因為做了地震預報，老百姓提前一天知道，睡在屋外，雖然全縣完全倒塌的房屋有7000間，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這是大陸官方和網站在唐山地震二十年、三十年後透露出來的部分真相。另有一則報導說唐山地震後一位叫李玉林的跑到北京報信，在中南海受到紀登奎、李先念諸黨國要人的接見。這些黨國要人對近在咫尺的唐山地震需要向李玉林作瞭解，需要李玉林給他們出主意如何救援。李玉林則感恩戴德淚流滿面，三十年後還要“牢記黨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請看06年4月7日《燕趙都市報》（責任編輯：許秀華）和人民網《環球人物》（責任編輯：劉則華）的有關文字：

中央領導聽我彙報

他們走進一間很大的會議室（後來才知道這是紫光閣），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焦急地等他們，並很快給大家找來新軍裝穿上，李玉林的 eyes 開始模糊了。

聽了彙報，一位領導問李玉林：“你掌握第一手災情，我們就聽你的了，你就說怎麼辦吧！”黨的領導人如此平易近人，讓他終生難忘。此時的李玉林什麼也不怕了，“要趕快派解放軍到唐山救災，不怕多，越多越好！”這時，一位軍隊領導站起來，聲音洪亮地命令部隊奔赴唐山。

“你能不能繪製一張唐山市草圖？”一位領導說，這對李玉林並不難，“我當過十年兵，還是名司機，對畫圖和唐山地形很熟悉。”不一會兒，他就現場繪製了一張唐山市區草圖。

隨後，李玉林又提出第二點，希望“把全國各大礦務局的井下救護隊，全調往唐山”。“還要讓全國各省市急派醫療隊”，中央領導聽後，邊記錄邊抓緊落實。

請你把開灤煤礦井下工人的情況再詳細說一下，我要給毛主席寫報告”，這時，一位工作人員向李玉林提出要求。得知毛主席也在關懷著開灤礦工，李玉林激動得又一次熱淚盈眶。……

……車在新華門前剛停下，嘩啦一下就沖過來差不多一個班的戰士，個個端著槍。不遠處的兩個民警也以百米速度沖了過來。當時看他們那個表情，恨不得要把我們拎起來揍一頓。我推開車門蹦下去。兩位民警一看我，眼都直了——“哎呀，你是幹什麼的，你是哪兒的？”我回答說：“我們唐山地震了。”他們看我下身只穿著一件三角褲衩，渾身是血，馬上就消了氣，然後告訴我們，新華門是咱們的國門，只有國家元首才能走這個門。

在兩位民警的指引下，李玉林等人最終來到中南海，來到副總理辦公室。不過，最終只有李玉林一個人見到了那些領袖人物。他作為代表，獨自進了內廳。“我披上一件修車工穿的破棉大衣，上面沾滿了油，還露著棉花。快到門口時，我一看，裏面有紀登奎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以及陳錫聯、陳永貴、吳德、吳桂賢。他們一看到我，就一路小跑似的走過來。紀登奎同志在前邊喊：“哪位是李玉林同志。”我說：“我是。”

“他上來就擁抱我。我當時非常激動……”說到這裏，李玉林再次淚流滿面。“領導同

志穿的都是白汗衫。除了吳桂賢同志握手問候我，其他領導都跟我擁抱。他們的衣服都讓我弄髒了。紀登奎同志問：“李玉林同志，你家裏情況怎麼樣？”我說：“家裏情況還不太清楚，我脫險以後，就上北京來找黨中央毛主席來了。”他說：“李玉林同志，你是個好同志啊！往裏請！”進去以後，紀副總理就喊：“李玉林同志，你是從災區來的。你瞭解災區的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我們這6個同志都聽你的，你說吧，讓我們幹什麼！”紀副總理這麼一說，我倒冷靜下來了，當時就提了3個條件：第一，趕快派解放軍，越多越好。好幾十萬人都在廢墟底下壓著呢。聽我這麼說，6位領導沒有一個不掉眼淚的。第二，把全國各大煤礦的救護隊都派到唐山，因為整個開灤煤礦的礦井裏可能有2萬名夜班工人。第三，全國各省市都得派醫療隊，並且要多帶藥品。”儘管當時中國還處於動盪之中，但在震災來臨之際，社會的凝聚力卻迅速恢復起來。7月28日上午，就在李玉林等人向中央領導彙報災情後不久，黨中央就向全國下達了救援命令。一場全國性的救災戰鬥打響了……

請看325位學生老師是怎麼慘死的。

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舉行教育彙報演出時發生火災，觀看孩子們演出的克拉瑪依市官員26個，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其中一位官員上臺高呼：“孩子們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26個官員全部安全逃出火場，無一人傷亡！

新疆石油局副局長方XX，是在場最高官員，逃出後一頭鑽進小轎車直奔醫院，經過消防隊不下車報案。演出的組織者克拉瑪依市副市長趙XX、市教委副主任唐健，不去維持秩序，自己安全逃命。石油局培訓中心黨委副書記況X，鑽進廁所，把可進30人以上的廁所反鎖頂上，任憑孩子們哭喊也絕不開門！事後告訴記者，自己的逃生知識有多豐富。

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實在是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等所有官員從第一排撤到最後一排出口處“先走”之後，教師才能開始組織學生撤離。但此時電燈已全滅，大火已蔓延到劇場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開放的安全門）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結果被燒死了325人，132人燒傷致殘。死者288人是參加匯報演出給官員們看的中小學生；40多名教師，37位遇難，絕大部分為掩護學生而殉職。

十年後，那位讓325名孩子老師燒死了而自己從火場安全逃命的克拉瑪依市教委副主任唐健升任克拉瑪依市市長。（以上綜述源自網上搜索“克拉瑪依大火”所得文章。）

還需要多說什麼嗎？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政黨，這樣的幹部，這樣的教育，這樣的民族，還有明天嗎？！

風靡全球的電影“泰坦尼克號”實有其事。據歷史資料記錄，當時逃生的人們是這樣對待死亡的。

在船不斷下沉，而救生艇不足的緊急關頭，船上的基督徒們，主動放棄逃生的機會，在甲板上手拉手高唱鼓勵人們舍己利人的聖歌，直至連船沉入海中。領唱聖歌的哈伯牧師掉到海裏後，把抓住的浮木推給一位筋疲力盡即將下沉的青年，讓海水吞沒了自己的生命。

樂隊領班哈特利和其他樂手，在甲板上為這群基督徒伴奏。在聖詩的歌聲中，鍋爐爆炸、電力中斷、船身斷為兩截，直到海水把這些基督徒與樂師的生命和歌聲，一起帶

進大西洋底。

大公司創辦人斯特勞斯，一位67歲的老人，別人勸他：“不會有人反對您這樣的年紀先上救生艇”時回答：“還有女人沒上救生艇前，我絕不會上”。銀行大亨古根海姆，給太太留下了一張紙條“這條船不會有一個女性因我搶佔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會逃生得象個畜生。”

死難的男性乘客中，還有億萬富翁阿斯德、資深報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師羅布林等，他們都沒有去爭救生艇，而把位置讓給了那些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農家婦女及她們懷抱的兒童。

船上的工作人員中，消防員法爾曼·卡維爾，感到自己可能離開崗位早了點，又回到即將被海水吞沒的鍋爐室，再次查看還有沒有困在裏面的同事。已派到救生艇劃槳的鍋爐工亨明，把這個機會讓與他人，自己留下來為逃生的人們放卸救生艇到最後一刻。信號員羅恩一直在甲板上發射信號彈，搖動信號燈，不管獲救的希望是多麼的渺茫。報務員菲利浦斯和布賴德，在船長告訴他們可以棄船後仍然不走，繼續敲擊鍵盤發送電訊和最後的希望，敲擊著生命終結的秒數，在報務室堅守到最後一分鐘。

大西洋上那個悲劇暗夜，沒有任何豪言壯語，沒有任何華麗辭藻，僅有的是，可歌可泣的人間真情！（郭少坤《令中華民族蒙羞受辱的26個“逃兵”》載博訊）

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數不清舍生取義的故事，即便在近現代史，救國救民的仁人志士，也比皆是。唯獨當今中共治下的大陸，廉恥喪盡，慘絕恥絕！

“湖南作家期待被‘富婆’包養。”當讀到這樣的新聞時，總以為是搞笑，未料真到根本笑不出來。

黃輝筆名瀟湘輝子、晴霏，益陽市南縣人。長沙打拼13年，做過小工，開過雜貨店，做過記者，現為湖南省作協會員。自1993年起公開發表各類詩歌散文兩百餘篇，代表作有《都市鴻爪》、《美人魚》等，出過詩集，自稱在圈內“有一定的知名度”。

黃輝1993年第一次從益陽南縣農村到長沙，開始自己的打拼歷程。據其稱，他在建築工地做過小工，在稍有一點積蓄後開過一段時間雜貨店，但因經營不善再次“成為無產者”。

黃輝說，在過去長達10餘年的文學創作裏，除了曾在某報社任職的那段時間，他的最高月收入均在500元以下，這筆錢得支付房租和撫養妻兒，而家中唯一值錢的家當則是一台臺式電腦。

對於突然跳出來說想被人包養的原因，黃輝表示理由很簡單，只想過上一種舒適的生活：“你創作的時候不要總擔心肚子餓而沒東西填飽，我就不信人連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時還能高談什麼理想主義，談什麼文學和詩歌。”

至於所說的被包養，黃輝具體解釋稱：“被人養著，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時尚生活，可以去喝上一杯咖啡，能過上一種自由自在的日子，衣食無憂地進行我的文學創作。如果需要，我會盡一個被包養物件的義務，包括性，獲得必須失去。”

黃輝表示，現在文化界，流行美女創作和下半身寫作，“我要是作為男作家被包養了也很正常，就算真成了用下半身寫作，也不算過分。”

雖然歷代諸多詩人多曾在艱苦的生活環境裏創作，但是黃輝認為這些詩人都不是自願的。“體制內的作家依靠工資生存，靠國家養活，我作為體制外的作家依靠這種方式同樣合理。”

黃輝還表示，他介意別人如何說或者想他，但是“我知道既然對你們說了這話，我

就準備好了被口水淹死”。“被人罵很正常，我這樣想或者這樣做肯定會在這個圈裏引起很大的爭議，會有人表面上不恥，但內心則很難說，據我瞭解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嚮往被人包養的生活，只是他們不敢說而已。”（摘自：博訊 06、11、19）

當如此無恥墮落的思維居然能正常地存在，能“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嚮往被人包養的生活”，能登堂入室，能被社會見慣不驚，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民族的男性，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歷史上所有的無恥都是暗地裏的，見不得天日的。一旦無恥開始公然，由官府作為律令公告，而渾然不知其恥時，這個時代、這個民族也就完結了。

嚴禁公款大吃大喝，嚴禁公款嫖娼之類的文件、條令已是見怪不怪，登堂入室堂皇見報了。

上海公安局竟然張貼告示，要人們不要同情苦難的人。這則告示配有連環漫畫治安宣傳短文。請看：

在車站碼頭、高架橋下或偏僻路段，以及城郊結合部地區，露宿著一些拖兒帶口的外地來滬人員。他們衣衫襤褸、髒亂不堪、好逸惡勞，靠拾荒、乞討混日子，嚴重影響了大城市的文明形象，給上海治安帶來了很多問題。

提醒市民對此類人千萬莫同情，不要給予施捨。

網上查得八大奇特的禁令，難得的是全是正兒八經的當局紅頭文件，全文照錄。

“嚴禁無婚姻證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江蘇省暫住人口管理條例》曾經有過這麼一則條款，但父女、母子、兄妹都屬於這一範疇，他們也不能同住，簡直荒唐可笑。

“報考女公務員，乳房要對稱”。湖南省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竟拋出“女性要第二性征發育正常，乳房對稱，無包塊等方為合格”的條款，去年就有20%的筆試和面試都合格的考生因為達不到這個要求而被刷掉。

“不許哄搶遊客，做彬彬有禮的猴子”。成都的龍池鎮政府和龍池景區為猴子們制訂了“禮貌山猴行為準則”：不許不禮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許哄搶遊客，做到彬彬有禮；不許騷擾遊客，尤其是女遊客；要助人為樂。

“中小學教師嚴禁猥褻女生”。這則條款出現在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和資陽區兩個教育局頒發的“教師準則”內，很難想象這種完全已觸犯了刑律的行為條款，卻很不嚴肅地上了教育系統的“禁令”之中。

“不准為男領導配女秘書”。四川省政府不允許男領導配備女秘書的理由是因為，女秘書容易和男領導發生生活作風問題，從而在工作上影響男領導，既而導致領導失職或腐敗，禍國殃民。但很多線民不能認同這個理由。

“不按規定走路方式走路的要受罰”。四川新出臺了一項交通法規《行人十二種走路方式要受罰》，聽起來頗有點搞笑味道：如橫過沒有人行橫道的機動車道時，不直行通過，或在車輛臨近時突然加速橫穿、中途倒退、折返；未實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在道路上通行每橫列超過二人通通要罰。

“嚴禁用公款打麻將”。地球人都知道，挪用公款是什麼樣的行為，2004年8月安康市建設局竟然需要用發放紅頭文件的形式來告知挪用公款是要受到懲處的，在這

樣的事件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吏政的威嚴和有效性 看到的只是官場腐敗的觸目驚心的事實。

“嚴禁酒後駕駛機動車輛”。乍一看,這條禁令無可厚非,可它偏偏出現在山東濰坊市審計局為整頓行風出臺的“三條禁令”之中,跟在其後的條款是“違者給予通報批評、警告;情節嚴重的,給予記過、限期調離或辭退、開除處分”,什麼時候醉酒駕車這種違法行為改歸審計局管了?即便是追加處罰,都屬對同一責任人的重複處罰,於法無據。(原載:博訊)

有西哲曰:謊言可以欺騙一時、可以欺騙所有的人,但是不能在所有的事上欺騙所有的人到永遠。話很對、很深刻,一般意義上是真理,但對於中國大陸的現狀,則是對牛彈琴、雞同鴨講,毫無用處。制度文化人性三者合力,已形成了狂瀾,人力是無法挽回的了。天塌地陷的時候,毫無用處的明白或仍然不明白的愕然將隨著崩潰灰飛煙滅。

當謊言欺騙了幾代人的時候,當謊言帶來了終極的毀滅時,它其實就是在所有的事上欺騙了所有的人到永遠。

第七章 懦怯大行剛勇無

元滅宋、清滅明，都是遊牧取代農耕、落後文化打敗先進文化，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則是剛勇戰勝懦弱！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懦弱與剛勇並存是正常現象，但是，當懦弱占據了主導地位時，這個社會，這個民族離分崩離析也就不遠了，恰如南宋末年和清朝末年的光景相似。

現在的中國大陸，正是這種懦弱卑怯的人性沉渣泛起，瀰漫全民身心、籠罩神州大地的時刻。

女友在宿舍遭輪奸，男友徘徊門外不敢報案

燕趙都市報報導，男友自忖弱小，不是對手，竟任由歹徒對女友輪番施暴，在門外徘徊，甚至沒有想過報案。受害者獨吞苦果，竟也忍氣吞聲。而同宿舍的工友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如此這般，施暴者得以實施暴行。這起發生在河北三河市某書刊裝訂廠惡性輪奸案中，怯懦者的怯懦和冷漠者的冷漠讓人久久不能釋懷。

女孩公廁內被拾荒男子強姦 40余人圍觀無人制止

燕趙都市報 本報衡水電（記者李海菊、孟憲峰；通訊員付忠禮）4月18日下午4時許，位於衡水鬧市街頭的一公共廁所內，一女孩在如廁時被尾隨而來的拾荒男子強姦。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時間長達20餘分鐘，現場圍觀市民40余人，卻沒有一人出手制止。

強姦盧母、妻、女祖孫三代

最近，甘肅省定西市紀委、政法委等部門組成調查組，徹查該市岷縣堡子鄉一起強姦案中執法機構違規違紀的情況。案件的過程令人吃驚：村民侯某，仗著酒勁闖入盧某家，對其妻、女進行強姦。因當地警方處置不當，未得到及時控制的侯某，在盧某報警的當天晚上，再次報復性當眾強姦盧母、妻、女祖孫三代。就在侯某實施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時，盧某的兒子向二百多戶村民求救，然而村民大多關門謝絕，少數來到現場的村民也僅僅充當了看客的角色，致使盧家三代人慘遭強暴的慘劇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

（原載：博訊）

類此報導打開互聯網，觸目皆是，不忍卒讀。如果說“可殺不可辱”，是大陸歷來政治運動中含冤被殺的、自殺的或可最後聊以自欺自慰的“忍”，那麼，發展到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妻子、姐妹、女友被當眾調戲、污辱、輪暴而還能“忍”下去，則是任怎麼也無法自欺下去的了。可是，我們的社會就是還能泰然自若地安然無事、安然無恙。

批評斥責國民冷漠的文章義憤填膺、連篇累牘，沒有任何作用。全社會在墮落，從上到下，從裏到外。

見慣不驚，見怪不怪，可以是天象、人禍、惡習、貪墨、無恥、不義、殘酷、慘苦、腐化、淫蕩、亂倫……任何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對此類事見慣不驚、見怪不怪。不是母親、妻子、姐妹、女友的貞操受到了蹂躪不能容忍，而是作為丈夫、兄弟、男兒對人類的另一半遭到欺凌時不能挺身而出保護她們不能容忍。這人類的另一半生育男兒、哺養男兒，也天生地仰仗男兒、在男兒的臂彎裏胸脯上受呵護體貼溫柔性愛；男兒則無論從生理、人性、道義以至人類的繁衍延續這一最根本的問題上天然地負有保護女性的責任。這是天則！無論歷史發展到那一階段，無論女性如何解放、如何撐起了半邊天，只要還有人類，只要還分男女，這一天則就無可更移。

看著母妻女被強暴而呼救不果時，除了拼命，別無選擇；即使死是必然的，也是別無選擇。我們的民族已經喪失了人類最原始的剛性。

送郎上戰場，古今中外歷朝歷代都毫無例外地上演著數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孟姜女萬里送寒衣哭倒長城的故事之所以千古流傳，潛在的一大原因是男性社會對此的感動與感激。從古至今，無論古羅馬大帝愷撒、暴君尼祿，無論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無論中國始皇帝嬴政、無法無天毛澤東，對女性在佔有之餘，也有愛護、保護、憐惜的一面的。天則使然，君王其能外乎！

雄雞打鳴，找母雞交配，若遇另一隻雄雞插腳，也會鬥上一鬥；猴王集三千後宮於一身，若有另猴挑戰，要打得遍體鱗傷不落荒而逃，許多是至死方休；蜜蜂交尾即死，以身殉性。自然萬物萬事，本寓至理至性，皆應敬畏。我的同胞們啊，有些事是死也不能做的，有些事是死也要做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一個民族更是要有精神的。這些古訓不能嘲笑，不能嗤之以鼻。否則，我們這個民族與狗彘無異！

春秋戰國時期聶政保護姐姐聶嫫而自殘的故事感天動地。聶政刺殺韓國首相俠累後用劍挖掉自己的眼睛和臉皮，為的是不讓人認出來而連累已經出嫁的姐姐聶嫫。聶嫫聞訊後趕到暴屍現場，認了弟弟，自殺于弟弟身旁。

我們民族不是歷來懦弱卑怯的，聶政聶嫫就是明證。在婦女最沒地位的漢朝，聶嫫是司馬遷幾乎唯一寫進列傳的市井婦女，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曾崇尚剛烈剛勇尊重女性的明證。

現代時髦的中國人對此會嗤之以鼻，會以現代的價值觀念衡量和嘲笑這對姐弟。這就是現代中國大陸懦弱卑怯人性沉渣泛起瀰漫全民身心、籠罩神州大地的根本表徵。最無可救藥最無可奈何最令人傷悲者在此！

懦弱、卑怯的根在人性，任何民族都有，只不過我們特別地源遠流長罷了。

1933年，中共紅軍在井岡山地區與國民黨軍隊張輝瓚部交戰獲勝，活捉了師長張輝瓚。紅軍將張輝瓚砍頭、挖眼，在挖掉的眼窩裏點上油燈，謂之“點天燈”，然後把點上天燈的張輝瓚放在竹排上順流而下以示眾以儆效尤。這種打死老虎的酷毒殘忍與剛勇尚武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們兇殘的懦弱與卑怯早就聞名於世了。毛澤東卻將這種惡劣的卑怯用生花妙筆記錄為：“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至少三代青年受其蠱惑至今。當今的境況只是蒼天的一種報應罷了。

見死不救、圍觀、起哄，已是大陸的常態，無論大報小報，無論網刊論壇，這些報導比比皆是。國家主席楊尚昆八十年代在廣州看到醫院見死不救的現象還能動一下惻隱之心，作個批示，如果他見到現在醫院門外層出不窮無錢交付保證金的窮人患者病疼至死，醫生熟視無睹、無動於衷且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景象；如果他看到各級“信訪辦”門口含冤負屈呼喚青天的訪民被抓捕毒打至死的景象……又能如何？這種表層的報應還不夠，老天的懲罰更深入腠裏膏肓。

前不久大陸報載一名女中學生因遭到老師過分責備，憤而投河自殺。其家長狀告老師。公開審判時法官宣判該被告教師沒有刑事罪責。在旁聽席上的幾十名教師竟同時起立鼓掌歡呼。他們那人類最原始的悲憫之心蕩然無存，遑論有一絲職業道德、丁點責任心、半毫羞恥了。他們歡呼什麼呢？同伴的勝訴？兔不死狐不悲的欣喜？為人師表的道德良心呢？自己的學生呢？學生的感情呢？學生的生命呢？學生的家人呢？還有尚未被逼死的幾十幾百幾千的學生呢？全都到醬缸裏去了，全都讓狗吃了！他們那雀躍之心該有多麼強勢！這個時刻，他們一點也不懦弱，多麼勇敢啊！可怕的是全體教師歡呼，更可怕的是同時歡呼，最可怕的是起立歡呼，無可救藥的是鼓掌歡呼！！得有多深重多罪孽多一致的無恥之心才能做到如此不約而同，步步緊隨啊！！這樣的教師，這樣的校長，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法院，這樣的社會，中國還有明天嗎？

五十七年的“整”，五十七年的“騙”，五十七年的“嚇”，五十七年的“殺”，所導致五十七年的“忍”，五十七年的無恥墮落，已如蛆附骨、如蠅逐臭、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不召即來。這才是根本之所在。

自打耳光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習慣。這個令人噁心的習慣正是懦弱卑怯最普遍最表皮也最深刻的表現。小品演員趙本山經常自打耳光的演技與他所飾演的小人物的性格絲絲入扣，相聲演員馮鞏可以在他心儀的閨秀倪萍面前自打耳光，優秀的電影演員葛優竟然也打起自己的耳光來了。當我在影片裏看到葛優那麼自然那麼隨便那麼純熟地煽了自己一記耳光後，我徹底地喪氣了。葛優雖然是輕輕地打在自己的臉上，我的臉上卻無異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我們這個民族確實自打耳光上了癮，成了習慣。文學作品反映生活。我們的生活習慣專注於在煩惱時、困頓時、沮喪時、受辱時自打耳光怨天尤人，而不是反躬自省奮起反抗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些現象在農村家居、在市井民間，隨處隨時可見。

許多年前大陸的電視新聞上，有這麼個鏡頭：大名鼎鼎的電影導演陳凱歌在回答一位年青的小報女記者提問時，竟然用手指戳著她：你去看看史記刺客列傳荊軻部分，才幾百字！那種傲慢的居高臨下責斥不屑的神態把那小女孩都嚇哆嗦了，比打她一記耳光還厲害。多少年後，那鏡頭還時時浮現在眼前。所以，當看到陳凱歌在雲南滇池拍外景糟蹋環境遭到批評置之不理行若無事的報導時，我一點也不奇怪。陳凱歌雖然是當眾煽了別人一記耳光，卻比趙本山、馮鞏、葛優的自打耳光更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自打耳光的惡習存在。懦弱卑怯的人性醜陋藏在深處。魯迅嘲諷國民性的懦弱卑怯：對手是羊時，他就是虎狼；對手是獅虎時，他成了綿羊。有報導陳凱歌欲躋身高幹子弟社交圈內遭到冷遇與不屑。無論真假，從邏輯上看是成立的：懦弱卑怯者需要尋找更強大的倚靠。

除了自打耳光，我們還有一個下跪的習俗和習慣。古代的不必多說，現當代的也屢見。

周恩來文革期間在人民大會堂跪地指地圖向毛澤東作解說一事被炒的沸沸揚揚，或是對周鄙夷者一種故意的渲染和發洩；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被槍斃後，所曝光的廣西省交通廳黨委書記褚之田每到成克傑家總跪拜磕頭，則是當局承認的滑稽的無恥。請看千千萬萬下跪的實例中所遴選的四樁之最，以為見證。

最具君臣氣象的是南京軍區司令上將軍許世友跪毛澤東；最無恥的是山東省濟甯市副市長李信跪舉報人；最驚天動地的是1989年4月22日三位青年學子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臺階上下跪上書；最具忠孝古風的是黃金秋在南京法庭上跪父母。這四跪，很說明問題，說明懦弱與卑怯的象徵之一下跪，在我們這個民族已經成了一種文化，它與制度、人性結合在一起，影響著全民族。

毛澤東視許世友為周勃、許褚，要他清君側、作衛士。許世友穿草鞋、行大禮，正是封建君臣跪文化在新時代的再現。這一跪，至今為民間津津樂道、廣為流傳，吾鄉賢老作家林斤瀾有文記其事，惟妙惟肖。

李信副市長之跪，除了也展現了人性的自私導致的懦弱卑怯外，更是中共官員無恥與墮落的寫照。

山東濟甯副市長李信向舉報人下跪的新聞引起人們廣泛關注。李信一跪再跪，無非是想保住烏紗，其行為的卑下令人齒冷。不過，圍繞他下跪前前後後發生的一些事情卻讓人不解、不懂。試發三問。舉報人去年1月發現李信涉嫌犯罪並開始舉報，2月就遭李信綁架。此後一年多，舉報人先後向檢察院、反貪局、公安廳、紀委反映情況，其間又發生了李信幾次下跪、寫保證書和送錢封口的情節。（摘自：工人線上）

三學子天安門人民大會堂臺階上之跪，是下跪文化的精華之舉之聚。三學子下跪伊始，恰大會堂內大小父母官數千人濟濟一堂共商國是之時。烈日當頭，岩地咯膝，長跪不起，達45分鐘，數十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熱血學子齊盼齊求老爺接見。三學子跪地，數十萬學子援後，一溜鋪開，站滿坐滿百萬見方的廣場，一望無際，既熱血沸騰又哀切淒婉，其忠良之心，天地可鑒，日月可表。三學子頭頂狀紙，長跪不起，數十萬學子吶喊聲震，要求接見。豈是三學子之跪，直是數十萬學子之跪！老爺們鐵石心腸，視而不見，安之若素。此情此景，古今中外，空前絕後。最絕最慘最不忍卒見者乃學子所跪苦主胡耀邦遺孀李昭從三學子面前走過，竟亦視而不見雙手上舉頂天的冤狀告紙，不去道一聲乏，不去扶一下臂。誰不予理睬不接狀紙都可理解，唯獨李昭不行！學子下跪，就是為了你的夫君！三學子就是廣場上數十萬學子，就是全中國數百萬數千萬學子，就是十三億民眾！一眼可以看得見的三學子數十萬學子用下跪的尊嚴去呼喚換取你夫君的尊嚴，你怎麼可以視而不見，棄若敝屣？可歷史就這樣記錄了李昭掉頭不顧的場景。這就是中華下跪文化精粹的集結和絕妙的下場！

可惜，這不是跪文化的終結。事後，多少文字述說、議論這一場景，無一人所見所論及此，似乎這是當然應然。可怕的不是鄧小平李鵬諸老爺們鐵石心腸，不見學子；可怕的是李昭不理會學子且學子們都視此為當然應然。這種麻木，這種深入骨髓的懦弱卑怯瀰漫在青年學子身上，籠罩在李昭們身上。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優秀的代表！我不相信李昭的人性就如此沉淪。李昭肯定痛苦不堪，大可憐憫，但她也毅然決然堅定不移，十分可恥。不必諱此！李昭是沐浴在黨文化的陽光下、受著黨文化嚴格的教育培養訓練成長的。她良善的人性敵不過黨文化邪惡的力量，人性善被吞噬，服從黨的決定戰勝了人性，懦弱卑怯主宰了一切！制

度、文化、人性三者的關係就這樣相互糾結交錯制約。積澱之深，在根在髓，人心難變，無力回天了。這才是最根本的，最可悲的，無法挽救的。

唯一還可聊以自慰的是黃金秋之跪。黃金秋，江蘇南京人，海外民主運動人士，返國從事喚醒民眾之舉，被當局抓捕判刑十年。在南京市的法庭上，黃金秋自辯陳述完畢，向前來旁聽的父母親雙膝下跪，聲淚俱下：恕孩兒忠孝不能兩全！黃金秋跪天跪地跪父母，乃亙古男兒之跪。古時多有，今或僅見。在講述了眾多的喪氣事例之後，我願黃金秋之跪萬古流傳。

與人民大會堂三學子下跪文化和人性相對應的，是天安門三君子塗汙毛澤東畫像的事件。懦弱卑怯的學子們這一次勇敢地把這三君子扭送到公安局，交給了警察。無論如何處置三君子，贊同、宣揚、仿效，且不論；疑若特務、恨如仇敵、視為幫倒忙，也在情理中；可以罵、也可打、不妨示眾……甚至亂毆至死，都比送交警察好。就是不能把他們送交警察！這是人性的底線問題。至今17年過去了，未見學生認真懺悔。學生以至我們整個民族，頭鑽到褲襠裏去，臉還要紅上三百年！這不僅是沒有擔當、懦弱、卑怯、出賣的問題，是沒了人性還不自知的問題。沒了人性還不自知，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當今的特點。

我們這個民族的明天，確實渺茫啊！

天安門三君子的大名是：喻東岳、余志堅、魯德成。三人分別被判處20年、無期、15年。喻東岳被折磨至神經失常，生不如死。如果中國能有明天，我們要記住這些名字。

不要打別人耳光，更不要打自己耳光，不要隨便下跪，凡人兩膝有黃金，懦弱與卑怯就可以一點點祛除。無論明天有無，當下活著的人們，應該有這一點尊嚴、自信和自愛。

一個民族即便失敗，剛勇剛烈之氣不失，則復興之日可期。德國、日本即其顯例。

日本大和民族素有武士道精神，戰敗剖腹自殺者比比皆是。他們對勇武的敵手禮敬有加。抗日英烈張自忠將軍與日軍戰死陣前，日軍厚殮葬之，列隊鳴槍致敬。

一本《日本的貞操》的書記錄了戰敗後日本婦女遭受美軍強姦的個案，其中有8個美軍輪暴一個日本女人的描述。日本人牢牢地死死地記住了這一切。

日本的女人是溫順的，因為日本的固有觀念婦女沒有地位。但是日本這個民族卻盡自己所能愛護保衛自己的女人。

日本在二戰大敗之後，在廢墟上，在婦女遭受美軍蹂躪強暴的恥辱上，忍辱負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硬生生地站立了起來。

中國被侵華日軍擄去做隨軍妓女的“慰安婦”，至今猶有倖存者，她們受盡日軍的污辱糟蹋。她們在大陸自詡強大的當下欲倚仗祖國的聲威洗刷以往的恥辱，大陸當局卻千方百計阻止打壓她們揭示真相討回公道。

1998年，印尼排華，燒殺華人，奸殺華人婦女，實況之慘，世所罕有，照片錄影在世界媒體披露，全球震驚譴責。唯中共政府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兩相對照，日本的崛起，中國的墮落，正是事理之必然啊！

德國戰敗，柏林淪陷，320名納粹女軍官自殺。蘇聯軍官記錄了這一悲慘壯烈的場景。

蘇軍飛行員目睹320名納粹女軍官醉酒自盡

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最著名的王牌飛行員阿爾謝尼·沃羅熱伊金，創造了擊落6架日軍飛機46架德軍飛機自己未被擊落一次的紀錄，兩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參加了朱可夫元帥指揮的攻克柏林的戰役，並在解放柏林後有幸第一時間來到帝國大廈希特勒的地下掩體察看，現場目睹了一些令人吃驚的慘狀：大量納粹男女軍官在得知失敗命運及希特勒自殺身亡的消息後，酗酒狂歡，隨後服毒自盡。……

不過，他們不知道，僅僅一個多小時前，朱可夫元帥和剛剛被任命的柏林警備部隊司令別爾紱林上將、陸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博科夫上將一行剛離開這裏，他們來確認希特勒是否真的自殺。不過，元帥和將軍們都沒到地下室去，只是聽取了彙報，而且，在他們到來之前，在戈貝斯所在的地下掩體內，剛剛發現了根據父母的命令毒死的6個孩子的屍體。朱可夫元帥後來說：“我承認，我沒有勇氣下去看那些被父母毒死的孩子們。”……

他們從走廊盡頭，順著另外一個樓梯，小心謹慎地下到地下二層，微弱的馬燈光線最多只能照亮10米，不過，他們還是發現了第一個掩體稍微開啟的門，打開門，一行6人走了進去。迎面而來的是一股渾濁、噁人的氣味，混合著酒精和其他物體的味道，馬燈光線隨即照亮了室內恐怖的場景：幾個蓋世太保軍官，基本上全是上校和將軍，衣衫不整，制服扣子全部解開，一些軍官只穿著褲頭、背心，喝得爛醉如泥，有的坐在背靠桌子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沙發上，幾名年輕的姑娘穿著黨衛軍制服，同樣地衣衫不整，一動不動地躺在他們中間，他們全死了。經過仔細察看，沃羅熱伊金少校發現，大部分納粹軍官是開槍自殺的，其他的人則是喝了大量的白蘭地，許多瓶子就胡亂地放在身邊，爛醉後服氰化鉀而死。地下二層其他所有掩體內，都是這種場景，幾百名納粹德國高級官員在酗酒狂歡之後，或開槍或服毒，自願身亡，僅穿黑色制服的黨衛軍女軍官就有300多人（最後統計是320人）。

沃羅熱伊金少校一行6人見到這種慘狀，沒有興趣繼續察看，隨後默默地離開。此時，柏林市內到處瀰漫著汽油味、火藥味，不時聽見衝鋒槍和步槍聲，什麼地方偶爾有一枚火箭炮升空，蘇軍官兵們正用歡樂的勝利迎接新的一天。（原載：博訊）

德國戰後迅速崛起，也正是因為民族的剛勇剛烈精神不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以被打倒，可以失敗，但不可以沒有了精神。中華民族的當下卻是沒有了精神，懦弱卑怯沉渣泛起導致剛勇剛烈蕩然；更主要的精神——國家與民族的理想、追求也沒有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

第八章 地獄煎熬也幽默

幽默一詞來自西方，林語堂的翻譯，準確、傳神，信、達、雅都做到了。雖然魯迅還是要譏刺林語堂，但事實的力量強勝雄辯。幽默一詞，歷八十餘年，越來越響亮，已從學界、學院、學子的陽春白雪階層進入到市井鄉村千門萬戶的下里巴人中了。猶如“可口可樂”的翻譯、“萬寶路”的翻譯、“奔馳”的翻譯，都是典範，可垂式後昆的。將香港人譯的“平治”，與大陸人譯的“奔馳”相比，實在是高下立判。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本章談幽默，本意在一片混沌的悲觀絕望中插一點苦澀的笑聲。正如天塌下來，該活的還是活了再死。無論過往還是現在抑或將來，再慘再黑再無奈再絕望，人性還是頑強地表現自己的一切，其中就有幽默。金聖歎臨砍頭，讓劊子手附耳過來告訴他獨家之秘：花生米與豆腐同吃有火腿味。頭被砍下來在地下滾，還不忘讚美劊子手活兒做的俐落：“快哉，快哉！”再厚重的黑暗，再殘忍的死亡，一碰到幽默，也會輕鬆輕快一時的。

也許這就是絕望中的希望、黑暗中的微熹。光明在人心中！

有孫紹振者，道五十年代北大生活之“最”曰：

最難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運動過去，乃有“向党交心”之運動，主題是“搞臭個人主義”。凡是見不得人的追求個人名利等齷齪思想，如能公開交心，當眾坦白，脫了褲子割尾巴，最為光榮。然而，北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大多愛面子，運動遲遲不見進展。

某日某黨員同學毅然於全年級大會帶頭交心，沉痛檢討進入北大以後忘記黨和國家的培養，個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蛻化變質，陷入個人主義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學，屢屢不得逞。乃於一日，持信至女生樓，請意中人一閱。曰：答應則好，不答應，則立即從樓上跳下。偶一回頭——該女同學滿面通紅。

暴露自我，如此坦誠，眾同學莫不自慚形穢。一男同學受此鼓舞，乃於小組坦言，讀《史記》，從懷疑劉邦人品，聯繫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實在危險，當改過自新，等等，等等。

數周後，此同學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二十餘年後方得平反，數年前已經退歸林下，侍弄幾畝薄地，信中時而流露陶淵明“采菊東籬”之樂。

最可同情的

一東德女留學生與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熱戀。東德屬於蘇聯陣營，而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國家。愛情與政治衝突，乃以柔克剛，轉入地下。政治則以剛克柔，令女生退學歸國。兩年後複學，補考《現代文學史》，考題為：《阿Q正傳》的典型意義。該女生，于愛情則大無畏，于阿Q似頗畏縮，語無倫次。適主考教師嚴家炎先生外出，囑餘主持，出於對其愛情之忠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獎勵。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學生輪流下鄉勞動，一漂亮女同學與一匈牙利男留學生戀愛；勞動期間躲入匈牙利留學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大字報直貼至留學生宿舍。該女同學以留學生宿舍為城堡，堅守不出。多日後，匈牙利大使館通知中國外交部，該女士與匈牙利公民結婚，按匈國國籍法，已成為匈牙利公民，現派該女公民至中國北京大學留學。

最不可思議的懲罰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擺攤，為學生洗衣。襯衣1件4分，褲子1條7分，襪子2分。本班某同學，對其中之一女工，雖未對談，頗有好感，乃於衣物中留一條曰：請于某時至未名湖一談。當吾同學欣然到達湖邊之時，不意於土坡背後跳出一彪形大漢，乃女工之丈夫也。將吾同學扭送至校衛隊，後為公安局內“傳訊”7日。團支部開會，批判其道德墮落。全體女同學義憤填膺，莫不面紅耳赤。支部一致決議，開除團籍。嗣後，學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學之決定。

最耐人尋味的

一位從福建師大至北大的進修生告訴我，北大課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國文學史》課程從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講義，最多也就發到宋朝。時為1958年春天，正是火燒知識份子個人主義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若在地地方高校，則大字報上烈火熊熊，聲討之聲四起。北大大字報一日多達千余張，無一張涉及此事。其怪之三：教學如此無系統，然而考試卻極有系統，北大學生安之若素，處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燒個人主義運動，有一教授在課堂上作自我批評曰：很少和同學接觸，失去向同學學習之機會。至今所有同學均不認識，只叫得出貴班班長：張X X同學。全場轟笑。教授問所笑為何，答曰：班長姓吳。

最悲慘的選擇

一同學被劃為右派，情節屬於最為輕微者，留于班級照常學習。昔日之朋友與之交談日疏。乃密告其摯友：如此精神歧視之苦，孤立之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聞之，皆以為戲言。數日後，該同學于東安市場，從一中年婦女手中，搶得毛線一束。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蓋該同學乃長跑運動員也。乃緩步等之，後為公安局拘捕，送勞動教養。至今音信杳然。

最無法彌補的：

反右時期向一同學借得羅曼·羅蘭之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乃豪華精裝本，系一波蘭留學生之饋贈。草草閱讀一過，遂乃歸還，時該同學已經成右派，未惶交談，不久即被發往北京郊區勞動，二年後複學，吾已為助教，適往該班輔導，四目不敢相對。

至2000年，畢業40年聚會，方得暢談。該同學揪吾胸衣曰：賠吾《約翰·克利斯朵夫》來。問其故，曰：當年君於書上胡亂批註甚多：“枯燥 不通 放屁 胡說 ”彼雖心甚恨

之，然而限於右派身份，不敢索賠也。言訖開懷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後，此乃無價文物也。

茲仿孫紹振先生例，錄所聞所見之“最”若干，以證地獄中也有苦澀的笑聲。有笑聲，無論如何苦澀，應該是還有希望的表徵。但願如此！

最美麗的監獄名字

“幸福城監獄”！天下有這樣的監獄。真的，位於美麗的新疆，鐵絲網滿布的高牆上塗刷著血紅的“幸福城監獄”五個大字。有作家廖亦武者，前往新疆採訪，發現了這天下獨一無二的最美麗的監獄名字，幸福得差一點暈過去。婚禮時被警察帶走沒嘗過幸福滋味、坐牢時被電棍插屁眼的廖亦武說：以後坐牢一定要爭取到這座監獄“幸福”去。

最逃不脫的異議人士

魯智深殺人後出家為僧，埃斯米拉達殺了貴族軍官躲到巴黎聖母院，都受到了庇護。古今中外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管犯了多大的罪，你懺悔、你出家，就可以獲得赦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這鐵律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不行了。

大陸湖北省宜春市化成寺的監院聖觀法師，發現前任監院帳目不清，予以清查調整，被宜春市政府及宗教局的人員著令立即離開寺院，卻並不解釋原因，只表示聖觀法師本人應心裏有數。同日下午，幾名宜春市公安局的警察到寺院，把一女信徒帶走，強迫她承認與聖觀法師有染。

聖觀法師，俗名徐志強，1984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1989年塵心未絕，參與遊行，入了地獄。2002年出家為僧，卻終未能逃脫俗世的糾纏。

最不守戒律的和尚群體

大陸九成和尚娶妻生子。現象之普遍已經到了“法不責眾”的地步。大陸和尚發明了“新年敲鐘權”。上海的玉佛寺元旦的第一鐘賣了人民幣8萬8千元。上海龍華寺一般鐘聲3千元，逢8等特殊鐘聲漲價。蘇州寒山寺是出賣“新年敲鐘權”的首座，1998年就開始了，2002年，寒山寺首鐘賣到2萬元。“新年敲鐘權”風行全中國大陸江南北的名山大寺，南京棲霞寺、鎮江金山寺、無錫靈山大佛景區、天津薦福觀音寺、煙臺號稱“太平晨鐘”的太平庵、北京戒台寺，或是明碼標價，或是拍賣競標。除了賣鐘聲，一些寺廟道觀也盛行賣“第一炷香”。湖南南嶽衡山一些宗教場所，每年春節前後或一些神靈的誕辰，前往燒香的中共領導幹部的專車絡繹不絕，新年的“第一炷香”已被炒至10多萬元。

最政治化的高考題答案

文化革命後，大陸恢復高考，文科歷史有試題“試論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有考生答曰：因為沒有執行“農業學大寨”的經驗。

最神奇的想像力

大陸某地農村耕牛交易市場。一初中畢業的學生王某初來任開票工作。王某不懂牛分公、母，也不會寫雄雌二字，遂將奶牛在發票上變為“女牛”，將種牛在發票上寫成“男牛”。領導檢查工作時發現了，批評責問王某。王某不服，振振有辭曰：你填入黨申請書表格時，性別一欄怎麼填？領導說：男啊！那你老婆怎麼填？女啊！那不結了。

最神的橫語

梁羽生、金庸、古龍、溫瑞安의 武俠小說裏再凶的強盜，再橫的豪客，再牛的流氓，再不講理的無賴，再多錢的公子哥兒，再狐假虎威裝腔作勢的幫兇幫閒去飯館吃飯時，大約也想不出對店小二說這神來橫語：沒有？你種也得給我種出來！中國某體育記者採訪2002年足球世界盃韓國漢城賽場，在旅館餐廳用飯，他要吃米飯，餐館只有麵條，侍者婉言說明並道歉。記者不依，說：“你種也得給我種出來！”旁邊的中國記者看不過眼，勸說幾句，竟演變成口角和扭打，腦袋都開了瓢。韓國電視臺自然猛拍一通，加以解說，播放出來，滿城皆學“種出來！”這句經典橫話。

最狗尾續貂的口號

文化革命中，凡集會、演說、宴請……之前、中間、最後，都要高呼“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這兩個三呼已經是規範定式了，全國皆然。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那一天，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集會上領頭的循例三呼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後，竟別出心裁，再接著高呼“敬祝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比較健康，比較健康！”一時傳為有創造性發展的美談。未料，傳到江青耳朵，勃然大怒：怎麼比較健康呢？我比他們都健康！（這是與會者告訴筆者的真事！除最後一句系筆者按情理邏輯推理杜撰外。）

最大膽的意淫

周揚兒子文革期間曾入獄，同獄難友有一個三十年代時為共產黨跑路送信的農村老革命，犯花案來的。老淫棍問小周為什麼進來，答以“思想罪”。老淫棍不解，小周略加解釋：腦子裏想錯了事，犯了法。老淫棍曰：屁話！想什麼也犯罪？我他媽的想同江青睡覺，想了一百次了，犯屁罪！

最糟的改名

文化革命中，時髦改名，人名、街道、學校、器物……都要革命化。1967年，一對夫婦去烏魯木齊一個菜市場買番茄，看見菜市場裏的大字報呼籲革命群眾不要把番茄稱為番茄或番茄，說那都是封資修的，要把番茄和番茄改名為最最響亮的“東方紅”。老婆讀過小學五年級，看懂了這張大字報，對夫說：“這可不行，我要吃番茄，說我要吃東方紅？番茄要爛了，怎麼辦呢？說東方紅爛了？”

第九章 最後神器墮落盡

文化上的墮落，以學術的墮落為最後的墮落，最無可藥救的墮落。

人性的醜陋在制度與文化的醬缸中發酵。教授、學者、專家、名流在求生、養家糊口、要活得舒適方面與平民百姓並無二致；而在委屈苟延、奉承拍馬、趨炎附勢、賣友賣身以致作假造假、同流合污、無恥下作上同凡夫俗子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是，他們的無恥墮落為害更烈最甚，是最後的最無可藥救的墮落！

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會貼到他的病床頭，該有多少北大教授學子蔑視學術、斯文掃地；馮友蘭否定自己的學術生命，就為受不了一個不學無術的江青的威脅利誘；北大校長許智宏在薩斯肆虐期間率代表團訪問哈佛大學遭到拒絕未以為恥；北大書記閔維方以混混口吻大談學術學者事宜大言不慚……這些表像的底下該會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污濁和無恥！

這種惡性循環已經形成，五十七年的事實昭彰於世。山裂土崩，陸沉魚爛，狂瀾不挽，回天無力，不死不休，至死方休！

有亦明者，著文“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沒有誰能比亦明文更明確更系統更透徹更具體更兜底地將中國學術界的黑暗真相予以曝光與鞭笞了。文長四萬餘字（載：《博訊》2004年1月26日）。謹部分摘錄如下。

- 學術腐敗是 90 年代之後風靡中國大陸的一種社會現象，它是繼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之後的另一個大規模、深層次的社會腐敗。學術腐敗的具體表現就是，學術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導，下至研究生、大學生，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作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不僅如此，學術腐敗已經從學者的個體行為發展成集體、集團行為，並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趨勢。比如，大學普遍向高官明贈暗高等學位，學術界頭面人物公開地、明目張膽地欺騙政府、輿論和社會，學術機構對學術腐敗現象不僅熟視無睹，任其氾濫，甚至包庇縱容，等等。

- 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中國學術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領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發現學術腐敗現象。實際上，在很多領域，學術腐敗現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會象茅廁裏的熏天臭氣一樣撲鼻而來。有人說，在中國的學術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話，你就必須拿出 80% 的精力放在人際關係上。這“人際關係”到底是什麼東西，還需要多說嗎？更為惡劣的是，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已經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紅嘴白牙地欺騙、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膽大妄為，其肆無忌憚，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他們憑什麼？因為他們身後就是一個整體腐敗的學術界。他們當仁不讓地成為了腐敗勢力的代言人。

- 確切地說，中國的學術腐敗不是單純的“學術方面的腐敗”，而應該定義為“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學術行為的腐敗：這是個人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者在從事學術工作時不遵守科學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從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動；二，學術權力的腐敗：這是集團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在學術界，權力運用的實質就是瓜分、掠奪學術資源，也就是進行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學術原則的腐敗：這是學術界系統的整體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打著“學術”的幌子，與貪官

為伍，與奸商勾結，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會。

- 上海大學原法學院院長潘國和半路出家進入法學界，在短短的十年間，著述總量達到1千萬字以上，……而在此期間，他還擔任三個學院的院長職務。雖然潘院長自稱“非常勤奮”，……但人們還是發現他的論著多數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們竟然沒有誰敢於舉報，有的人還不知好歹地說“我願意”。究其原因，無非是“潘在法學院根基很深”。

- 山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蔣民華賴以起家的“成果”幾乎全部是從同行手中搶奪來的。根據山東大學教授于錫玲的檢舉材料，蔣民華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職權在獎勵申請表中的負責人欄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學部委員候選人推薦書》中，羅列了蔣民華的五項科研成果，但這五項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

- 2003年1月8日，《新語絲》網站發表了一篇揭發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院士涉嫌剽竊的文章。揭發文章問世之後不到24小時，東南大學就匆忙地完成了“細緻的調查”，並且公佈了“真相”。（東南大學：關於“東南大學校長剽竊外國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說明）。 “真相”是什麼呢？剽竊“完全是李仕鋒的個人行為”。同是在這短短的24小時之內，顧冠群的學生李仕鋒寫出了公開檢討，而且還專門向顧冠群教授致歉。顧冠群校長則指示學校“要採取切實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學生的學術道德教育，嚴厲查處學風不正的行為。”……可緊接著，涉及顧冠群剽竊的第2篇、第3篇、第4篇文章被先後揭露了出來。此時的東南大學是什麼反應？據《南方週末》的一篇文章報導：1月22日，東南大學副校長左惟對記者宣稱，顧冠群對這4篇有問題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記者問左惟：“你們如何斷定顧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鋒承認的，之後又寫了第2份檢查。”由於發表文章需要交納“版面費”，而這個費用需要導師簽名才能夠報銷，所以記者要求查看報銷單據，以確證顧冠群不知情，但這個要求被學校拒絕了。記者要求會見李仕鋒，學校則答曰已經把他“送回老家了”，連他的電話和位址都不告訴記者。記者與東南大學其他博士生交談，發現他們都很緊張，因為他們都被“關照”過，“正在關頭上，不能出差錯”。……

- 東南大學並不是孤立的。其他如中國科學院包庇弄虛作假的洪國藩院士……洪國藩的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案被我稱為學術界的遠華案，因為它涉及的金額巨大，牽連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壞。……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不惜當眾說謊來為“小小的”洪國藩保駕。這個黑幕的後面到底隱藏著什麼交易？可以想像，當這塊黑幕被扯下之後，露出的東西定將震動整個學術界。

- 有一名“211”學校的博導，手裏拿著出國進修的機會遲遲不敢動身。問之，則答曰：怕發生“政變”。問者不解，經他人指點，原來這個博導是某個學院的第四副院長，怕在出國期間，失去這個得來不易的位置。筆者曾親眼看見一位副校長（當然也是一位博導）是如何“晉見”該校黨委書記的：直挺著腰板，用半個屁股坐在沙發沿兒上，另半個屁股是懸空的。那姿勢，活現出一位太監被皇帝賜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態。一個學者，活得卻是如此猥瑣，他能搞出什麼樣的學問呢？“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沒有了人格尊嚴的人，連匹夫都算不上，還能算是學者嗎？

- 武漢一所大學曾邀請一個年逾古稀的院士評審一個科研專案，可這個院士竟然要求對方同時支付一個“韶齡少婦”的往返機票。這一對老男少婦在從事學術活動中同吃同住，毫

不顧忌。

- 去年非典期間，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在世界上首次將非典的真正元兇——冠狀病毒——與非典聯繫在了一起，他們的發現比香港科學家要早了幾周。可是，由於中國的一位院士已經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體，所以這些非典病毒的發現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發現公諸於世。(Enserink, 2003)。我曾評論道：“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應該是軍人，如果不是這些軍人科學家的膽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國的院士淫威太盛！”中國科學家的工作失誤是非典在中國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學霸學閥的橫行霸道是導致中國科學家工作失誤的主要因素。

- 另一類學霸和學閥是各個學術單位的主要領導，如研究所的所長、學院的院長，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科學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這個只有 600 餘人的研究所，公車就有 100 輛，所長、副所長的年薪都達幾 10 萬元人民幣之譜，需要分幾個戶頭入賬。國家在過去幾年內給他們下撥了上億元的科研投資，但全所只在國際重要期刊上發表了 6 篇論文，其他如產業化項目一個都沒有，相當於每篇論文的造價是 2 千萬人民幣。即使是這樣，它的一個研究室主任還恬不知恥地叫嚷：“沒有什麼項目幹不成，只要再給我 2 個億。”這哪里是學者在說話，簡直就是街頭無賴在敲詐勒索！……

- 中國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沒有真才實學的商人吳征，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北大清華的客座教授。……一名普通的相聲演員，竟然被 4 所大學爭先恐後地聘為教授，並且是不同專業的教授。

- 博士多到了什麼程度？據說目前在讀博士生人數已經達到 12 萬人，僅次於美國和德國，穩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規劃，到 2010 年，中國每年將有 5 萬人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的學位制從 70 年代末剛剛起步，80 年代初開始授予博士學位。1983 年，北京大學專門請了 100 多位專家給數學系研究生張築生一個人搞博士論文答辯，才使他獲得北大授予的第一個博士學位。曾幾何時，中國的博士教育幾乎可以與牧童放羊相媲美。一個博導同時指導幾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經算不上是新聞了。據說某大學的一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一位博導的 8 名弟子同時上陣，一舉拿下了 8 個博士學位。難怪這被稱為中國的“博士大躍進”。

- 博士氾濫與學術腐敗有關係嗎？當然有。首先，學校建立博士點，以及教授升博導，這裏面的貓膩多著呢。……據說每個博士點的公關費已經達到了幾十萬元人民幣之譜。……據揭露，湘潭大學早在 1998 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請到博士點，不惜財力”的口號。到了 2003 年，他們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點要保 5 個爭取 8 個”的奮鬥目標。果然，這個被自己的學生評價為“連碩士都培養不好”的大學，現在已經有了 9 個博士點了。……

- 一個只有高中學歷的槍手，一個月內就能夠“搞定”一篇博士論文，而這篇論文卻能夠在答辯時一次通過。這樣的博士，在中國近年的博士大躍進中，可以說如雨後的蘑菇，層出不窮。

- 上面說到的博士雖然“水”，但卻是真正的中國博士，可以簡稱為“真的真博士”。除了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國的學術界內還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謂真的假博士，就是那個博士學位來自野雞大學，實際上是花錢買來的學位。比如北大和清華

的客座教授吳征就是從美國一個小青年創辦的巴靈頓大學得到了這種學位。吳征教授不僅是真的假博士，他還是假的真博士：他沒有在復旦大學上過課，也沒有通過復旦大學的學位答辯，但卻拿到了復旦大學真正的博士學位證書。奇怪嗎？感到奇怪的人一定會被中國的學者笑話：too simple, too naive！

- 中國學術界利用招收學生的特權來搞腐敗，到目前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兩起。第一個是上海交通大學，第二個是海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開，相當有戲劇性。當時，上海交大的網絡發生了故障，不能與外界連接，學生們就在校內網路遊逛，結果巧遇該校教務處的一份文件。通過上交大的 BBS 系統，中國人民總算見識了中國知識份子掌權之後的醜惡一面。這份檔實際就是一個關係圖，上面列有這麼幾個欄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數、加分、專業情況、委託人、擬解決意見。在這些欄目下面，還分有校領導接收、中學校長推薦、2001 年外地生源機動指標討論材料等幾個類別。整個檔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數最高的為 632 分，最低的只有 426 分。如果看一看“委託人”一欄，裏面有“電力局紀委書記李永鳴之女”、“中醫大黨委書記張建中侄”、“盛校長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吳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總經理王星之子”、“清華大學副校長余壽之子”、“西南交大蔣校長之子”、“電子科技大學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長”等等。在“擬解決意見”欄中，有“保證專業”、“120%”、“錄取”等幾類。總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長、副校長共 7 人，其中 6 人寫了條子；黨委書記、副書記 4 人，有兩人寫了條子，外加一個紀委書記。除了這些內蠹，參與這個招生黑幕的還有來自交大之外的 4 名院士。

- 大學招生到底黑到了什麼程度？沒有繪畫基礎的人竟然能夠在海南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高考專業課中得到第 1、第 2 名的成績。在學校組織的突擊測驗中，“2 名學生測試的最高分是 30 多分，最低分為 7 分。成績差得離譜。”這還是他們在這所大學學習了一年之後得到的成績。海南大學在隨後隨機抽查了美術系 2002 級 100 多名學生中的 43 名。在 120 張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創作測驗的最低分是 2 分。這 2 分是怎麼得來的呢？因為這名學生在紙上畫了幾根線條。

- 去年秋天，臺灣女名人璩美鳳投考復旦大學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她考了 3 門課程，其中兩門不及格，3 門課的平均分數不到 48 分，但照樣被復旦大學錄取。這個勾當雖然骯髒，但卻可能只骯髒了一半：復旦大學只是在錄取時作了弊，在評卷時大概還是乾淨的。真難為了這所中國第三高校！

- 其實，參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鼓噪，僅僅暴露出了中國大學校長們貪婪淺薄的一個側面。去年夏天，一則“北大才子長安街頭賣肉”的消息成為酷暑中的熱門新聞，可北大校長卻不冷不熱地放出了“北大學生賣肉完全正常”的論調。要北大的學生甘當普通勞動者。一邊是口口聲聲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一邊卻要自己的學生甘當普通勞動者，誰能夠搞得清這位校長是在用什麼邏輯來思維呢？有位北大學生說，“北大學生賣肉完全正常”這樣的話全國人民誰都可以說，就是北大校長不能說。可惜的是，這位北大校長連這麼點兒見識都沒有。

- 中國的大學校長“爛”到了什麼程度？看一看參與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長、西南交大校長、清華大學校長、電子科技大學校長，看一看自家院內臭氣熏天卻對公眾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的南京大學校長，看一看抄襲剽竊的東南大學校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看一看公開嫖娼的合肥工業大學副校長，再看一看參與經濟犯罪的延安大學校長、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院長、同濟大學副校長（曾祥生：同濟大學原副校長吳世明受賄 一審被判刑 10 年）、首都經貿大學副校長（程婕：首都經貿大學原副校長姜忠波受賄被判刑 11 年）、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學勇：搞貪污竟怪“會計懶”）、成都理工大學副校長（劉德華、劉豔：貪污學生“點招費”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長被捕），這些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現狀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圖”。

• 2003 年，一個頗有“創造性”的出版社策劃了一個“美國著名電影公司花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的彌天大謊。而這個大謊之所以能夠撒的那麼完滿，那麼驚天動地，卻是因為有一大批學者捧臭腳。這些學者並不是一些滿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國權威學府的權威人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一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孟繁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頤武；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葉舒憲。據透露，這部“末流言情小說”竟然被這些權威們吹捧為“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21 世紀的新的中國開始嘗試給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難道是這些學者吃錯了藥？抑或是喝昏了頭？都不是。實際上，這些學者的領隊白燁研究員既參與了貝拉小說的策劃和出版，然後又蒙著學者的面具來吹捧她。這就像是那些販賣核酸營養品的人，一邊買假藥，一邊以專家的身份來宣傳這個假藥多麼有效。這些學者哪里是什麼喪失了學術良心，他們是把學術良心給賣了：他們一手賣商品，一手賣良心。

• ……一個是兩院院士、被中國學術界尊為“泰山北斗”的張光斗，另一個是自以為自己是個人物的清華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希光。張光斗在五十年代黃河三門峽工程上馬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怎麼說都不算光彩，與黃萬里先生的堅決反對有天壤之別。可就在去年，張光斗在中央電視臺對全國人民說，他曾反對三門峽工程上馬。五十年前靠犧牲學術良心來撈取了半世榮華富貴，到了臨死關頭卻又要抓一顆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裏塞，中國的學者怎麼會這麼不要臉？與行將就木的張光斗相比，清華的博導李希光則正處壯年。這位一張開嘴巴就讓公眾噴飯的傳播專家，為中國人民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要求國家立法，不許人民在互聯網上自由傳播自己的思想。正是因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臉的事，李希光才能夠成為清華園裏的大紅人。

• 據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 40 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資料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 100 倍，產量算錯了 60 多倍”。這哪里是在搞學術，簡直就是在明目張膽地騙錢。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工商界，詐騙未遂的案犯也會被判入獄。可是，中國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槍不入的馬甲，騙成了就賺了，騙不成就算了。這個案子至今沒有下文，中國的公眾至今不知道這幾個騙子院士到底是誰，他們受到了什麼樣的制裁。中國從什麼時候起對騙子變得如此地寬容？

其實，這個流產的 40 億元欺詐案還不是數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陸之際，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就拉上了另外 21 名院士給政府寫公開信，要求政府“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可這 22 人中，有 20 人的專業與預防醫學毫不沾邊。誰都知道，在自然科學界，學科已經高度專業化，一個人的學術水準的高低只適用於他自己所在專業，超出他的本專業，

他的學識很可能連普通人都不如。這就是所謂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這個道理，身為科學院副院長的陳竺院士當然不會不懂。那麼，他把一幫不懂專業的院士拉到一起來幹什麼呢？他是在搞人多勢眾，以便趁非典之亂達到竊取、壟斷國家的科研資源的目的。國難當頭，中國的院士卻要趁火打劫，真是喪心病狂到了極點！

• ……歷史上中國學術界的大規模腐敗莫過於科場舞弊。有清一代，科場案頻頻發生，著名的就有順治 14 年的順天鄉試案和江南鄉試案、康熙 50 年的江南鄉試案、乾隆 17 年的順天鄉試案、咸豐 8 年的順天鄉試案，等等。而清王朝對科場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級，在這幾個大案中，共處死了 30 多人。清朝康熙 50 年，在江南貢院舉行的鄉試中，主考官收受賄賂，閱卷人通夥作弊，實際上是把舉人的功名賣了出去。事情洩露後，江南舉子群情激憤，把“貢院”二字改寫成賣完”，並且把財神爺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廟裏。康熙聞訊，立即派員到江南查案。幾經周折，最後撤了兩江總督的職，而參與科場舞弊的案犯一律斬首。咸豐年間，“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場舞弊罪狀，依載垣、端華所擬，主考官大學士柏葰坐家人掉換中卷批條，處斬。同考官浦安坐聽從李鶴齡賄屬，羅鴻禔行賄得中，均處斬。”堂堂正一品大學士主考官只是因為調換“中卷批條”、考官因為受賄、考生由於行賄，同時被砍掉了腦袋。是不是太狠了點兒？不過，不這麼整治，科場舞弊之風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論清王朝整肅科場的目的是什麼，其客觀效果卻都是保證了考場的乾淨，考試的公正。

反過來看看中國現代的科場舞弊案。參與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學招生黑幕的要員受到法律制裁了麼？沒有。不僅法律的鋤刀沒有落到他們的脖子上，連黨紀和政紀的鞭子都沒有抽到他們的身上。人類歷史前進了 200 多年，中國的文明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 ……以北大經濟學教授厲以寧為代表的一群人，無視中國有數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民眾這個現實，恬不知恥地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標誌是有第 2 套住房”這麼個理論。……

就是這幫經濟學家，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大張旗鼓地提出了“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麼個口號。實際上，世界上除了倫理學，哪門科學是講良心、講道德的呢？講良心、講道德的應該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那麼，這幫傢伙提出這麼個口號，豈不是在說毫無意義的屁話嗎？他們的目的何在呢？說穿了，他們是在用“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個幌子為自己講道德和不講良心做鋪襯，然後好去明目張膽地幹“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壞事。他們都幹了什麼壞事？這夥人幹的最大壞事就是鼓吹“教育產業化”，結果把一個在人類近代歷史上通行的公益事業在中國轉變成了一個吃人的產業。他們幹的其他壞事還包括：鼓吹擴大兩極分化，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他們還要瓜分國有資產，搞“新公有制”（厲以寧語）。據一位某省黨報的主編在酒後透露，在中國，最賺錢的買賣有兩個：一是倒賣國有資產，一是辦報紙——比它們還賺錢的買賣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

• 2003 年 8 月 15 日，瀋陽黑社會頭子劉湧死刑案被遼寧省最高法院改判為死緩。據報導，改判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刑法學專家陳興良等 14 位“一流法學家”的一份《瀋陽劉湧涉黑案專家論證意見書》。消息傳出，輿論大嘩。最後，中國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動介入此案，再次把劉湧定為死罪。問題是，這些法律專家的觀點為什麼與公眾的觀點相差這麼遙遠？據說，陳興良教授認為遼寧最高法院改判劉湧死刑為死緩是為了保障人權，因為“根據有關證據，在劉湧案件中有刑訊逼供的可能。”這真是天大的笑話。陳教授難道是從月球上來的嗎？刑訊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嗎？是只限於劉湧一案嗎？孫志剛

被警察無辜地活活打死 陳教授怎麼沒有寫什麼意見書呢？你們的屁股怎麼總是坐在有錢人的炕頭上呢？有人指出，陳興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擬定那個“意見書”，是“打著程序公正的旗號，破壞程序正義。”真是一語中的。

• ……兩年前，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的橄欖球主教練喬治·歐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聖母大學，但由於他的簡歷中虛構的在新罕布什爾大學校隊打球以及在 1972 年從紐約大學得到碩士學歷的事情被人發現，結果上任僅 5 天就被迫辭職。在辭職聲明中，這位教練說“由於多年前的自私無知，我使聖母大學，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了恥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實際上，蒙受恥辱的更是他個人。不僅如此，這個有 30 多年教齡的名教練還丟掉了工作。一個體育教練偽造學歷就會得到如此的下場，可想而知，在學術界偽造學歷實際等於玩火。

• 哈佛大學：達西醜聞。約翰·達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學醫學院一個附屬醫院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他的導師尤金·布勞恩瓦爾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美國科學院當時心髒科學的唯一院士。……1981 年春，布勞恩瓦爾德為達西爭取到了哈佛醫學院助理教授的職位。

就在達西準備上任之際，他的 3 個同事發現了他偽造試驗資料的證據。哈佛大學馬上收回了給他的聘書，但允許他繼續在布勞恩瓦爾德的實驗室工作。5 個月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發現達西提供的試驗資料與其他人的資料有極大的出入，達西醜聞這才走出了哈佛大學。最終，達西發表的 17 篇論文、53 篇摘要被撤銷。NIH 禁止達西在 10 年內申請或參加 NIH 的科研專案。

• 麻省理工學院：巴爾第摩事件。巴爾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國生物醫學界的傳奇性人物。他 26 歲獲得博士學位，36 歲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37 歲獲得諾貝爾獎，52 歲時（1990 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學任校長。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可以說，他是世界生物學界的權威，是美國學術界的領袖。但在 1991 年，巴爾第摩被迫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之職，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以“巴爾第摩事件”的主角而聞名國際學術界。

• 斯坦福大學：“間接費用”醜聞。1990 年，就在“巴爾第摩事件”的硝煙在波士頓上空瀰漫之際，在美國的西海岸爆發出了更大的學術醜聞：有“西部的哈佛”之稱的斯坦福大學被聯邦政府的一個會計揭發，說他們利用所謂的“間接費用”欺騙聯邦政府的錢財。據這位會計估計，斯坦福大學在 80 年代從聯邦政府多索取了 2—4 億美元。

什麼是“間接費用”呢？“間接費用”是政府在發放科研經費時給予研究者所在單位的費用，用於房屋、水電、文祕等開支。一般來說，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間接費用率占科研經費的 40—60%，超過上限，要簽訂“諒解備忘錄”。在整個 80 年代，斯坦福大學與聯邦政府簽訂了 90 多個這樣的備忘錄，涉及金額 2 億多美元，而名列第 2 和第 3 的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總共才簽訂了 20 個“諒解備忘錄”。不僅如此，斯坦福大學拿到聯邦政府報賬的項目包括該校校長臥室的裝修，他的婚禮招待會，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華遊艇的折舊費。

1991 年 3 月，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調查斯坦福大學的這個案件。美國的新聞媒體也一擁而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此事。最後，斯坦福大學校長辭職，斯坦福大學向聯邦政府退還

了 100 萬元間接費用，外加 120 萬美元罰款，儘管它拒絕承認自己犯法。

- 章太炎曾把社會的腐敗分成兩種，一種是“土崩”，一種是“魚爛”。土崩是從外面開始，一層一層地崩坍，而魚爛則是從裏面開始，一直向外爛。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界目前就處在魚爛狀態：它就象一具金縷玉衣包裹著的腐屍，從外面看金碧輝煌，但它散發的臭氣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它腐敗的程度。

在亦明 2004 年揭露學術界腐敗的的大作發表後，學術界的墮落未見任何好轉，一如既往下滑以至無底深淵。最近的丘成桐與北大就人才引進的真假之爭就是見證。大局糜爛，無可救藥，學術不可能獨善其外，下滑至無底深淵正是事理邏輯之必然，正是末世來臨前夕人文毀滅的最後徵象。

2006 年 7 月 11 日，世界著名數學家美籍華人丘成桐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時說：“中國很多大的專案，表面上請了很多專家，特別是引進很多外國專家，實際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國外是全職，按照規定必須 9 個月在美國國內（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學的教授，必須 9 個月在美國，只有 3 個月可以在外面。所謂全職引進，都是假的。為什麼要作假，有錢可撈就有人做。北京大學也好，其他學校也好，給的是全職引進的錢，一年有撈幾百萬，為什麼不撈？……《紐約時報》說北京大學 40% 的引進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國調查一下，我擔保大部分是假的。”此前，丘成桐還批評了自己的學生北大數學系教授田剛。田剛同時在多所國內外大學兼職，未達合約工作量，卻拿數百萬年薪。丘還指責田剛有學術剽竊的嫌疑。

北大在令人難堪地沉默了 20 餘天后，由新聞發言人趙為民作出回應。回應不敢正面澄清丘先生指斥的事實，卻對丘的批評反唇相譏。

北大數學學院教授丁偉岳、項武義等人則在公開答辯中指責丘是出於“名利爭鬥”與曾經的學生田剛為難，指責丘破壞了北京大學的聲譽。仍是始終回避丘成桐說的“引進教授拿錢但是不做事”，以及北大學術壟斷、“學霸”的指責。

網路上的民意一邊倒地支持丘成桐，相信丘成桐的網友超過 85%，而支持北京大學的不到 5%。

香港記者閻丘露薇就此專訪丘成桐後說：“看看北大的聲明，其實並沒有回應到丘成桐指出的問題，強調的是關於引進人才對學校發展帶來的正面作用，其實丘教授指出的，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那就是誠信，以及職業操守。”

2005 年底，有人在網上舉報，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漢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進等人涉嫌造假，指出“漢芯一號”晶片是陳進從國外購買帶回，僱請民工打磨掉 MOTO 標誌後，再烙上“漢芯”標誌，然後作為重大科技成果申報，騙取中國政府 1 億 1 千萬元人民幣（約 1370 萬美元）的科研經費（到帳 6 千多萬元）。晶片研發是中國科研關注重點，造假舉報震動了上海交大和科技部。幾個月的調查之後，上海交大在今年 5 月 12 日證實陳進嚴重造假，並決定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有關部委也開始追繳相關經費。卻不再追究為什麼這樣一個低級拙劣的騙局能一路綠燈通行無阻至最高學術機構最高行政機構。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教授說：

“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甯教授說：

什麼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 2003 年 5 月率領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考察，但哈佛大學校長拒絕接待他們，理由是，哈佛大學對於來自 SARS 疫區的學者和學生都有隔離十天的規定，為一視同仁起見，“決定不予接待”。據北大“校長信箱”版主的介紹，許院士率領的這個“中國科學院院士代表團”出訪美國的目的是“為加強院士隊伍的建設，制定科學家倫理道德建設等方面的規範和制度”。道德乃立身之本，因此把上面的官文翻譯成老百姓的話就是：中國的院士要向美國人學習如何做人。

湖南省高教代表團在美國考察期間發生車禍。美國警方介入，於是這個代表團的 7 名成員的身份曝光了：都是什麼校長副校長，其中只有 1 人懂英語。如此訪美代表團大約有上百個。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主張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何祚庥說：“我要嚴厲批評一個口號，即所謂“人要敬畏大自然”——一種對人和自然的關係無所作為的觀點。”

說了這麼多學界令人沮喪的事例，現在來看一個正面的真實故事。

有高爾泰者，是一位公認的學者型的作家、畫家、書法家、美學家。高爾泰曾是右派，在西北荒漠夾皮溝勞改，九死一生。1978 年高平反後來到某大學教書。時省委書記在大氣候的影響下要接見他。大學的黨委書記、校長就通知高某日某時省委書記要接見你，請作好準備。屆時，省委書記來了，高爾泰卻不見人影。怎麼也找不到。過後，有人在一間小屋裏看見高爾泰在作畫。問曰：怎麼忘了省委書記要接見你？高答曰：是他要見我，我沒要見他。

如果省委書記輕車簡從，便服拜訪高爾泰，而不是如此呼來喚去，那高爾泰再清高，大約也不會拒絕接受書記的“禮賢下士”而與之交談。

貴哉，高爾泰！妙哉，高爾泰！大哉，高爾泰！

學界即使沉淪墮落到毀滅，也會有高爾泰這樣的火中鳳凰！

第十章 共產黨萬稅

“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這話曾在五、六十年代風行。這話有嘲諷、有揶揄、也可解釋為共產黨能抓緊思想教育。所以這話沒被批判過，反能傳揚以至膾炙人口。這話的發明者大約是農民。那時，整天勞累之余的農民被接連不斷的大會小會折騰的喘不過氣來，發為牢騷，就有了這“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的幽默。這幽默的傳揚者知識人也參與了，否則，留不下文字來。這都是拜沾了幽默的光。時間的背景延至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出現了另一個折磨全中國十億農民最不可思議的事實和文字上更為幽默的景觀：共產黨萬稅！

結婚要交“夫妻恩愛稅”，煮飯要交“炊煙污染稅”，蒸饅頭要交“饅頭稅”。這並非天方夜譚，而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的確定不移鐵板釘釘的事實。

江蘇宿遷市農村，五口農家 02 年三畝地小麥收入 2650 元，被集資攤派了 1460 元。其中有教育附加稅、城建稅、政府招待附加稅……交不上稅，要搶走口糧、不讓孩子上學、不讓住房子。丈夫患病臥床而在地裏幹活的農婦涕泗交流，向誤以為是省裏來的大官溫家寶跪訴著。中國總理溫家寶大惑不解：“一個農民，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為什麼要交城建稅？”（溫家寶微服私訪記之淚灑宿遷：載中國將軍政要網站 <http://www.jjzy.cn/bbs/read.php?tid=12465&fpage=1>）

山東省農民負擔的集資攤派達 52 項，其中有修建鄉村交通稅、農產品農藥檢查稅、氣象報稅、傳授科普知識稅、鄉村廣播稅……（胡錦濤下鄉目睹慘狀——視察魯豫農村發現官逼民反危機：載集思學院網站 <http://www.cngis.org/bbs/archive/index.php/t-5601.html>）

中央 24 個部、委、辦、局向農民徵收的稅有 93 項。地方政府向農民徵收的稅有 269 項。農民需承擔共計 362 項稅。

除卻正常的農業稅、土地稅諸類外，粗略統計，另有稅：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

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

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

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一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 14 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

毛澤東說：人的思想一旦解放，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跡。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後，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一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中央政府頒佈了個環境保護法，就有識字懂法的村鄉鎮幹部以護法的名目立了個“炊煙污染稅”連帶生發了個“態度稅”。農民做飯冒出的炊煙被視為污染環境行為，於是堂堂皇皇振振有詞地向各農戶徵收污染排放費。絕大多數的農民忍氣吞聲，也總有個別敢說話的農民向上門徵收炊煙稅的村幹部討個說法。不討則已，一討又冒出一項“態度稅”，“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所以徵收多少，視態度而定。

鄭州人民與全體北方人民一樣喜歡饅頭，鄭州市政府還專門鬧起個饅頭辦公室來為饅頭服務。饅頭辦公室各級政府都有，蒸饅頭是要辦許可證的，在市里辦要交 1100 元，區裏要交 1600 元。官員們搶著為饅頭服務，不幸搶急了眼。2001 年 3 月 2 日，鄭州市場暢銷多年的鄭榮牌饅頭被二七區饅頭辦罰款，3 月 6 日又被管城區罰款，而這鄭榮饅頭偏又是在市饅頭辦掛號的。報復很快來了，3 月 14 日市饅頭辦在金水區正要查處一家饅頭廠，區饅頭辦便趕來爭搶，當街對罵……（摘自“中國人創富三十年回望”，載《南方人物週刊》）

這已不是暴征橫斂，而是直接搶掠！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毛澤東就鼓吹農村的痞子起來革命，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當今農村“計生”打手、徵稅小吏出手最凶最狠者基本上就是遊手好閒的遊民、無賴、流氓這類二十年代的痞子。這是一脈相承，也是一種報應！

變本加厲的巧取豪奪在整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的各級幹部腦袋瓜裏不斷湧現新點子。

據農業部會同國家計委的調查統計，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中央國家機關“紅頭文件”規定的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和名不叫“達標”卻實質是“達標”的活動就有 43 項，加上地方黨委政府下達的“達標”項目就多達七、八十項。其中，包括教育、衛生、文化、體育、計劃生育、廣播電視、程式控制電話、國防教育、民兵訓練、民政勞動保險、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基層組織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文明村鎮建設、綠化工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的領域。大到小康縣驗收、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達標、創文明衛生縣、鎮、村等等，小到訂報、滅鼠、改水、改廁等等達標。

上級部門在那閉門造車，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錢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給一點，也是“蝦公釣草魚”，達標後給上一點象征性的獎金，還美其名曰：“以獎代撥”。

每一項的“達標”內容又是十分具體的。比如，教育“雙基”達標是：兩層樓，六粉刷，磚牆鐵門花園化。要求村村建小學，泥牆改磚牆，磚木結構改混泥預製，還要設施標準化、牆壁瓷磚化、環境花園化。僅此一項，就把農民壓得抬不起頭。還比如，鄉鎮派出所達標標準是“3511 工程”，即 3 個人、5 間房、1 輛摩托、1 部對講機。其實，這“3511 工程”到了下邊，13 個人也不夠，3 間房就變成了 1 幢樓；1 輛摩托 1 部對講機也就成了 1 部警車幾輛摩托人人配個“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標準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數。再比如，廣電部門下達了一個十分具體的“小喇叭入戶率”，這就叫今天的農民摸不到北，因為，如今的收音機和電視機在中國農村已經比較普遍了，幹嗎還硬性搞個“小喇叭入戶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說，小康驗收達標的指標就有幾十條，條條聽起來都重要，少一條也通不過，每項都是要農民拿錢去壘的。

農民們怨聲載道，縣鄉幹部也叫苦不迭。

“鄉官”們為此編了一串順口溜：

“這驗收，那驗收，都要縣鄉幹部籌。”

“這達標，那達標，上面從不掏腰包。”

“這大辦，那大辦，都是農民血與汗。”

當我們瞭解到壽縣八公山鄉欠款的情況時，著實感到了意外的震驚。可以說，八公山鄉是安徽境內最小的一個鄉鎮了，它總共只有 4 個行政村，一個區區彈丸鄉鎮，在“達標”活動中，卻也是累計欠款 1 千多萬元……（摘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

不是說五、六十年代時還風行“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這話嗎？曾幾何時，國民黨在稅的多少上、名目的推陳出新上就絕對是小巫了。其實，這些都還是小把戲小兒科，毛澤東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用大氣魄大手筆于不動聲色中將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的口袋掏光了，還要你感恩戴德他領導你走向了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蔣介石相對毛澤東來說，不僅在軍事上是手下敗將，在斂財方面更是孫子！

土改，合作化；公私合營，吃定息；毀林煉鐵，砸鍋煉鋼；興修水利，根治淮河；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十大建築，行宮別墅；三門峽庫，學習大寨；……無一不是囊括人民所有、敲骨入髓的盤剝，延至今日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圈地、房產、金融、鬻官、資金外逃……更是明目張膽地瓜分了。

這一切，中共各級幹部都心知肚明、一清二楚。中共 1985 年就發佈了《關於制止向農

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告》發展到上文提及的 03 年溫家寶胡錦濤微服私訪發現令人匪夷所思的稅收項目和瞠目結舌的稅收手段，時隔 18 年，竟是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總理溫家寶不僅在跪地哭訴的農婦面前涕泗交流，他還有過許多次哭：薩斯期間，看望礦難死者時，幫農民工討工錢時。這些哭聲，這些淚水都是真誠的，都是人性人心心底的那根善良悲憫的弦的律動。凡人皆然！溫家寶還常以古詩來抒發他體恤百姓疾苦的心聲，“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胡錦濤亦然，朱鎔基也有類似的場景。可是這一切，竟然全都是毫無用處！18 年來愈演愈烈的“共產黨萬稅”境況將皇上宰相的淚水哭聲化解成與平民百姓一樣的一絲絲哀鳴。

按說，天下莫柔弱於淚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兩屆總理，一代皇帝，為百姓灑下的一掬同情之淚竟然等同于農婦、訪民的哀鳴，不能動搖各級官吏的鐵石心腸半分半點。這究竟是怎麼啦？這是因為制度決定了總理、主席原本就是各級官吏的代言人、是各級官吏利益的總代表。這是因為凡人總有惻隱之心，總理主席在極端哀苦慘酷的事實前生發的惻隱之心只能對單一的物件起暫時的緩解作用，不可能也決不許可損及各級官吏的龐大利益，更不可能改變根本制度；而這制度則是各級官吏也是總理主席本身賴以生存得以偶爾發發惻隱之心的基礎。這個官吏集團是如此龐大嚴密，制度與文化保證著它的一切：組織結構、利益分配、保守秘密、鎮壓權力以及外逃的方便。總理主席說到底，不過是它們的總執行人罷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怎麼可能來真格的呢？

這個龐大的集團到底有多少人呢？4 千萬！這還是十餘年前統計的數字。以全國 12 億人計，30 個老百姓要養活一個官吏。這是中國歷史之最！請看歷代官民比例的數字比較：

朝代	總人口數	官員數	官民比
西漢	5 千萬	7500	1: 7945
唐（高宗）	6 千萬	13465	1: 3927
元（成宗）	6 千萬	22500	1: 2613
清（康熙）	2 億 4 千萬	27000	1: 9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12 億	4 千萬	1: 30

90 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 120 人，現在（01 年）超過 340 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制。農民用 100 畝地的純收入養活著一個國家幹部，自己卻外出打工謀生。（李昌平：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裏話——給朱總理的信）

這 4 千萬官吏是蝗蟲、是豺虎、是機槍、是坦克、是每一個被他管轄的百姓的皇上！中國的百姓、中國的農民是最懦弱的、最逆來順受的、最好統治的、餓死也不會反抗的。豺虎欺壓慣了百姓，予取予奪，隨心所欲。雖然餓死也不會反抗，但“泥人也有性兒”，可以餓死也忍，卻可能欺死不忍。這是人性！萬古不易的人性！中國歷朝歷代的黔首黎庶造反無不如此。造反、鐵血、你死我活、更朝換代，無論造反成功或是鎮壓成功，血流成河、屍橫遍野，“千里無雞鳴，白骨蔽平原”的景象是民族的災難、人類的災難！中國的明天最應避免的就是這樣一種結果！

第十一章 毛主席萬歲！

敝家鄉的甌江上有一座小島，島上有一座江心寺，寺門口有一口大鐘，鐘上有一大片銘文，銘文中有四個篆體大字：“皇帝萬歲”。

“皇帝”之稱的由來，是大臣成功拍馬與嬴政氣宇蓋世的傑作。《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皇帝”的來龍如此，“萬歲”的去脈則還要早一些。戰國時馮諼為信陵君賈義燒債券，民呼萬歲；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左右皆呼萬歲。發展到後來，“萬歲”自然成為皇帝的專用詞。

嬴政說“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這就是“皇帝萬歲”的具體化。中國歷史上二百多位皇帝，沒有那一家皇帝真能萬歲而傳之無窮，但這些人類的精英還是樂此不疲往復無窮地讓臣民喊叫著“萬歲”。敝鄉江心寺的和尚是得道高僧，佛法高妙，寺鐘上鐫刻了“皇帝萬歲”四字，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國主如何更換，“皇帝萬歲”永遠不錯，永遠要喊。這四字，賽如“阿彌陀佛”永放光芒，永保無虞。

毛澤東許多方面是千古一人，但在“皇帝萬歲”的問題上則不時會出現智障。

先來捋清事實。

名作家丁玲回憶毛澤東早在延安時代就有萬歲夢。

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筆抄寫自己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個我可不敢！要是賀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會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裏正抱著一個男孩。我們正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

子尿的詞來了。(楊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載《炎黃春秋》1993年11期)

這是丁玲略微撒嬌風騷的自詡，或許有作家浪漫的成份，不能全然作真，那麼以下所述，則是載於史籍，無可懷疑的了。

1943年，某次會議上，彭真第一個喊出了“毛澤東萬歲！”毛澤東竊喜心頭，默認了。

1950年“5·1”勞動節的口號稿中，毛澤東自己加上了一條“毛主席萬歲”，正式發佈時改為“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這是朱德秘書1981年參加一次會議時所講，他至今保存著當時的會議簡報。

1958年成都會議上，華東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這樣的口號，“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胡喬木後來回憶，“這是成都會議上正式提的口號，當時就沒人敢反對，提出者後來還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1966年，林彪第一個喊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從此，四個偉大萬歲風靡華夏大地、響徹神州上空、顛倒芸芸眾生。

與歷代封建王朝有別的是，在新的自我標榜為唯物主義的時代，佞臣和皇帝自己完成了唯心的極致。“毛主席萬歲！”遂成為一種標誌，一種象徵、一種迷信。文化革命中風靡全中國的“紅海洋”血淋淋的景色就是見證。一位孕婦，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把碎片藏在床底下，抄家時被翻出來，被毒打後流產，不久就死了。一位小青年，喊口號時把“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喊顛倒了，被關了7年。這兩樁是筆者親歷的事。這樣的例子在文化革命中遍佈大陸、數不勝數，驚人的荒唐慘酷。以至於在中國不但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農墾部部長王震揭批副部長陳漫遠罪過之一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自己則是經常喊這一口號；以至於能喊“毛主席萬歲！”是一種榮耀恩寵、政治身份的標誌，不准反革命分子臨死前喊“毛主席萬歲！”筆者從勞改隊回學校後，去向領導要每個人都有一份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被告之：你是勞改犯，沒資格。

毛澤東青年時代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老年時經常對身邊人孟錦雲、張玉鳳嘮叨：“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可見他很明白人不能萬歲。

毛澤東自己一生喊過三個人萬歲。第一個是陳獨秀，他早年寫過：“我祝陳君萬歲！”；第二個是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的許多集會上，他頻頻舉手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第三個是人民，他回報臣民山呼的禮物就是經典式的動作，舉手向前一揮再一攔回來，同時喊出了“人民萬歲！”這個時候，毛澤東很唯物。崇拜陳獨秀時，萬歲是心儀的宣洩；敷衍蔣介石時是一種高明的演技；人民是芻狗，是一堆肉，需要哄哄罷了。

毛澤東絕不允許喊別人萬歲。他自己明確的語言是在文革中傳達到家喻戶曉的：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危險人物”。新提拔起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為毛澤東作詮釋：“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當然這是指劉少奇。

劉少奇與周恩來相比，畢竟於帝王心術的理解尚淺。1959年劉少奇登基作國家主席，人民日報套紅將毛澤東、劉少奇的標準像並立，大小、色彩、位置沒有任何區別。此後，劉

少奇攜老婆王光美出國訪問，出盡風頭；讓老婆掛帥“四清”運動，自己以國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坐鎮助陣，劉少奇家鄉湖南湘潭花明樓出現“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的標語。這兩條標語，兩個主席都看見了。劉少奇對這一切泰然處之、心安理得。

周恩來則不同。據給周恩來當過翻譯的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在“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1952年5月1日，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有位比爾·加德納先生，問齊錫玉：“為什麼只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齊錫玉心裏怪他“怎麼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礙於領導指示，於是耐心向他解釋說中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卻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知道，我的經歷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裏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而這部新聞片最後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卻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征！”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著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毛澤東對此絕無二話！周恩來深味其中真意，劉少奇則有點得意忘形了，以致樂極生悲，慘遭殺身之禍。

中國人也真賤！毛澤東都明說了：打核大戰不怕，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一半，還有三億。又說：“八億人，不鬥行嗎？”中國人還就是視毛澤東為神，心甘情願匍匐在地，任其蹂躪宰割猶山呼萬歲，“吾皇聖明，臣罪當誅。”這裏有盲目、畏懼，潛意識中也有人性醜陋的僥倖心理：那死的一半一定不是我，不是我家人；正同凡人參與賭博，明知十賭九輸，還總是冀其那一贏的心態是一致的。

德國一智者說：希特勒納粹為禍全歐洲、全世界，為害日爾曼民族，德國人民也有責任，他們姑息、縱容、鼓勵了希特勒。

毛澤東的為禍全中國全民族全社會，周恩來、劉少奇們以及知識人、芸芸眾生都有份、都參與了。這也正是文化、民族性與制度綜合的罪孽。

當胡風被打成反革命時，知識人絕大多數是看客、幫閒、幫忙、幫兇。

當把明知絕無可能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扯在一起，敲響了55萬右派的喪鐘時，他已是明目張膽地指鹿為馬、欺世盜名了——諒你們只有乖乖接受。

當發動文化革命，把以前的忠實爪牙、打手、夥伴周揚、劉少奇、林彪置於死地時，他已可為所欲為，置人命、天下萬物甚至傳統、良知、普世的道義價值於股掌了。

所有的知識人與芸芸終生都違心更多的是真心地鞭笞自己的靈魂，高喊萬歲，匍匐在他的腳下。全中國生活在謊言和恐懼之中。

中國當下這種全體沉淪墮落的狀況，制度、文化是罪魁，當政者是禍首，芸芸眾生尤其是知識人也難辭其咎。他們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甚或幫閒、幫兇……容讓和鼓勵了當政者的肆無忌憚，構成並促進了這種泥潭醬缸文化的確立與成熟。

長江巫峽的文峰山巔有一條“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其大無朋，占了半座山，每個字長寬各 10 丈，每筆寬 1 丈，每個字占地 1000 平方米，5 字和一個感嘆號相連，外加字間距，超過了 6000 平方米。每 1 個字，都比兩個籃球場加起來還大出了 160 平方米，整幅標語約等於 15 個籃球場。”這大約是迄今為止人類製作的最大標語！

這條標語是當局驅使一百多名右派分子製作的。這些右派分子，在“光榮任務，表現好可以摘帽”的誘惑下，人人爭先苦幹。當時，他們每日的糧食定量是半斤（250 克），每日起早摸黑，上山懸空吊著鏟地、刻字、背漿、潑漿，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苦，付出了五條生命的代價，完成了這“曠世傑作。”這是發生在 1961 年的事，並非瘋狂的文革時期。

無獨有偶，香港回歸前，有一塊“臺灣飛地”調景嶺。每當“雙十節”，港島到處飄揚著英國“米字旗”，只有在九龍海岸木屋社區的調景嶺上，“青天白日旗”掛得漫山遍嶺，成為一個奇觀。筆者 1993 年到香港，經友人提點，遊覽了調景嶺，不是節日，也見滿山滿谷的“青天白日旗”在風中獵獵作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山的半山腰上，有 5 個巨大的白字：“蔣中正萬歲！”這 5 個字在青天白日彩旗的點綴下，特別醒目，特別耀眼。原來，居住在這兒的是 1949 年潰敗後逃難到香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及家屬，共萬餘人，其中有不少將官校官。港英當局讓他們避難，在這兒自生自滅。他們在這兒自力更生，經過幾十年的經營，調景嶺成了香港一個特殊的社區。他們認中華文化是祖，視蔣介石為宗。“蔣中正萬歲！”5 個大字想是在他們生活穩定了後的 6、70 年代寫的，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能量和那麼多的功夫。

大陸巫峽上的“毛主席萬歲！”和香港調景嶺上的“蔣中正萬歲！”正是皇帝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光大，是中華文化的殊途同歸。國民黨、共產黨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在文化上則一脈相承；蔣介石，毛澤東同是一世梟雄，毛澤東在心狠手辣殘忍歹毒詭詐無恥上更勝一籌，大陸順民的求活求生求赦求安和調景嶺上遺老遺少的認宗認祖念鄉念家在人性上是一致的。這大約就是兩大你死我活的陣營中出現了同一模式山呼萬歲的根本所在。制度、文化與人性三者就是如此交錯糾結，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制約鎖定我，我攀援牽扯你。不改變這個制度，不驅除這種文化，皇帝萬歲就會繼續，以至“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臺灣制度徹底變了，文化也在漸變，“皇帝萬歲”是再也無力還魂了。李登輝、陳水扁或以後的無論誰，都會在民眾的絕對監督之下，絕無可能搞獨裁了。

大陸則不一樣，毛澤東死了，後繼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順者生，逆者亡，還是皇帝文化。這皇帝文化不過改頭換面、梳妝打扮的更時髦更適應當今的潮流而已。

“四個堅持”、“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的新湯，煮的還是一黨專政的老藥，只是藥引多變，藥性更加不可捉摸，時和時猛、或熱或涼、突燥突濕，病入膏肓者，如何能受得了！文化上因信仰崩塌無所適用而醬缸兜底，沉渣泛起，影響所及，遍佈全國全民，無論男

女老少，無論高低貴賤，無不如遭天譴。人性中醜陋的一面、獸的一面在合適的土壤中醞釀發酵發作，暴露的淋漓盡致、登峰造極。

其中最深遠最持久的是毛澤東那些似是而非、似美而醜、似善而惡、似真而假的大雜燴思想文化在民眾中流傳、蔓延、浸潤、滲透。

河南省的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是兩個最典型的例子。筆者得友人贈送了一厚本書《南街社會》，這是她親住南街村研究南街村六年的結晶。拜讀之下，感慨複雜。網上查到兩篇文章（“華西村、南街村的邏輯難題”署名“浙商製造”。“南街村概況”作者佚），對南街村做了高度的濃縮，所敘與友人之書基本一致，茲綜合摘引如下：

南街村位於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緊靠 107 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848 戶，3180 人，1000 畝耕地，總面積 1.78 平方公里。

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遵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飛速發展。□

南街村依靠當地糧食資源，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企業上配套項目，大搞糧食深加工，形成了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產業格局，實現了層層增值和良性循環，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組建了國家大型一級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1991 年率先摘取河南省“億元村”桂冠，而後年產值突破 16 億元。

南街從 1996 年起，斥資數千萬元，建起了 20 多棟高檔次的高層公寓式住宅樓。如今全村 800 多戶村民和全體職工都已遷入新居。每戶是 3 室 1 廳，92 平方米（使用面積），內有公家配給的高級床、沙發、衣櫃、桌椅書架、工藝品架，還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液化氣灶、中央空調（雙制：製冷、制熱）、24 小時供應熱溫泉水……有人形容，“戶戶都是廳局級標準（面積）、省部級裝備（中央空調等）”。關鍵是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費品大部分是集體供給的，油、鹽、醬、醋、酒，雞、鴨、魚、肉、蛋，樣樣齊全。糧食每人每月 40 斤，月月有餘，可以存在集體。家用電器、水、電、糧油等由村裏統一配給，孩子入托、上學等教育費用也完全由村裏負擔，在外地上大學的學生學雜費、住宿費，包括每月的 300 元生活費等全部由村中負擔。村民的文化娛樂、醫療、保險、統籌提留等費用也由村裏承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村民無一家安裝防盜門窗。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以支援現實生產力的發展；企業可以辦社會辦文化；政企合一卻效率很高；“消滅個人”的集體產權模式卻能激發個人積極性。中國農民、中國企業的創造，跟國際慣例、市場規律完全不同，也許這些成功個案沒有推廣價值，但這些經歷了時間和實踐考驗的企業家標本，可以解剖出極有價值的資訊——為什麼這些“不符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能夠成功，在中國，到底什麼樣的企業“身份”最合國情，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它們首先要服什麼水土？

……南街村和華西村都是政企合一體制，核心人物同時擔任村黨委和企業集團一把手。

南街村民喊他們的領頭人王宏斌為“班長”；華西村百姓則稱呼其當家人吳仁寶為“老書記”。身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的王宏斌頭上，還有一個中共臨潁縣委副書記的榮銜。王宏斌還是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全國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中共 14 大、15 大代表。

而 1928 年出生的吳仁寶具有傳奇色彩，吳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長達 40 年之久，在華西村享有絕對權威。美國出版的《重新發現中國》一書中稱：“華西村是中國的新加坡，吳仁寶是華西的李光耀。”

.....

南街村早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進典型，華西村也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會大院對面的樓頂牆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子的。

毛澤東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 年他們掀起了三大活動：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舉措中有一條是家家備有毛澤東選集，人人手中發送“老五篇”，新招職工的條件之一是要會背“老三篇”。南街村的舉措中還有一種“鬥私會”，南街村黨委的核心人物“班長”王宏斌、“副班長”郭全忠都曾帶頭在大會上做過觸及靈魂的“鬥私”，在全村引起震動。

.....

華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村子裏建桃園三結義雕像、二十四孝亭的時候，有人批評吳仁寶是舊思想。吳仁寶的本意是讓大家要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華西村有一個規定，凡老人家滿 100 歲，村裏按子孫人數每人 1 萬元人民幣獎勵老人。2001 年就有一個老人家得了 37 萬元。

在南街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這種承包制之所以有效率，關鍵是與“政治掛帥”的制度環境匹配。因為個人的生產、生活資料都掌握在“集體”手裏，各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必須在精神、動機上對村集體效忠。否則，其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會受到影響。

.....

對於這兩個中華名村的前景，兩位當家人都心中有數。一位外地來的官員問王宏斌，若是哪天你突然出車禍“死”了，你推斷南街村的道路還能不能走下去？對這個問題，王宏斌沒有正面回答。

華西作為中國首富村，其經驗有沒有推廣意義？作為中國小康村研究會會長，吳仁寶的觀點是，首富村、小康村的主要價值，在於大家明白農村為什麼窮？怎樣富？而不是機械地推廣克隆。

華西村、南街村能否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模式、新版本。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鑒別方法，那就是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續兩代以上，否則，還是一種“能人經濟”，一種不同於西方人的東方人特有的人際結合方式，只在特定環境下有效。

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是畸形環境催生的一個怪胎，它的指導思想表面上是大雜燴、四不象，其實是毛澤東思想陰魂不散的迴光返照。中國兩千年封建文化的底基，是一塊繁殖衍生怪胎的好土壤。毛澤東的皇帝文化披上了共產主義“各取所需”的大同理想外衣，將是非、真假、善惡、美醜的界限模糊到極限，五十餘年的謊言、理想教育，灌輸培訓造就了一批忠誠的追隨者。南街村的出現正是這種極限和追隨的結果。它的影響較之任何貪賄墮落可能都更深遠。眼前的得益會使幾乎所有的人忘記了或看不到日後的可能是災難性的嬗變，正如中共建政初期的廉明蒙蔽了幾乎所有的國人，使他們對接踵而來的鎮壓、整肅、饑餓、屠殺毫無準備，除了逆來順受忍辱吞聲引頸受戮外，別無他法。

作者在這本書中似乎還有所暗示：這一切表面上的富有似乎是虛假的，內藏玄機——靠

貸款撐着，一旦還貸，海市蜃樓就消失無蹤。（07 年本書香港版發印前，筆者見到本書作者，詢問之下，果然如此。——作者註。）

中國大陸“毛主席萬歲！”雖然不見再喊了，但制度不變，皇帝文化就仍在繼續，無論如何改頭換面，萬變難離其宗。明天只會更壞！

第十二章 孩子已經沒明天！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識字班，1958年大躍進時農村裏的掃盲班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雖然不無裨益，但未能持之以恆，收效甚微。因為是以運動的形式來進行的，運動一過，自然銷聲匿跡。且深究起來，當局的真實意圖，在讓農民略識之乎，聽懂黨的傳達，以便更好地愚弄。

那麼對於孩子的教育，國之根本、命脈，也用這種運動的方式方法就會種下禍根，釀成大禍。

中共建政以來的人文教科書多變，都以緊跟當時的政治運動的形勢為基本方針。階級鬥爭是總綱。五十年代，則有白毛女、黃世仁、半夜雞叫、周剝皮、董存瑞、黃繼光、丘少雲、馬特洛索夫、卓婭舒拉、保爾柯察金；六十年代，換了雷鋒、焦裕祿、劉文學、龍梅、玉榮（草原英雄小姐妹）、東海小哨兵；七十年代，加上了劉文彩、珍寶島英雄、大寨、大慶、英明領袖華國鋒；八十年代，當然會有鄧爺爺；九十年代，上海的教科書竟然有江澤民的歪詩；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則是年年必不可缺的。

這種狹窄的、鬥爭、仇恨、效忠、聽話、頌揚為主的教育灌輸造成了幾代人思想、心理、性格、知識層面的扭曲。當今中共主席胡錦濤就是最典型最活生生的見證。胡錦濤在別人問他讀過俄國哪些文學名著時，脫口而出就是：《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麼，他讀過的中國文學名著，十有八九會是：《高玉寶》、《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業史》、《紅旗譜》、《山鄉巨變》、《鐵道遊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胡錦濤受的小、中、大學教育正是五、六十年代的事。這些書正是那個年代當局大力出版宣傳的書。這種教育灌輸的結果，使胡錦濤腦際迴旋的當然不是慈愛、不是孝友、不是寬容、不是百姓、不是和平、不是吉祥、不是鑄鐵為犁、不是融融相處、不是化干戈為玉帛，而是鬥爭、對抗、英烈、正義、犧牲、血腥、勇敢、為國捐軀、視死如歸、排除萬難、聽黨的話……可以說，幾代中國人都是如此的，概莫能外的。

八十年代後、九十年代開始，全社會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向錢看！原先神聖的東西狗屁不如了。這種突然的急轉彎式轉型在文化上道德上的負面影響是最大最根本最深遠最無可救藥的。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萬事萬物自有其生息循環的規律。

原先的孩子們現在成了國家領導人、各級官吏、人民教師。他們多年浸淫在鬥爭熱血仇恨的模式中所形成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變。如此政府，如此教師，如此突然轉型的社會，我們的孩子會成為什麼樣的孩子呢？都說，從一個極端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果真如此！

白毛女不嫁黃世仁是傻冒

山東省沂水縣的中年婦女王某本想讓女兒通過看電影《白毛女》來接受教育，不料

其女兒的觀後感卻令她大吃一驚。王某有個上小學五年級的獨生女兒，7月5日中午，王某買回了包括電影《白毛女》在內的許多反映解放前生活的影碟，準備讓女兒觀看從中接受教育。不料想，看完影碟當王某問女兒有什麼感受時，其女兒竟回答說：“那白毛女也真是的，人家黃世仁有權有錢，標準一個大款，這樣的主兒貼都貼不上，她卻為了窮大春逃到山洞裏受苦，傻帽兒一個。”對此，王某在吃驚之餘感到憂心忡忡：女兒小小年紀怎麼就這樣看待問題？

小學生被派遣為官員母親送喪抬花圈

即將小學畢業的30余名學生，頭頂烈日，徒步往返近10公裏，竟然是被學校派往鄰村幫山西晉城一位官員辦喪事抬花圈。據瞭解，辦喪事者是晉城市某部門的一位副部長，死者是他的母親。這些學生來自山西陽城縣固隆鄉固隆村小學。此事在學生家長中引起強烈不滿。（載《京華時報》6月13日）

這些表面的淺層次的現象已經十分觸目驚心。再來看看更不可思議的事：

會答的舉左手，不會的舉右手

今年1月《文匯報》上講，湖南省政協提案批評中小學造假：教師在公開課前預先佈置學生做踴躍發言狀，會答的舉左手，不會的舉右手。我看後大笑。女兒拿過報紙一看，說她在小學時就經歷過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兒讀過的一所小學，前幾年終於被評為省級一級學校。為評比，他們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設計公開課舉手；有的工作推後做了，比如追補了幾年的備課筆記檔案。我聽了覺得荒唐。一個教育界人士笑我大驚小怪，說不這麼做的倒不多見。

拾金不昧的作文

我女兒說她從小學到中學已經寫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實際上從來也沒撿到過一分錢。

曾經的我們跳過忠字舞，揮過小紅書，批這個鬥那個，發言、表態、寫白紙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瀾，把值得懷疑的東西弄得不容置疑，對不能懷疑的東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該相信什麼。後來的年頭，我們仍不時地說一些不是很真的話，做一些不是很實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們就接了下去，寫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編好人好事，對同學說瞎編的話。

引蛇出洞

一個小學的班主任，聽任課老師說前面一節課他們班紀律很亂，就到班上說：“剛才上課誰不遵守紀律了？”全班鴉雀無聲。“誰承認，誰就是好孩子，老師保證不批評他。”許久，一個孩子站了起來。不料老師立刻翻臉，劈頭蓋臉地大罵他，還發動全班圍攻他，使那個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聽完了，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我問這件事是不是要處理？答曰：是。我說，就是嘛，不處理還行，心裏這才輕鬆了一點。過了一會兒，我又覺得不對勁，再問：“會怎樣處理那個老師？”“批評教育。”“就批評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說

能不能調離教師崗位？”回答是斬釘截鐵的——“不可能！”

那個教師用57年引蛇出洞的辦法對付小孩子，用這種世界觀塑造幾十個小孩子的靈魂，對他應有的處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輕鬆的感覺一下子蕩然無存。我們得回到幼稚園。1987年，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聚會。有人問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學學到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那位老人平靜地說：“是在幼稚園。”“在幼稚園學到什麼？”“學到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夥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要放整齊；吃飯要洗手；做錯事要表示歉意；午飯後要休息；要仔細觀察大自然。從根本上說，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

這樣的事也是真的，這樣的事也是普遍的、司空見慣的！我們的孩子還有明天嗎？

現在來看九十年代初曾在教育界引起轟動的一篇中日兒童教育異趣的文章。

夏令營中的較量

孫雲曉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來到了內蒙古，與30名中國孩子一起舉行了一個草原探險夏令營。

A□中國孩子病了回大本營睡大覺，日本孩子病了硬挺著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當年放牧的烏蘭察布盟草原，中日兩國孩子人人負重20公斤，匆匆前進著。他們的年齡在11—16歲之間。根據指揮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計劃，則應步行100公里！

說來也巧，就在中國孩子叫若不送之時，他們的背包帶子紛紛斷落。產品品質差給他們偷懶製造了極好的理由。他們爭先恐後地將背包扔進馬車裏，揉揉勒得酸痛的雙肩，輕鬆得又說又笑起來。可惜，有個漂亮女孩背的是軍用迷彩包，帶子結結實實，使她沒有理由把包扔進馬車。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沒勁兒，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煥發，還千方百計讓她開心。他們打打鬧鬧，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後面。儘管有男孩子照顧，這位漂亮女孩剛走幾里路就病倒了，蜷縮一團瑟瑟發抖，一見醫生淚如滾珠。於是，她被送回大本營，重新躺在席夢思床上，品嘗著內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樣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臉色蒼白，汗珠如豆。中國領隊發現後，讓他放下包他不放，讓他坐車更是不肯。他說：“我是來鍛煉的，當了逃兵是恥辱，怎麼回去向教師和家長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醫生的勸說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過了一會兒，他又爬起來繼續前進了。

B□日本家長乘車走了，只把鼓勵留給發高燒的孫子；中國家長來了，在艱難路段把兒子拉上車。

下午，風雨交加，草原變得更難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腳泥水。當晚7點，隊伍抵達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們支起了十幾頂帳篷，準備就地野炊和宿營。內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將黃瓜、香腸、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禮貌地請大人們吃，緊接著自己也狼吞虎嚥起來。倒楣的是中國孩子，他們以為會有人把飯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該保證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話。於是，有些餓著肚子的中國孩子向中國領隊哭冤叫屈。飯沒了，哭有何用？

第二天早飯後，為了鍛練尋路本領，探險隊伍分成十個小組，從不同方向朝大本營狼宿海前進。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沒有現成的路，他們只能憑著指南針和地圖探索前進。

如果哪一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們將離大隊人馬越來越遠，後果難以預料。

出發之前，日本宮崎市議員鄉田實先生驅車趕來，看望了兩國的孩子。這時，他的孫子已經發高燒一天多，許多人以為他會將孩子接走。誰知，他只鼓勵了孫子幾句，毫不猶豫地乘車離去。這讓人想起昨天發生的一件事：當發現道路被洪水衝垮時，某地一位少工委幹部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車，風馳電掣地沖出艱難地帶。

中日兩位家長對孩子的態度是何等的不同！我們常常抱怨中國的獨生子女嬌氣，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這板子該打在誰的屁股上呢？

C□日本孩子吼聲在草原上震盪

經過兩天的長途跋涉，中日兩國孩子勝利抵達了目的地狼宿海。

當夏令營宣告閉營時，宮崎市議員鄉田實先生作了總結。他特意大聲問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77個日本孩子齊聲吼道：“美！”“天空藍不藍？”“藍！”“你們還來不來？”“來！”

這幾聲狂吼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中國人。天哪！這就是日本人對後代的教育嗎？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嗎？當日本孩子抬起頭時，每個人的眼裏都閃動著淚花。

在這群日本孩子身後，站著的是他們的家長乃至整個日本社會。

據悉，這次由日本福岡民間團體組織孩子到中國探險的活動得到日本各界的廣泛支持。政府和新聞機構、企業不僅提供贊助，政界要員和企業老闆還紛紛送自己的孩子參加探險隊。許多教授、工程師、醫生、大學生、小學教師自願參加服務工作。活動的發起者、該團體的創始人河邊新一先生與其3位女兒都參加了探險隊的工作。他們的夏令營向社會公開招生，每個報名的孩子需交納折合7000元人民幣的日元。一句話，日本人願意花錢送孩子到國外歷險受罪。

D□中國孩子的表現在我們心中歷上沉甸甸的問號

日本人滿面笑容地離開中國，神態很輕鬆，但留給中國人的思考卻是沉重的。

剛上路時，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裝滿了食品和野營用具；而有些中國孩子的背包卻幾乎是空的，裝樣子，只背點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國孩子便把水喝光、乾糧吃盡，只好靠別人支援，他們的生存意識太差！

運輸車陷進了泥坑裏，許多人都沖上去推車，連當地老鄉也來幫忙。可有位少先隊“小幹部”卻站在一邊高喊“加油”，當慣了“官兒”，從小就只習慣於指揮別人。

野炊的時候，凡是又白又胖抄著手啥也不幹的，全是中國孩子。中方大人批評他們：“你們不勞而獲，好意思吃嗎？”可這些中國孩子反應很麻木。

在咱們中國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過的雜物都用塑膠袋裝好帶走。他們發現了百靈鳥蛋，馬上用小木棍圍起來，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國孩子卻走一路丟一路東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營，暴露出中國孩子的許多弱點，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們培養目標與培養方式的問題。第一，同樣是少年兒童組織，要培養的是什麼人？光講大話空話行嗎？每個民族都在培養後代，日本人特別重視生存狀態和環境意識，培養孩子的能力加功德；我們呢？望子成龍，可是成什麼龍？

我們的愛心表現為讓孩子免受苦，殊不知過多的呵護可能使他們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經公開說，你們這代孩子不是我們的對手！第二，同樣是少年兒童組織，還面臨一個怎樣培養孩子的問題。是佈道式的，還是野外磨練式的？敢不敢為此承擔一些風險和責任？許多人對探險夏令營讚不絕口，可一讓他們承辦或讓他們送自己的孩子來，卻都縮了回去，這說明了什麼呢？

是的，一切關心中國未來命運的人，都值得想一想，這個現實的矛盾說明了什麼？

全球在競爭，教育是關鍵。假如，中國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備競爭力，中國能不落伍？（原載：博訊）

作者孫雲曉在另外的文章裏說：“1992年，我採訪在中國舉辦的中日少年探險夏令營時，曾問一個13歲的北京男孩：‘為什麼野炊時中國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幹？’北京男孩兩個字就一針見血地回答了我：‘遺傳唄！’他還解釋說：‘爸爸媽媽為了讓我進個好學校，讓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動，電不准我動，火不准我動。我長到13歲，火柴也很少劃，我家炊都不會，哪還會野炊呀？不是我們不想幹是不會幹，不會幹的事怎麼比得過人家？’”

“……全中國的父母沒在一起開過會，卻幾乎都會說一句話：‘孩子，只要你把學習搞好了，別的什麼都不用你管！’這句近乎國民共識的話，道出了中國教育的真正隱患。”隱患不再是隱患，看看當年的孩子，現在的大學生如何入學，網上隨便一搜：

8月17日是清華大學本科新生報到的日子，來自全國各地的3千多名學子踏進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園的新主人。在新生入學的同時，許多家長和親友也隨同而來，新生的陪同者少則二人、多則十幾人，組成了一支人數十分龐大的送行隊伍，估計總數達七、八千人。……據該負責人介紹，很多外地新生的家長擔心孩子的旅途安全，親自送子女來校報到，這種心情可以理解。……看到這些露宿校園的家長為了孩子如此辛苦，我們也很感動。（摘自：清華新聞網）

這種在日本、在西方所有的國家都絕難理解的現象，在我們是司空見慣；在他們認為是愚蠢之極的行為，在我們是“很感動”。至於更離譜的溺愛，就不提了。幾乎所有的大學生對此都接受了。這是最可怕的！這是根本！已經滲透到全民的意識和行為中了。

我們的孩子會有明天嗎？

美國紐約遭受9·11恐怖襲擊。筆者的一位朋友在紐約曼哈頓上班，公司疏散員工，她走到地鐵口。地鐵口擠滿了灰頭土臉的人，人人都在往下走。她一邁上臺階，略顯擁擠而井然有序的人群突然齊刷刷分成兩邊，讓出了中間一條通道，讓她先走。原來我這位朋友拄著拐杖，人們以位她是遭遇恐怖襲擊受傷者。美國人就是這樣地富有同情心悲憫心愛心。這是從小教育薰陶的結果，絕非臨時能有的。筆者的這位朋友是華人，祖籍浙江杭州，名字陳立群，從小患小兒麻痺症而拄拐杖。事後她非常感慨，沒齒不忘。

紐約的阿拉伯裔人很多，信伊斯蘭教的人更多，全美國更多。911以後，幾乎沒有一個信伊斯蘭教的人遭到報復。固然，美國總統在第一時間呼籲善待他們，但是沒有美國民眾的自覺，是不可能在如此巨大的突然襲擊和損失面前保持平靜的。這得益於他們的教育！

2003年，薩斯襲擊大陸，災難突然降臨，我們的大學生驚惶失措，爭先逃命。在真正的災難降臨時，我們會如何呢？我們的孩子們會如何呢？

筆者於06年9月份做過調查，我們還有這樣的教育：

溫州市農民工孩子上小學，每學期學費1000元，城裏孩子每學期學費100元。農民工孩子不能上城裏學校，只能上專門為農民工孩子辦的學校，有私立的、有半公半私的，隨時有可能被取締，且絕對求遠大於供。農民工孩子要上城裏小學，須交2—3萬元，上城裏中學須

交4—5萬元，若半途轉學，餘款不退。

農民工的月收入是600元。全國農民工已近2億，適齡中小學生應在2000萬以上。感歎譴責收費過高，農民工不堪重負，是善良人們的同情心。殊不知骨子裏的不公、不平等、蠻橫不講理，在孩子們尤其是農民工孩子的心裏留下的創傷是一輩子的、是最大最根本最深遠最無可救藥的。再作深入調查，結果如下。

八十年代一般學校收費集資情況	八十年代重點學校收費集資情況
幼稚園——500—1500 元；	7000—10000 元；
小學——300—1000 元；	3000—8000 元；
初中——5000—10000 元；	10000—15000 元；
高中——15000—20000 元；	20000—25000 元；
九十年代一般學校收費集資情況	九十年代重點學校收費集資情況
幼稚園——3000—10000 元；	20000—40000 元；
小學——7000—10000 元；	15000—25000 元；
初中——10000—15000 元；	20000—40000 元；
高中——20000—30000 元；	30000—50000 元；

收費集資的物件是指：1、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子弟。2、戶籍非學校所在地轄區的本市居民孩子。3、分數不夠重點學校標準開後門的。這三類孩子來上學，都得在規定的學雜費之外再掏出這麼多錢來。

如此大事，就能如此作假、如此不公、如此蠻橫！這有點“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賣路財！”的味道了。這是准國家行為、准政府作為！因為雖然不是教育局財政局的明文規定，卻是公開的、毫不隱諱的、堂皇的、盡人皆知的、比明文規定還硬的、必須遵守執行照辦的、凡物件都已經照辦了的、一直在進行著的、絕無變化取消跡象的、且有增加收費金額趨勢的。

課外輔導的收費情況是：放學後，到老師家補課輔導從星期 1 到星期 5，每人每月 300 元。有教師帶 10 來個孩子輔導的。

傳授知識的殿堂已經成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市場。為人師表的靈魂工程師轉換成了一切向錢看的精明的商人。

我們的孩子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受教、灌輸、影響、薰染！

前門狼未驅，後門虎已進。上世紀的污染尚在蔓延，本世紀的崩潰已經開始。

孩子的今天已經不存在了，還能有明天嗎？

第十三章 東西文化對照

五千年文明古國，有許多許多優秀是西方所望塵莫及的，本章不論，非妄自菲薄，實在有更多更多，更眼前更立馬更要緊更實際更深刻更臉紅的不得不自慚形穢者也。

• 太監文化

太監文化是中國獨有的，東漢“十常侍”，明末魏忠賢“九千歲”是其著者。西方沒有這種太監文化。論者曰：中國現在也沒太監文化了。否！當今的秘書專權、夫人幹政、情婦參與、子女仗勢，就是太監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若是個別現象，也就罷了，可怕的是，這已經是通例和習慣了。所以可視為一種文化。這種現代的太監文化正是制度直接孕育而發展成熟的。

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無论文武，全是身經百戰歷練出來的。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鄧小平、彭德懷、陳毅沒有一個是秘書出身的。這也是能成就大事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從來對秘書的使用有極大的限制，大秘書胡喬木是顯例。毛在世時，胡就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秘書；毛去世後，胡，無論資望才華都是拔尖的，但怎麼折騰，也只是管管宣傳文化。這是因為，繼毛後的鄧小平在用人的格局方法上與毛異曲同工，英雄所見略同，鄧小平對胡喬木的限制使用正是毛澤東的一脈相承。

秘書秉承首長意旨辦事，不可能不唯諾媚上的。久之，秘書就是賈桂，否則，他當不成秘書。所以，中共體制內的秘書是絕無可能有大氣象、大格局、大手筆的。田家英有才氣，只是有點獨立見解，終不見容于毛，自殺或被殺身亡。

中共的第二代、第三代變了，許多重要的關鍵的位置秘書佔據了，發號施令了。鄧小平的親信、患難秘書王瑞林就無此榮幸。王瑞林的竄升反倒是在鄧死後，是秘書幫的躍起不好意思漏了他。鄧小平畢竟是有大格局不同凡響者。秘書主政，宋平、溫家寶、曾慶紅是顯例；賈慶林、黃菊的秘書，甚至司機都成了獨當一面的大員；正是沐猴而冠、雞犬升天諸小家子氣的氾濫，裙帶風、枕邊風自然呼呼吹響。這種表面五花八門實質乃太監文化的沉渣泛起也是黨文化走向窮途末路的徵候。

• 拐杖與痰盂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因一次意外事故摔斷了腿，打上石膏，拄著拐杖。1984 年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來訪，卡洛斯拄著拐杖會晤李先念。電視上、報紙的照片上只見卡洛斯金雞獨立，白色石膏全裹，胳膊窩裏頂著拐杖，仍舊滿面笑容，喜逐顏開，一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樣子。西班牙人從沒認為卡洛斯癱腿拄拐的形象損了國家顏面，反倒興高采烈，為自己的國王如此敬業為國效勞欽佩不已。中國主席李先念高齡出訪，也堪稱勤于王事、宵衣旰食。在西班牙期間，侍衛向西國接待人員要一個痰盂。西國沒有所謂痰盂，經說明，給了一個敞口的容器。原來李先念老人家 76 歲了，尿頻，曾來不及如廁濕了褲子。要痰盂是救急用的。

說到痰盂，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與毛澤東會晤，外電報道時很感興趣的一條花邊新聞是：毛澤東的書房裏茶几前有一個痰盂。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賓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都沒有痰盂之設。西人記者不知道痰盂為何物。花瓶不會擺在地上，裝飾物怎麼如此難看，還有一些水。經詢問才恍然這是專為吐痰擤鼻涕用的。他們始覺有趣，繼而聳肩。我們有痰盂，卻總也改不了隨地吐痰的毛病。至今海外屢見類似報導：機場大廳一黑人清潔工清理地毯時看見一口濃痰，隨口就罵“又是中國人！”尼克松沒用毛澤東的痰盂，卻在周恩來擺的國宴上引用毛澤東的詞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正是：萬年太久爭朝夕，最懂當推尼克松。千般注釋化唾沫，一齊吐在痰盂中！

• 失業者打了德國總理一耳光

BBC 中文網駐德國特約記者史明 5 月 19 日報導：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本周 2 的一次德國社會民主黨地方黨代會上，遭到一名失業者的襲擊，被打了一個響亮的耳光。那位據信 52 歲的失業者很快被制服逮捕，經過警方詳細偵訊，沒有發現其他更深刻的政治背景，襲擊者周 3（5 月 19 日）獲釋。

被襲擊的德國總理施羅德本人對這一事件保持緘默，他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中央機構也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力圖淡化事件對德國政界的影響。儘管如此，因為對施羅德左翼政府目前實行的社會改革不滿，德國總理在大庭廣眾之前挨打，這一富有公眾刺激性的政治小插曲，還是引起德國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些公眾知名人士在向施羅德本人表示慰問的同時，紛紛評論認為：德國下層民眾在迄今為止的社會改革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反而一再失去經過幾十年社會沖折才得來的各種福利，這樣的氛圍下，施羅德吃的這一記耳光，就明顯具有社會不滿爆發的象徵意義。

中國古文化中有比德國失業者更出格的行為。宋包拯曾要懲罰皇帝，礙於君臣尊卑，下不了手，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把皇帝的衣服掛起來，用棍子打了三下，權充揍了皇帝的屁股。一出京劇“打龍袍”演的就是這個故事。現當代是沒有這種事了。老百姓只能用這個故事來聊為滿足安慰自己。

• 華盛頓的拆遷釘子戶

在美國華盛頓的馬塞諸塞大街上，有一片機器轟鳴的繁忙建築工地，一幢現代化的大廈正在拔地而起。但在建築工地的中央卻有一棟陳舊的小樓，與即將建設的大樓極不協調，小樓的三面都被建築工地包圍，深深的建築地基使小樓看上去像空中樓閣一樣搖搖欲墜。小樓主人斯普瑞格思先生 1980 年花 13 萬美元買下了這棟小樓，到 2003 年，小樓的市場價格升到了 30 萬美元。建築商一口氣成片買下了斯普瑞格思小樓周圍的房子，但在斯普瑞格思先生那裏卻碰了釘子，最後建築商提出了 3 百萬美元的高價，斯普瑞格思先生仍然不為所動，說了一個 3 千萬的天價就把建築商們拒在了門外。到了建築商要開工了，斯普瑞格思先生的小樓還是一個釘子戶。建築商最終放棄了與斯普瑞格思先生交涉，重新規劃了設計，在斯普瑞格思先生小樓的三面和上面建築開工，唯一要小心的是要保駕好斯普瑞格思先生小樓的地基，建築商在斯普瑞格思先生小樓的下面安了密密麻麻的支架，不能讓它倒了，否則麻煩就大了。（載：《博訊》006 年 5 月 11 日）

大陸有多少拆遷戶被逼至死或被直接打死壓死燒死或欺負到走投無路比死還難還苦還慘的！

- 西班牙小學生陪審員裁決華人無罪警察犯錯

西班牙某小城一華人飯店老闆夜半來到電話亭打電話，恰遇警察巡邏。警察讓華老闆出來出示身份證件。華老闆電話正說的起勁，晚了許多分鐘才出來，出來後又說證件不在身上，要警察與他一起回飯店看。警察正為華老闆的不在乎惱火，就推推搡搡了。華老闆則仗著自己有永久居留的身份毫不懼怕，與警察幹了起來。警察揍了他，還把他抓了起來，向法院告他妨礙公務。法院開庭，陪審員聽了雙方的陳述後，一致表示華老闆無罪。法院裁決華老闆無罪，警方應賠償華老板醫藥費損失費 5 萬西幣。警方不服上訴。法院再次開庭。這次重新開庭，法官從街上臨時找了五、六個男女小學生來作陪審員。小學生陪審員聽完兩造陳述辯駁完畢，一致認為華老闆無罪，警察錯了！警方焉了，不得不服判，賠了華老闆 5 萬西幣！

- 美國法律如是對待流浪者和黑人

紐約市政當局為了安置流浪者，修復了一些舊船來收容流浪者並且提供免費食宿。有一位被收容者住了一段時間，不習慣，認為不自由，於是重新流落街頭，在一些公共場所夜宿。市政當局就強制她不能夜間在外露天夜宿。結果，這位女士認為這種強制舉措侵犯了她的自由和人權，將市政當局告到法院。法院判決市政當局敗訴，必須給予這位女士自由流浪和食宿的權利，除非有專門法律規定的限制外，她可以自由地選擇她的流浪食宿方式。

美國有一《贊助性行動法案》。該法案是為了解決美國黑人在就業方面處於不利地位而制定的。該法案規定，一個社區內的某些類別的企業必須使其僱傭的黑人比例大致等於該社區全部人口與黑人人口的比例。但這樣一來，在招工考試中就有一些總分高於某些黑人的白人落選而一些低分數的黑人得以錄用。於是，就有落選的白人以此法案導致了“逆歧視”（相對於原來的歧視黑人而言）而進行了憲法起訴，理由是認為《贊助性行動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的自由主義精神和平等原則。這確實給最高法院出了一個難題，但判決是令人激動和信服的，判決詞的大意如下：“那些旨在糾正由於歷史原因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之不平等的種種努力，不能視為違背美國憲法精神。”如果我們想想美國黑人歷史上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由於平均相對不利的受教育水準以及社會歧視所導致的就業上的相對困難，就不得不真心敬佩這個正義的判決，也不難理解為什麼這個判決使得絕大多數美國公民心服口服。（據《博訊》“不信東風喚不回”文改寫。）

大陸廣東省警察將大學生孫志剛以沒有暫住證的罪名拘捕毆打至死，類似案例在大陸數不勝數。

- 美國百姓持槍合法

美國有一個持槍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美國民間老百姓持槍合法，只要登記在案就成。這是他們建國以來的傳統，要旨在於民間永遠要保留自衛的能力，以便在政府過於強大時，進行反抗。民間槍支、百姓持槍是針對政府而存在的。這恐怕是專制國度裏的人做夢也難理解的事。由於民間持槍合法，產生的弊病或慘劇時有所聞，特別是大學校園裏甚至中小學校園裏發生的槍殺案，不少無辜者死于歹徒槍下，令人痛心不已。但是無論這些槍殺案如何慘

烈如何頻繁（美國的新聞自由保證了這些慘劇一旦發生，馬上就會得到全面徹底的報導。其實，仔細數數，一年內也沒有幾起。）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能夠動搖美國持槍法案？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研究的問題。有人引用華盛頓韓戰紀念碑上寫著的話：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無價的）來說明堅定不移的緣由。——因為美國明白，那是老百姓為了保證自己的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個成熟的偉大的社會，是一個幸福的社會，更是一個清醒的、明白自己利益和價值所在、可以為此承擔代價的社會。

- 在西班牙開刀

肚裏長了腫瘤，需上醫院。醫院頗大，分門診和住院兩幢大樓。一踏進住院大樓，給人的感覺就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所有醫務人員個個面帶笑容和藹可親。入院前七天，必須進行一次全身檢查，醫院認定全部 OK，七天后才可動刀動槍。護士小姐給你一張入院須知：病人姓名、位址、電話、身高、體重、病因、入院日期，以及入院 3 天前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寫的詳詳細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唯獨少一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是否黨團員。

入院，一個病人給兩張牌卡，憑卡可在 24 小時內隨意進出病房。病人家屬下午 5 時至 9 時方可入院探視。但大門口不見看門人，手持小紅旗、臂帶紅袖章，有牌者進，無牌者攔。進出全憑自覺遵守規定。

底樓大廳有酒吧、餐廳、書店、商店、花店還有銀行自動取款機。另設與牧師、神父通話的專用熱線。只需一個電話，神父、牧師即刻火速前來為任何人祈禱祝福，完全免費。進入病房，更讓人賞心悅目。病房如同星級賓館，兩張床、櫃子、小型壁櫥，每張床前一架彩電，床邊一部電話和一副立體聲耳機與彩電配套、一張皮躺椅供陪夜家屬使用，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浴室兼廁所。電視機和電話採用投幣計數，童叟無欺。24 小時中央空調保持恆溫。住進這樣環境的醫院自我感覺體內的腫瘤已少了一半。於是冒出個新問題發問護士：“本院有無高幹病房？”護士答曰：“王子進院，與庶民同房！”原來這是國家（公家）醫院，千院一律。有錢人想住得更好些，到私家診所醫院去！

晨 9 時 45 分，手術開始。家屬在專設的客廳等候。麻醉前，主刀大夫微笑著對待宰的我說：“你這樣的小瘤我已割了一百多隻，不會有錯。”此話是否當真，只有天知道，可我聞言，心中竊喜，體內的腫瘤又小了一半。10 時 30 分，手術完畢。主刀大夫與家屬會晤，介紹手術情況，然後家屬提問，大夫回答，據說此形式乃法律規定，必不可少。

手術後的一日三餐，是由營養師根據病人的不同情況調配而制，高血壓的禁鹽，糖尿病的禁甜。由於配餐科學、調理得當、護理周到，5 天后我就可以出院了。金髮碧眼的護士小姐給我一本印刷的非常精美的文件夾，翻開細閱，第 1 頁是我的病情及手術情況的記錄，詳細之至，某月某日某時某分手術、某時結束、主刀大夫姓名、割了什麼、多大多重等等。第 2 頁是問卷調查，提問不下百例，上至主治大夫，下到清潔員工，醫院環境、管理方式等等。有意見者，可以隨便提。遍檢文件夾，就是找不到“表揚”欄目，方知這調查只准報憂不得報喜。第 3 頁為彩色版，介紹醫院的醫療範圍、醫療成果以及醫院縱向橫向的聯繫範圍，還有院長大人每週一次直接接受病人投訴的時間表。第 4 頁是告知我在住院期間所化的手術費、病房費、針藥費、護理費、膳食費共計為 135 萬 7 千西幣。末尾一句話讓我懸著的心放

了下來，眉開眼笑起來：“上述費用全部由西班牙王國國家保險局支付，敬請垂注。”我知道這“敬請垂注”的潛臺詞是：“別忘了黨國的恩情！”遵命，本人今生不忘，來世也忘不了。（原載：西班牙《華新報》1999年4月7日12版 王方“在西班牙開刀”文，略有刪改。）

• 語文錯誤的不同結果

前美國副總統奎爾因為把“土豆”這個英文詞拼寫錯了，成了媒體上永恆的笑料，被報導批評嘲諷了不知多少次。他的仕途結束，都和這件事有相當的關係，因為選民普遍認為他笨。英國教育部長也是用錯了一個詞而在媒體批評嘲諷下辭職以謝國人。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在歡迎宋楚瑜來訪時不識宋贈禮上梁啟超七律的“俦”字。

主管宣傳、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深圳觀劇時問“夸父是什麼人？”

現國家元首胡錦濤在記者問他讀過那些說俄羅斯的文學名著時，答曰：《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廈門大學副校長潘世墨念連戰贈字上的“巒宮”為“黃宮”。

他們的主席、常委、校長的位置穩如泰山。

• 一頭美國牛與一頭中國牛的故事

據路透社報導，數十名駕車者向佛羅里達州公路巡邏隊報案，聲稱一頭牛被困在泥濘中。警方迅速趕到，發現牛在的那塊田野上確實佈滿泥濘，而牛並沒有被困住，或許曾被困住過，而現在正在自由自在地吃草，絕無安全問題。但是，牛急待救援的消息吸引許多車輛各種車輛仍然絡繹不絕地趕到現場。許多人把車停在公路邊上，希望能為拯救這頭牛盡自己的一份力。路肩上停滿了，就只好停在路上，結果造成第一次大塞車。為了疏導車輛，交通管理部門在現場樹立了一塊告示牌，閃爍的燈泡組成的文字是：“牛平安無事”，以便讓那些關心牛安危的駕車者趕快走人。這一招很靈，人們看見這塊告示牌，又看見牛正在安詳地吃草，便不再逗留，公路成功地被疏通。但鬧笑話的是，在牛吃飽了並離開了那塊田野之後，交通部門沒有及時把這塊告示移走或關閉電源。許多人看見了告示，卻看不見牛，莫名其妙，就停下車來研究“牛平安無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或者牛已經被陷進泥濘裏了？這就造成了第二次大塞車，最後使得公路上被阻塞的車流長達好幾英里。

據《世界日報》發自桂林的消息，“亞洲動物基金”創辦人謝羅便臣在香港舉行的一個記者會上表示，她曾親眼目睹桂林一家動物園以活豬活牛喂老虎的血腥場面，並播放了現場拍攝的錄影帶。從錄影帶上可以看出，觀眾坐在“鬥獸場”外，觀看老虎活吃豬牛的節目。先是吃豬，兩隻老虎輪流用利爪把玩小豬，嚇得小豬屁滾尿流，最後被咬斷喉嚨。真正恐怖的是老虎殺牛表演。一頭巨大的公牛被兩隻老虎猛抓，背部被撕開，鮮血湧流。老虎不斷從牛背上狠狠咬下肉塊，還撲在牛背上舔血，其慘狀令人不忍卒睹。更為可怕的是，工作人員為了分開虎牛，以便增添觀眾的興頭，竟然開著車碾過牛身體，那頭可憐的牛居然還站了起來，鮮血淋漓地繼續躲避，整個“鬥獸場”裏淌滿了恐怖的血跡……參觀者中，竟然還有一群由老師帶領的稚齡學童。（據《博訊》鄭義“一頭美國牛和一頭中國牛的故事”改寫。）

• 李肇星在美國人面前的怯懦

4月16日《華盛頓郵報》在B2版上以罕見的篇幅刊登六幅彩色照片，其中三幅是中國

駐美大使李肇星；另三幅是美國眾院多數黨共和黨黨鞭湯姆·第利，非常牛氣。照片邊上的說明文字是詆毀中共獨裁者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

第利對李肇星說：

Don't take the weakness of this president as the weak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下面是翻譯文字：

不管是遇到獨裁者、共產主義者還是暴君，他們都只懂得兩樣東西：力量和決心。當你直面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退縮了……我給你們講個小故事……我參加 MEET THE PRESS 電視節目，那時中國駐科索沃（議員口誤）大使館剛剛被炸，中國大使在我前面出場。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他是個讓人討厭的傢伙 OBNOXIOUS FELLOW，他在那裏大喊大叫地嚷著說美國人多麼的壞，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點。然後他下場了，該我上場。我故意地走到他跟前，擋住他的路，並伸出我的手。他很樂於和我握手。我抓住他的手，用我最大的力量使勁捏他，而且猛地把她拉了一把。我說，“不要把這位總統的軟弱當成是美國人民的軟弱。”他有點滑稽地看著我，於是我把他拉到面前，鼻子對鼻子，一字一句地重複道：“不一要一把——這位總統的一軟弱——當成是一美國人民的一軟弱。”他就那麼轉過身走開了。他的腿都要癱了。我猜想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待過他。後來，在演播室外面……我走過去站到他身旁，一句話也不說。他正在那裏喋喋不休地亂罵美國 RANTING AND RAVING ABOUT AMERICA，然後他一轉身，看著我，馬上就溜走了 JUST SCOOTED OFF。這表明，如果你面對著小霸王 BULLY 勇敢地站起來，而不是給他磕頭，那個小霸王就會被嚇跑，再也不敢招惹你了。而我就是這麼看這些人的。（原載：《博訊》）

• 福建莆田少林弟子大戰西班牙警察

1997 年秋天某日，馬德里一地鐵口發生一老一少兩個警察與一中年華人對決武鬥的鏡頭。原來這華人是從福建偷渡來的，尚未辦成綠卡，沒有身份證件，在地鐵口賣香煙糊口維生。這個地鐵口，是武某與南美人、黑人吵架打架後爭來的地盤，他每月能從這地鐵口賣煙獲利近 4 千美元。武某視此若身家性命。武某的家人在美國，他要攢夠 4 萬美元偷渡美國。所以，他在地鐵口做香煙生意，態度特好。日長月久，地鐵口上上下下的旅客、來來往往的行人都同他熟了。這個地段的“片警”也憐憫他，開眼閉眼。沒想，這一老一少新來的警察公事公辦，不僅趕他走，還要沒收他包裹的香煙。語言交流不暢，推搡間就動起武來了。從地鐵口打到地鐵月臺上，從月臺上又打到地鐵口，警察的手機被打掉了。圍觀的人群越來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乎異口同聲喊叫：“不要臉，兩個打一個！”有婦人曰：“他總要吃飯嗎，要活嗎，賣香煙最可憐了嗎！”老警察被武某用拇指食指鎖住了喉，動彈不了，少警察則掙扎脫出戰圈跑去打公用電話求救。當時圍觀人群已是人山人海。剎那間，幾十輛警車絡繹不絕鳴叫著開來，包圍了整個街區，連直升飛機也出動盤旋在上空。

武某乖乖就擒。沒料想，許多圍觀的西班牙人南美人黑人要隨警察去做人證。武某在警察局待了兩個小時，說清了情況後，就被放回來了，仍舊賣他的香煙。天大的一場中西“風波”、襲警“暴亂”就如此消弭於無形。

筆者 1997 年冬與武某同租一房住，聽他講秋天發生的戰事甚詳。武某系莆田少林俗家弟子。他說那兩個警察不是他對手。警察真的揍他，他則手下留情，只是擋格防衛，不敢真

的打警察。那兩個警察應該心中有數的。在警察局裏，警察一點也不凶，絕沒打他。

-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計劃經濟束縛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場才能引向發展。

我找到了自己為了實現同樣目標的夥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他們為擊敗共產主義立下了大功。

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2000 年以後世界將迎來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但是卻有巨大的障礙阻礙著人類走向和平與富強，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巨大的學潮時我正在北京，當時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要垮台了。我很想對巨大廣場上的示威者們講話，告訴他們，要他們堅持住，我們同情他們，中國也必須改革。但中國的領導不同意。這是極大的遺憾，要是中國領導的共產主義垮臺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義的道路上會前進得更遠。

我想在同樣的國境線內保留蘇聯，但是作為有另外名稱的民主國家。我未能成功。葉利欽權欲薰心。他沒有任何民主的理念。他瓦解了蘇聯。同時也製造了混亂和所有的困難。缺少了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和高加索國家，俄羅斯將不再是世界大國。那兒將持續不斷地混亂。那是些沒有理想的國家。這理想就是西方國家的理想：市場、民主和人權。

當葉利欽瓦解了蘇聯、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我沒有哭，因為我達到了主要目的，這就是在歐洲消滅了共產主義。然而，阻撓人類在全世界實現自由理想的亞洲的共產主義也應當被消滅。

蘇聯的解體對美國是不利的，因為美國在世界上失去了能作為唯一的民主國家（我指的是蘇維埃主權國家聯盟，簡稱蘇聯）保存下來的夥伴。沒有了夥伴，美國就被“世界統治者”的幻想所迷惑。歐洲和全世界的小國都競相最大限度地討好美國，這是個錯誤。只有與沒有了共產主義的民主的蘇聯的夥伴關係，才能使美國消除“世界政府”的幻影。人類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將是漫長的，但將來是成功的，整個世界應當消滅共產主義。（據大陸《真理的追求》編者按：這篇講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之驊提供材料，外資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周尊南教授翻譯。）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說：“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

- 美國軍隊裏的種族歧視

一位叫周沙的中國貴州人 1994 年在美國海軍服役。美國人中士克茲和周沙吵架。一言不合，克茲沖著周沙大吼道：“我知道你他媽的在我的背後議論我，”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什麼能夠真正讓周受到打擊的髒話，終於他重重地加了一句，“you fucking gook.”。

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 *gook* 這個詞的意義是什麼，這個詞是用來辱罵亞洲人和亞裔的，其在程度上等同于罵一個黑人“黑鬼”——*nigger*。

周沙知道大多數在旁邊圍觀的同事們並不知這個詞，就決定首先讓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周沙先正式地稱呼了克茲的軍銜，然後靜靜地用很清晰、令所有在場的人都能聽得見的聲音說：“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你剛剛罵了我 *gook*，你知道當你罵一個亞裔 *gook*，完全等同於罵一個黑人 *nigger*。”所有在場的人都怔住了，大家開始明白了事態的嚴重性。

那兩位與周沙談笑的同伴站在那裏，仍然在思考著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一位好奇地說：“我們都取笑了他，幹嘛他只沖著你大嚷大叫？”周沙毫無表情，冷冷地說道：“因為你們兩人都是他媽的白人，只有我是他媽的 *gook*。”

在美國軍隊的軍規裏，任何有關種族敵視的言語，都會受到極重的懲罰。軍隊裏把這種規定叫作“零度寬容（Zero Tolerance）”。這件事如果彙報上去，讓司令官知道的話，克茲的下場會很慘，會被立即踢出軍隊，沒有榮譽退役，失去軍人所享有的所有優惠待遇，而且對找工作也會有很大麻煩。

周沙等了一天，希望克茲前來道歉。那就可以不對此事追究下去。因為雖然克茲罪有應得，但是他的家庭，老婆和孩子卻很無辜，不應該因為他的不負責任而嘗到苦果。周沙在猶豫中度過了一整天，沒有等到克茲的道歉。周沙為難了：既不想讓無辜的人遭到牽連，又不甘心讓作惡的人逍遙自在。

周沙徵求好朋友喬的意見。喬既覺得克茲應該受到懲罰，又同情他的家小。喬說：“美國這個社會裏，有些人還是帶有種族偏見。也許當你回到平民社會中，你會碰到不少人會試圖這樣冒犯你。你不能太把這些話當真。”

周沙不由得想起華人同胞常用的方法：大人不計小人過，不和那種人一般見識，就當沒有聽見就行了。周沙天神交戰，最後決定不對惡行寬容和姑息。在無論多大的惡勢力之前，絕不低頭！周沙對喬說：“當我身為軍人的時候，我不得不按照軍隊的規則去做。但是如果我恢復我的平民身分的話，如果有混蛋敢那樣冒犯我，我會簡簡單單地砸扁他們的腦袋。”

晚上，周沙向頂頭上司總上士傑弗瑞報告了這一事件。

幾天後，沙德森少尉通知周沙，司令官已經知道。沙德森少尉很理解我在選擇上的兩難。他安慰我說，現在這一事件的發展已經和我如何選擇毫無關係。即使我不準備對此事追究下去，他也會向上級提交一份報告。因為種族敵視事件是軍隊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一級軍官對這類事情進行隱瞞和拖延，都會受到軍紀的懲罰。談到克茲中士的命運，他聳了聳肩膀：“他是罪有應得。這種事情是沒有藉口可以原諒的。”（據《博訊》周沙“美國大兵裏的黃面孔”改寫。）

• 英國首相布萊爾畫像的用途：沾口香糖殘渣！

倫敦因為吃口香糖的人太多，以至於大街上的牆面和看板子上黏了很多口香糖殘渣。這不僅不衛生，而且很不雅觀，但卻屢禁不止。這本是小事，卻引起“日理萬機”的英國首相

布萊爾的“深切關懷”。布萊爾下令把自己的大幅照片貼在倫敦的大街小巷，讓路人把口香糖殘渣黏在他臉上。此招一出，也引起其他黨派政客們的興趣，爭相效仿。他們甚至把這當作一種榮耀，認為誰臉上的口香糖殘渣越多，說明不列顛的公民們越喜歡他。

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被湖南3位年輕人用顏料雞蛋潑汙了。3位年輕人被法院分別判處終身監禁、20年、15年徒刑。

• 西班牙政府幫華人打官司討回公道

2004年，筆者在馬德里開了一間糖果鋪。小孩子、吉普賽人來順手牽羊的不少，防不勝防。西班牙的法律是偷竊5萬西幣（約400美元）之內的錢物沒大關係，不算偷，不會判刑。我隨和，開眼閉眼。妻計較，就經常與人吵架鬧事，卻因語言不通，有理也說不清，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妻就更放不開，對人更厲害以至也經常冤枉人。有幾個半大的孩子記仇了，老是來惹是非。一次發展到罵妻，筆者出面護妻，推那個半大孩子S出去。S跑到馬路對面，撿了塊大石頭扔過來，砸傷了筆者大腿。過後幾天，還帶著一個同夥，拿著一把自製的土槍來小鋪威脅。此後，一些小孩子、小流氓見我們好欺負，就不斷地來騷擾偷搶糖果零食。我們報警，警察來了，他們跑了。如此有幾十次之多。我到警察局報案記錄的就有七次。一位西班牙友人抱不平了，在第三次陪筆者上警察局報案後，寫了一張申訴狀，連同警察局也給告了。筆者卻渾然不知。在筆者被石塊砸傷後的四個月，收到了法院的傳票，讓筆者去一趟。原來是詢問筆者被半大孩子S砸傷的前前後後事。再過了兩個月，筆者又收到傳票，讓去法院做證人。原來是警察局正式把S告到了法院，警察要筆者來指正S的偷盜、流氓、打人、持槍威脅的事實。那天法庭上的翻譯是一位臺灣女孩，不太懂法律，我們之間的溝通有障礙。筆者直到退庭了，才明確地認清了自己的身份和權利。整個過程只能揣摩著應付。公訴人和法官一再問筆者是否要求賠償。最後筆者只要求道歉，不要求賠償。再過了兩個月，判決下來了。因S在犯事時未成年，判他在少年勞教所勞動半年，晚上可以回家。這以後，小鋪平靜了大半年。S還是會來買東西，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神態，但規矩老實，再不鬧事了。

為此，筆者從心底裏很感謝西班牙，感謝西班牙政府，感謝西班牙警察法官，感謝那位西班牙友人，也感謝半大孩子S！

這樣的事在大陸是天方夜談。筆者要不是親歷，也難以置信。西方的法治與中國的人治只差一個字，相距何啻天壤！

• 美國90歲老太的長征與被捕

一位祖母級的老人，90高齡的老太太桃莉斯·漢道克，為呼籲“改革競選經費”而步行長征5100公里，從太平洋邊的加利福尼亞州，向大西洋邊的首都華盛頓進發。

桃老太在1999年1月開始從西海岸的加州出發，每天走16公里左右，方向是首都華盛頓。90歲的她彎腰駝背，穿著一件醒目的背心，扛著一面小旗，沿著公路步行。桃老太的“步行式政治表達”通過電視和互聯網傳開，她也成了名人。過往的汽車，都會鳴響喇叭，向她招手致意。在她經過的城鎮和鄉村，她發表演講宣揚自己的改革主張，也向許多政界人士表達自己的意見。民眾支援她的方式，常常就是陪著老太太走一段。她就這樣，經過一年

多，跨越了 12 個州，還曾經因為在穿越沙漠的時候脫水而住了幾天醫院。她始終不肯放棄，最後終於成功地步行來到東海岸的首都華盛頓。

當她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所有歡迎她的記者和人群，都為 90 高齡的老太太頑強堅持自己的政治表達而感動，她自己則笑著對大家說，我可是個老太婆了，假如我過幾分鐘就倒下去死掉，大概誰也不會覺得奇怪。不過她可是精神神地走進了國會大廈，並且發表演說。她對國會議員們說：“你們怎麼敢以為老百姓就不關心？”可是，在聯邦國會大廈裏，桃莉斯老太太讓警察給抓起來啦。因為她犯法了。

美國法律有個規矩，那就是：國會大廈是立法重地，在那裏，立法的國會議員們，只要在這個屋頂之下，說什麼都可以，怎麼說都不犯法，都不會被逮捕被定罪。他有立法豁免權。而你若不是國會議員，就不得在這裏發表任何政治演說，不能有任何政治示威的行為。假如做了，就是犯法，警察就有權抓你。這是一條執行很嚴格的規矩。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平等”的規矩呢？

那是為了保障立法者能夠在絕對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把他所代表的那個選區的民眾意見，順暢地說出來。你想想，假如一個立法者說錯什麼，有可能被逮捕被定罪，他當然就不可能對一項立法毫無顧慮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了。所以第一條顯然是必須的。可是，民眾為什麼就不能在這裏表達自己的政見呢？這也是為了讓立法者的表達不承受壓力。立法就是立規矩，必須是公正的，長遠的，顧及全社會全體民眾的長遠利益，而不是誰的嗓門大就偏向誰。因此，立法應該是“利益中性”的，是理性的過程。如果讓議員們身處狂熱民眾的實際包圍之下，這個理性過程就難免轉變為非理性過程。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法國大革命時期，俄國十月革命時期，都發生過議員在那裏立法，民眾沖進議會大吼大叫的情況。更有甚者，民眾甚至軍人在那裏持槍威脅立法者，甚至用武力驅趕議員。走到這一步，所謂民主當然就全玩完了。

正是為了杜絕上述情況，民主國家才立下上面的規矩，國會大廈裏面是不允許民眾進行任何政治表達活動的，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表達的是什麼。想演講，想表達，想示威，得上外面去。到了外頭，隨便你是什麼人，隨便你表達什麼，怎麼都行。既然有了這規矩，就得嚴格執行。結果，不聽警察勸告的桃老太和她的支持者，就在國會大廈被警察抓起來了。警察不抓都不行，他們不敢開這個先例。

誰都知道桃老太沒有惡意，再說，還是個 90 歲的“長征記錄創造者”。大家都敬重她。可是，並不能因此就壞了規矩。法律的特點，就是沒有例外。所以，桃老太還是必須接受逮捕和上法庭。聯邦法官升堂開庭，該怎麼審怎麼判，還是得按規矩來。不能看在是祖母級的老太太份上，就破了規矩，因為規矩一破就沒有個頭，人家也要找理由破上一回，否則不就是不公平了嗎？規矩一破，這法律就不成法律了。

桃老太特明白，所以一開庭她就“認罪”，趁著“認罪”的機會，她又在法庭陳述中，滔滔不絕地表達了自己對政治改革的看法，對“民主”的認識，給所有在場的全是孫子輩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記者和看熱鬧的，好好地上了一堂經典民主課。

法官也挺有意思，判處她“囚禁已關押之時間”，多少時間呢，沒說，反正她是正式逮

捕過了，就是一分鐘也算是“已關押之時間”了。她和她的支持者們立即“刑滿釋放”，每人判交十美元法庭手續費。

這判決，大家都覺得公正。仔細想想，沒有比這判決更英明的了。判完以後，也就是按規矩做了之後，法官恭恭敬敬地把桃老太請到自己辦公室裏，表達自己對老太太的敬意。就是在那個時候。法官對她說：“我們美國的許多法律，就是由象您這樣堅持不懈地努力著的普通人所促成的。”

記者報導說，法官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和周圍的人，眼裏都閃著淚光。

• 也是東方的韓國人看中國人

貴國在一些基本的禮儀和道德上甚至還遠不如那些比貴國貧窮的多的國家。無論我在上海街頭還是北京街頭，我都很少看見有人能夠排隊上公車，路面上往往很骯髒，行人隨手把垃圾和廢物扔在街頭都是很隨意的事，更讓我驚訝的是貴國人居然會隨地吐痰！這在其他國家都是很粗魯和失身份的事情，可貴國卻能大大方方地做！有一次我在上海南京路上看見了一個美麗少女當著她的男友的面把痰吐在地上，這樣的女孩如果在韓國那是一輩子也嫁不出去的，我們也不可能有這麼粗魯大膽的女孩。還有就是貴國衛生習慣太差，往往貴國國民在非夏天以外的季節每星期只洗一次澡，這在愛好清潔的國家是無法想像的。世界普遍是每人每天都洗一次澡並洗頭。愛清潔也是一個人體現個人修養和文明的重要方面。此外還有沒有謙讓，愛吵架。我在貴國街頭，公車和商店經常看到有人為了一點小事吵架起來，甚至還有男士主動和女士吵架的，難道貴國國民真的就沒有這點風度嗎？中華文明的寬容在哪里？在我們韓國，日本和新加坡嗎？我很難過。

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往往是貴國的網路上民族愛國主義很強烈，看起來大家都愛國都很仇視日本。

可在現實中，在我看到的這五年裏，情況卻似乎正好相反。看起來貴國國民在現實中不但不仇日，而且還對日本有著很好的感情。我認識的北京和上海的中國同學大都比較喜歡日本和韓國，尤其是日本。滿大街的日本汽車和滿商店的劣質日本電器讓我很迷茫，我想到那些可惡的日本企業在二戰時欺壓中國勞工，現在還抵賴這段歷史，中國人不恨他們嗎？！那些可惡的日本企業在中國有那麼多的資產和市場，居然還敢和中國人作對不怕中國人抵制日貨報復，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呢？！哪位中國朋友能夠告訴我！網路上那麼多豪言壯語，可當可惡日本人修改教科書的時候，當他們公然侵佔貴國釣魚島的時候，貴國國民拿出什麼實際行動了嗎？有人和我們韓國人一樣上街了嗎？有人和我們大韓勇士一樣切指抗議了嗎？沒有，有的卻是貴國一個著名的女藝人穿著日本軍旗走在了美國街頭。我知道你們憤怒，可憤怒卻不願拿出行動，我知道你們愛國，可愛國卻不願犧牲！即使堅持購買國貨那也是一種愛國的犧牲，可你們做到了嗎？！貴國人民是真的仇恨日本人嗎？！貴國“舍利取義”的古老偉大精神在哪里？！也在韓國嗎？

另外一個發現是，外國人，尤其是那些來自富裕國家的外國人或留學生，在貴國總能夠受到一些特殊的禮遇。當然我沒有享受過，因為我一口流利中文加上很“土”的長相和開朗的性格，連我的最好朋友都當我“本國人”看待。反而是那些中文不流利，脾氣又很壞的日本學生備受歡迎。每天他們周圍都圍了一大群人，貴國學生像小學生一樣問上問下的，還總

愛當面把自己國家和日本比較，然後得出結論自己國家一無是處。日本留學生無論長得多醜脾氣多壞都會受到許多貴國美少女的歡迎，我知道她們想嫁給日本人然後脫離（或者說背叛）她們的祖國。往往我很反感這種低三下四的人，作為韓國人的我覺得這樣的人不能稱作中國人，他（她）們是貴國的恥辱，可讓人難過的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一個長得很凶的日本學生曾下流的對我單獨說：“你要學會耍帥，當著這些中國賤女人的面用錢，她們就都跪倒在你面前求你“上”她們了。”我很反感他說的話，後來有一次我在學校旁的餐館裏看到那個日本學生當眾調戲一個中國女生，他對那個女孩說下流話還要去摟她，還非要她喝完自己的酒。那個女生已經開始哭了，她想反抗卻又似乎害怕，而她周圍，也就是那個日本學生周圍的我的中國同學們，居然全在那兒看笑話！沒有一個上前阻止，有幾個居然還幫著那個混蛋日本人起哄要那個女孩服從！我實在看不下去，就上前拍拍那個混蛋日本同學的肩膀，嚴肅地要他規矩點，否則就要通知警方了。他才放開了那個女孩。事後有個在場的中國人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樣的，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原載：《博訊》）

• 中美市長互邀訪問的慷慨與吝嗇

中國威海市崔市長，美國來得蒙得艾文市長通過電視相互對話，交談各自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這是北京中央電視臺“讓世界瞭解中國”節目裏的一個鏡頭。

美國艾文市長在高興地接受了中國崔市長的邀請之後，“吝嗇”而禮貌地表示她訪華的盤纏還沒著落。艾文解釋她的辦公費用來自於市民的納稅錢，每一筆開支必須對她的市民負責，訪華的費用將是一筆額外開支，不在辦公費用之列。所以她需先向有關企業募捐，獲得贊助後，才能前往貴國看望你崔市長。艾文態度自然、懇切，語調溫和親切，無絲毫尷尬作態。

中國崔市長也高興地接受了美國艾文市長的訪美邀請。崔市長也發表了對應的講話。對於自己的旅行費用沒有半句閒話，對艾文市長的歎苦“吝嗇”，則慷慨大度地表示他可以支付艾文市長訪華的一切費用。在節目主持人的提醒穿插之下，就費用的細目一一予以落實。崔市長慷慨未盡，主動再提向艾文市長贈送衣服禮品。崔市長的態度當然也是自然、懇切，語調更是大度大器大方。艾文市長眉笑眼開，不忘幽上一默：當晚就要打包上路。

如此比較一番之後，中國分處中美兩地的一男一女主持人鼓掌歡呼，中央電視臺現場全體觀眾熱烈呼應，掌聲大作。

• 中國人習慣性的行賄動作在西班牙海關的遭遇

今年9月30日，上海一大學教授在西班牙海關向警察行賄被捕。

W先生，今年59歲，是上海某著名大學的教授。女兒在滙豐銀行工作，女婿在上海某外資公司任職。家庭富裕，是令人羨慕的小康之家。今年國慶大假期間，W先生一家決定到歐洲度假，度假的方式也是採取國外白領階層常用的旅遊方式——自助式度假。準備在西班牙、法國等地旅行15天。

9月30號，W先生一家人乘飛機抵達了西班牙旅遊聖地馬拉加（MALAGA）機場。在

出海關時，被海關警察攔下。警察先檢查了他們的護照和簽證，發現他們持有的是旅遊簽證，卻帶有大量的行李。於是示意他們打開箱子檢查。箱子打開後，警察發現他們攜帶了大量的食品，不僅有大米、麵條以及中式的速食食品，甚至還帶有鍋碗瓢盆等炊具。按照西班牙海關的規定，每人只能攜帶 1 公斤的食品入境。於是警察告訴他們食品不可入關，按規定應該全部沒收丟掉。W 先生的女兒和女婿用英語與警察交涉，未果。警察堅持不丟掉所帶食品不得入關。就在這個時候，W 先生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了一張 50 歐元的鈔票，遞給了他面前的警察。警察大驚，立即將 W 先生請進了機場的法警辦公室。

馬拉加海關警察認為，W 先生企圖用錢收買警察。於是警察以“行賄罪”拘捕了 W 先生，並讓 W 先生在逮捕令上簽字。簽完字後，W 先生被警車直接送到了監獄。

W 先生的女兒女婿根本沒有想到事情會如此嚴重。當警察正式通知他們：“W 先生被捕了，你們可以出關了”的時候，他們驚呆了。

於是，自助旅遊變成了營救總動員。W 的家屬輾轉找到了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領事部的林主任。正在休假的林主任告訴他們，如果人已經被關進監獄的話，應該找律師去交涉。於是，他們在當地聘請了律師，希望能通過律師把 W 保釋出來。然而，律師無法找出對 W 有利的證據，而從警方提供的機場錄影中，卻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W 掏出 50 歐元欲給警察的動作。於是律師要求保釋的訴狀被駁回。

為了讓 W 儘早出獄，律師和警方、法院進行了協商，達成了妥協的辦法：將 W 先生“遣送”回國。於是，W 在西班牙監獄中“旅遊”了 21 天后被“遣送”回國。按照西班牙法律規定，被遣送人必須由警方代購指定航班的機票，所以，W 的回程機票只能棄之不用，而另花費 800 歐元重新購票。其實，西班牙警方不用 W 自己的機票，是因為厭惡 W 的行為，有點故意整蠱的味道，但絕沒有越出法律規定之外。

第十四章 李敖演講榮辱談

2005年秋天的北京大學，請來了頗具爭議的人物李敖來演講。

北大請李敖和北大為什麼請李敖以及李敖值不值得北大如此隆重邀請接待與李敖在北大演說的實際情況是兩碼事。前者是另一個問題，本章單論後者。

李敖的北大演講和人們對此的反應議論，十分有趣，簡直妙不可言！或能予人性文化制度的關係作出深層次的詮釋。

李敖北大演講後，直接聽演講的北大學子的反映大陸媒體極少見，幾乎沒有報導，只能從其他的文章報導中獲知一鱗半爪的訊息，都是正面的，也就是與官方相異其趣的肯定和讚揚；當局的反映則是哭笑不得，封鎖不見報，且對李敖予以暗示警示以後清華復旦的兩場演講須收斂；李敖的老闆鳳凰衛視在原先大肆渲染後鉗口噤聲了，只作了一分鐘的報導；西方主要媒體不多的報導評論文章肯定稱讚了李敖的演講，鋪天蓋地激烈的反應議論則是海內外華人知識人發出的，幾乎是眾口一辭地嘲笑、諷刺、批判、不屑、斥責、謾罵。我尋找過華人知識人叫好李敖北大演講的文字，在汪洋大海般的罵文中只找到了5篇。

為什麼反應如此迥然不同？海內外華人對李敖北大演講的斥責反應基本上同中共一致了，不大一致的地方是中共還不領情——因為罵文驚人地一致認為李敖“小罵大幫忙”。以往凡被中共打壓、封鎖、消音的訊息、書文，一般都會被肯定被傳播被讚揚的準繩在李敖北大演講上失效了，不僅失效了，還顛倒了。百思難解！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還需深究。

罵文中翻李敖舊賬，往性上揶揄消遣以至辱罵的，無須提了；義正詞嚴地批評批判的多是名見經傳的精英，沒有半字的欣賞理解諒解，全是全盤否定。明明白白的中共不喜歡的、害怕的、竭力封鎖消音的，實實在在北大學子大陸學子驚喜的、歡迎的、受益無窮的演講，為什麼就這麼被精英們所厭惡所討伐？究竟是怎麼了？

都說李敖討好中共，為中共歌舞昇平。這大約是罵文責李敖北大演講最大的罪錯。

先知先覺的顧准、遇羅克不管公開私下、著文日記，沒有不高喊毛主席萬歲中共萬歲的；

被割喉管的巾幗張志新、李九蓮，就是因為平時喊毛萬歲太多了，才為防止刑場上再來這麼一嗓子而割斷了喉管；

文人精英前輩胡風、聶紺弩、馮雪峰、巴金、沈從文、老舍、冰心、……全是既有情有義又不情不願然而總也高喊毛萬歲的專家；

敢廷折面爭的梁漱溟雖從不喊毛萬歲，卻也在公開場合不罵毛狂亂昏悖而說他領導中國走向強大；

中國良心劉賓雁也表示過願意“小罵大幫忙”的意思。

怎麼就全忘了五十餘年來大陸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可能公開痛罵中共的歷史？！

怎麼到了李敖，就不容他說幾句場面上的照應話？怎麼就這麼高標準起來？不妨設想一下，李敖應該怎麼說才能使罵者滿意。象克林頓、布什那樣，可以嗎？象連戰、宋楚瑜那樣，行嗎？多少讚美或應酬中共的話，無論出自誰人之口，都無妨，怎麼李敖一說，那程度成色還差了许多呢，就大逆不道了呢？就如此銖兩相較、摘章尋句、條分縷析、抽絲剝繭，非要落實挖掘出微言大義不可呢？

已經有13億人自覺不自覺地頌揚中共半世紀了；已經有所有到訪的中共客人N人次地吹捧中共了；接著還會有無數人次重複著這些肉麻愚蠢的言行。但是有一個象李敖這樣既作假捧卻真開罵的人嗎？

難道只有像李玉和、像楊子榮、像柯湘、象許雲峰、像黃繼光邱少雲董存瑞才行麼？

何況李敖那些借題發揮嬉笑謔罵中共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話是明白無誤的。誰能誰敢如此當著和尚罵禿驢？！6・4時絕食學生代表與李鵬對話，最大膽的吾爾開希也不過說：你比我們年紀大，稱你一聲李老師吧。把身踞總理高位的李鵬氣得坐在那兒一聲不響。吾爾開希與李敖的背景情況是迥然有異的，前者比後者有利的多多了。怎麼就能全然不顧這一切呢？怎麼就能全然視而不見北大書記主任聽講時如坐針氈，鐵青著臉、苦笑、澀笑、無可奈何的情景？！這可是在任何其它場合下能作大文章的好素材啊！所有的罵文都對此避而不談。

所有的精英們完全都有可能比李敖講的更好，但，只是可能，事實上沒有。李敖臨場發揮的巧妙，嬉笑謔罵，皆成文章，無人能及，至少已經過去的北大當代史、大陸當代史上還沒見到。為什麼會視而不見？

所有精英們的智商、文化水準都是一流的，不可能看不見上述這一切，只能說，是故意看不見，故意遺忘了，故意漏掉了，故意要這樣。除此之外，別無它解！

成見蒙蔽了一切，人性的醜陋導致了這一切。恕我小人一回。看到李敖，這個曾被筆者仰視後又視為小丑的人在北大的講壇上縱橫捭闔、談笑風生、扮豬吃虎、運用自如時，一股酸意湧上心頭。筆者的忘年交梁漱溟先生，一代大儒，曾是與胡適齊名的北大先賢，1924年離開北大之後，再也無緣回到北大講壇，無論他的北大情結有多深。現在被你這小子占了北大講壇頭指氣使，如入無人之境，豈不氣殺妒殺酸殺人也！當今與李敖北大演講過不去的精英們是否也會象筆者一樣地曾小人了那麼一剎那呢？我比你早了多少年（十幾年、二十年、幾十年）大罵中共；你罵的我早就罵過，且罵得比你好了多少倍；我罵得多辛苦，被監視被跟蹤被迫害被關押被迫殺被流放；我……現在倒好，你小子成了座上賓，如此風光……趕快打住！已有誅心之嫌，妄測他人動機，豈是鬧著玩的！不過，所有罵的內容我沒有不同意的，高明的如玩世不恭、機會主義，實際的如抓住痛腳尋開心“休戚與共”，等而下之的“打著紅旗挺紅旗”，不入流的涉及隱私的“快意恩仇”，或者就直統統指著鼻子罵“狂妄成精”。但是你總得多少對座：北大演講。開罵，要對著這個座位！否則，就成了無的放矢，無論罵得多精彩，也都是罵李敖，而非罵李敖的北大演講。

平心靜氣地來看李敖的北大演講，尤其是看一看錄影的實況，應該不難得出公正的結論。

對這件不算大的事，尤其是對於文化界知識人來說，確乎是大的事，在當今海內外華人知識圈中，就能如此扭曲，明明白白的一件大好事，可以大做文章的大好事，硬要群起而攻，把它打成最不利於自身的大壞事。是愚蠢、是人性的醜陋導致的扭曲，自然而然，無丁點做作，無絲毫勉強，全體一致，口誅筆伐。已經形成了一種氣候、一種格局，已經是一種習慣。遇有不同意見，還要再予批評。墮落莫過於此！痛心莫過於此！筆者在第一時間寫了一篇捧李敖北大演講的小文發表，就有幸被作為一個典型的代表挨批。承蒙批者是朋友，私下客氣地說我“糊塗”。我真願意是我糊塗而不是幾乎全體糊塗。

確實不是我糊塗，是幾乎全體糊塗。

沒有一篇文章，沒有一個人，為李敖欺負北大不平，為李敖踐踏北大痛心，為大陸的全體知識人被李敖頤指氣使、指桑罵槐、調侃消遣羞恥、憤怒。所有的不滿、罵聲都指向了李敖的風頭，指向了他真實的文治武功。

北大，是大陸的最高學府。北大，自有北大的尊嚴。北大的尊嚴由其兼容並包的自由思想，由其崇高的學術地位所奠定；北大的尊嚴也由其代表人物的人格力量所昭示，如蔡元培、胡適之、梁漱溟、傅斯年、馬寅初。李敖作為臺灣的文化使者來到北大演講，北大自應待之以禮，李敖自應明白為客之道，沒有放肆張狂到如此不把東道主放在眼裏的地步的。北大接待李敖的是黨委書記和一個什麼主任。這個時刻，他們是北大的代表，代表著北大，代表著北大的學子，代表著北大的地位，代表著北大的尊嚴。無論他們是否夠格，從普世的禮儀觀上，就是如此。李敖卻把他們當成小孩子一樣玩來耍去，一會兒說他們“孬！”還“太孬了！”一會兒說北大多幾個王八也不是壞事，一會兒要他們站起來學習馬寅初，一會兒，以妓女亞瑪作譬惡毒咒罵挖苦中共，一會兒又假作害怕，在講壇上回過身來問他們我說的對不對行不行。不僅絲毫沒把他們當北大的代表看，連主人、成年的大人也不是，純把你當成一個木偶來耍。欺負你到家了，說爬到你頭上撒尿都不為過。北大的書記主任孬，自在意料之中，但沒想到會孬到這步田地。他們不可能為維護北大歷史上曾輝煌過的自由思想學術地位做什麼，但他們作為黨的工具，為維護黨的利益，也是北大的利益北大的尊嚴，可以也完全應該對李敖還以顏色的。唇槍舌劍一下，象李敖那樣順手拈來、涉口成趣地反刺一下，不僅可以挽回一點面子，也可以請功邀賞，可以為北大留下一段軼聞佳話，可以一展自己的才華風采。可悲的是，他們什麼也沒做，只會鐵青著臉尷尬地坐在那兒。其實，他們是什麼也不會做。他們沒有這個氣魄、沒有這個能耐、沒有這個才具、沒有這個應變的機智。制度與文化決定了他們是黨的螺絲釘、是馴服工具，在沒有得到上一級領導的具體指示之前，他們只能只會畫一個圈蹲一個圈，萬難越雷池一步。他們只能是草包！李敖心知肚明火眼金睛，吃定了他們。正是他們，也正是我們的制度與文化，讓李敖的看家本領、無賴流氓的本色，派上了用場，發揮的淋漓盡致，可以說爐火純青，無人能及。

如果說，口才難與李敖匹敵，隨機應變不如李敖，那麼，在李敖談到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時，明顯地斷章取義、似是而非的時候，北大的實力是應該可以禮貌地予以指正或商榷的，學生們不行，還有眾多的師父。卻不見半個北大教授出來與李敖叮嚀半句。非不能也，實不可也！書記主任都鉗口噤聲，那輪得著教書匠置喙！還是制度問題，文化和人性則也起了點作用——圓滑成熟、明哲保身。這從有一位學生提出了唯一較尖銳的問題得到了證實——學生畢竟熱情有餘、血氣充沛而圓滑不足。

北大的書記主任如此，也就罷了，號稱自由知識份子的精英們不僅不見及此，挺身而出

當仁不讓責斥其狂維護北大，反從右面包抄圍剿過來，討伐李敖，大罵李敖討好中共、獻媚北大、奴顏婢膝云云。我不知道，被李敖戲弄的抬不起頭來的書記主任看到聽到這些為自己報一箭之仇的討李檄文時會作何感想。歷史就如此吊詭？不，是我們的文化已走向末路。精英們絕非故意忘了李敖侮辱了北大，是他們確實未見及此。不然，他們是不會如此認真如此負責如此一窩蜂地針對李敖的風頭和文治武功的。多年的習慣、見識、訓練囿於此。正是文化的局限，正是文化的悲哀，當然也包括了那麼一點人性的醜陋。鬥爭文化。正氣凜然。非此即彼。英雄模式。為民請命。不怕犧牲。視死如歸。求全責備。借機表現。葡萄酸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全身心浸淫在此，哪有空裕顧及其他。行文至此，我要對剛才小人之心猜度作出糾正：罵李敖北大演講的更主要的原因在文化，不是一剎那的酸意。再從某些精英們自己與中共當局對陣時十分注意策略，竭力避免刺激中共的周到萬全的算計上也可證實這一點。

如果再看看大陸體制內精英知識人的狀況，則更令人絕望——他們對此沒有聲音！愛惜自己羽毛到如此地步，還能說什麼呢？

從李敖的北大演講，我們看到了在制度的約束下，文化與人性墮落的另一面。

附文：

李敖北大演講摘錄。

.....

我在這兒有很多人眼睛看著我，說李敖罵過國民黨、罵過民進黨，罵過老美國，罵過小日本，今天你在北京，你敢不敢罵共產黨，很多人不懷好意，你看幸災樂禍看著我。我告訴你，我先不罵共產黨，我先讚美共產黨和國民黨曾經打倒的一個勢力，那個就是北洋軍閥。

為什麼讚美北洋軍閥，大家知道嗎？北京大學怎麼出來的，北洋軍閥，什麼人叫蔡元培校長做北京大學校長，那時候蔡元培他是國民黨人的身份，是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有這個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和他敵對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宿敵，那個就是黎元洪幹的事情。我們現在罵北洋軍閥，我們有什麼資格罵北洋軍閥呢？北洋軍閥的肚量比我們寬大得不得了。今天，把我李敖放這兒，來做北大校長，對不起，好象是搶副校長的位置，哈哈，否則，我們就不要罵北洋軍閥，我們要做歷史性的反省。

今天我在這兒和大家談一些事情，我出發以前，各方友好都勸著我，拉著我，說這話別提，那話別說，我說我來北大有兩類，一類是金剛怒目，一類是菩薩低眉，你們待我還不錯，今天開始菩薩一點。

.....

俄國一個作家叫庫布寧，他寫過一本書叫亞瑪，亞瑪是個什麼事故呢，在妓院裏面，大家都有在接客，忽然來了一個女孩子如花似玉，當然很多人願意跟她上床，也賺了不少錢，紅得不得了，一代名妓，有一天她跟其他妓女聊天，她說，我還是處女啊。其他姐妹們笑著說，你還是什麼處女啊，我們整天賣的是什麼啊，這個女孩說，你們知道我是什麼啊，我是共產黨，我們黨需要錢，俄國要革命，我是在做一個偉大的賣身，可是

在精神上，我還是處女。你們不瞭解我。

大家注意啊，有人說是唯物主義，可你現在談的全是唯心的，唯心主義，當我覺得我不是妓女，我就是處女，這是高度唯心的。有人問我，這是不是與馬克思不同啊，我告訴大家，馬克思就是典型的唯心論者，你們說他唯物嗎，我認為他很唯心，尤其在抄別人的東西的時候，更唯心。

你們說馬克思，我們北大還有馬克思學院，抄什麼東西，大家核對核對，英國首相格萊斯頓演講，馬克思資本論裏面捏造了格萊斯頓的話，馬克思說亞當斯密的話，亞當斯密沒說過這話。馬克思說，工人無祖國，這句話不是馬克思說的，這句話是法國大革命時候英雄馬拉講的話。為什麼我們都被馬克思騙了呢，最主要的是1895年，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寫封信給斯密特，說，馬克思親口告訴他，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自己都不信馬克思主義，我們那麼急幹嘛。

.....

今天我站在這裏，大家說，你要不要罵共產黨，剛剛我說過，我先替北洋軍閥講了好話，讓我替共產黨講一句好話，說你怎麼這樣敢為共產黨講好話，為什麼不敢，當共產黨作了好事的時候，或者說沒有做壞事情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把真相澄清出來，誰說共產黨不許別人講話，我抓一本書給你們看，誰說共產黨不許人講話《毛澤東文集》，當然你們會笑我你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其實不是，我給你們看一段蠻有趣的，這一段可能你們都不看，念給你們聽：我們有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鼓掌）有了錯，一定要有自我批評，一定要讓人家講話。不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今天我在這兒摸老虎屁股，但大家要記住，是老虎要我們摸它屁股的。

.....

我告訴大家，言論自由爭取以後是這個下場，那麼我們革命了，項羽可以這樣喊，你不能這樣喊，李自成也可以這樣喊，你不能這樣喊，項羽擁有武器，李自成擁有武器，和統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你一把紮槍，我一把紮槍，差不多。現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統治者，用機關槍，噠噠噠，坦克車，嘖嘖嘖，怎麼樣，一點招都沒有，輸了，所以我說，人民要聰明，爭取自由要靠智慧，大家看我這本小說寫《北京法源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源寺去看看，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去過能把這個小說寫得神龍活現，這就是文學家嘛，就幹這個的。

我講我的心裏話給你們聽，我一回頭看，除了我們的劉長樂老闆以外，主任及校長都不太笑，我一回頭看，就很緊張。他們不算本領，我在內地最佩服的一個人，丁大官人，叫做丁關根，你和他討論問題絕對不笑，臉繃著一路繃到底，我真的佩服。哈哈哈哈哈。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人和丁關根一樣了不起的，叫包公，包公特色，就是不笑，所以宋朝人當時有一句言語叫做包公笑，黃河清，包公要是笑了，黃河就清了，不可能的事情。

.....

今天我來到這兒，香港一句俗話就是“不是猛龍不過江”，我過江來了，我敢來，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敢罵國民黨、敢罵親民黨，敢罵小日本和老美，今天我來，不單

罵人，我也捧人，我捧了北洋軍閥給您看。

那個時候北大怎麼樣對待政府，教育部公文來了，退回，不看，拒絕，北大多狠，教育部的公文拒絕，教育部錢來了，錢收下來了。（大笑）現在的北大，太孱了，在我看來，太孱了，（鼓掌），哈哈，什麼原因，怎麼樣可以不孱，我們的書記站起來，我們的校長站起來，登高一述，像我們以前的老校長馬寅初，不就是這樣嗎。北大馬寅初幹了9年的校長，在國民黨時代被軟禁，後來在北大做校長的時候，本來一看是哥倆好，和毛澤東感情好得很，為了人口兩個人的看法變了，馬寅初說中國人這樣生下去我們不得了，我們的財政都被吃掉了。毛主席說，人多沒有關係，人多好辦事情，結果毛主席贏了，大家鬥馬寅初，從校長室，大家貼大字報，貼海報，一路鬥鬥鬥鬥鬥，鬥到馬寅初床前面的牆，都貼了大字報，可是馬寅初說我不在乎，我要幹到死，我要孤軍奮戰，我要幹到死，結果他沒有死，他活到100歲，別人都死了，他還活著。（鼓掌）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說今天從北大開始，雖然毛主席說，北京大學水淺王八多，是不是，說北京大學廟小妖風大，水淺王八多，不過，多幾個王八也不是壞事。（鼓掌）

我的講演其實講不完的，可是今天的重點，大體上就說到這兒了，這些書你們懶得看，我告訴你，我看得精得不得了，熟不得了，我念一段周總理的話給你們聽，你們見識見識：人民大眾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都可以存在，毛澤東的思想，當然要講，別的思想我們也允許它的存在。所以今天我要替共產黨講好話，大家口口聲聲說共產黨不讓人講話，是錯的，是一部分共產黨把毛主席周總理根本的精神給它過分緊縮了，才有今天的現象。所以我和大家說，共產黨有它自由的成分，過去被打壓是一個錯誤，所以我們總覺得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是錯的，我們必須說，整個的原因出在原來的馬克思那裏，可是現在我們知道都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請大家問問，社會主義不夠嗎？為什麼前面要加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不夠，不靈了，可是不靈了說不出口，加了一個帽子，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不是嗎？

我告訴各位，你們都不看毛選集，都有這段話，毛主席最後的一段話，你們聽了絕對會驚心動魄，我念書給你們聽：這些罵我們的，象龍雲，象梁漱溟，我們要把它養起來，養著他們罵我，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毛澤東思想裏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懂這個道理的，結果我們把它兩個凡是化了，把這一部分毛澤東給忽略掉了。

還有一個毛澤東你們知道它是誰嗎？我念給你們聽，共產黨是在歷史上發生的，凡是在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不許鼓掌，不許鼓掌（但仍有少量鼓掌聲），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嗎，我看很舒服，共產黨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他們消滅得早一點（鼓掌）。

什麼時候消滅，國民黨的一個大員，叫戴傳賢，他說周朝人統治八百年，我們國民黨要統治至少一千年，結果國民黨梗了，共產黨到今天還存在，我願意它，大家注意啊，我李敖說的，我願意它存在一千年，和我們是什麼關係，共產黨講兩手策略，一手是軟的，一手是硬的。他們抱著，我們也抱著它，共產黨不是講願意為人們服務嗎？我們就是人民啊，讓它為我們服務，辛巴達奇航妖島，就是天方夜譚裏的故事，辛巴達過河的

時候忽然有一個老頭子爬到他背上去，掐著他的脖子，幹什麼，讓他背著我，你跟著我走結果是星光大道，怎麼樣甩他也甩不掉。你要照顧他，我們希望共產黨活一千年，我們在它背上活一千年，抱著它，貼著它，哄著它，耐著它，奴役它，讓它為我們服務，有什麼不好。我們不服氣，要打，我講過，玩言論自由你們玩不過我，你們要革命你們玩不過坦克車，不要再走這條路，說我們不搞這些，那搞什麼，我們去梗了，去顛了，去得了，去崧了，去反了，用這種無謂的情緒，不健康的情緒在家裏生悶氣，拍桌子摔板凳是錯誤的。

.....

我講這一點很多人提心吊膽，包括我在內，人家說，你到大陸來要不要看長城，我說我可能沒上長城，先進了秦城。哈哈哈哈哈（鼓掌）

（載：<http://www4.bbsland.com/forums/politics/messages/1348854.html>）

第十五章 毛將焉附與獨立人格

毛澤東骨子裏看不起知識人，最不屑的嘲諷就是：

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的透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過去知識份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現在，知識份子附在什麼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呢？就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幹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現在五百萬知識份子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的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一句“五百萬知識份子是吃工農的飯”，從根本上摧毀了知識人心中自重自尊自愛自養自立的理念。毛澤東口含天憲，無論你服與不服，假服真服，絕大部分知識人是認了的。嘲諷知識人“韭麥不辨，五穀不分”的八個字以最大音量最廣形式的喋喋不休重複強調，使知識人忘了自己的發明創造可以取代千萬人的體力勞動，忘了自己所擁有的知識技能數學物理化學手術刀繪畫筆五線譜……則是窮一輩子也難盡其妙的，還徹底地忘了常識——半分鐘可學會辨韭麥五穀；於是真的自慚形穢起來，真的以為自己要靠共產黨養活。

於是知識人總認自己是毛，總是要找到一張皮來依附，才放心，才感到有了倚靠，才能高枕無憂，才會為皮的輝煌而大展其孔雀開屏的功夫。由此可知專制治下的知識人從整體上來說是服務於當政者的，是御用文人。他們淪為幫兇幫忙幫閒是最順理成章一點也不奇怪的事。

這樣的毛，沒有自己，只有皮，只有主人。清人汪中將知識人作為“毛”的無奈和可憐描述揭示的淋漓盡致：“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黃祖、袁紹袁本初是三國人物。現代政界的“毛”，時髦稱智囊、智囊團。胡耀邦下臺，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趙紫陽軟禁，幕僚們連更換門庭的可能也沒有了。

海外流亡者知識人也從根子上被毛澤東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洗了腦子，完全接受了做“毛”成“毛”的訓示。他們的身子離開了大陸，但是他們的心還是黨文化的俘虜。沒有皮，就覺得活不了。因此，就總要找皮依附。許多人許多時候，投靠無門，孑然惶然，衣食無著，時不時地流露出十足的可憐相、巴結相、不知所謂相。洋大人投靠無著，甚至會轉而試探走回頭路。1997年，屠殺學生和平民的罪魁禍首鄧小平死了後，海外知識人的表現是最可悲最可憐最令人沮喪的。

1997年4月號《北京之春》發了一期“蓋棺評鄧”專輯，共有十九篇評鄧大作，六篇集體的，十三篇個人的。絕大部分文章在批鄧、評鄧的同時都要為鄧頌功擺好，或為鄧頌功擺好時批鄧、評鄧。最能說明問題和表現出感情色彩的是對鄧死的用語。直截了當說鄧死了的六篇，其餘十三篇或說“逝世”、“去世”、“與世長辭”、“離開人世”，或挖空心思說“走了”，甚至有說“值得我們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溫情脈脈，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心態躍然紙上。

無論世人、歷史將如何評價鄧，無論中共將給鄧小平戴上多少頂桂冠，鄧小平作為中國民主的頭號敵人，則是可以蓋棺論定的。57年反右，66年文革，79年西單民主牆，89年“六四”，鄧小平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舉起屠刀，惡狠狠地砍下來。就這一點上，鄧之罪惡比毛有過之而無不及。“六四”死難者血跡未幹，冤魂未散，反右以來數百萬以至數千萬志士仁人、無辜民眾受苦受難受罪的慘狀猶歷歷如在目前，何能對鄧這一罪魁禍首評功擺好！無論以何為藉口，全面也好，客觀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寬恕也好，都是對死難者和自己的背叛和侮辱。等鄧氏同夥及其家族，等中共對此那怕是有一丁點的認罪、懺悔、歉疚，我們再來全面、和解、客觀、公正，再來寬恕，難道就遲了？難道就來不及了！試想，對希特勒，會這樣遣詞造句嗎？對史達林，會如此情深意重嗎？

中國文化生封死諡，是很有講究的。古時皇帝死稱“崩”，常人死若稱“崩”，那種僭越是要殺頭的。現代大人物死稱“逝世”，平民百姓或不到一定級別一定尊榮的人死，稱“逝世”是會鬧笑話的。對鄧小平這個既屠殺自己親友又趕得自己棄家離國別妻拋子的元兇如此含情脈脈，從心底裏借他的死表達對他所屬的那個集團——中共的溫情與媚意，只能說這有利益攸關以及文化上的原因——知識人不能擺脫“毛”的依附地位，在合適的時候，就會頑強頑固地表現出來。這也是人性！

這種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態源自自身不硬朗、不厚重。輕飄飄的毛總也紮不下根，總是浮在半空遊蕩尋找依附物。如果自己是皮，景象就會迥然不同！

為什麼就不能自己做皮呢？為什麼就不能既是毛又是皮呢？自己做皮就那麼難嗎？就絕無可能嗎？或者是可笑的嗎？

縱觀古今中外，知識人自強自主人格獨立，亦皮亦毛的事例成千上萬，舉不勝舉。試看洋人蓋茨、索羅斯。蓋茨有自己的電腦王國，他捐給慈善事業的數額以上百億美元計；索羅斯能刮起金融風暴，在香港蓄意與中國大陸作金融對決。有評論曰：索羅斯與趙紫陽打了個平手。蓋茨和索羅斯是商人、是大資本家，更是大教授、大學者、大專家、大知識人！

中國春秋時代齊國的鮑叔牙經商有術。管仲與他合夥做生意，卻因“貧困，常欺鮑叔”，投資時少出錢或不出錢，分紅時則毫不客氣地多拿。管仲還有許多其他毛病，打仗時逃跑，當官老是被罷職。“鮑叔知其賢”，全都不以為意，還推薦他為相。以至管仲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是著名的管鮑之交的故事。鮑叔牙要不是能賺很多錢，是不可能那麼大度地對待少出多拿的管仲的。管鮑共事桓公，始終得到桓公的信任器重，成就了齊國的霸業，他們自己也得以善終。這與鮑叔牙資產富饒幾可敵國是分不開的。

春秋時的范蠡文種佐越王勾踐報仇復國。范蠡深知勾踐可共患難不能共富貴，對文種說：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良臣亡”。謝絕勾踐假惺惺分國一半給他的許諾，漏夜離開越王，泛舟海上到了齊國經商致富。致富後，又散財，再到陶地，繼續經營生意，再次致富；人稱陶朱公，民間尊為財神。於是，許多美麗的傳說連大美女西施都附會在他身上。文種戀棧，則被勾踐賜死。

三國時魯肅，周瑜稱他“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周瑜就受過他“一困糧，三千斛”的接濟。魯肅最終能接周瑜的班、成為孫權的首輔除了他的品德才幹外，

家資豐饒也是一大原因。

時賢余英時先生作《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專辟數章論士商關係。可予人以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的功效。（以下所述凡引文者，皆出是書，不另作注明。）

明人重治生。“有一則明人告誡子孫的‘家規’說：‘男子要以治生為急，農工商賈之間，務執一業。’”王陽明曰：“果能於此調停的心體無累，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明遺民陳確曰：“儒者為學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讀書’，而‘治生’比‘讀書’還要來得迫切。”“陳確所提出的原則正是：士必須首先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才能有獨立的人格。而且他強調每一個士都必須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義務，而不能‘待養於人’。”

“良賈何負閥儒！”這是明人的話。“這樣傲慢的話是以前的商人連想都不敢的。”余英時先生在借此說明士商心態的變化，實際上這更反映了士商地位的變化和互動的關係。

清才子學者洪亮吉記另一位才子學者汪中的故事是士商關係的最有意思的證明。

一日薄暮，偕中至院門外，各騎一狻猊（院門外的石獅子——筆者注），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請安，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

汪中看不過眼，以大學者的身份又去折辱了這位三品商官。肄業生對商官的禮敬恐怕純是看在錢的份上，洪亮吉、汪中能折辱三品商官則是仗著學問名聲和士的地位，三品商官乃用錢捐來。知識、金錢、地位，三者的關係糾纏交錯而又有一點相輔相成。知識人應該成為這三者的主導！

吾鄉賢浙江瑞安商人卓禹由士入商的成功就從主導這一角度證實了士商合流的美妙。

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請疑質滯。……公之為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即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強有心計，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貴稱里中。（《梅村家藏稿》卷五十）

卓禹的弟弟卓爾康如是評述乃兄：

白圭之治生也，以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能告之。夫知、仁、勇、強，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人任時，強本力用，非深于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為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樑之圯者，歲饑出困粟，所全或以百數。彼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

卓氏兄弟一實踐，一理論，完美了儒家德目知仁勇強與貨殖（經商）的相結合。如此既士既商、亦毛亦皮，是從士從商的最高境界。

余英時先生說：“我們也決不能誇張明清商人的歷史作用。他們雖已走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未曾突破傳統。”現代的“士”——知識人完全應該也可以比明清商人走的遠一些、深入一些，實現突破。蓋茨、索羅斯是西方的典範，中國也應該有現代的鮑叔牙、范蠡、白圭、卓禺。大陸似乎已經有了萌芽、騷動。海外則未見動靜。這張“西皮”總是誘惑“二黃”跑調！

九十年代初期，大陸出現了“儒商”一說。有牟其中者，曾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中國首富。“儒商”一說，有論者稱是牟其中開的頭，無論確否，牟其中說得最多，言之鑿鑿、言之成章、言之成理，則是事實。筆者曾在93、94年與牟其中有過合作，參與過他的一些商業活動，瞭解他的一些情況。牟其中最初因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政論文章被捕坐牢差點槍斃。這個基因融進了牟往後的所有歲月和商業經濟活動中。牟能說能寫，文章不假手秘書，全靠自己動筆。中央黨校請他講過課；黑龍江白城市副市長辭職到他的公司打工當辦公室主任；劉華清的秘書因六四被清洗也到了他的公司供職；全國市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被他耍得團團轉；老撾政府代表團因他下釣差點上鉤；他上國務院辦公室說自己要承包三峽大壩工程；他以三百元人民幣起家做成了購買蘇聯四架飛機的生意；他放了兩顆真衛星到天上；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採訪他時，他說自己有八億資產，順溜的連個嗝都不打；他揚言要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大口子，引進印度洋的氣流暖風。所有這一切，筆者基本上都是親見親歷，可以證實確鑿無誤！按說，牟其中可以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儒商，成為亦士亦商高境界的典型。可是牟其中功利心太重，玩權術太過，事功太急，導致失敗成階下囚。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六四”前期，他對公司職員下令，不准去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誰去誰走人。“六四”後的某年，他帶領公司高級職員在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墓前舉手緊握右拳宣誓效忠共產主義事業，前赴後繼幹革命。中央電視台拍攝播放了這一幕，當然是因為牟其中的幕後運作。這種假惺惺作態過了。過猶不及！他作為儒商，忘了儒家這原始的教誨。當局對他的注意就進入了每分每秒的階段。牟其中的失敗是由他的性格註定了的。牟其中作為現代知識人從商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和借鑒，無論大陸或海外流亡者，都能從中獲取許多寶貴的東西。

此後，有孫大午者，河北徐水人，從商致富，崇尚儒家理念，於03年被當地政府以“非法集資罪”抓捕判刑三年，緩刑四年。出獄第三天，“縣委書記請孫大午‘吃飯’。孫大午帶著大兒子，心事重重地前往赴宴，一看出席的人員：縣長、政法委書記、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局局長、銀行行長，都到了。書記端起酒杯首先為孫大午‘壓驚’，並當場對他提了三點希望：一、正確對待對你的這場訴訟；二、今天，參與訴訟的各級部門的一把手都在，希望你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單位和個人；三、回去以後把企業繼續做好，儘量少接觸媒體。你說你有罪，個人形象不好；你說你無罪，政府形象不好。靜靜地聽完書記的指示，孫大午表態：‘請領導放心，前兩條我能做到，但第三條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觸媒體，因為媒體給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謝他們。但我可以不談案子本身，多談企業，請書記放心。’孫大午承認自己性格很倔強，記者對他說：‘這種性格很容易出現悲劇。’孫大午答道：‘出現悲劇是正常的，讓我感到幸運的是，畢竟社會在進步，在走向法治。’”（《南方人物週刊》鐘良）

與孫大午同時或前後，大陸湧現了一大批亦士亦商的知識人。有鐵流者，57年右派，八、九十年代經商有成，期間坎坷挫折，歷經磨難，不改初衷。最可道者，乃無時或忘自己知識人的角色。進入新世紀，古稀之歲，烈士暮年，回到書齋發憤寫作。

成功又失敗的牟其中、半成功的孫大午、獨善其身的鐵流三人，是當世士商角色轉換融合的三個典型。他們周圍都能團結聚攏一大批知識人。知識人中的一部分最終要走這條路。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時代的必然。只有如此，中國才會緩慢然而堅執著一路向前發生質的變化。

毛澤東組織湖南英才赴法國勤工儉學和在湖南進行革命活動，是當時的報業大亨史量才和上海紡織業巨頭通過章士釗給了他八萬銀元。梁漱溟1946年退出政壇後，在重慶北碚創辦文學院、中學，自己潛心寫作《中國文化要義》，這些事需要的大量資金以及事務麻煩就是依賴當時的運輸業鉅子盧作孚昆仲的全力支援幫助。這樣的例子在49年前很多很多，49年之後則絕種了。絕種的原因，就是制度與文化摧毀了這種可能：所有原先的士商淪為苟活的芸眾，除了必要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工資糧票戶籍外，他們一無所有；心理上思想上則被徹底地擊倒征服，教化成真以為自己完全賴工農共產黨養活。

從牟其中、孫大午、鐵流們身上，假以時日，但願我們可以看到史量才、盧作孚們的身影重現。

海外流亡者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西方的基金會養了許多知識人。流亡海外的知識人，習慣了做毛附皮的賈桂、操翰、智囊、幫忙幫閒的心態，一時轉不過彎來，總是還要尋找倚賴，希望有人養自己。殊不知這種西方文化雖有其高明之處，但畢竟是人家的。西方養士文化經過長期的實踐，已形成了一整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持之以恆的規矩。社會的方方面面互相依靠、互相促進、互相制約、互相玉成；而這一切，則有其制度和大文化背景作靠山和保證。這是與大陸的被毛澤東畸形化了的皮毛依存關係迥然有別的養士文化。流亡者投靠他們，他們予以收留，使你有安身之所，這就是世界大義、人類大義的極致了。他們已做到最好。你卻把立命的希望也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你與他們完全是兩碼事。你要做的事，無論什麼，都是你的故國、你的文化、你的物件，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你卻要他們象對待自己國家自己文化的知識人那樣對待你。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因為制度法律的規定，因為社會的慣性，不會全然拒絕你們；但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長遠，是對你們這樣的要求排斥的。你為一時的假像所迷惑，忘了挺起自己脊梁，習慣於因循守舊，接受了殘羹冷飯，你就過了，對於自己過了，對於他們，也過了。過猶不及。如何能長久呢？！

海外流亡者中許多人有這麼個共同的想法：我若有錢，就如何如何……救貧窮、濟蒼生，出書辦刊物醒芸眾……這往好裏譬，是亞裏士多德的“若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其實，正是做毛意識的延伸沉淪而不自覺。於是他們積極地去尋找皮、依附皮，冀望皮能有慧眼、是伯樂、發慈悲！一旦找不到皮，或是皮不理你的茬，就無所措手足了；全然不會返躬求己，更沒有在一開始就想到、去計劃自己拼搏。最顯明的例子是獨立中文筆會向西方基金會籌款的種種情事。一年幾萬美元的“恩款”折煞了多少著名學者作家教授名人！這似乎是整體知識人的習慣觀念、正常思維，也正是全體知識人缺乏或沒有獨立人格的根本所在。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郭慶海先生出獄不久，參加了筆會在大陸舉辦的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獎會。郭慶海在“獨立作家難獨立”（《中國獄中作家文選》）一文中感慨曰：

會議的主題依然不能令我心情開朗起來。因為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獲獎者章詒和女士的答謝詞實質上道出了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作為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作家們一直面對的艱難處境。章女士說：“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怎樣才能獨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

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的體制與權力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她一語道出了目前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尤其是獨立作家們的尷尬處境。

去年身陷囹圄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程翔先生，是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駐香港記者、中國首席特派員，兼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法律顧問。他在“我所認識的陳子明”(《中國獄中作家文選》)一文中如是說：

我之所以深深敬佩他們，乃因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政治環境下，敢於走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真正做到“不媚上，不媚下”。

……中共長期以來視知識份子為政權的附屬品(毛澤東更把知識份子貶為依附在皮上的毛)，這就註定，知識份子難以有“獨立人格”。

正是為了能堅定不移地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陳子明、王軍濤等籌建起全國第一家民辦研究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第一次有人在意識形態領域有組織的“異類”聲音。……民辦研究所有官方研究所所沒有的優勢，學者們能夠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探討問題，不必按官方的調子來塑造自己的意見，更不必按權力的大小來厘定自己接近真理的距離。這對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一種難得的自由。所以，很多有潛質的知識份子都願意到這個所工作。在他們的示範作用下，八十年代中以後，北京開始出現一股民辦研究所的熱潮，如“首都鋼鐵公司”屬下的“法制研究所”、“四通公司研究所”等。

陳子明辦研究所的經費究從何來？這是中共安全部早就在“關心”的事。陳子明經常對我說，知識份子要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必須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如果躺在“大鍋飯”上，就必須看領導人的臉色，揣摩主子的思想傾向，從旁論證領導的意圖，這樣，則“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從何談起？他們為了創立民辦研究所，就致力於積累自己的經濟實力。在辦企業方面，陳子明以事實證明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企業家。他從創辦函授學校開始，只是幾年工夫，便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包括建立一所函授大學、一間出版社、一個市場及民意調查中心，一家旅遊紀念品公司，其後還收購了由當時“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主辦的《經濟學週報》)，並在多個省市設立分部。……據說在全盛時期單是每月在各地所發的工資就高達二十多萬人民幣。到“六四事件”後，研究所被充公的現金和設備等財物就多達三百萬人民幣，……

陳子明等以這個企業集團所創造的財富來支持他們的民辦研究所，這是中共懼怕他們的真正原因。這個集團下的函授大學，打破了官方對知識傳播的壟斷。他的出版社打破了知識份子出書要經過思想警察審查的慣例。他建立的跨越全國多個省市的民意調研網路(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家民意調查中心)，更直接威脅到“黨代表了民意”的神話。過去，很多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會發出不同政見，但這只能作為個人的發洩，中共不會怕，因為他們都是吃共產黨的“皇糧”，吃皇糧的就要“順著領導意志走”。陳子明則以辦企業來研究，以經濟實力來支援“獨立人格”。這是他和其他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同。正是因為他們具有這種能量，中共黨內保守力量就視他為一大威脅，在“六四事件”之前，就想辦法來整垮他。……在“六四事件”之後，保守派更提出，要嚴防改革派知識份子經商辦企業，提出要防止這類人進入“經濟領域”。因為他們知道，進入經濟領域的知識份子才有真正的力量。他們就是怕有人走陳子明的路，具備獨立經濟來源後會危害到共產黨的思想一統地位。

筆者所以大段引文，是因為陳子明的思想觀念行為是先知先覺者，是因為幾乎從來沒有

人注意及此、至少是至今沒見知識人就此討論反省，是因為程翔先生沙裏淘金留此見證。萬潤南先生的“四通”類此，筆者不熟悉。如此陳子明、萬潤南，卻從不見海內外的知識人對其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深入探究，從中淘出閃耀千古的金沙。

無論如何高度評價陳子明的作為，都不為過。陳子明，是五十餘年來的第一聲雄雞啼曉！可惜，被當政者也包括知識人自己扼殺了。如果說，大陸雖然畢竟有了一些變化，經濟活動可以在夾縫中扭曲生長，但仍難逃脫如來佛手掌；那麼，在海外，孫猴子已經跳出了五指山的掌控，能夠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大翻斤斗雲，狂舞金箍棒了。

但是，海外陳子明，你在哪里！？海外知識人幾乎一直惶惶然若喪家之犬、若乞討之丐。為什麼？難道不是我們的思維路向出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失？知識人真應該深長思之啊！

明唐寅有詩：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流亡西班牙的王策在大陸獄中用鐵筆練書法，出獄返回西班牙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網上打出廣告：鬻鐵筆字。這是仿效唐伯虎賣畫自養。惜乎方法欠妥功力尚淺，沒有成功。如果有十個、一百個王策，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努力自養，整體以及個人的成功終會到來的。王策改變方法，經商自養，不到三年，略有小成，衣食無虞，讀書寫字，開會奔走，再無須求爺告奶，仰人鼻息了。

先師潘懷素先生系國際聞名的音律學專家。49年前奔走政界，類章伯鈞梁漱溟，是中共建政最初的三十來位政務院參事之一。七十年代中期筆者從先師處聽到許多故事，尤其是流落民間窮極潦倒的奇能異士，學有大成而為衣食生計窮于奔命的學者專家教授的慘況，其中有馳名東南亞的魔術大王、有愛因斯坦的中國學生……令人感慨萬千。那時筆者有了養士之念並身體力行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似有小成，然驟遭變故煉獄，萬念俱灰，無心做事，錢也隨之四散飄零。等醒過來為時已晚了。筆者是一個失敗者，幾曾衣食無著、三餐不繼。此後再經砥礪，想法有了變化，漸悟也可以說是頓悟了養士之念還是脫不出毛澤東一再嘲笑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窠臼。

中國的知識人，應該走另外的路。應該自養自立！89後的再次大流亡，其實提供了一大契機。流亡者大多是青壯年，應該完全可以在經濟上自立自養自強自尊自愛然後作許多事。可惜的是觀念上習慣上人的惰性上積習難改積重難返，總要、不由自主地要依附、要做毛，而不會想到不願意自己成皮。

中國古有養士之說。筆者曾深然之。養士、自養，一字之差，卻有千萬般的不同，未能自養，如何養士？僅只謀生糊口的自養遠遠不夠，立足于成皮的自養，觀念上的脫胎換骨，才是真自養，也才能過渡到養士。

依附、被養不甚難，但僅同時要求心態平常平和平淡平衡則就很不容易了，遑論其他。得失之理，千古不易！筆者返躬求己自養。雖非成功者，但可以算不是失敗者了。筆者寫的文字目前還不多，但每一個字都是自養之餘熬出來的，不必看不必考慮任何人的意見臉色，沒有斷奶斷糧的擔憂，更絕無嗟來之食的自卑羞慚。返躬自養，從宏觀上，有為可能過渡到養士出力的歡欣和鼓舞；從微觀上，心境的平和安寧、人格上的獨立自主，是自養所付出的

大代價的更大更無可替代的自由回報和永遠的無價財富！

自養並不很難，為什麼未能為流亡者、知識人全體接受、實行且發揚光大形成一套理論呢？這裏當然有許多個人方面的原因，但從根上來說，還是觀念習慣惰性問題，是文化概念問題。兩千年的積習、人固有的惰性，豈是朝夕間說改就能改的。

經商者古稱“賈”，從“貝”偏旁，與“賊”字同歸一個部首。古人造字有深意。農業社會輕商賤商，認為“賈”與“賊”相仿，皆為“財”也。這種輕商賤商的觀念根深蒂固，至今猶在有形無形地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支配著許多知識人。

需要改弦更轍！知識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知識人在如何建立獨立人格方面需要有新的思維新的思想，需要學蓋茨、索羅斯，學白圭、鮑叔牙、范蠡、魯肅、卓禹、陳子明、牟其中、孫大午、鐵流，需要自己是基金會、是皮！只要全體知識人如此去思考、如此去做，持之以恆，五年十年幾十年，小成功、大成功就會湧現。現在海外有零星的人在做，這不夠，遠遠不夠。也不能以這些零星人的失敗和尚未成功去否定嘲笑這種思維這種思想的錯誤。需要總體的新思維新思想，需要總體地去做，需要逐漸充實、完善、確立這種新思維新思想。

筆者欣賞春秋時顏觸說齊王。請看《戰國策·齊策》中的這一段妙文：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當今的士——知識人，大陸的、流亡的，何時能像顏觸一樣面對權勢？！其以我為主、自由灑脫、浪漫不羈的快意、傲然，千古一人，千古美談！

筆者在這方面的粗淺想法在七十年代後期已初步形成，限於學識淺薄，至今尚不成熟，但一直固執其路向的正確。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論士商關係的篇章，旁徵博引，以翔實史料和振聾發聵的獨到見解使人嘆服和鼓舞。余先生嚴謹的考證明確指出知識人自養古已有之古已有成——這是余先生論中國文化最結合現實慧眼獨具的見解和貢獻，也是對海外流亡者最語重心長意在言外的綸音。願我知識人、有心人深長思之！

謹以七律一首結束本章。

拜讀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感賦一律兼賀余先生榮獲克魯格獎
中華士子還原真，沿用創新知識人。
流亡悟道識猶淺，良賈閱儒意甚珍。
獨立何須附皮厚，自由豈賴存毛身。
賀公膺獎嘉言美，仰岳最應取髓神。

第十六章 異數文化的悲哀

在大陸，四十年前，王光美是大惡人，江青是大美人；過了十多年，江青成了大惡人，王光美變為大美人。在海外，反共圈內視王光美江青都是大惡人，擁共圈內則與大陸一致。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無論海內外，無論反共者擁共者，都視王光美、江青為階級鬥爭的物件，而絕然忘了她們首先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惡的人性，善的人性；醜的人性，美的人性；裝假人性，示真人性。縱然是桀紂、嬴政、楊廣、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殺人魔王，也總會在作為兒子、丈夫、父親時閃現出人性的光輝，王光美、江青其能外乎！所以，在一般情況下，雖然完全沒有必要去訴說去強調王光美、江青有人性美，但是，在論及階級鬥爭文化時，論及人性時，是不必諱言說王光美、江青也有人性美的。

筆者曾在06年10月王光美去世時撰文“王光美大處不糊塗”，末段曰：“王光美作為一個婦人，較之許多完全匍匐在毛澤東腳下的黨人要硬朗得多；王光美作為一個妻子，對得起患難與共的丈夫劉少奇了！至於往後的作秀，大做文章的苛求者應該首先看到王光美對丈夫的大節。從人，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對一個經歷了九死一生、夫死子亡的未亡人和母親，我們還是應該多一點悲憫和寬容。”拙文引發了一些言正辭嚴冠冕堂皇的批評斥責。

為什麼對手或敵對營壘中的人就不可能有人性中的善、沒有真與美呢？這同黨文化罵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是“頭頂長瘡、腳底流膿”，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異曲同工、一脈相承。階級鬥爭文化的毒素確實已經滲透到血液和每一個毛孔細胞裏了，只要是對立方就萬惡不赦，連舐犢之情、親子之愛、夫婦之貞……這些最基本的人性都要予以踐踏。我們的社會生態就是如此的扭曲、悖情、乖戾和反動！

江青處於強勢時，踐踏蹂躪王光美，我們跟著起哄；王光美處於強勢時，踐踏蹂躪江青，我們也義憤填膺。五類份子、江青、王光美是階級敵人時，我們踐踏蹂躪。現在我們不踐踏蹂躪五類分子了，因為我們不再視五類分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開始多少視他們為人了。可為什麼我們還要視王光美、江青為階級鬥爭的對象，繼續踐踏蹂躪王光美、江青呢？最近有北大教授孔慶東者宣稱“她那個階級是我們政權的敵人”，“共產黨對他們是極其寬大的，但他們仍夢想變天”，“改革開放後都平反昭雪了，但大右派還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比當年兇惡十倍”。這是階級鬥爭說的捲土重來。這不奇怪，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如此，孔慶東不過憋不住幫兇，搶先獻媚說了真相出來而已；如果真的改了，倒是奇事一樁了。應該奇怪的是海外以民主自由為追求為鵠的的知識人，為什麼會與孔慶東一樣，視王光美為階級敵人、視共產黨為階級敵人呢？這不是贊同認可階級鬥爭的理論麼？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視對方為人，哪怕是要殺我們的情況下，也視對方為人，而不是階級敵人。我們可以反抗，應該在死亡的威脅下反抗，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對方視為人，是惡人，而不是階級敵人。如此，我們就能從人性的角度去對待理解社會、人生中的善惡、真假、美醜的矛盾與抗爭，而不是繼續沉陷在階級鬥爭的泥坑裏。如此，積微積漸，潛移默化而導致良性循環，從根本上將萬惡的階級鬥爭黨文化予以改變，纔有可能。

請看一些被視若無睹的現象。筆者稱它們為異數文化。這種異數文化以及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正是筆者上述怪論的印證，也是墮落末世的徵象。

- 堅持的異數

“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受審時，江青不認罪不認錯，大鬧法庭，公開宣稱“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所有的輿論都不齒她的這句話。其實，說這句話的江青，江青說的這句話的涵義比起所有風吹兩邊倒、永遠騎牆、最後仍然匍匐在毛澤東腳下的黨國要人包括鄧小平都要坦率、實在、有擔當甚至道德得多！江青確實是一條狗，但江青雖然是一條狗，卻不是那種斷了脊樑的癩皮狗！對於毛澤東來說，江青是一條忠狗義狗！人性中忠義的品德是美德。江青具有這一美德！全中國、全體知識人沒有看到或絕對諱言江青的這一美德。制度文化不許可不允許不可能肯定讚頌江青的這一美德。制度文化反倒肯定鼓勵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反戈一擊重新做人的“美德”。“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正是這種顛倒文化的具體延伸、化解和表征。

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中有“降漢不降曹”、“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故事。贊的就是忠義、不背主。關羽為保全二嫂一侄，忍辱負重，降漢不降曹。單雄信被李世民抓住了，一心忠主公主王世充，死不投降。李世民手下許多大將軍是單雄信的拜把兄弟，其中秦瓊還曾受惠單雄信甚深。開刀問斬單雄信的法場上，秦瓊、程咬金諸拜把兄弟來送行，單雄信喝了程咬金的斷頭酒，卻不理秦瓊。秦瓊感佩單雄信的忠義，自知理虧，負疚甚深，遂用兩把短刀插在自己的左右腰肋間，以此來送別兄弟單雄信。單雄信和秦瓊忠肝義膽、兩肋插刀的故事千載流傳。當今之世，已沒有人對此感興趣了，知道的人也很少了，新式的人還會嗤之以鼻。忠義之美德恐怕應世而斬。

張春橋在審訊期間一言不發，對任何問題都一言不發，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這些中共的核心人物，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同毛澤東一樣，整肅殺害過許多人，手上沾著許多無辜者的鮮血。他們十分清楚明白一旦被決定整肅，是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完蛋的命運的。這是他們自己參與創立的制度、扭曲的文化所決定了的。千千萬萬被他們整肅殺害的冤魂就是明證。可是一旦他們自己“入甕”時，卻幾乎全然忘了這“甕”正是自造自設的。人性的最後掙扎冀其萬一的希望大約是每個人都逃不脫的劣根性吧。劉少奇徘徊在毛澤東家門口，冀其邂逅，乞憐求恕；彭真高呼自己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陳伯達在秦城聲稱自己救過毛澤東一命；所有被批鬥者都匍匐認罪、乞求恕免。無一人因乞求而得到寬赦。這是階級鬥爭的黨文化在原則上本質上確定了的，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能得到例外。當代史上，唯一明白此理而不作任何乞求的是“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在這一點上，張春橋的人性較之中共任何其他的黨國要人是有高下之分的。有參加審判“四人幫”的法官回憶文章說張春橋在預審時也是很會說的，恐怕是意識到這一點的事後補救功夫。張春橋確實是一個異數！

江青的堅持、張春橋的沉默，這裏有沒有人性的美？相對來說，應該是有的。

• 扭曲的異數

說到扭曲，王光美是異數中的顯例。人多以王光美安排毛劉兩家後人相會為題目議論紛紛，或譏其忘了夫仇，或贊其大度，或責毛劉乃一丘之貉，或哀其無可奈何。所有這些見仁見智都不錯，獨未見其極端痛苦扭曲之心靈的咬齧。王光美也是人，人性的善惡真假同樣具備！

評劇大演員新鳳霞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致殘，半身不遂，輪椅代步。王光美坐了7年的秦城監獄，擬判死刑，毛氏不只哪根筋動了，筆下留人，才虎口餘生。新鳳霞王光美劫後驚魂，

邂逅某處，王對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是海外《開放》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裏說的。應該是可信的。論者多以此詬病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未見報刊的另一面是：1980年，中共中央平反劉少奇，悼詞和生平簡介頗費周章，其中有一句當時的套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劉少奇”。按照黨文化的慣例，這是對劉少奇的最高頌揚和肯定。

劉被毛直接殘害慘死，慘到瘋癲，慘到70斤重的赤身裸體，慘到全身沒一處好皮肉，慘到燒化時沒有名字……現在竟又是“毛主席親密的戰友”！所有參與者上至最高當局華國鋒鄧小平，下至秘書打雜者，謊言製造的順當隨便和接受的泰然自若，另當別論。且看王光美是如何對待的。王光美凜然拒絕，中央做工作，還是拒絕，並且以如果不刪掉這句話，將不出席追悼會相要脅。最後，中央妥協，刪掉了這句話。這段隱情，筆者得之于梁漱溟先生的孫子，他講述其祖父去世後全國政協發表介紹其生平文字中發生了類似問題，提到了劉少奇王光美的前例，應該是可信的。我查閱了劉少奇的悼詞和生平介紹文字，果然如此！由此，我們知道，王光美在凡能使她想起毛澤東的時刻和場合，會是如何的痛苦和扭曲。她只能只得如此作假，如此酸苦辛澀裏說甜蜜，心碎著演戲！我們為什麼就絕然不能稍稍站在王光美的位置上想一想？！這同王光美曾經為虎作倀兩碼事。不能在說這事時務必要先把王光美的老底臭一番，才算公正，才是愛恨分明。這也未嘗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扭曲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非要象中共對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那樣對王光美們呢？五十七年後，我們才來說地富反壞右好話的歷史不要重演。現在就不要把王光美們當作階級敵人，視王光美們為人，一個復雜的人，一個既曾為惡也有善心母愛的人，同地富反壞右一樣的人，同我們一樣的人。

如果是筆者美化了王光美，過了頭，那麼，能否當作是矯枉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在這個扭曲的時代，或許真需要矯枉過正啊！

貴為曾是國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逃脫不了制度文化對她的制約，對她人性的扭曲！

五十七年的謊言蒙昧愚民打磨威嚇殺戮，五十七年的灌輸教育培養訓練，已經深入滲透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了，並不在腠裏，在膏肓了！除了脫胎換骨，別無他法。幾代人的脫胎換骨，也就是毀滅與重生。制度的毀滅可能一朝瓦解，文化的更新則決非一蹴而就。或者是舊文化也隨著舊制度毀滅，人性得以復歸、重光。但願如此。

• 檢討的異數。

寫檢討，是毛澤東整治知識人的一大發明，是侮辱、摧殘知識人的無上妙方。給你一絲希望，認識、挖掘、坦白、交代、檢舉、服罪、求饒，跪下去，趴下來，求饒，求饒。他居高臨下，俯視著你，開懷、訕笑、冷笑、癡笑、大笑……知識人的人格、尊嚴、精神、靈魂被糟踐的體無完膚，許多人就此斷了脊梁。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回憶道：

“周新民死的才慘哪！……他上午交一篇、下午交一篇，交待。他寫的大概有一房子……（他）在法學研究所……張友漁正的，他的副的。後來死的時候糊塗了。‘我是共產黨員，我就相信共產黨。’就這麼兩句話……一直沒有醒過來。……天天寫，哪有東西寫！太苦了。”（摘自：李健生1985年往訪梁漱溟談話錄音記錄整理稿。）

五十七年間，大陸知識人寫的坦白交待檢討書的文字大約比五十七年來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多上一百倍。沒有一個人不在檢討裏全面否定自己以顯示黨和毛澤東的英明正確偉大、以表明自己的認識深刻真心悔改的。

五十七年來，千千萬萬知識人只有一個人成了檢討的異數，那就是聶元梓！聶元梓是十年浩劫文化革命中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是毛澤東欽命的文革第一人，是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九大”的中央候補委員。聶元梓在紅得發紫又跌的最慘、關了十八年之後說：文革中的錯誤，“我不能負責；不論錯誤有多小，一分責任我也不負。”（摘自謝冀亮：《聶元梓口述自傳》，載博訊網。）

這是擲地有聲的話！聶元梓的話其最有價值處不在歷史事實，而在膽大包天，不自我糟踐。這是大陸知識人檢討文化中的第一聲金雞報曉，卻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是為什麼？聶元梓過氣了？聶元梓是刑滿釋放人員？所有糟踐自己檢討過的知識人不好意思？所有知識人的新貴們事不關己、不明究竟、不以為然？都是，也都不是！陶醉了，新貴們只要付出一點聽話配合的代價，洋房汽車職稱地位名聲唾手可得；麻木了，老一代心有餘悸導致的習慣性的服從已成條件反射。這一知識人從匍匐而直起腰來的萌芽被扼殺了，被淹沒在陶醉與麻木的汪洋大海裏去了。全中國如此！全體知識人如此！

附帶說一下“等級的異數”。公侯伯子男以至當今名目繁多數不勝數的等級分類、分別、分配，如黨籍可代幾年徒刑，如何級可配汽車、司機、秘書，如何時何事到中央委員一級止、到政治局委員一級止、到政治局常委一級止……這種等級文化已為大陸全體接受、習以為常，視為天經地義了，不論也罷。所謂“等級的異數”是指這種文化遍及滲透到任何角落和大腦中樞的每一條神經末梢，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坐牢分等級不奇怪。我該坐什麼牢，不給我坐什麼牢就憤憤不平，認為受了委屈遭到不公歧視，這種心態才是“等級的異數”。請看聶元梓口述自傳裏神叨叨的牢騷：

那些人就是要整死我。按我的資歷，我的級別，我應該是進秦城監獄的。解放以後第一次給幹部定級，我就是12級，是高級幹部。後來晉升級別的時候，我還發揚風格，把晉升的機會讓給別人。不管怎麼說，我的級別是可以進秦城監獄的，那裏的居住條件和伙食都比普通監獄要好得多，那裏關的都是高級的政治犯啊。鬥爭我的時候，宣判我的時候，把我的問題說的那麼嚇唬人，進監獄的時候，卻讓我進了延慶的普通監獄，和小偷、流氓、殺人犯們關在一起！

這使我想起了鄉諺：討飯人也說自己的米白一些。淪為囚徒了，斤斤計較埋怨撒嬌的竟是此。這比討飯人說自己米白的等級心態遠過之。我們的等級文化力量神奇到如此“異數”的地步。最可悲的是，經歷了這一切的浩劫後，遭受了如此深重的個人苦難後，聶元梓的這種心態依然故我，國人尤其是那些有類似坐牢經歷的黨國要人幾乎無一例外的如此心態。異數文化，也就是黨文化，將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性折騰成如此模樣。夫復何言！

• 欺騙的異數

林彪吹捧毛澤東是明著撒謊，兩造都心知肚明。“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種吹捧與肉麻的頌揚不同。無論“我們永遠跟著你！”、“難怪陽光格外明亮，原來機艙內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

恩情大”、“三忠於”、“四偉大”，都是文學性的誇張、象徵、比擬的手法，或浪漫或撒嬌，郭沫若們自己心裏其實是很明白的，也說不上就是撒謊欺騙。“頂峰”諸論的出臺，則牽涉到哲學、人文的基本常識，明白無誤地與常識擰著幹了，明確不易地告訴你：我就是要這樣撒謊欺騙人。林彪吃准了毛澤東需要這種吹捧，他摸透了毛澤東異于常人的心理狀態，他篤定毛澤東會一時接受。都說是林彪迎合毛澤東，其實，骨子裏是毛澤東配合了林彪。沒有毛澤東默契的配合，造神運動是不可能如此迅速龐大完備瘋狂地席捲神州大地的。林彪與毛澤東鬧彗扭後，五一節上天安門城樓遲到早退，不與毛打招呼；在大會堂與毛澤東一起接見外賓時獨自坐在一角，不辭而別，也是一種明白無誤的表示：我與你尿不到一壺了。林彪確實是一個大騙子，但也是一個公開堂皇的騙子。制度和文化成就了這種明目張膽地對十億人的欺騙。這種公然的撒謊欺騙文化——異數文化，國人懵懵懂懂、似知不知，若明若白。既然沒有清算它，它的變種自然繼續、延伸。“四個堅持”、“三個代表”、“穩定壓倒一切”、“和諧社會”即是。不過比起“頂峰”諸論來，那氣魄、氣焰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 麻木的異數

麻木，當然是指芸芸眾生的無知覺，其異數，則是自以為覺悟者的阿Q化。這是當世獨有的景觀。

在海外見多了關於大陸災難、貪墨、墮落的報導，就以為滿中國滿世界都應該知道這些，其實你只要一接觸其他層面上的人群，就會明白滿不是這麼回事。大陸的朋友總是或明確或暗示應該多看到光明面。西歐南歐的各首都城市，現在都有許多中文網吧，筆者因自己電腦故障，多次進去上網流覽，順便做了一下粗略的調查，結果是：進網吧10次，網吧裏人數在38—89，平均56人，95%的人在30歲以下，40歲以上的人極少見，50歲以上的人除我外沒見過。網吧裏所有的人在聊天、打遊戲、看線上的電視劇，沒有一個人是看時事新聞的。海外目前電腦還沒有任何屏蔽，網吧也沒有任何駐華使館勢力滲透控制。西歐南歐華人以浙江青田縣人歷史最久、人數較多。我在青田人裏做過調查，我問過相處的遇見的青田人是否知道他們的鄉賢章乃器，被詢問的人裏有大學生、中學教師、僑團負責人，十年了，沒有一個人知道，卻基本都知道青田人的陳誠、陳慕華。陳慕華在外貿部長任上時回過家鄉。陳誠的兒子陳履安九十年代回過鄉祭祖。

浸淫在民主自由訊息中的人們，以為世人都像你一樣渴望民主自由，瞭解你所瞭解的動態訊息，就大錯特錯了。人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不願意知道，不屑於知道。十來歲的孩子不知道孫中山的十之八九，二十歲不知道“6.4”的幾乎是全部，三十歲不知道文革反右的凡問皆是。他們最關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所有可以感動人的事例都不過是故事，所有說“脊梁的有無，應該自己去看地底下”的話都是一種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許，這說的有些過了，但非常悲哀，這基本上是確鑿的實情。精英們總在自己的圈子內轉悠，思維習慣已很自然地適應圈內文化、以圈內文化為主，幾乎沒有或很少接觸底層大眾，卻又幾乎個個自以為“秀才不出門，已知天下事”，全局在握、成竹在胸，講話著文，大言炎炎而難及邊際。

謊言與遺忘是相輔相成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回蕩著五十七年期間每時每刻每分每秒的謊言，空前絕後地成就了遺忘的功用，成功了全民的麻木、冷漠、自私和癡呆。

海內外每天網上為自由民主發議論的、搖旗吶喊的、跟班的，滿打滿算不過百餘人，十

餘年來，基本上也就是這些老面孔。為什麼？為什麼慘不夠？為什麼打不疼？為什麼不知恥？為什麼喚不醒？覺醒的人又為什麼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自欺、誇大、陶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句毛澤東的名言、黨文化的正統麻木異數的鴉片煙，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吸食進去了，我們步履踉蹌，思維沉迷，總也走不出這一黨文化的怪圈、跳不出陳舊的窠臼，脫不出佛祖的五指山！

• 墮落的異數

毛澤東時代的知識人其愚忠、受辱、匍匐、自責超古邁今，亦堪稱神州一絕。陳徒手作“午門下的沈從文”：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范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在一張大字報中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1962年范曾來到歷博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知情者介紹，當時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有一天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文革期間與沈從文過從甚密的黃能馥、陳娟娟夫婦說：那時，范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後，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上的錯誤。范曾指著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邊吧。”……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蕭乾在去世前曾出版過一本《風雨平生》的口述自傳，赫然記述著宅心仁厚的沈從文也曾採用類似的方式對待過自己的右派學生蕭乾。反右期間，在批判蕭乾的大會上，沈從文站起來積極發言說，此人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這樣的揭發出人意料，但蕭乾只是把它看作是在階級鬥爭面前自保的一種方式，沒有過多去計較。他們的關係還一直維持下去。文革期間，蕭乾亦想走沈從文的老路，也曾服毒自殺未遂。1972年蕭乾從幹校回京後去看望沈從文，見它住房困難，出於好心，就想托當時市革委的一位朋友幫助他解決一下。沈從文得知後，勃然大怒，電話裏痛罵蕭乾耽誤了他的政治前途，並質問“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因為此事，兩個有著幾十年師生情誼的友人，斷然絕交，不復往來。

畫家范曾的墮落不論也罷。因早逝而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沈從文最與世無爭了。他大約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了，讓他獲得瑞典皇家文學院垂青的都是1949年前寫的湘西鄉土文學。49年後，沈從文總是挨批挨鬥，活得很卑微很窩囊。他只是要求安生地活著，與他小說中的那些小人物一樣。如此卑微窩囊甚至猥瑣地活著，卻需要他付出心靈人格墮落的代價。沈的墮落與范曾迥異，是為墮落的異數，正如巴金、冰心在屠戮面前沉默一樣。這是時代文化的特徵。這樣的事例實在太多太多，已成為常例了。一個時代，知識人幾乎全然如此，而在整體上絕不反省絕未反省不能反省，這種墮落的“異數”其實也就是“常數”了。究其因，當然是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綜合作用。

• 懺悔的異數

人性在特定的制度、文化陶範制約下，其醜陋的一面會膨脹至喪失人性而不自知。流亡法國的四通公司的前總裁萬潤南回憶在清華大學讀書鬧文革時高幹紅衛兵的瘋狂：“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哪里是甚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咤‘兒混

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

如此完全悖情悖理悖常識悖語文的話為什麼就能喊得如此理直氣壯毫不動搖毫不知恥？大革命的文化狂飆使人失去理性，制度保證了安全、安然，於是人性中的自私、衝動、欺負欲、表現欲、殺人欲就借著這一股狂飆狂熱地發洩出來。

1966年8月18日，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得到是文質彬彬的“彬”字回答後，笑著說：“要武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對階級敵人再不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了，代之以狠鬥、狂打，往死裏打。風聞宋彬彬揮舞著軍用的銅頭皮帶抽向了地主、地主婆、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份子、壞分子、牛鬼蛇神。專門抽打要害，鮮血淋漓，皮開肉綻，哀嚎震天，死去活來，不死不止。據當時和後來的傳言、報導，宋彬彬就這樣親手打死了五、六個人。時隔近四十年，美國人拍了部電影，再現了那一段歷史。於是，網上出現了宋彬彬是否真打死了人的議論。無論真假，對宋彬彬個人很重要；對於被打死的人來說，則並不重要了；對於歷史來說，則是更加慘酷龐大的畫面。歷史已經記錄了在那個時代，以宋彬彬為代表的高幹、軍幹子弟組織了一個叫“聯動”的團體，在北京城製造了“紅色恐怖”——這是“聯動”自己公開呼喊、公開塗刷印製的口號，這是以階級敵人的鮮血、生命終止為標誌的“紅色恐怖”，這是對毫無還手之心、還手之力的老弱病殘婦孺極盡欺凌、污辱、毒打、折磨肉體至死方休的最懦弱最卑怯的“紅色恐怖”。就兩個月的時間，北京城內被如此活活打死的達幾千人。

東四一帶有一家“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遇羅文：大興縣屠殺調查——載：香港《開放》）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師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問她：“喂，聽說你在紅8月時打死了3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三個人。”（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載：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紅色恐怖”之風刮向了全國。這一段歷史已經記錄在案，無論是中共，還是任何幫間，都無法更移和否認了。那麼，宋彬彬是否真的打死了人，重要嗎？不要再為此糾纏了！

應該“糾纏”的是這些“聯動”紅衛兵為什麼如此瘋狂毫無人性？事後為什麼不知懺悔？

“聯動”紅衛兵開始成立時不壞、不惡，只是愚昧！他們從一開始，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天職，以出身革命家庭為自豪，以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為自許。這一切，是他們父輩的傳承，是毛澤東思想的罪惡，無論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子女，還是宋任窮和元帥將軍們的子女，概莫能外。當時的全中國大眾，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深度、自戀自許的程度有別罷了。發展到打

死人的地步而且是如此瘋狂慘無人道地打死人的地步，人性的惡膨脹到無窮大，表現得淋漓盡致時，他們本身才難辭其咎。

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如果作俑者中共，如果全社會檢討錯誤、懺悔罪責，那麼，這些當年的孩子們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會蘇醒，會隨著檢討、懺悔。但是始作俑者文過飾非、瞞天過海，把文化革命的罪惡歸咎於造反派，找了個替罪羊“四人幫”，推給了毛澤東的老婆。既然如此昭明顯著、天怨人怒的十年浩劫都能變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政績，中共仍然高踞在“偉光正”的寶座上向全國芸芸眾生發號施令宣示宣教，那還有什麼不可以賴帳什麼不可以化黑為白的！人性的善惡有時就系在一念之間、千鈞一髮之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是！既然無須放下屠刀，也能成佛，何樂而不為呢？人性自私的一面，是人皆有，端在合適的條件下發酵。宋彬彬們本就玲瓏剔透，聰明絕頂，心領神會，深得個中真味。謊言遺忘故伎重演，“聯動”罪惡成過眼雲煙，“聯動”這一名詞從記憶歷史上抹去，“聯動”成員改頭換面、從政從商從藝著文，幾乎全部成了當今的風雲風流風發的人物。人性惡的一面捲土重來，父輩化國為私的本領得以延續發展以至登峰造極。清夜不再捫心，輾轉仍然安眠。據說美國的新澤西聚居著二、三百華裔，是中共頂級高幹的子女，年齡多在三、四十歲。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已延至第三代了。只要中共不懺悔，他們也不會懺悔的。是為懺悔的異數。

• 仇恨的異數

四川一位救助過許多人的跌打醫生武術名家趙錦才赴北京參加武術比賽，被來觀看的郭沫若認作是二十餘年前重慶“校場口”事件中動手打他的流氓。於是，厄運降臨趙錦才，文化革命中終於被逼至死。香港《開放》雜誌的一篇署名文章講述了這個故事。作者說：“過去我就沒興趣弄清‘校場口’究竟發生過一個什麼樣的事件，現在更懶得打聽，誰是誰非與我無干。我只想告訴大家，我親眼見到過的趙錦才以及他遭遇了大人物郭沫若。”

作者的認識與那種表面的仇恨迥然有異。她已經不屑於瞭解趙錦才是否曾是打手、地痞、流氓頭子或被利用的江湖豪客俠士，她只著眼於郭沫若害了人，不管其中有多少曲折，不管深層次的罪魁禍首。這種骨子裏的厭惡仇恨透著冷氣，絕非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這同文革中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已經相近，只是更沉潛了。

這些些微處的人性見出了制度與文化製造仇恨深層作用和效果。沒有寬容、不見消弭，有的只是扭曲、只是仇恨！時代的異數導致了仇恨的異數。

• 貪官的異數

大陸凡法辦的貪官沒有不養情婦的。被槍斃的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是，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是，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是，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是，現職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黃菊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是……這是一張列不完的名單。按說，人皆有七情六欲，大官也是吃五穀長大的，他們愛上異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麼就沒有一個貪官被傳出美麗的愛情故事。法辦前沒有，法辦時沒有，法辦後也沒有；正兒八經的正面的沒有，別出一格的側面的沒有，蛛絲馬跡的暗示的沒有，可以猜度的揣摩的沒有；雄性方面的沒有，雌性方面的也沒有；當事人方面的沒有，記者文人親友方面的也沒有；堂而皇之的公開的沒有，偷而摸之地下也沒有。這地下的，是什麼都有的，連政治反對派的、大逆不道的也有。這些輩七素八的最能吸引大眾眼球的卻只有揭短的出醜的色情的斥罵的而沒有讚美或實述至危不渝

至死不渝愛情的篇章，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其一是確實沒有，其二是雖有，卻沒人敢說敢寫。確實沒有，反映了全面的墮落與無恥；不敢說寫，則證實了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互相糾纏制約的關係。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落馬自殺、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逮捕判刑後，地上的地下的平面的網路的描述他們情色生活的文字多如牛毛，其中的津津樂道肯定有誇大其辭添油加醋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成份。不管如何糟蹋他們，啥事也沒有，也絕不會有他們自己或親友對不實誣蔑之處提出控告，恐怕連想都沒想到，連想都不敢想！貪官既已被定位為敵我矛盾，淪為黨的敗類、人民的敵人，那當然不是好東西，也就是階級敵人了。打落水狗時狠一些出格一些正是對黨忠誠的表現。這與文革時期批鬥走資派、牛鬼蛇神如出一轍。黨文化的根不除，其延續、綿綿不絕是正常的。

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的貪瀆在情婦們堅持不懈的上告下敗露。其中之一的情婦已經為其誕下一子。他們只有欲的追求、餓足，性欲、金錢欲、權利欲、炫耀欲、變態欲、報復欲。貪官的情色生活中沒有真愛或者說非常缺乏真愛，更談不上被時髦的潮流所一致唾棄的專一忠貞。梁山伯殉情、羅蜜歐尋死，如此蕩腸回氣令人泣下的故事不會再有，說說都會被嗤之以鼻；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真摯和痛苦但願會有當世的情婦感同身受；聶赫留朵夫為妓女瑪絲洛娃的贖罪貪官們大約十有八九不知道；美國作家霍桑《紅字》裏的女主角為情人動天地泣鬼神的犧牲精神，當今的全體連夢中也不會再有了；即便是牛虻的生父蒙泰里尼主教那無恥而又折磨了一生的愛情在當世貪官的群體中都會是最崇高最高貴的典範了。

公安部副部長、反貪局局長李紀周的情婦李莎娜據賴昌星所述其醜無比：“她人長得很難看，真的很難看。”（摘自《遠華案黑幕》187頁，盛雪著，明鏡出版社出版。對不起，李莎娜女士，我絕無意貶損你的容貌，實在是行文的需要。）李紀周被判刑後，沒見任何他們之間互相揭發推諉的報導，公的私的都沒有。這可能是貪官情色生活中的例外。以李紀周的高官階，找一位年輕美貌的情婦是輕而易舉的事，卻偏偏愛上了賴昌星說的“很難看”的小警察李莎娜。據大陸人民網報導，李莎娜在法庭上“聲情並茂”地表白：“我是一個女人，我知道怎樣愛護男人，如果知道公司運的是走私貨，我就不會拉李紀周下水”。據大陸中新網報導，李紀周懺悔道：“四是為情所動，因情害己。我在1992年下放廣州公安局帶職鍛煉期間與女幹警李某接觸很多，關係越來越密切最終墮入情網。我是有婦之夫，這本身就不道德，後來又因她而亂用職權，干預下面辦案，……”這是貪官與情婦之間很少見也很難得的真情。當然，沒有人對此也決不可能有人對此同情欣賞。這是制度和黨文化決定了的。其實，李紀周李莎娜在如此特定的境況下，他們人性中的善與美也只能在這一點上顯示出來。

人性有善惡、美醜。聶元梓、王光美、江青、張春橋、林彪、貪官是人，情婦也是人。不管他們的政治形態如何，首先他們都是人，他們一定都具備善惡、美醜的雙重性而絕非一壞到底無絲毫人性的惡魔。在正常的社會中，那怕是回到中世紀的封建皇朝時代，這一點也是昭明顯著、確鑿無疑的；只有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他們全成了惡魔。正同他們得勢時地富反壞右、學術權威、走資派……是牛鬼蛇神是“腳底流膿、頭頂長瘡”的惡魔一樣。這種根本性的似是而非混亂顛倒的現象是根深蒂固的黨文化所造成的，深入人心、融落血液、化進骨髓了，改變與糾正千難萬難。

• 食子的異數

陝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湘鄂西紅軍根據地創建人段德昌被自己人以革命的名義殺掉是在非常時期，不算異數。因為“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子”已是耳熟能詳的話了，中外皆然。

坐穩江山後仍然“食子”才是異數。例子太多，五十萬右派就是，舉不勝舉。其中最冤枉者之一是周居正。

周居正和江姐江竹筠、羅廣斌（紅岩小說作者）一起被關在國民黨重慶監獄渣滓洞。1949年9月，周居正和羅廣斌得知中共建政的消息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了一面五星紅旗。這個情節後來通過小說《紅岩》、電影《在烈火中永生》、話劇《江姐》、歌曲《繡紅旗》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典範教材，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血洗渣滓洞，獄中的共產黨員策反敵特然後越獄。在生死關頭，周居正幫助難友郭德賢背出四歲小孩。周居正是渣滓洞裏逃出來倖存者的異數。未料，虎口餘生的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勞改時被弄成右派“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判處死刑，綁縛刑場，執行槍決了。周居正槍斃前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無論是屈打成招，或是真的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周居正都是最忠誠的共產黨員、最熱心的馬克思主義者。比爹娘還親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容不了他，一定要吃掉他才放心。後來者劉賓雁，更將這種忠誠演繹成無往而不正確的“第二種忠誠”，還是也被吃掉了才放心。是為食子異數。

“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異數文化需要如此大器的分配與歸屬，這種文化、這個社會才會正常起來。但是在當今的大陸以及可見的未來，這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

第十七章 不是未見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所有政治問題因為牽涉到政權的根本，中共自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思想理論，不容外人置喙，我行我素，天馬行空，為所欲為，或可理解。于純科學、純自然的問題為什麼也非要一意孤行不可呢？

1955 年，毛澤東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裏提出“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此後五年，麻雀被定性為害鳥並判極刑，各地展開了捕雀運動。

科學家則提出不能消滅麻雀。

1956 年 10 月，青島舉行了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大會。實驗生物家朱洗首先講了一個故事：1774 年，普魯士國王下令消滅麻雀，並宣佈殺死麻雀有獎賞。百姓爭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園卻佈滿了害蟲，連樹葉子也沒有了。國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去外地運回雀種，加以繁殖保護。朱洗說：“除了在某些季節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節是有益的。”大多數科學家都建議，在沒有正式得到科學結論以前，希望政府考慮不要轟轟烈烈地搞運動。可是，毛澤東執意要消滅麻雀，執意要搞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來消滅麻雀。

1958 年大躍進時，消滅麻雀的舉措臻於登峰造極、曠古未有之境：規定在某日某時全中國凡能從房裏出來的人都出來上街上房，敲響所能敲響的所有響器幾十分鐘，以嚇唬麻雀疲於飛命，落地殞命。筆者當時在上中學，與校長、老師、同學一起幹了這件震古礪今的大蠢事。筆者敲的是臉盆，把搪瓷都敲掉了，回家挨母親好一頓數落。記得是一陣一陣的敲，不是一直敲，那大概人也受不了。看見幾隻麻雀倉惶地飛過來了，就又來勁地敲起來。可憐的麻雀一頭栽下來時，萬物之靈的人就一陣歡呼，歡呼毛澤東思想、總路線、大躍進的偉大勝利。

就在“麻雀戰”轟轟烈烈的時候，鳥類學家鄭作新和他的同事們走遍了河北昌黎果產區 and 北京近郊農村，採集了 848 號麻雀標本，一個一個地解剖嗦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種食物的容量。他的結論是：冬天，麻雀以草籽為食；春天養育幼雀期間，大量捕食蟲子和蟲卵；七、八月間，幼雀長成，啄食莊稼；秋收以後主要吃農田剩穀和草籽。總之，對麻雀的益害問題要辯證地看待，要因季節、環境區別對待。他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1959 年 7 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萬言書，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為整彭德懷，連帶及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最不可思議的是“城門失火”，竟殃及麻雀。毛澤東不僅不理睬任何忠言，也不聽科學家的常識意見，固執地說：“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直到 1959 年 11 月 29 日，廬山會議的勢頭已過，彭德懷薦了，劉周朱陳鄧諸人服了，毛澤東才在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的一份“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上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張勁夫報告中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

張勁夫的報告是 11 月 27 日呈遞的，毛只隔一天就作了批示，可見此事在毛心目中是占

著位置的。次年3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一個這麼簡單明白的有關生物學食物鏈的常識問題，毛澤東硬要折騰了五年之久，才不情不願地停止了愚蠢的自殺行為，還不作絲毫的反省與檢討。為什麼？固然，制度導致的合作化運動、大躍進所燒起來的狂熱是其弊端，但愚蠢延續了五年之久，毛澤東明知不對，卻偏要拗著幹。製造災難的元兇就不只是制度而應同時歸咎于文化的落後和人性的醜陋了。

毛澤東固執地拒絕馬寅初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意見，除了他根深蒂固的視萬民為芻狗的觀念、戰爭中人多好辦事的經驗外，也有他不懂幾何級數的增長不同於算術級數的增長這個數學問題的原因。毛澤東自視甚高，不是一般的高。年輕時就“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當了皇帝後，更上層樓，歷來的邏輯和事實是當了皇帝要上天。如果真是這樣，中國就有福了。可惜的是，在這一點上，他卻從來也不糊塗。他把心思放到征服世界，當世界霸主的上頭去了。自視高至此，那會把一般小事小人物放在心上。錯就錯了，打什麼緊，交一點學費嗎，革命路上最正常不過的現象。何況，這種一呼萬諾，生殺予奪的帝王感覺是十分美妙而引人入勝的。生物鏈和幾何級數，對於具帝王氣象的毛澤東來說，又何須明白深究！

與打麻雀同時的糧食高產放衛星的鬧劇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

當時，水稻畝產最高13萬斤，小麥12萬斤，棉花5千斤。這些從常識來說是絕對笑話的謊言竟能讓全國人民相信，讓毛澤東激動地感歎：糧食多了怎麼辦？有人計算過，13萬斤的稻穀鋪在一畝地裏，會有1米高。能相信這睜眼的瞎話是得有非凡的本領的。筆者一直想不通想不明白種過地的皇帝毛澤東怎麼就成了白癡！直到看到了中國最大的科學家錢學森運用嚴格的科學論證，肯定一畝地地能種出十幾萬斤稻穀的文章，才明白原來是怎麼回事。

錢學森：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青年報第1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2105斤以後，又有2畝9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3530斤小麥。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千多斤或3千多斤，而是2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160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160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第4版）

君子可欺之以方。春秋時鄭國首相子產讓僕人把魚放生，僕人偷吃了魚，卻對子產說魚已放生，還作了一番生動的描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騙得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這個故事說明了人性是需要欺騙的、樂於接受美好的欺騙的。毛澤東需要謊言，但他需要言之成理的謊言，他不僅需要欺人，也需要自欺。錢學森施展幫忙幫閒術，投其所好，運用自己的科學知識：植物生長所需的日照、養分，加上數學的嚴密計算，從理論上推算出、推斷出一畝地能打幾萬斤稻穀。毛澤東正需要這個，正中下懷。所有地方上一個接一個放得更高的衛星，一畝地的產量從幾千斤到幾萬斤到十幾萬斤的謊言，都有了科學上的堅實依據，再不是信口開河了。毛澤東心安理得地接受歡呼三呼。

麻雀的科學不相信，水稻的偽科學就相信，正是從需要出發。

不是未見及此，而是就要逆此！這還有什麼辦法？！

推而廣之，禍而延之，試看當今大陸，“就要逆此”的事數不勝數，變本加厲，其源蓋在此也！還是這位大科學家錢學森，對“人體科學”癡迷不已，故伎重演，著文介紹，成立人體科學研究會，表演耳朵認字、意念移物之類的魔術，令王震這類武夫目瞪口呆，信以為真。

稱為民族搖籃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傷了她的元氣，全都見著了；卻就是硬要再在長江上建三峽大壩，任當代大禹黃萬里怎麼哀告都置若罔聞，非要把這條父親河也碎屍萬段不行。不是未見及此，而是就要逆此！這還有什麼辦法？！

治國就要逆著幹，幫閒如此逆著幫，全國民眾視若當然、處之木然。這還有什麼辦法？中國還有明天嗎？！

第十八章 亂象紛呈碾碎一切

古代很講究星象、占卜。帝王們對於星象、地貌的變化如隕石、地震之類的自然現象很敏感。於是，應運而生了一批專門的巫師、術士，專職地解釋、禳解星象和地變；連帶及朝廷上下和社會民間對此都熱切地關注起來。由此造作出：吉年，則鳳凰翔、麒麟現；凶歲，則牡雞鳴、妖異出；隕石落，主將帥或人主亡；地震起，兆國家政局動盪……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一切，兩千餘年的傳統文化把它擺在了一個還算恰當的位置：不盡信。也就是不是全不信。五十七年的文化則一言以蔽之：迷信！這“迷信”的宣傳教育有它科學思想普及的一面，也有愚民的一面。毛澤東自己，則是大體相信的，尤其是關係到他本人身家性命的時候。關心則亂！尊貴如毛、狂妄如毛、智慧如毛、明察如毛、成熟老到如毛，也脫不出人性的規範與羈絆！

1976年吉林降隕石、唐山大地震，對毛澤東打擊很大，他問身邊人孟錦雲隕石的事，他固執地不搬住處，都說明了他對此很在意、很相信。唐山地震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不到2個月，毛澤東就在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嗚呼哀哉了。

今年離毛澤東之死恰好三十年。我特地提到毛澤東之死與天象、地變有關，是對當今之世的亂象紛呈心懷戒懼。

這些亂象，不只是本書上述的一切，還有更為深層的亂象！

退休或在職的將軍閑極無聊，竟集體涉足水利工程，介入之深、人數之眾，聞所未聞。請看有關報導。

118名將軍支持的朔天大運河方案驚動中央高層

開利綜合報導。至今仍在中央一些部委與研究機構中廣泛傳閱的《西藏之水救中國》，其實早在2005年12月就已引起很多人關注，這本書由二炮政治部原創作室主任李伶歷時17年跟蹤采寫而成。

此書所描述的“大西線工程”，投資達2000多億元，由民間水利學研究者郭開提出，並多次引起激烈爭論和質疑。

“儘管我們知道中央一直在關注這件事，但他們對這本書的反應速度還是超出我的意料。”朔天運河籌委會成員于招英回憶。

曾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任職的于招英，在2005年12月找到秘書局的一位老友推薦此書。但秘書局朋友的回答讓她吃驚：“早知道了，我們還專門從書店買了，給中央領導一人一本。”

原來，此書在此前一個月剛出版，首印的一萬冊基本被中央各部委買走，僅水利部就一次性買了一百本。

韓守文則回顧了送書給中央領導的過程與領導的回饋。現年70余歲的韓守文曾在解放前做過鄧小平及數位將軍的機要秘書，他在十餘年前也加入了朔天運河籌委會。今年1月21日，他通過機要管道把此書送給有關領導。1月26日，領導身邊工作人員回復他，

書已送到領導手中。“2月4日，還在春節期間，國務院領導就批示水利部、發改委與南水北調辦，研究書中介紹的‘大西線’設想。”

這本書在部隊高層中的流傳也極為廣泛，這和朔天運河籌委會許多成員的從軍背景直接相關。10餘年前就支持“大西線工程”的原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上將，年逾80，用一個星期將書看完。“書寫得太好了，我就給一些領導同志送過”。白髮蒼蒼的劉振華介紹了這一送書過程。劉振華回憶，一位部隊領導告訴劉振華：“這個意見（指大西線設想）有不同看法。”劉振華問：“不同看法的利弊是不是應該比較一下？”領導回答：“還需要以後再看。”

中央政策研究室問策郭開

不過早在出版這本書前，73歲的民間水利學家郭開已親身感受到高層對“大西線”方案的關注。出書前的3個月，2005年8月2日，他和于招英被中央政策研究室請去討論“大西線”問題。郭開滿頭銀髮，眉毛鬍子都是白的。他給記者的名片上有諸多頭銜：朔天運河大西線創始發起人、總設計師；著作家、教授、經濟師；中華朔天運河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北京朔天諮詢開發公司董事長。據他介紹自己曾隨四野打過仗，在文革期間被關入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裏發現了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的英文版《中國地理》，書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彎”理論。這讓解放前在清華旁聽水利專業課程的郭開產生了一個奇特的想法：是否可以引雅魯藏布江水，串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魯江、大渡河，過阿壩分水嶺入黃河，從而解決整個西北與華北缺水的問題？平反後，他開始請教從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專家，為考察水系自費走遍大半個中國，他不斷地修正初始想法。“還把許多人拉了進來。”10多年前，于招英就是這樣被郭開拉過來，她從中央機關辭職後加入了朔天運河籌委會。

8月2日那天，他倆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負責人相對而坐，另有研究室的3位司局長，6個人就“大西線”談了3個多小時。郭開等人認為：“大西線”將是可以徹底解決我國水資源危機和沙漠治理的最大國土整治項目，是關係全國經濟發展、社會改造的一件大事。大西線也是解決我國耕地、糧食及新農村建設問題的出路之一，並且和國家戰略安全問題直接相關。他認為大西線上馬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日益成熟。23萬鐵道兵正枕戈以待，青藏鐵路完工後可馬上轉向延伸線，將青藏鐵路修至大西線起點朔瑪灘為大西線鋪平道路。8月1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告訴郭開，他已向中央領導彙報了8月2日的談話內容，中央領導認為需要慎重論證。

這次談話後，中央政策研究室有關負責人與郭開有了經常性的聯繫，郭開粗略一算，從去年8月到今年6月，他們就“大西線”問題已商討11次。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關工作人員稱，郭開對這件事非常熱心：“從郭開方面講，（他）這麼執著，動機是好的。從國家方面講，會涉及多少年後的一個大布局，而且還有許多反對意見。反對意見涉及到投資問題、對環境的影響、供水量的問題。供水量達不到怎麼辦？投入大，產出小，不能成正比怎麼辦？許多問題還需要考慮。”這位官員提醒，要多聽取反對方的意見。

一百余名老將軍支持

郭開、于招英之所以在8月2日被請進中南海，和原空軍副司令、少將王定烈為他們向中央領導呈送大西線報告直接相關。王定烈少將現在是朔天運河籌備委員會主任，他從1992年參加這一籌委會後，至今年五月已向有關部門先後遞送了16份報告，要求上“大西線工程”。將軍的努力促成了郭開被中央政策研究室問策。而這位起推動作用的少將和向中央高層薦書的劉振華一樣，是老將軍老幹部群體的代表，“大西線工程”先後得到了118名將軍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將，17名中將，包括赫赫有名的楊成武將軍、楊得志將軍、肖克將軍等，另外包括一些老幹部。（原載：博訊 2006年7月30日）

漢朝一位丞相見路上有死人，不理不睬，見一條牛怕熱喘氣快死了，卻下車再三詢問。人問故。曰：人死有司管，牛怕熱死關係年成，乃我丞相職責云云。分工負責，各司其職，古有明訓。現代社會，更是如此。只有中國，當代的中國，才會出現這類“牡雞司晨”的亂象。

軍隊經商，軍隊走私，軍人貪腐，這些表面的潰爛看得見摸得著，治理起來並不太難。軍人幹政，如此出以公心，為民謀利，冠冕堂皇，才是深層次的難以捉摸的亂象。

無獨有偶，除了這118位將軍要當水利專家外，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將軍也著文大談農民問題。文章一出，海內外一片叫好聲。確實，文章寫的提要鉤玄、深入淺出，既入木三分，又大眾能解。比較國務院的農業問題專家，其見地毫不遜色甚或過之。筆者卻隱憂隨至：將軍未解甲，何事戀農家？沙盤演練竟種稻，運籌如何不拔刀？

毛澤東當年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是一個大學校”的最高指示。1968年，毛澤東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中學校、文化部門領導文化革命。那是因為毛澤東當時權勢熏天、胸有成竹，有意攪亂搗蛋文化界、教育界，消遣調戲侮辱文化人知識人和不聽話的學生娃子。天下在他股掌之中。他不怕亂。一旦林彪叛逆，他立即收縮自如，強弩之末亦能穿魯縞。十大軍區司令調動，也就他的一句話，一支歌。相傳毛澤東在十大軍區司令調換的會議上，指揮握有重兵、各鎮一方的十大司令及其驕兵悍將同聲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還得在金鑾殿上大擺宴席，與將帥們套近乎，交心交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才勉強行得。毛澤東卻只用起個音，動彈了幾下胳膊，就把天大的事給辦得妥妥當當了。毛澤東氣魄、膽識、才具確乎當得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八個字。

毛澤東能這樣做，那是全局在握、全局在我，要圓就圓，要扁即扁。現在呢，人事全非，時遷勢異。軍人幹政，不是被動的接指示、受派遣，做表面功夫，而是主動、積極、深入到實際事務、國家根本；更是一種其勢使然。最可怕的正是這種其勢使然！

貪官們只顧花天酒地尋歡作樂，只顧貪墨斂財，只顧安排後路、老婆兒女，只顧身家性命，顧不上政事、大事，應付、因循都是不錯的了。在這樣的亂局亂世中優秀者以憂國憂民為己任，欲脫穎而出，這是其勢必然，人性使然。越俎代庖的現象也就自然而然。這在正常的政局下是好事，但在亂局亂世中則必然添亂，好事會變成壞事。

劉亞洲是太子黨，曾是李先念的女婿。他參軍後，從戰士逐級晉升為中將、空軍副政委。他也是作家，寫過小說。但他與只有一張嘴一支筆的純知識人不同，他還有槍。劉亞洲說：“在軍人中我讀書，在讀書的人中我是軍人。”如此意味深長的話。2005年4月，劉亞洲與3位將軍、6位校官夥伴在互聯網上發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為何對我猖狂？”的文章。這是以反日為契機的政治改革宣言。其特異處在出自現役軍人集體之口。這篇文章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在眾多的叫好和批評聲中，這段話最引人注目：

美國軍隊比中國軍隊強大的地方就在於，美國軍隊絕不會讓一個既不會開飛機也從沒跳過傘，全部的軍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門搖筆桿子的人當上空軍統帥，無論他小說寫得多麼好，背景多麼顯赫。劉政委的升遷之路正是中國軍隊真正的憂患。

單是劉亞洲，亂象已三至。此其一。

歷史上武人幹政導致天下大亂的例子比比皆是。優秀的劉亞洲應該在其位謀其政，或繼續寫小說，成為大作家，或當好軍隊文職幹部，將才華致力為改革軍隊內部的一應事務。如此以帶職現役高級軍官的身份躍躍欲試於政壇，反常的舉措必然導致反常的結果！此亂象其二也。

劉亞洲連篇累牘發表大作，越俎代庖、議政論政，振聾發聵，竟能繼續不斷。這種現象的本身就是十二分悖情逆理的。放在毛澤東時代、即或在鄧小平時代，是決不會被允許也絕無可能的。三重的亂象已無可奈何地來臨了。有什麼辦法糾正嗎？什麼辦法也沒有！或許無須什麼糾正，亂象亂世的歷史就是如此的。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也大名鼎鼎的潘岳。潘岳，現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對政事作調查研究、上萬言書，引起震動，因不合上意，被置閑，被調離去管環境保護。一位記者如是介紹潘岳：

1991年，面對劇變後的蘇東局勢，當時由一批年輕的中國官員和學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戰略性文件，名為《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這份研究報告主張中國共產黨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同時批判了“浪漫主義改革觀”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強調“循序漸進的現實主義和理性主張”的經濟改革觀和“中國是中國人的惟一家園”的民族主義世界觀，學術成果直接上報中央，並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其背後主要策劃者，正是潘岳，而那份文件，也是他1991年9月主持的一場研討會的結果。

2001年12月，《深圳特區報》、《華夏時報》等幾家報章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的文章。文章指出，馬克思的原意對宗教的鴉片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只是列寧在解釋時創造性地加上了“麻醉”兩字，即改為人們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令宗教被視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後，“一直以鴉片論作為我們認識宗教的圭臬，以致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度產生偏差，並為此付出代價。”其作者，正是潘岳。

2002年上半年，一份題為《對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的“政改報告”悄悄在中央高層傳閱。由於這篇理論報告作為內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領導作為決策參考，因而有人稱之為中國共產黨近些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政改奏摺”。其作者，正是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的潘岳。……這篇文章為潘岳贏取了“中共政改標籤”、“當代康梁”的稱號。（摘自：博訊）

潘岳志在政界，無論這位記者如何溢美，潘岳已經有所作為且在政界繼續大有作為的可能性是很大地存在著的。但是，潘岳被從政界排除，調任環保部門。這種深層次的亂象與將軍對水利指手劃腳、去管農民問題恰好相對照。

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已是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國家環境保護局不管發現多大多嚴重的環境、生態問題，總是只能識其然而不能治其所以然，總也鬥不過地方官，總在層層、重重的地方保護主義的鐵障前敗下陣來。這種亂象又有幾人識得其嚴重性和不可逆轉性。少數明白人也因為身處其中而總冀其“前途是光明的”。這是人性使然。歷史則只管依著自己的鐵

則而行，任誰都阻擋不了巨輪的一滾向前。

地方諸侯自身的愚蠢無知所造成的亂象更是不可勝計。

人民日報8月12日曾華鋒報導：

蘭州市屬於缺水型城市，人均年可利用水資源量僅為742立方米，低於國際規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嚴重缺水城市標準。有資料顯示，由於地下水位元下降，造成井群開採能力降低，10年前蘭州地下取水每天能達到20萬噸，而今天蘭州每天從地下只能取出5萬噸水。隨著一些大中型企業的崛起和外來人口的增加，蘭州市水資源已供不應求。但記者採訪發現，這座缺水型城市還存在諸多浪費水資源的現象。

蘭州市城市節約用水辦公室有關負責人介紹，蘭州市目前有8033戶用水大戶。由於體制原因，被列入計畫管理的只有1114戶，覆蓋率僅為13%，距離國家對北方城市要求的95%的計畫覆蓋率相差很遠。

來自蘭州市自來水集團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市每月特種行業用水量約4萬噸，一年近50萬噸，相當於西湖的水量。這些“特種行業”指的是高檔桑拿、洗浴、美容美髮、純淨水生產、游泳館、洗車等行業。這些行業用水量大，目前政府採取高水價來調控，成效仍然有待提高。

農田裏水汪汪一片，照得出人影，令人疑入江南水鄉。記者在蘭州市、張掖市甚至嚴重沙漠化的酒泉市看到，為了滿足春播種苗極少量的水分需要，農民們普遍採用冬前“大水漫灌”（俗稱“安冬水”，為冬小麥安全越冬灌溉），一次用水量常常高達150立方米/畝左右，而研究表明，次年用於作物發芽的水分只有20%—30%，大部分的水分在冬季自然蒸發耗費了。

甘肅省農牧廳副廳長尚勳武介紹說，全省農業用水約占全部用水量的87%，大部分農民還缺乏科學節水意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係數在0.5以下，有的甚至只有0.3水資源嚴重浪費。（摘自《人民日報》2006—08—12 第5版）

如此自殺的行徑竟能大暢其道！地方官什麼時候能從醉生夢死裏清醒過來呢？十年之差，地下水從20萬噸減為5萬噸，還不能引起警惕，採取措施。那麼無論如何嚴峻的水資源形勢，未到渴死的程度，大約是不可能讓他們明白自己已經自殺了許多回了。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明白了，又能如何？大廈之將傾，任誰也回天無力！也許蘭州還有明天、明年，但10年之後呢？二十年、五十年、一百一十年之後呢？樓蘭古國毀滅景象的重演是勢所必然的！

這種亂象已不是表面現象，已不是文化革命期間的打砸搶、鬥批改，它不僅深入了社會和國家的命脈，而且乃勢所必然，運會如此！其力量如一個巨大的齒輪，不可逆轉地向前滾動著，碾碎一切！

第十九章 文化秩序重建無望

當今的文化秩序不倫不類、不衫不履、不陰不陽、不男不女、不三不四、不上不下，不東不西、不古不今……馬列有之，毛鄧有之，江湖有之，西方有之，傳統有之，一鍋大雜燴！所有的“有之”無不以其與主流文化對立的、落後的、醜陋的、惡濁的、最低級的易仿效的內容為主為能。假惡醜大行其道，競相爭顯，惡性循環，如蠅逐臭，沉渣泛起，攪動醬缸缸底，穢氣熏天，邪氣高揚，戾氣瀰漫，正氣消弭，祥和蕩然！積至今，已逾半世紀，其一發不可收拾，終至坍塌毀滅，乃事理邏輯之必然。

會有新秩序嗎？

千古一帝毛澤東在拼命砸爛傳統的文化秩序時，欲重建一個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文化新秩序；用他自己的話，叫作“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卒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為標誌，失敗了。

舉重若輕的鄧小平以鐵腕制止體制內姓社姓資的爭論，以鐵血堵青年學子民眾之口，創立“四個堅持”的新秩序，終以坦克碾人為肉醬，武裝保衛腐敗貪墨而遭孽萬載，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多才多藝的江澤民換了新招，推出三個代表，號呼以德治國，高唱“我的太陽”，重建江氏王國新秩序，奈何手下大員和太子首先“悶聲大發財”、自身總是出洋相而胎死腹中。

馴服工具胡錦濤發揚毛澤東故智，事事因循，時時守舊，高舉艱苦樸素大旗，讚揚“社會主義明燈”古巴、朝鮮，要回到毛的舊秩序去。這就等而下之倒行逆施了。無須拭目以待，且看烽煙四起，千瘡百孔的現狀，也就可以推斷其結局如何了。

毛澤東、鄧小平已經作古，不論也罷。江澤民、胡錦濤尚在人間，垂簾幹政，高踞帝位，影響所及，行政所及，凡我華夏子孫，莫不身受。

江澤民手下兩員親信大將賈慶林、黃菊，原為北京市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將賈慶林從福建省委書記任上調到北京任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又安排賈慶林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賈慶林與“遠華案”主人賴昌星關係甚深。賴昌星在加拿大避難，有國際聞名記者盛雪採訪在加拿大監獄中的賴昌星，寫成《遠華案黑幕》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已重版了三十餘版。出版前威脅利誘電話不斷，有出價一百萬美元買斷此書的。

黃菊進京、進政治局常委班子情形類賈慶林。賈、黃還有一點相同的是人望極差。中央組織部、中央辦公廳諸有關部門多次組織對領導人有關情況的問卷調查，黃菊、賈慶林都排名最末。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恒，以零學術專著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任“神五”副總指揮。江綿恒還任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長、董事，僅一家與臺灣王永慶之子合作的公司就號稱資產64億美元，而王公子聲稱自己沒出一分錢。

江澤民2002年在中南海接見香港特首董建華，現場採訪的香港記者對江澤民窮追不捨地提問。江澤民招架不迭，竟失態斥罵香港女記者“悶聲大發財”去，一時傳為經典之醜。

江澤民化了1億2千萬美元向美國波音公司訂購了一架專用座機，竟發現被安裝27個竊聽器。這架專機最終擱置不用。1億2千萬美元，相當于10億元人民幣的老百姓血汗錢買了個水瓢。解放軍總參三部情報頭子姬勝德因此被撤職判刑。此事國內封鎖甚嚴，海外報導至今仍撲朔迷離，不明究竟。

江澤民執意在北京建造歌劇院，耗資達30億元，歌劇院6200個座位，每個座位造價近50萬元。

江澤民彈琴、唱歌、吟詩、梳頭、說外語樣樣在行，都能秀出驚天動地震竦世界的大響動來。此類事太多了，道不勝道，說不勝說，有諺言入木三分曰：他就像我們以前找代課教師工作被試用時，說自己語文、數學、體育、歷史、唱歌彈琴，什麼都會，什麼都能教一樣的心態。

戲作“某氏三秀三哭”散曲總記其事，為江氏的作秀文化立此存照。

某氏三秀三哭

上世紀六十年代，趙朴初先生有“某公三哭”，狀寫赫魯雪夫“哭三尼”——哭肯尼迪、哭尼赫魯、哭自己。“四人幫”垮臺後，余仿作“某婦三哭”，描摹江青哭軍師、哭王姚、哭自己。今作“某氏三秀三哭”，戲言某氏哭唱秀、哭吟秀、哭演秀。順口打油，格律未計。為大陸民眾未悉訊息，不明究竟，不解典故，每哭後，略附注解，同聲共泣，助某氏悲哀也。

一、哭唱秀

【禿廝兒帶過哭相思】

上海灘頭黃浦江，戲子家鄉，樣板曾輝煌。生旦淨末俱工矣，一醜未妙，當仁我不讓。吹拉彈，絕活殿后腮幫兒漲。指兒癢，李斯特鋼琴，勿動手阿拉奏叮噠。克林頓、小布什，冰島北、呂宋南，無分總統元首大國與小邦，管什麼紳士淑女國宴堂，且作我，客串吊嗓嘍功演秀場。未料宴半腹尚饑，倒胃翻腸。你的紅燈今猶亮，“我的太陽”無人賞。哭曲高和寡你們不懂行，赴澳門吆喝女同志來臺上，陪歌洪湖浪打浪，傷心誰識再獨唱：“教我如何不想他”，戲祖江娘娘。

- 李斯特博物館擺著一架鋼琴鼻祖李斯特百餘年前用過的鋼琴，顯眼處寫明“請勿動手”。某氏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下來就彈，管理員目瞪口呆，驚訝不已，阻不是，不阻不是，一臉尷尬。

- 某氏向多國元首獻唱義大利名曲“我的太陽”。某氏在冰島國歡迎他的國宴進行到一半時，突然站起來高歌“我的太陽”，使參加宴會的冰島政要、來賓面面相覷，交耳相詢，莫名其妙。翌日，媒體大嘩。

- 某氏在澳門回歸一周年慶典時，上臺獻歌，大聲喊：“女同志一個都沒有不行！”澳門特首四姨太上臺陪唱，齊唱“洪湖水浪打浪”後，某氏獨唱三十年代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

二、哭吟秀

【哭皇天帶過烏夜啼】

我豈止吹拉彈唱雕蟲技，風雅事筆硯詩書也來的。李二椅，圖釘按字盡爬還要題，怎不羞死矣。看我舞文筆翰墨世家繼，賽顏柳，棒槌體，蓋了你，鳥朋弟。十三年，七百一，七百一超毛追康熙。題罷字，背唐詩，烽火三月連家書萬金抵。腦晃頭搖癱發，我會杜拾遺！創作能攀太白齊，與時進，千里一日，十天萬里，坐飛機當然快的。譏狗尾續貂辱詩仙，繪黃山雲濤夢持筆！破字兒傳世萬古一人誰堪我比！未料網壇盡嗤鼻，熱嘲冷諷容無地。歎一聲我欲乘風歸去兮，西去陽關風急，東往蒙館門閉。哭吟秀罷，還當主席。

- 有媒體統計，某氏十三年來題字逾七百多次，遠超毛澤東一生題字的四百餘次。

- 陳水扁競選臺灣總統，台海形勢趨於緊張。有記者問某氏看法如何，某氏答以杜甫詩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云云。

- 某氏訪G國，詩贈G國元首，“次韻李白早發白帝城”曰：“朝辭華夏彩雲間，萬里南來十日還。隔岸風聲狂帶雨，青松傲骨定如山。”某氏作“登黃山有感”詩，有句“且持夢筆書奇景，日破雲濤萬里紅。”

- 某氏面對美國一華僑相詢祖國西部開發投資情況，高吟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某氏對港臺記者吟誦蘇東坡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玉樓瓊宇，高處不勝寒。”復吟鄭板橋俚詞：“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

三、哭演秀

【哭途窮】

地中海畔驚世一亮靚妝相，梳兒揚，側首望，撫髮媚笑對國王。韋小寶，揚州青樓梳辮忙。上海灘，洋場白相。風流天子髮絲豈能不要油光光。風情現世，傳媒定格華人皆倉惶，恨無地洞藏。有道糟糠之妻不下堂，攜赴德州農莊，邁步不管他娘，顛巍巍獨倚車旁，賴總統伉儷扶將。望夫轉，欲斷腸。飛機上，拽過老妻扳正對前方。授勳禮抓起勳章自己掛脖子上。失儀一時失態于永遠。不顧罵顧也罵，哎呀呀，可叫我怎麼辦，可叫我怎麼辦？邪火發香港，提問豈能琴亂彈，邊吏欽定自古然。戟指記者太幼稚，窮追猛打識機關，且快去悶聲發大財，一國兩制豈能讓我受難堪！全不識曾談笑風生偕大腕；國歌能唱容易，兩個都會才難，民國頌非我誰敢，咬字准音正腔圓；秀外語英西俄更家常便飯，遇抗議方寸大亂，唯一辦法，比高叫喊。可憐聲嘶力竭，曲終劇散。哭秀功精湛無人可傳，九十公斤，坐臥不安。

- 某氏屢屢當世梳頭，已名震宇內，尤以在X國王、王后前兩次從容掏梳，一手按髮，一手握梳，側首作媚笑狀為最，媒體皆驚以頭版頭條，配以大幅照片報導。

- 某氏攜妻訪M總統私家農場，M總統夫婦迎候。某鑽出轎車，徑大步前行，撇下龍鍾老妻顛巍巍倚靠轎車門邊進退維谷。M總統夫婦見狀不忍，上前一邊一個攙扶某老妻前行。電視、照片，全過程留此存照。

- 某氏訪某國歸，機場送行，某氏老妻上舷梯到機倉口時徑直往裏走，某氏見狀，一把拽過老妻，使勁按住肩膀扳正她面向歡送人群招手致謝。媒體評論：妻失儀于一時，夫失態于永遠。

- 某氏被T國授予榮譽勳章。授勳典禮上，當身材低於他的T國總統欲從盒子上取勳章時，某氏五指遽下，自己抓起勳章，自己給自己戴到脖子上，作微笑得意狀。一時，全場愕然。

- 某氏接見香港記者，應對失措，惱羞成怒，戟指斥罵記者太幼稚、太簡單、水準低，大談自己見過大世面，到過許多國家，同美國名牌主持人“談笑風生”，要記者去“悶聲大發財”。

- 某氏會見臺灣客人時，向客人獻唱中華民國國歌，從頭到尾，一字不差，一字不落。

- 某氏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有人在場外抗議，高喊口號。記者問某氏，如何看待抗議。某氏答曰：唯一的辦法是我的聲音要高過他們。

- 某氏多次對人說到自己體重九十公斤，位置坐得穩，不會跌倒。

胡錦濤是當今皇上。他不是光緒載湉。他可以滿世界地走。他年歲比載湉大了一倍，成熟得多。他應該有所作為。可是他六十餘年的生涯有五十七年是在中共不倫不類的文化薰陶下，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庇蔭下，在江澤民的虐待下過來的。這就決定了胡錦濤只能是個乖孩子是隻小老鼠似戰戰兢兢的乖孩子，畫一個圈，站在中間，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乖孩子！

胡錦濤的科學知識尤其是水利電站專業知識是光緒不可能比擬的，但是胡錦濤的人文、歷史、治平常識則不及光緒的零頭，因為胡錦濤從小到大，接受的是階級鬥爭、馴服工具、學雷鋒的教育與訓練。如果胡錦濤從事水利電站工作，他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專家；但他從政了，且被選中了當皇上，那麼，治國的學養、才具、能力、膽識、氣象就是最需要的、第一位的。且來看他的學養。他讀的專業之外的閒書是：《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所以，他回答外國記者關於讀過俄羅斯哪些文學名著時會回答是上述這兩本書；所以，他甫坐上龍椅，就去窮山溝西坂坡朝聖，配合著不去避暑勝地北戴河開會的舉措，意在用毛澤東艱苦樸素的思想道德去壓江澤民一頭。這種典型的五十年代的做派，完全是小孩子玩家家捉迷藏的把戲，新形勢下，徒增笑柄罷了。也因此，他會在內部講話中，發出學習古巴和朝鮮的號召，而全然不明白，這不僅是在與全世界潮流擰著幹，也是與他自己黨內的無論是對手還是手下對著幹了。

《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一書是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英雄姐弟卓婭、舒拉的母親寫的一本大眾讀物。1955年，中國的么洵翻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那個時代的蘇中青年，受這本書的影響至巨至深。紅色中國、紅色蘇聯用此書教育灌輸國民忠黨愛國思想是很成功的。

被譽為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與胡錦濤一樣讀過《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且寫了筆記。試看梁漱溟純從人生人性的角度抒發感慨：

《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敘述蘇聯衛國戰爭中壯烈捐軀者青年兩姐弟，出之其親母手

筆。二子身為國殤，其盡忠與國之情節自當所詳。而為母氏顧從其自身結縭說起，與其家人間夫婦、親子、兄弟之情縷縷焉委婉言之，親切自然，至性動人。由是而知其子忠烈固自有本有素，非發見乎一朝。……嗚呼！此母固不凡矣！慈愛、孝友、忠貞……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記著，這是事實，我們經受了這個，不能讓這事重演！……墳墓裏的人並不是真正的死人，忘了戰爭慘禍，容許新戰爭發生的人才是死人！”此心昭昭炳炳，常有以昭覺後人者，是固不隨物俱化矣，則其人何曾死？若其昏昧頑冥、略無心肝、不知痛癢者，則為曰死人，抑何不可？此母最末一句其識此義乎。（《梁漱溟全集》第8卷）

梁漱溟這篇筆記是在文革期間寫的。他借題發揮，對當時大陸全民皆兵的好戰行為進行了鞭答。凡身歷當時全國發瘋了似的深挖洞場景者，凡熟悉梁漱溟寫作特點者，當對“若其昏昧頑冥、略無心肝、不知痛癢者，則為曰死人，抑何不可？”這句沒來由的話，能明白其微言大義、春秋筆法，毫顛所向，直指戰爭狂人毛澤東了。1946年，梁漱溟參與國共和談，和談破裂，梁漱溟發獅子吼：“一覺醒來，和平死了！”震撼神州大地。梁漱溟作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其悲天憫人的情懷，貫徹其一生始終。

按說，胡錦濤無論是作為普通人還是國家元首，對俄羅斯聞名於世的文學巨匠巨著真不知道也好，故意撇開也好，也沒什麼，值不得我們對此說三道四以至喋喋不休。問題在於胡錦濤對此的順口和泰然自若，此後欲蓋彌彰的補救在提到普希金、托爾斯泰時還是不忘捎帶上高爾基和《鋼鐵是怎樣練成的》，不忘著重說明他們這一代青少年是如何受著卓婭舒拉、保爾·柯察金的影響成長起來的。這只有一個解釋，類似仇恨、鬥爭的觀念取代高尚高貴高雅的情操在他心中是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治國已以此始，竟以此繼。思念及此，不寒而慄。

治國非同兒戲。可中共就是視同兒戲。文化革命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女士、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女士接見日本一個衛生醫藥方面的代表團，日本人談到《本草綱目》，提到李時珍，讚不絕口。我們的副委員長和副總理就對在座的衛生部長劉湘屏說：李時珍哪省的？今天來了沒有？安排一下，同日本客人見見。李素文、吳桂賢絕對沒有壞心，她們一個原是菜市場的營業員、一個原是紡織廠的擋紗工，都是很樸素、很本分很平實的人。她們熟悉賣菜、擋紗，治理國家，則實在欠了那份心、缺了那份力。她們沒錯，是把她們強行安置在這個位置上的人錯了。錯了不要緊，改了就好。這是中共鼻祖毛澤東的訓導。可就是陰陽奉也陰陽違，老也不改，就是不改。延至新世紀初，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掌宣傳文化大印，在深圳觀看提到神話人物夸父的新編話劇時，問深圳的父母官張高麗：“這夸父是什麼人？”張高麗答曰：“幾百年前的一個古人。”

治國非同兒戲，因為關係到億兆百姓的生老病死、安居樂業、自由幸福。即使是退回封建皇權時期，那也得思謀顧及到臣民的溫飽。皇權時期有太多的種種不是，但有一點，在選擇官員的標準上是嚴格的，並不兒戲。陪侍乾隆皇帝的翰林院一翰林，錯把石像“翁仲”讀成“仲翁”，就被乾隆貶到山西當通判小官去了。一首有名的字詞顛倒趣詩記錄了這則故事：“翁仲如何作仲翁？爾之窗下欠夫功，而今不許作林翰，罰去山西作判通！”

胡錦濤肯定與李素文、吳桂賢、李長春、張高麗一樣決無壞心，絕非有意貽世笑柄。這就好。但這根深蒂固是無法速變的，要求胡錦濤是梁漱溟，不可能；要求胡錦濤博學通才，也不必要；但作為國家元首的胡錦濤在提到類乎卓婭舒拉的時刻，學學梁漱溟，換個角度想想，則不是很難的。想到慈愛、想到孝友、想到忠貞、想到百姓、想到和平、想到鑄鐵為犁、

想到化干戈為玉帛、想到李白杜甫的詩句：“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想到約束以核戰威脅世人的屬下狂人。這是歷朝歷代、古今中外為人君者必具的氣象。千萬不要根深蒂固食古不化以對抗、脅迫、鬥爭、鐵血治國。若能如此，則蒼生大幸，天下大幸！文學常識欠缺貽世笑柄的芝麻綠豆小事自能化為一縷青煙隨風消散，或被好事的文人騷客改編渲染鋪陳敷衍成美麗的故事，為英主聖君留下一段無傷大雅的趣聞軼事。否則，貽世笑柄事小，墮落淪喪，國將不國，富者醉生夢死、歌舞昇平，貧者苦不聊生、哀鴻遍野，勇者奮起抗爭、揭竿而聚，弱者忍氣吞聲、鬱積赴死，甚者生靈塗炭、大亂或至。這些或許在你也是小事，不見餓死幾千萬人，一樣太平無事麼？但時勢已變，往者難再。毛澤東不會鬧文學常識笑話，你鬧了；毛澤東的臣民為其愚弄威懾任其宰割還感恩戴德匍匐在地三呼“臣罪當誅，吾皇聖明”，你沒此份能耐。你的臣，全都在為自己打小算盤，你的民，在萬難毀壞的鐵屋子裏不再沉睡，已經蘇醒，一個接一個，越來越多在蘇醒。你怎麼辦？覆巢的可能越來越大。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時做“昏昧頑冥、略無心肝、不知痛癢者”亦不可得，只能是千古罪人！

如此胡錦濤，如此皇上，他所要重建的文化已呼之欲出，昭明顯著了。那是一種全民再學雷鋒，焦裕祿重生，歐陽海、劉英俊、王傑、麥賢得再世，人人爭當學習毛選積極分子、做黨的馴服工具，上班前搶找掃帚掃地抹桌擦玻璃，休息日用推子幫人理髮，過馬路攙扶老大娘，撿到一分錢趕緊交警察，定時向組織彙報思想，狼鬥私字一閃念，抓革命、促生產，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讀《雷鋒日記》，看《東方紅》，聽“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寫決心書、檢討書、入黨申請書……的文化。

這是說笑嗎？不是！這種文化的復辟是可能的嗎？可能！中國可能復辟封建、可能復辟亂世，甚至可能毀滅，但最不應該復辟這種文化！

科技的進步，電腦時代的到來，中共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面向世界，使國人在較廣泛的層面上睜開了第二隻眼睛。文化界、知識人首受其惠。積澱了幾千年的進步文化基因“沉渣泛起”，結合著西方的民主、自由、憲政思想喚醒和武裝了一部分知識人。文化又蘇醒了！這一次的蘇醒不同於以往。它不再是皇恩浩蕩吾皇聖明下的囁嚅、呻吟、乞憐、廷爭、以死相諫，而是對皇權本身提出了質疑、反詰、駁難以至否定。這種聲音雖然微弱、微小、微薄，但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國際大勢的影響推動裹挾下，已在逐漸發酵、醞釀。中共已無力繼續一手遮天、指鹿為馬、為所欲為了。這是多麼好的現象啊！中國似乎有可能走上希望之路。文化的墮落與進步之爭似乎終於能以進步勝出。可惜，很可惜，這被一再扼殺的 N 次蘇醒雖然可能是比較徹底的，卻來得太晚了！

中國已無力無能再折騰了。中國的生態環境瀕臨崩潰，無可挽回地走向全面崩潰！森林無存、江河零落、水土流失、荒漠增生、水源污染、空氣污染、資源罄盡……山頹木壞、陸沉魚爛！人賴以生存、立身安命的根本沒有了，又如何進步、如何變化！？

第二十章 生態環境毀滅在即

有人說：不聽馬寅初的話，多生了幾個億；不聽梁思誠的話，拆了半座北京城；不聽黃萬里的話，毀了中國的母親河！

五十餘年的中國現代史，沒有成功的英雄。這是柄國者摧殘文化、蹂躪人文、毀滅生態的成功。馬寅初、梁思誠、黃萬里三傑都是失敗的英雄。黃萬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態。這是人類賴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續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條件與環境。因而黃萬里失敗的意義也最大。

不聽黃萬里的話，不僅已經毀了黃河，而且正在毀長江、淮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瀾滄江、怒江，以至神州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所有河流湖泊。

史有明鑒，大禹的父親鯀用堵的辦法治理黃河失敗了。“息壤”這塊可以捏在手掌又可以無窮大的土塊是鯀治河失敗留給後世唯一美麗的神話傳說。這個神話傳說，說明了即使上帝幫鯀，也治不好黃河，就是因為辦法錯了，堵的辦法錯了！治河不能堵！鯀被處死。子承父業，大禹接手治理黃河。大禹吸取了父親失敗的教訓，改弦更轍，採用疏導的辦法治河，成功了！

黃萬里，1937 年從美國學成歸國，無論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還是共產黨統治時期，畢生致力祖國水利事業，竭力主張以疏導的方法治理黃河、長江。

現代的科學研究和世界各國治河的實踐經驗無可辯駁地證實了疏導的辦法才是治河的津梁。

黃萬里是先知先覺者！他以科學的分析透徹地論證了不能在黃河上修大壩，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了是禍不是福的道理。黃萬里正是當代大禹！

黃萬里在 1957 年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黃萬里以科學資料證明此名言的悖情悖史。因為，黃河泥沙量全世界它的泥沙沖積了比長江所沖積大一倍的陸地。長江流域面積是黃河的 2、3 倍，流量是黃河的 16、8 倍，沖出 12、5 萬平方公里三角洲，黃河的泥沙沖出了 25 萬平方公里的華北平原三角洲。黃河不清，才導致此！正所謂“肯吐瓊漿淤萬頃，千年斯土民踐踏。”華夏自古以來最缺的是平川。因此，“黃河乃是全世界最優的利河，今人把它看作害河，實為我水利學者的恥辱。”

基於對黃河這一最基本的理念，黃萬里竭力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其理論根據是：河水夾帶泥沙是自然規律，不能違背；從水庫流出的清水沖刷力比濁水強大，將更猛烈地沖刷河床，河床必然大片崩塌，清水重新變為濁水。其實際分析是：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泥沙淤積在三門峽以下河道，為什麼要人為地把泥沙攔截在三門峽以上的河道淤積起來呢？其惡果將更烈！因此，黃河清是禍不是福！

“黃河每年將黃土高原上的 16 億噸泥沙沖到了下游和海裏；高壩一修，泥沙不會再被

沖到下游與海裏了——可泥沙哪兒去了呢？‘物質不滅定律’，泥沙不會消失，，只不過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攔在水庫裏了嗎？一年 16 億噸，三門峽到底有多大的庫容，能經得起 3 年 5 年、10 年 8 年這麼淤積？黃河不能清，違背自然規律非要它清，就一定會導致災難！”（多維記者高伐林語）

黃河三門峽水庫修成後，禍害甚大，60 年代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會議，欲作補救，已無濟於事。

現在的黃河，千瘡百孔，象一條破舊的漏水管，慘不忍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有關資料，1972 年黃河開始斷流，90 年代每年斷流 1 百餘天，1997 年斷流 222 天。黃萬里認為三門峽水庫大壩將把下游的洪澇威脅轉移到上游，而清水出庫又將威脅下游的堤防。這一切都不幸而言中了。追根究源，最大的禍端，在於欲斷黃河濁流的三門峽水庫大壩。

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工程，是世界水庫史上最失敗的一項工程。

事隔三十五年，當政者又要修長江三峽水庫大壩。黃萬里為制止這禍國殃民的工程，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分別六次上書最高決策者趙紫陽、鄧小平、江澤民痛陳利害，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經濟開發程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見《黃萬里文集》）

黃萬里的這一主張與毛澤東“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的楚襄王之夢當然勢同水火。科學的求實不敵詩人兼君王的浪漫，自然潰不成軍。

現在，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了，它的實際禍害也昭明顯著了，以致力主三峽上馬為當政者最倚重的水利界工程權威張光斗對其禍害驚惶失措，哀嚎“或許你們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傳的要低……但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 135 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見《三峽探索》張光斗對三峽建委辦公室主任郭樹言談話。）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千錘百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古訓竟在這個關係國計民生的天大事上對中國的當政者毫無作用。究竟是怎麼啦？

除了利益驅使，別無它解！長江三峽工程原先預算 570 億，最後花了 6000 億。（見“戴晴在澳大利亞國際河流年會上的演講”一文。）龐大的水利工程集團是獲利者。流亡美國的作家鄭義說：“不知黃萬里先生知否？——他以自己對江山社稷的忠誠開罪了一個龐大的權勢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團。爲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權勢、中飽私囊，這個利益集團反大禹疏導之道而行，大建其壩。半世紀以來，他們建了 8 萬 5 千多座各類水庫，竟占了全世界水庫總數的二分之一。在海河流域，他們建了將近 2 千座水庫。在淮河流域，他們建了 5 千 3 百多座水庫。在長江流域，他們竟然建了 4 萬多座水庫。他們還不打算住手，還準備在漢水

上再建 16 座，在長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 20 座。不把中國的大小江河碎屍萬段，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黃老先生擋了他們的權路、財路，自然只能終生坎坷，腸斷孤旅。”（見鄭義文《遙祭中華之子黃萬里》）

在利益面前，什麼國計民生、子孫萬代，什麼良心道德，全都是狗屎！當然，對於張光斗之輩來說，這利益就不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一生治河理念和行跡的肯定否定；對於主事者李鵬、江澤民、鄧小平之屬來說，則是名聲地位、集團鬥爭的需要，所以才會“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筆者原以為，高層的大部分並不知情，被蒙在鼓裏，偏聽而已。不料，深入瞭解、查閱資料後才知道他們在第一時間早就瞭解了真實情況！

三峽建委辦公室主任郭樹言把與張光斗的談話向副總理吳邦國作了匯報，吳邦國批轉總理朱鎔基，朱鎔基批轉前總理李鵬，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對這樣天大的關係國計民生、子孫萬代的大事就這樣轉圈批文，不了了之！

夫復何言！人性之醜陋，概莫能外！

不聽也罷，整他也罷，一意孤行也罷，禍國殃民也罷，你總不能公開地承認和宣揚我就是要禍國殃民吧，那麼，事實證實了禍國殃民後，你即使嘴裏還是不願承認，還要文過飾非、瞞天過海，心裏總得有點反省吧，行為上總得有點收斂吧！？怎麼就能、就敢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呢？！

我們這個民族怎麼了？！莫非上天真要這個民族滅亡？不然，為什麼會對當代大禹黃萬里視若仇敵，非要逆天而行不可呢？

時隔三十五年的悲劇重新上演時，背景從黃河換成長江！中國有幾條黃河長江？

1995 年，長江三峽大壩動工的噩耗傳來，黃萬里在病榻上作“哭長江三峽大壩動工”長句：生在江頭吞海口，心憂三峽壩工久。……庫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濤洪。楚王愁看移民苦，淺鯁爭功脅眾從。樗散衰儒不曉機，再三抗疏議陳窮。但聞猛虎千家哭，悵望輪台悔詔空。”

茲作聯語以追挽這位獨一無二的失敗的英雄科學家和詩人。

息壤鯀繼後亦惡，竟毀億兆神州既成，家國支離，魚爛陸沉，已近乎潰，非因外敵入侵，應換制度溯本；

疏導禹承先有仁，欲拯萬里華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頹木壞，幾殆乎盡，全系內殘自門，更須文化究根。

這非要逆天而行者為了事先推卸責任，將長江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決議通過，以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事有湊巧，總是充當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當年新增了一位常務委員是來自臺灣的的農業和環境保護專家。此公黃順興，有古士之風，居廟堂之高，則憂

其民，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出反對聲音。當然被千方百計、處心積慮地阻撓、排斥，竟至於用突然關閉電源不讓他發聲、將文件藏匿不下發諸下三濫的手段對付之。有敢言記者戴晴者，採訪黃順興，披露了此中曲折內情，令人驚詫莫名。見一斑而窺全豹，人民的代表大會的真相庶幾可知也。五十餘年國計民生的大事就這樣被代表著、強暴著！

查當年的代表人數是 2960 人，就 3 位代表說了人話！我們這些代表！我們這個民族！戴晴採訪錄所記甚詳，感興趣者可參閱新世紀網站 NCN.ORG

黃順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竭盡所能反對長江三峽大壩上馬而遭到冷遇、封殺的案例最能說明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關係。

制度。人民代表大會相當於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般代表相當於眾議員，常務委員則相當於參議員。惜乎這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只是花瓶，作擺設、作橡皮圖章用的；代表只是花朵、綠葉，作點綴用的。中共建政以來，沒有任何一件國家大事是真正由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監督的。高踞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的還有一個“黨”。即在人民代表大會內部，還有一個黨組凌駕於代表大會各委員會之上，那是任何不是中共黨員的人民代表絕對不可與聞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首腦“委員長”亦即西方的議長，是中共的二把手、三把手、甚或四把手。1954 年第 1 屆人大至今是第 10 屆人大，委員長人選分別是劉少奇（第 1 屆）、朱德（第 2、3、4 屆）、葉劍英（第 5 屆）、彭真（第 6 屆）、萬里（第 7 屆）、喬石（第 8 屆）、李鵬（第 9 屆）、吳邦國（第 10 屆）。劉少奇是中共黨內二把手，朱德是四把手、葉劍英是三把手、彭真是 N 把手、萬里是 N 把手、喬石是三把手、李鵬是二把手、吳邦國是三把手。他們全得聽命於中共中央，“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冠冕堂皇門面上的規定、手續，實質上，他們全得聽命於中共黨的一把手，也就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樣一種格局自然決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只是中共捏在手心、隨心所欲可圓可方可長可短的橡皮泥。制度的根本錯誤就此鑄定。黃順興的反對聲音在西方民主社會是正常的、天經地義的，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就是反然的、大逆不道的。在這樣的制度下，反對案的結局會被戲弄被消弭於無形從一開始就決定了。

文化。兩千餘年明哲保身的明訓威力強大，根深蒂固，猶在徘徊，堅決不去；五十餘年的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階級鬥爭、馴服工具……諸類觀念深入骨髓、化在血液；採取下作手段以達目的，乃歷來遊民、無賴、流氓行徑以及升格為幫忙、幫閒、幫兇後的自然反應，本不足怪。

人性。趨炎附勢似乎是人類的共性。特立獨行總是極少數。3 千人的代表大會上只有 2 個人附和贊同黃順興的提議。3 千人都愚昧無知？都沒有頭腦？都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在噬人制度與殺人不見血的野蠻愚昧文化的雙重夾攻下潰不成軍，高舉雙手投降；趨眾、趨勢的人類固有的陋性則隨風而漲，表現得淋漓盡致。

試想，如果黃萬里的科學分析能登堂，黃順興的明確反對能入室，人民代表對兩種對立的意見就能充分瞭解，就能予以深入的討論，自然就能於問題越辯越明。孰是孰非且不論，這樣一種方法、格局、形態才是處事、治國的正道。中共在理論上於此能比誰都說得頭頭是道，在文件中、在書籍裏也能明文明載，就是一到實際操作，即迥然不同，即逆道而行。那樣一種中共自己在理論上也認可的處事治國的局面為什麼就不可能出現呢？

制度是根本，文化是元兇，人性則推波助瀾，成了幫忙、幫閒、以至幫兇。這是五十餘年的定勢、定局。制度若不作根本改動，一切無濟于事，任誰無力回天。

寄希望于制度的根本改變以帶來光明燦爛的明天，是百年來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夢想。不斷地夢，不斷地毀滅，又不斷地夢，總以為前僕後繼的努力總會有繼往開來的結果。這夢，這場夢，這長夢，沒有醒的時候——生態環境崩潰在即的前景把人毀滅在夢中！

中華民族人才輩出，代有新人。古有從來治國即治黃之說，就是說，黃河治理好了，國家也就國泰民安了。現代國家，河流治理也是國家命脈之所在。不是未見及此，未言及此，而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哲人之言，充耳不聞；而是就要逆此！當代大禹黃萬里捨命相諫，就是不聽。你有什麼辦法？如此關乎國祚民生的天大事硬要如此倒行逆施，只能有一個解釋：上天要你滅忙！

危言聳聽乎？唯恐天下不亂乎？抑或懷有不可告人目的乎？

請看流亡作家鄭義寫的《中國生態環境緊急報告》一書所揭示的事實、所作的科學分析。鄭義所依據的基本上是中共官方有關部門公佈的生態環境的數字資料。鄭義只用數字、用科學的論證來說明、來展示神州大地正在毀滅的現狀和將要完全毀滅的前景。這是自然的毀滅，是森林，是土地，是江河，是湖海的毀滅！同政治無關！當然，造成這種毀滅絕對同政治、文化有關；但鄭義說明、證實這種毀滅的方法、理據完完全全是數學、物理、生物、植物、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學。以下皆為《中國生態環境緊急報告》一書的引文或綜合歸納。

1993 年，中國林業部長徐有芳指出：經數十年亂砍濫伐，中國大陸的成材幾乎完全砍伐殆盡。

東北林木砍完了，西南林木砍完了。

中國東北與北歐挪威在同一緯度上，面積也大致相等，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東北三省和挪威的森林覆蓋面積也大致相等。進入 21 世紀，經過半個世紀的濫砍濫伐，東北的森林已經消失殆盡，挪威的森林覆蓋率則傲居世界之首。

森林沒有了，其邏輯和自然結果必然是水土流失。

黃河每年夾帶的泥沙總量為 16 億噸。年均土壤侵蝕總量 20 億噸。

長江的含沙量不及黃河，但輸沙量要大得多，後果要嚴重得多。

東北黑土層已流失過半，僅剩下 20 釐米左右，已達到或接近沒有耕作價值的母質。有些地方甚至流失殆盡。

中國大陸水土流失的面積為 367 萬平方公里。每年有 100 多億噸沃土付諸東流，相當於流失 1000 萬畝耕地上的 30 釐米厚耕作層。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水土流失在面積上已經達到超飽和狀態，所有能夠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比如黃河流域水土流失之趨於好轉或穩定，主要是因為已開始進入以降雨量減少為標志的荒漠化頂級階段。

自然形成 1 釐米厚的土層需要一百到四百年，形成一定範圍可耕土壤層則需三千到一萬二千年。也就是說，人類重返這些棄地，從地質理論上說最早也是數以千年之後的事了。

水土的大量流失其邏輯和自然結果必然是國土荒漠化。

在這些水土流失的土地上，荒漠化正在繼續完成著生態環境逆演化之頂級階段：無樹、無草、無水、無土的不毛之地。

1949 年以來，沙漠和沙化土地從 66.7 萬平方公里擴大到 168.9 萬平方公里，淨增 102.2 萬平方公里，年均 2.76 萬平方公里，日均 76 平方公里。

荒漠化正從西北、正北、東北三面緊緊進逼，我們能退進太平洋裏去嗎？

960 萬平方公里家園，減去嚴重水土流失的國土 367 萬平方公里，再減去沙漠、戈壁、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約 300 多萬平方公里，就剩下 300 萬平方公里。與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約一番半。在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我們的人均生存空間已被壓縮到原來的五分之一。

我們民族最後的最珍貴的生存空間，已經從根基上開始塌陷。

水土流失、荒漠化必然導致水資源的枯竭。

中國人沒有水喝了！

全國數百座大中城市，大多以地下水為唯一或重要水源，這些城市幾乎全部缺水，並幾乎全部超采。當水危機從生產用水短缺發展到飲用水短缺時，便從資源危機而上升為生命支援系統危機。

不過近二十年時間，中華民族已墮入無水可用甚至無水可喝的絕境。

地下水超采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是海水和污水入侵。海水和污水入侵的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從根本上毀掉地下水資源，而且一旦發生，就難以逆轉。

限於篇幅，以下只將有關標題引錄。

江河湖庫枯竭——氣候災害輪番掃蕩——水污染——大氣污染之癌——垃圾圍城——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物資源耗盡。

再看最近一個月來觸目驚心的有關中國大陸生態環境的報導：

- 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空氣環境污染源。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國際能源機構發表報告說：中國到 2009 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污染源。這一最新預期時間比早先的預期提前了將近 10 年。

- 資源短缺和污染加劇了中共的水危機。

世界水大會本周首次在亞洲舉行，而選擇中國首都可能是最合適不過的了。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擁有的水只有全世界平均每人可得到的水的四分之一。污染使這個國家近一半的河水只能用於農業和工業，對中國 8 億農民中的許多人來說，飲用水成了奢侈品。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宣佈，中國僅在 2004 年就為了處理環境污染花了 1360 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近 7%。這筆錢大部分用於處理水污染。目前外國對水部門的投資只占總投資的 1%，

- 長江污染在加劇，其流域 500 多個主要城市的居民飲水受到威脅。這是中國長江水利委員會發表最新報告中說的。

- 渤海十年後將變為死海。中國國家海洋局海洋研究所專家表示：即使現在開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僅靠其與外界水體交換來恢復清潔，也需要至少兩百年。監測發現，目前渤海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是陸源污染，每年陸地向渤海排入污水 56 億 8 千萬噸，占全中國的 17、9%；主要污染物每年入海 2 百 16 萬噸，占全國的 8、5%。

- 渭水已無水可流。八百里秦川，已變為一千里污染。下游——污染、倒灌、淤積；

關中——旱、饑、澇；源頭——乾枯。這不是最壞的。地方官員在為招商引資拍的電視片的解說詞中就敢說：“渭河，一條古老寬廣的河流，她源遠流長，橫貫秦隴。”已經乾涸的泉眼、長了蒿草的河床、異味臭氣熏人眼鼻的污染就能視而不見！

- 河北已經沒有一條河能流到大海。

- 黃河流域污水排放量達 43 億噸，不降反升。

- 黃河突發異常，河水呈現乳白色綿延數十公里昨日上午，黃河蘭州段河面突然出現反常現象，整個河面變成了乳白色，延綿河道數十公里。且河床下沉積了一層白色的渾濁物，岸邊的一些石頭都已經被染成白色，並且還伴隨著一股酸臭味。

- 包頭鋼鐵集團排放毒水直逼黃河，比松花江污染厲害。位於內蒙古包頭市以北 150 公里的白雲鄂博，稀土儲量占全國近八成，因此有“中國稀土之都”稱號。上海《新民週刊》報導，包頭鋼鐵近年在當地開採稀煉鋼，產生的大量廢渣以及未經利用的稀土任意排放到“稀土湖”中。由於稀土含有大量放射性金屬鈾，因此令周邊水土遭受到嚴重的“核污染”。國家計稀土研究專案專家馬鵬指出，包鋼尾礦壩占地 11 平方公里（約相當於香港灣仔區的面積），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堆放尾礦（煉鋼廢渣）1.35 億噸，蓄水 1.5 千萬立方米。由於尾礦壩下沒有防水層，現在尾礦壩毒水正以每年 3 百米的速度，向十公里以外的黃河滲透。尾礦壩地處地震多發帶，一旦發生地震或決堤，肯定比去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嚴重。尾礦壩周邊至少五條村，已受到毒水洩漏嚴重影響，地下水的溶解性固體、硫酸鹽、總硬度、氯化物均超標，屬於不能用於工業、農業或飲用的最劣第 5 類水質。2003 年已一直為村裏的污染問題奔波的老農王銀厚稱，近年地下水污染因為尾礦壩滲漏愈來愈嚴重，他說：“用井水澆菜，一澆就死，誰還敢吃水？不僅水不能吃，種出來的蘋果梨也不能吃，吃了包你拉肚子！”

- 環保局副局長潘岳說：中國環境污染的代價是毀滅性的據德國世界報的消息，中國環保局副局長潘岳上周 6 在“南郵晨報”發表文章，稱中國離環境災難的距離並不遙遠。而新華社援引專家的話發文說，將全國的水質重新恢復潔淨，達到正常標準，需要數百年時間。潘岳還寫道，根據較為現實的估測，環境污染繼續以現在的速度發展的話，每年環境破壞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高達國民收入的 13%。換言之，自中國 70 年代末積累的經濟成就因環境惡化將全部抵銷。潘岳認為，我們必須開始償還這筆帳，不要讓它越堆越高，直到完全破產、全盤崩潰的那一天。潘岳還認為，環境污染的嚴重後果基本由最下層的老百姓承擔，幾乎沒有人關心那些貧困、無權勢人的基本生存現狀。三分之一的中國城市空氣嚴重污染，四分之一全國百姓飲用的水質沒有達到基本的清潔標準。幾乎每隔一天就發生一起嚴重污染水源的事故。中國環保機構發出警告，要求中國趕緊重視環保，採取有效措施。如果不這樣做，中國將發生難以想像的環境危機，吞噬 30 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專家稱，90%的中國城鎮飲用的水源都有毒素存在。

我們的子孫後代將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無立錐之地，將面對長江黃河無涓滴之飲！

中華民族曾歷經諸多劫難，無論多麼可怕的劫難，都不曾像今天這樣毀掉了民族生存的基本條件。

中華民族早已不可挽回地越過了國土正常承載力；我們正在向生命支援系統的總崩潰步步逼進；距離中國崩潰的生死界線，人口是3—4億，時間是15至30年；最悲觀的預測是：由於中國生態環境各子系統全面告急，任何時候都會因一環斷裂而引發總體崩潰；最樂觀的預測是：人口可能在這條生死線上停步，亦即中國有可能免於崩潰，而長久地在生死邊沿掙扎。

鄭義在書的最後說：“在根本的意義上，生態平衡是鐵律。這顆藍色星球是不會沉沒的。不堪重負時，它只須輕輕一抖，去除那屬於超載部分的人類，隨即便恢復優美的平衡。……”

恐怕不盡然。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本身相對地球總表面積來說就不是一個小數，是2%；是地球陸地表面積的6%，加上也在潰爛的南亞大陸，將迅速被波及影響且本身大部分地區是荒原、沙漠的北亞、西亞，整個亞洲是個潰瘍區，是地球陸地表面積的30%！還有16億將變得窮兇極惡，無臉無恥的蟻民——黃禍之預言，不幸就要應驗了！比黃禍還大的災禍，不久也將可能來臨了！

中共頂級高幹的子女二百多人已移民美國，大部聚居在美國某州的某一高級住宅區。這是美國媒體在陳水扁要當總統，大陸威脅要打臺灣時的報導。美國有名單，可以把這些人當人質。這些人大批地去美國，很少去歐洲。如果單是政治原因的避難，北歐的富有，地中海畔的氣候，都應該是首選。這些人是可以看到機密文件的，是對中國生態破壞的現狀瞭解的；他們不選擇歐洲而避難美洲，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小說《黃禍》問世後，筆者的一位在匈牙利的朋友因這本小說被匈牙利國家有關研究機構請去，徵詢對黃禍的看法。可見歐洲對此早就不敢掉以輕心，予以高度警惕、防範。只是大陸的升斗小民直至學者專家一直被蒙在鼓裏罷了。

中國，在劫難逃了！

生態環境的警鐘長鳴，這是最近一個月來觸目驚心的有關中國大陸生態環境的報導。一樁樁一件件天大的危機全都是最正常不過的小事，對中國貪官只聽得見銅板聲響的耳膜已經不起任何作用，對芸芸眾生麻木的神經也毫無影響。正常的人不要想明天！那會不寒而慄，沒法想下去。麻木在這個時候大有好處，得過且過，混吧，天塌下來有長子頂著。喝酒、吃肉、數錢、跑路。只要有錢，到哪兒不活得好好的！

鄭義，你是獨一無二的。一語驚醒夢中人，你想把萬難毀壞的鐵屋子裏沉睡的人驚醒。但正如你自己說的“真正令人揪心的，並不是生態平衡，而是我的民族……”。這些人恐怕不易被驚醒，也有人不願他們被驚醒，因為一旦醒來，也許並非絕無希望……

願每一個還想活下去，還想兒孫活下去的中國人都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不管你是誰！是中共的主席、總理、高官、貪官、小吏，是擁有億萬資財的暴富，是小本經營的店主，是學富五車的學者、教授、作家，是下崗的工人，是種地的農民，是基督徒，是法輪功，是民運人士，是異見者，是奴才，是叛逆，是揭竿而起造反的黔首，是誓死保衛共和國的英雄，是乞丐，是偷兒，是強盜，是警察，是士兵，是男人，是女人，是老人，是孩子，……在大自然面前，真正的人人平等，大自然災難性的毀滅決不會區分尊貴和卑賤、貧窮和富有。

第二十一章 明天，你在哪里？

文化有末日否？有毀滅否？

西方文化的歷史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埃及文化毀滅了，羅馬文化成廢墟了，希臘文化只剩下神話故事了，瑪雅文化不見了，印地安文化留在電影裏了，小亞細亞文明、波斯文明也只在歷史教科書裏出現了。

中國呢？西夏文字殘篇至今無人能解，樓蘭古國被風沙整個吞沒。

宋大儒朱熹對這個問題有文學性的論述：“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朱子語類·卷一》）

唐杜甫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湖萬古流”詩化語言與朱熹的“人物都盡，又重新起。”約略同。只是杜甫的意思是針對具體的個人，不是朱熹般地從大文化的角度來說事。

千年前的朱熹認為天地不會壞，其實就是認為文化不會毀滅，會一代代傳承下去，會一如既往地傳承下去。此處不傳，彼處傳；此人不傳，彼人傳。依朱熹之論，衡之當世，應該是：縱大陸“人物都盡”，港臺、東南亞、日韓、北美諸地，能“又重新起”。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生態破壞生態崩潰的當今現狀。大陸的生態崩潰會連帶及港台、東南亞、日韓以至整個世界。

當然，這是極而言之。即大陸，也是存在著“……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的可能，何況天下之大！只是果真有那可能，那將會出現一段十分漫長而痛苦的歷史時期。

被稱為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早在前世紀初，就提出了世界文化三大路向之說：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三大文化路向代表了三大不同的人生問題和人生態度。

西洋文化是人對物的問題，其人生態度是向外用力的態度。“現在總說作：從身體出發。”

中國文化是人對人的問題，其人生態度轉而向內向裏向心用力的態度。“現在說作：從心（理性）出發。”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是佛家的出世文化。

梁漱溟論西洋文化曰：

西洋文化的淵源所自、世稱“二希”——希臘（Hellenism）、希伯來（Hebrewism）。羅伯特生（Frederic Robertson）論希臘思想有數點甚為重要：（一）無間的奮鬥；（二）現世的主義；（三）美之崇拜；（四）人神崇拜。可見他們是以現世幸福為人類之標的的，所以就努力往前去求他。這不是我向所說的“第一路向”是什麼？而希伯來思想是出於

東方的——竊疑他遠與印度有關係。他們與前敘希臘人的態度恰好相反，是不以實現幸福為標的——幾乎專反對現世幸福，即所謂禁欲主義。他們是傾向於別一世界的——上帝、天國；全想出離這個世界而入那個世界。他們不順著生活的路往前走，而翻身向後了，——即是我們所謂“第三條路”。西方自希臘人走第一條路就有許多科學、哲學、美術、文藝發生出來，成就的真是非常之大！接連著羅馬順此路嚮往下走，則又於政治、法律有所成就，卻是到後來流為利己、肉欲的思想，風俗大敝，簡直淫縱、驕奢、殘忍、紛亂的不成樣子！那麼，才借著這種希伯來的宗教——基督教——來收拾挽救。這自然於補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雖然不能使那個文明進益發展，卻是維繫保持之功實在也是很大。然而到後來他的流弊又見出來了。一千多年中因為人們都是系心天國不重視現世，所以奄奄無生氣，一切的文化都歸併到宗教裏去了。於是哲學成了宗教的奴隸；文藝、美術只須為宗教而存；科學被擯，迷信充塞，乃至也沒有政治，也設有法律。這還不要緊，因為教權太盛的原故，教皇教會橫恣無忌，腐敗不堪，所以歷史稱為中古之黑暗時代！於是有“文藝復興”、“教宗改革”的新潮流發生出來。所謂“文藝復興”便是當時的人因為借著研究古希臘的文藝，引起希臘的思想、人生態度。把一副向天的面孔又回轉到人類世界來了。而所謂“宗教改革”，雖在當時去改革的人意思或在恢復初時宗教之舊，但其結果不能為希伯來的路向助勢，卻為第一條路向幫忙，與希臘潮流相表裏。因為他是人們的覺醒，對於無理的教訓，他要自己判斷；對於腐敗的威權，他要反抗不受，這實在同于第一路向的。他不知不覺中也把厭絕現世傾向來世的格調改去了不少。譬如在以前布教的人不得婚娶，而現在改了可以婚娶。差不多後來的耶穌教性質逐漸變化，簡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幫手，無復第三路向之意味。勉勵鼓舞人們的生活，使他們將希臘文明的舊緒，往前開展創造起來，成功今日的樣子；而一面教權封建權之倒，復開發近世國家政治、社會組織之局面。總而言之，自文藝復興起，人生之路向態度一變，才產生今日所謂西方文化。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單看那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學、德謨克拉西的面目，而須著眼在這人生的態度，生活路向。要引進西方化到中國來，不能單搬運，摹取他的面目，必須根本從他的路向、態度入手。但是四五年來，大家只把科學方法，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說來說去，總少提到此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P381）

上世紀初的這一段議論將西方文化的本質予以透徹的剖析，其長處短處一目了然。

梁漱溟論中國文化曰：

“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中國文化“精神移用到人事上，於物則忽略。既不是中國人笨拙，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認為世界文化的明天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梁漱溟說：“除了信賴人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這是何等精神，人類便是再進步一萬年，怕亦不得超過吧。”又說：“問題在人，問題之解決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賴人，又怎樣？信賴神嗎？信賴國家嗎？或信賴……嗎？”（《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認為世界文化的終極是走印度文化一路。這恐怕同梁漱溟本人從少年起就是虔誠

的佛教徒不無關係。本章不论。

西方文化偏物質、偏欲，中國文化重心靈、重情。在物質極大豐富，可各取所需的未來社會中，欲的需求都能得到完全的贍足；而靈的、情的追求、平衡、滿足則永無止境。

西方文化將心靈、感情的追求、平衡、滿足向外用力，終極指向寄託於宗教、上帝。

中國文化則向內向裏向心用力，返諸自身、自己、心靈、理性。

中國文化在這一點上、在這根本性的一點上，與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中國文化就是追求、平衡、滿足心靈、情的文化。儒家重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是向裏向內向心的文化；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首重個人自我修養的完善完美，家、國、天下居次。“進為良相，退為良醫”，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至善至美，圓融柔和，益人益己益世的文化；它同純然的奮爭，非要如何，非此即彼的文化是迥然不同、高下有別的。這在將來的世界，是會顯示出巨大的作用來的。

向內向裏向心用力，返諸自身、自己，是自身理性的徹悟，這有別於向上帝傾訴。無論是苦難還是仁義，都是自身自己的事。這與從耶穌基督處索取大愛、把苦難推給上帝寄望於上帝的悲憫理解，是迥然有別的。自身的徹悟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1935年1月，王新命先生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諸先生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考諸兩宗宣言，都有出臺的社會背景或事件基礎。上世紀三十年代號稱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什麼阻礙地實行“拿來主義”，崇洋趨新成為時尚，王新命諸人是針對國人西化風尚有感而發，要求國人心中有文化本位的觀念。至於五十年代，牟唐張徐諸人在臺灣發表的文化宣言，則是一批真誠的儒者，或說以中國文化自命的踐履者們，激於羅素等西方大哲骨子裏的“西方中心主義”而發佈的莊重的聲明。

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諸新儒家的宣言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蘊涵著民主思想的萌芽，這同西方的民主憲政是有共通、相容之處的；歷史的發展，需要中國建立民主制度。

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思想萌芽與西方的民主憲政熔於一爐，是中國未來文化的走向。

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四位浸淫西方文化日久，不同于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馮友蘭諸儒學大家囿於大陸，故他們於東西方文化如何熔於一爐的見解，有別於梁馬諸公者。但是必須明白無誤地指出：這是在他們全都一致地立足于中國文化本位的大前提下，也就是筆者在第四章所說的：“中國需要以中華文化為主地來接納消化西方文明。”雖然這是老掉牙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老生常談，但在這一根本問題上，新舊儒家的“老生”“新生”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同梁漱溟世界文化的明天是走中國文化路向說大體一致的。

近年來，大陸儒學昌盛，各地有讀經堂之類的學校興辦，以教育《三字經》、《弟子規》、

《論語》、唐詩宋詞……為主。值此沉淪墮落之世，儒學沉渣泛起乎？迴光返照乎？重掀波瀾乎？幫忙乎？幫閒乎？論者見仁見智。以大歷史角度視之，以三大文化路向觀視之，在物欲高漲氾濫的時刻，人心重歸本位，向裏向內，尋找、追求靈與情的平衡、滿足，無論膚淺深刻，都是好事。哪怕只是曇花一現，也是穿透沉沉黑幕的一縷光明，帶來中華文化復興的一絲可能和希望。

最近榮獲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譽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的余英時先生在頒獎儀式上說：“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轉引自《中國時報》）

余英時以“道”詮釋中華文化，將孔子、老子、墨子以及所有優秀的傳統文化包羅歸納進來，名以“道”之大概念。

基督文化有創世紀、有世界末日。“儒家沒有‘創世紀’，也沒有‘世界末日’，但是隨時都可以是‘創世紀’或‘世界末日’。”（余英時語）這正是儒家文化的“道”異于其他文化的高明之處。

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荀子曰：“天地始者，今日是也。”《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是創世紀的意思，隨時都是創世紀的意思；反過來看這些話，也就是混沌初始，始終如一，亦世界末日也。這是中國文化的“道”準確透徹簡明扼要地詮釋自然、天地、當世的典範語言！

縱觀近現代史，在西方文化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的景觀下，中華儒學的復歸曇花屢現。曇花絕美，一現足觀；屢現者，正是留戀不去，生命力時時勃發的徵候。既屢屢“一現”，“一現”亦即“永現”，庶幾曇花轉為“天花”，遍撒中華，儒家之道復歸，汲取西學精華，融為一體，中華文化復興可期也。

筆者服膺梁漱溟世界文化三大路向之說。世界的明天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明天無論有無，都在我們人人心中！願人人自省，向內向裏向心，為中國明天的存活和到來努力。

後記

丙戌年底，書稿畢而發友人徵求意見，有置之高閣者，有一氣讀完者，有指謬而誠懇批評者，有出資在大陸地下印制者，至有贈款鼓動在海外正式出版者。置高閣者，自是警策之意；讀完者，誠鼓勵也；在大陸印制者承擔風險，感佩莫名；指謬者，多以書名“中國沒有明天”不當責，余答以：“……至於全書大概，正是“有没有”的大问号；書名不用‘有没有’，或加‘吗？’，不过是避俗避平，引人震悚之意，且我是持大悲觀態度的，故仍舊吧。”贈款者，余報以實際行動：幾經周折，終得香港開益出版社青睞下顧，同意出版。

如此，拙書稿得美國《民主論壇》首發連載，獨立中文筆會、《博訊》、《多維》、《萬維》、《大紀元》、《關注中國中心》以及大陸諸網站轉載，繼以香港開益出版社正式出版作結。

謹向《民主論壇》洪哲勝博士、香港開益出版社、《博訊》、《大紀元》、《多維》、《萬維》、《關注中國中心》以及大陸諸網站致以深切的謝意。

書印出來了，請大家來買我的書！有錯愛者，在大陸和加拿大傳閱這本小書，承謬讚還可能吸引人看下去。每本 80 港元，約合 10 美元，童叟無欺，貨真價實。快來買，快來買！特別是老朋友，請幫個人場，每本 20 美元，買一本送一本；多介紹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來買，保證書不會是兔子湯的湯的湯。印數有限，存書無多，先來先買，賣完再印。機會難得，切莫錯過。

購書處分別是：

香港：

香港机场、各大书店。也可直接或电话与以下书店地址联系：

田园书屋 香港九龙西洋菜街 56 号 2 楼 电话：852-2385 8031

开益书店 铜锣湾骆克道 520 号 1 楼 电话 852-2836 6387

美国销售点：

41-58 71 ST 5B

WOODSIDE NY 11377

U.S.A

電話、信箱：1-718-2743331 qunli99@hotmail.com

联系人：陈立群

支票抬頭寫：LI QUN CHEN

歐洲購書者支票寄美國，書從歐洲寄。

歐洲聯係電話信箱：34-91-4756874 hhq65@hotmail.com

聯係人：黃河清

加拿大銷售點：

SUITE#346, 300-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ALBERTA T3K 2A8

CANA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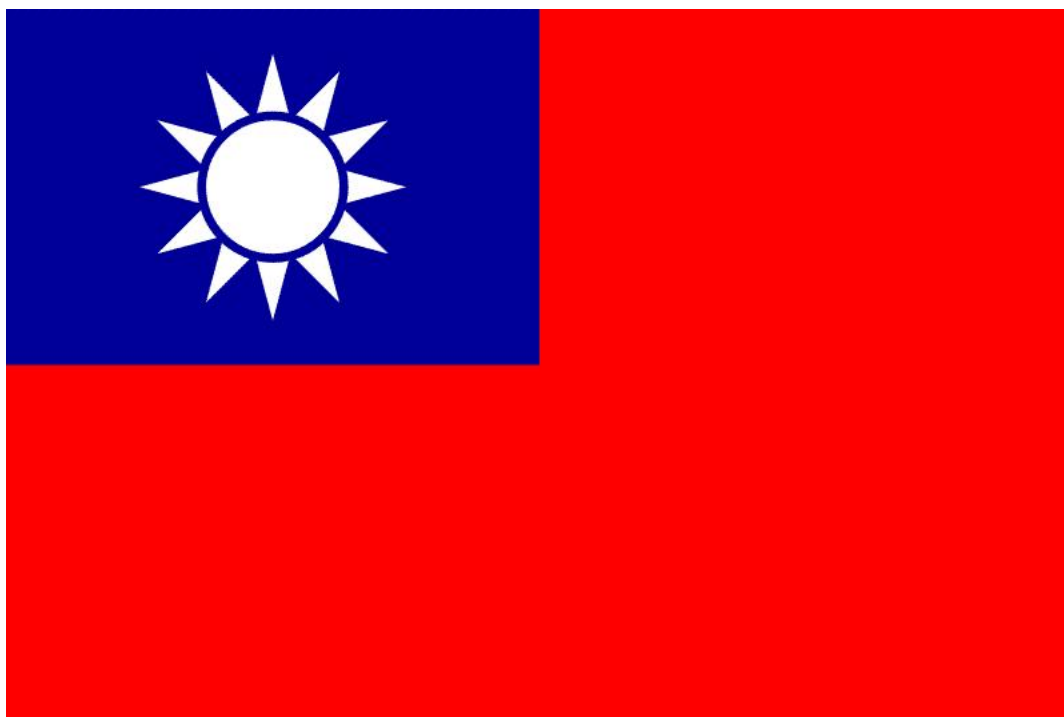
電話、信箱：1-403-4732880 ooo89523@hotmail.com

联系人：鲁德成

支票抬頭寫：LU, DE CHENG

不要忘了外加郵寄費每本 2 美元。真的忘了不要緊，也保證寄到。咬牙虧血本！不对不对，撒謊的不好。明人面前不说假話，不會賠不會賠，不賺罷了。在下寫書，本來就是侍候諸位看的，諸位願看，是在下的榮幸，哪能還能賺您的錢呢？您說呢，買我書的大姑小姨老少爺們，謝您還來不及呢！

黄河清 丁亥年立夏日於地中海畔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